

动物的复仇,抑或人性的畸变

——论托卡尔丘克长篇小说《糜骨之壤》的生态叙事

汪树东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长篇小说《糜骨之壤》是201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的代表作之一。该小说聚焦于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凄厉诉求和悲惨命运,把犯罪谋杀故事的通俗性和生态叙事的先锋性融于一体,呼唤现代人生态意识的觉醒,超越物种歧视,与其他自然生命共生共荣。该小说题材独树一帜,构建了一种孤独个人反抗庸众的启蒙叙事,其互文和反讽手法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不过,该小说缺乏动物视角和复调叙事,生态维度和灵魂维度缺乏平衡,从而使其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关键词:托卡尔丘克;《糜骨之壤》;动物保护;生态叙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01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01-08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推进,现代人日益以征服自然、支配自然为能事,对动物也日益残暴;但与之同时,动物保护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也风起云涌,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峻,意识到保护动物的重要性。反映到世界文学中,生态文学日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作家投身其中,细诉原委,摇旗呐喊。荣获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女作家托卡尔丘克便是一个典型,她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她对现代文明造成的气候危机、生态危机忧心如焚,在小说中屡屡反映严肃的生态问题。她的长篇小说《糜骨之壤》出版于2009年,犀利地呈现了现代文明的生态盲区,聚焦于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凄厉诉求和悲惨命运,把犯罪谋杀故事的通俗性和生态叙事的先锋性融于一体,呼唤现代人生态意识的觉醒,超越物种歧视,与其他自然生命共生共荣。

一、现代文明的生态盲区及危害

《糜骨之壤》讲述的是弱者为谋求动物权利而

大胆谋杀人的凄厉故事。小说主人公名叫雅妮娜·杜舍依科,年轻时曾当过桥梁建筑工程师,在叙利亚、利比亚建造过桥梁,但因为身体的病痛不得不返回波兰,先后干过多种工作,快退休时好不容易来到波兰和捷克交界的普瓦斯科维什高原,远离城市,靠近森林,买了座小房子栖身。小村子只有不多的几座房子,大部分是城市人春夏季节度假用的,到了漫长的冬天,只有杜舍依科和两位男邻居留守。杜舍依科成了邻居房产的看护人,还被聘为邻近小镇小学英语教师。杜舍依科坚持素食,喜欢森林里的野生动物,与两只狗相依为命。但当地小镇的男人们喜欢到森林里狩猎,杜舍依科屡次向警察局、市政局反映问题,呼吁保护动物,当局均不闻不问。最令她无法忍受的是她的两条狗居然被猎人们当作猎物打死,于是她决定代替动物复仇。她在半年多时间里先后谋杀了一个名叫大脚的盗猎者、小镇警察局长、首富福南特沙克、一个被称为董事长的成功人士,还有沙沙神父。同时,她也向市政局管理人员、在教堂向神父和信众反复申说人类残害动物的罪

收稿日期:2021-06-10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史暨生态文学大系编纂(1978—2017)”(17BZW034)

作者简介:汪树东(1974—),男,江西上饶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外文学、生态文学研究。

行,呼唤保护动物权利。最后她在朋友的帮助下逃脱警察的追捕,来到一个原始森林的昆虫观测站暂避风险。

贯穿整部小说的根本冲突是猎杀动物的男人和保护动物的女人之间的冲突,最终这种冲突以弱者的绝望反抗和强者的惨遭谋杀为结束。而要理解这种冲突,则需要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视野。

首先,必须关注的是,现代文明过于强硬的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了特定的生态盲区。自从现代文明转型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一直是最强音。无论是西方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人类中心主义,都只承认人类的内在价值,而不承认非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培根、笛卡尔、康德等现代性的奠基哲学家无不如此。

在《糜骨之壤》中,除了杜舍依科和昆虫学家波罗斯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信徒,尤其是警察局长、福南特沙克、董事长、沙沙神父等社会的头面人物,他们拥有金钱、权力、意识形态控制权,但在他们看来,狩猎野生动物是天经地义之举。当杜舍依科在森林里发现一只被打死的野猪,向市政局管理人员告状时,管理人员大惑不解,说她对动物比人有着更多的同情。其潜在之意,却是对杜舍依科过于关心动物的人类中心主义式的谴责。当狗被猎人打死后,杜舍依科非常悲痛,因为她把狗看作唯一的亲人,家庭的一分子,看作她的女儿,但是沙沙神父却说她是在亵渎上帝,“不可将人与动物相提并论。建这种墓地是罪过,是人类的傲慢。上帝将动物置于低人一等的位置,它们应该服从人类。……动物没有灵魂,非不朽之身,不会得到救赎”^[1]。对于沙沙神父而言,上帝只是人类的上帝,不可能是动物乃至植物的上帝,因此人类不可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把道德的范围扩展到其他自然生命。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盲区,造成了小镇狩猎队的肆无忌惮。沙沙神父不惜以宗教形式为猎杀行为做辩护,“猎人是上帝的使者与伙伴,他辅助上帝创造并照顾动物们。人类生活的大自然需要我们的帮助才能生生不息。猎人们狩猎符合捕猎法则”^[2]。但是,无论沙沙神父如何辩护,都无法改变猎人残杀野生动物的事实。

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很容易塑造出无限度地掠夺大自然的贪婪之人。例如《糜骨之壤》中的大脚就是这种典型人物,他丑陋粗鄙,心智混沌,出生于普瓦斯科维什,对当地森林非常熟悉,但是他能够想到的只是靠山吃山,“他把森林当作自己的私产,森林里的一切都属于他,一个典型的掠夺者……大

脚依旧是走着他的老路,肩上扛着捕猎网,发出残暴的喊叫声,就像一个小小的、凶狠的精灵,恶毒且喜怒无常。他总是醉醺醺的,也许酒精激发了他潜在的邪恶。他会用棍子敲打树干,好像要将它们从他的道路中间推开。他似乎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出生的”^[3]。他不会欣赏森林之美,也不会关心麋鹿的生存权利,因此他参与狩猎,杀死麋鹿之后,大吃鹿肉。而福南特沙克开办狐狸养殖场,也是不择手段地残害动物生命。至于警察局长、董事长、沙沙神父等人无不痴迷狩猎,都是不知悔改的自然掠夺者形象。

其次,需要关注的是现代文明阴暗的异化力量。美国生态思想家斯普瑞特奈克曾说:“现代世界观强行造成了人与周围自然界、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破坏性断裂。”^[4]现代文明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信奉主客二元论,推崇工业化、城市化,塑造出脱离血缘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的原子化个人,结果让人日益远离大自然,陷入个人主义的孤立陷阱,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现身心异化的悲剧。

在《糜骨之壤》中,托卡尔丘克对个人主义的生命困境有着颇为深邃的描绘。如警察局长、福南特沙克、董事长这样的所谓成功人士,他们相信个人奋斗,相信要在社会上攫取金钱、权力和地位;但是他们纵情声色,普遍缺乏同情心,呈现了成功人士的人性沦落。而像杜舍依科这样的人物,自己甘愿处于社会的边缘,处于寂寞无闻的状态,也有一种失落感。在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价值体系中,杜舍依科和迪迦、“鬼怪”“好消息”等人都是失败者,是社会的冗余物。当然更为可怕的困境是——个人主义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极为艰难。作家“灰女士”曾对杜舍依科说:“有时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自己描绘意义的地图……之后便穷尽一生为自己设想的东西奋斗。问题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义图景,正是因此人们才难以互相理解。”^[5]的确,现代文明就是上帝已死、诸神纷争的时代,每个人都执着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意义图景,于是自我与他人难以理解,深沟大壑包围了人。因此,小说《糜骨之壤》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现代人与人之间无法理解的观念悲剧。

身体—生态叙事也是《糜骨之壤》中的一个重要亮点。托卡尔丘克对人的身体颇感兴趣,认识到身体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她借女主人公杜舍依科之口说:“脚上藏着关于人类的所有秘密,它能告诉我们身体的重要意义,即我们是谁,我

们与自然的关系。它与大地接触,而正是这个大地与人体的接触点上藏着所有的秘密——我们是由物质构成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一点。脚是我们的插头。”^[6]然而现代人远离大自然,不但无法通过脚这个插头与大自然联通,而且往往以脚践踏大自然。正是远离了大自然,人的身体似乎也退化为没有生机的惰性物质,例如小说开篇就写到大脚死后尸体的丑陋与枯萎。远离了大自然,身体也很难维持健康,例如杜舍依科就被身体的各种病痛缠绕,似乎表明了大自然的生态危机和个人的身体病痛正是一体两面,大自然和人的身体是唇齿相依、息息相关的。

可以说,正是现代文明过度强硬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造成的生态盲区,再加上过度的工业化、城市化使得现代人日益远离大自然,陷入个人主义的生活困境,造成身心异化;现代人把大自然降格为资源库和垃圾场,任意掠夺,肆意妄为,于是自然溃败,生态危机爆发,现代人饱尝生态破坏之恶果。在《麋骨之壤》中,托卡尔丘克对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对生态的破坏忧心忡忡。小说写到普瓦斯科维什的采石场,“采石场一点一点地侵蚀了这个地方,最后用自己的铲子将普瓦斯科维什吞没。好像曾经还有计划要重启采石场,也许那时,我们已消失在被机器吞蚀的地球表面”^[7]。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机器不断吞蚀地球的过程,就是机器到处摧毁原生态的大自然的过程。最终当普瓦斯科维什被铲子吞没时,现代人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二、生态人格的崇高与悖谬

当然,《麋骨之壤》的最大贡献是塑造了杜舍依科这种独特的生态人格。杜舍依科是一个生性敏感、性情极为矛盾乃至暧昧的人。她主动疏远他人,和男邻居“鬼怪”一样较为孤僻,即使寒冬到来,也依然坚持住在普瓦斯科维什小村。她敢于坚定地代表动物向大脚、警察局长等人复仇,先后杀死他们,但是不能说她具有反社会、反人类人格,她对待无法适应社会的男学生迪迦和不得不到二手店里当售货员的小女孩“好消息”都非常友善,与男邻居“鬼怪”也合得来,和昆虫学家波罗斯更是情投意合。真正让她成为小镇中与人格格不入的疯老太婆的是:她坚持反对男人们狩猎,反对残害动物;她为了保护动物,不惜向人类复仇的坚定意志和残忍举动。为了阻止小镇男人们的狩猎,保护森林中的鹿、野猪等野生动物,杜舍依科曾经当面冲撞狩猎队,驱赶他们,但是无济于事;她还曾经无数次跟踪大脚,搜集他为野生动物设置的铁丝陷阱;她屡次到市政局、警察局

去告状,但同样无济于事。当她发现被无辜杀死的动物后,她就把这些动物埋葬在一起,修建了墓园。可以说,如果能够以合法合理的手段阻止小镇男人们狩猎,能够保护野生动物,杜舍依科绝对不会铤而走险,连毙数命。这无疑是在当今社会动物保护主义者与人类中心主义者决绝冲突的悲剧。

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杜舍依科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悲剧典型。托卡尔丘克在塑造杜舍依科这个形象时,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杜舍依科痴迷于占星术,另一是她极端爱护动物,是个坚定的素食主义者。占星术往往把人的性格、命运看作是被他出生时的星座决定的。占星术在现代社会中再次勃然兴起,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有关。现代人告别了稳固的精神信仰,也告别了稳定的家园和工作,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很容易产生人生的无所归依、命运飘忽不定之绝望感。而占星术的决定论,似乎让人捕捉到了一种人生的稳定感。杜舍依科曾说:“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已经没有哪个地方能够让我产生归属感,让我真正眷恋。那些度过童年与青春的地方、昔日度假的乡村、初恋时那个长椅不太舒服的公园、曾经生活的城市、咖啡店和家,都已不复存在。让人更心痛的是,即便它们的形态外观依旧,也早已人去楼空只剩空壳。我无处可归,似是被锁在囚笼。”^{[1]179}杜舍依科的“无处可归”感,就是托卡尔丘克的《云游》等小说中反复描绘的现代人漂泊无根的生存状况。占星术的决定论,恰恰是针对这种“无处可归”感的一种安慰剂。

当杜舍依科这样无处可归的现代人要寻找人生的归宿和情感寄托时,她往往更倾向于到大自然中去,到动物身边去。这也正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大自然,渴望返回荒野,也渴望养育宠物的根本原因。杜舍依科非常喜欢独自在森林漫步,观看鸟飞兽奔,感悟万物生机……在森林中看到田鸫和喜鹊时,杜舍依科会由衷地感叹:“世界是多么的伟大,到处是蓬勃的生命。”^{[1]110}正是万物蓬勃的生命感染了她,使得她暂时摆脱身体病痛的折磨,感受到生命的美好。而且杜舍依科的生态视野非常开阔,想象力丰富。“在田间或野地徘徊时,我喜欢想象这里百万年后的样子:还会有一样的植物吗?天空的颜色还是这样吗?地壳板块会移动而形成山脉吗?是否会出现海洋?在海浪的缓慢移动中地点一词将不再被使用?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这些房子一定不在了。我的努力像针头一样渺小而微不足道,正如我的生命。”^{[1]160}可以说,大自然的宏大解救了解现代人过度

自我中心主义的困扰,让人能够从更为宏大的层面来把握生命、理解自我,意识到自我的渺小,这恰恰意味着精神的破壳而出。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杜舍依科能够建立较为自觉的生态整体观。现代文明素来推崇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但是生态意识强调万事万物的普遍联系,正如德国哲学家萨克塞所说,生态学“要把它理解为研究关联的学说”^[3]。其实,生态世界观就是对现代性的个人主义、分离主义的后现代克服。杜舍依科也从占星术和大自然那里领悟到万事万物间普遍的生态联系,她曾说:“人必须睁大眼睛来关联事实,从别人看到的不同之中找到相似。必须记住,一些事件有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层面上。换言之,许多事情有可能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整个世界是一张巨大的网,一个整体,没有任何事物是孤零零的存在。世界上每一个最小的碎片都与其他的一切经由复杂的通信宇宙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宇宙很难渗透进平庸的心灵。”^[16]所谓平庸的心灵,就是那种相信个人主义、无法感知到万事万物的普遍联系的世俗者的心灵,他们往往受困于孤独,于是渴望通过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来填补心灵的孤独,最终造成对大自然的摧毁性压力。更为重要的是,杜舍依科能够从生态整体观的层面上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承认所有生命都有其内在价值。例如,她曾说:“可我们为要做什么有用之人,对谁有用?是谁把世界划分为有用和无用,又有什么依据?难道飞廉就没有活着的权利?在仓库里偷吃粮食的老鼠呢?还有黄蜂、雄蜂、野草和玫瑰,它们都没有权利活着吗?谁有这样的智慧去评判孰优孰劣?一棵大树蜿蜒曲折,满身树洞,却能免遭砍伐而屹立百年,只因无法用来制作任何东西。像这样的例子使我们这样的人受到不少鼓舞。人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17]想不到后现代社会中的杜舍依科,居然能够和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学家庄子一样领悟到“无用之用”的真理。而且,她大声地为黄蜂、雄蜂、野草、玫瑰做辩护,认为它们也有活着的权利,这是彻底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

引人注目的是,杜舍依科还具有非常明确的生态理想。小说第六章里曾写到她的理想:“半梦半醒之间,我会想到捷克,以及在它之后美丽、柔软的国家。那儿的一切都沐浴在阳光下,散发着金色的光芒。田地、山脚下呼吸,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释放美丽。那里道路笔直、溪流清澈,家家户户的小院里都养着摩弗伦羊、黠鹿,小野兔在谷物堆里嬉戏。他们把小铃铛绑在收割机上,以此用温和的方

式把小动物们吓到安全距离以外的地方。人们不紧不慢、互不争抢、不会白日做梦,满足于自身和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宇宙中有一个地方,还没有毁灭,那里的世界还没有颠倒,伊甸园依然存在。”^[19]杜舍依科的理想,就是人能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现代人不能放纵欲望,就是人的生活、生命丰富多彩,自由自在。

当然,最能够凸显杜舍依科的生态人格特征的是她为动物权利的辩护,是她反对人类杀害动物。小说第七章《给贵宾犬的演讲》中,杜舍依科在市政局向管理人员申诉,意味着她在替动物向人类的权力申诉。她说:“动物能展现一个国家的真相,尤其是这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如果人们对动物残酷行事,那么民主就只是空谈,毫无用处。”^[112]国家向来是人类的组织方式,民主也只是人类的政治运作方式,但是在杜舍依科看来,人类如果不能善待动物,国家和民主就不可能是文明的,而只是野蛮。杜舍依科对人类残害动物、食肉的控诉,是声色俱厉的。她说:“当你们经过商店的橱窗,上面挂着刚从尸体上砍下来的一大块鲜红的肉,你们会认为这是什么?你们根本不会去想,对吗?或者这么说,当你们买肉串或排骨时,实际拿到的是什么?没有什么可怕的吧。犯罪已变得习以为常,成了我们的日常行为。每个人都在爱犯罪。如果集中营成为常态,世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117]的确,成千上万年,大部分人都吃肉,但极少有人去考虑吃肉对动物的残害,更不会把吃肉视为犯罪。但是习以为常,并不意味着正确;每个人都在犯罪,并不意味着这犯罪就属正常。如果能够稍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积习,食肉便会成为难题,素食便是首选。杜舍依科还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动物的身体被制成鞋子、肉丸、香肠、鞋、沙发、床下的地毯,骨头被熬成汤……肚子上的皮变成了人们肩上的包,保暖用的是动物的皮毛,吃着它们的身体,将它们切成小块放到油锅里炸……这一切的噩梦都是真的吗?这是大规模的杀戮,残忍而冷漠,没有丝毫的反思和良心的谴责。也许思想都慷慨地赋予了哲学和神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杀戮和痛苦已成为常态?我们究竟哪里出了问题?”^[118]这是对肉食者、残害动物者最严厉的控诉!这也是生态良知率先觉醒的人的绝望呐喊!也许能够听得进去的人终究只是少数,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人类最深情的良知!无论我们有多少理由反对弃荤茹素,但像杜舍依科这样反对残害动物、食用动物,应始终是令人敬仰的!

食肉者始终认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即使他最终同意在人与人之间放弃这种法则,但往往也绝对不愿意在人与动物之间放弃这种法则。但是对于生态道德彻底觉醒的人来说,人不应认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应该把动物视为等待人类来照顾、安抚、指引的弱者,人道精神应该拓展为众生平等的生态智慧。正如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所说:“人不应‘轻视’‘较低的’生命物种,但也只有人才能‘关照’或‘照料’所有其他生命物种。”^{[4]98}的确,这才是人与动物乃至其他自然生命之间最美好的道德关系。无独有偶,杜舍依科也提出这样的动物伦理,她说:“事实上,人类对野生动物负有重要责任,在生存和适应环境方面提供帮助,给予它们对等的关怀和爱护,因为在这方面它们给予我们的要比自己得到的多得多。要保证它们能够有尊严地活着,给它们买单,使它们能在每学期的营养成绩册上拿到学分。……人们对动物负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带领动物在下一世的生命中走向解放。从依赖到自由,从惯例到自由选择,我们所有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1]117}人类应该关怀和爱护野生动物,而不是杀死它们,把整个世界变成地狱;人类应该意识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渴望自由,朝向自由,因此囊括众生的生态道德亟须建立。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也称为基督教文明,要让动物保护思想深深植入现实社会生活,就必须与基督教文明相结合。但是基督教文明长期奉行较为鲜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早就指出生态危机和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当然,基督教文明中也可以寻找出动物保护、生态智慧的全新路径,例如莫尔特曼在《创造中的上帝》中,就致力于阐释基督教的生态神学。杜舍依科在教堂里当面反驳沙沙神父的狩猎辩护,更是令人震惊。杜舍依科认为:“上帝如何能同时聆听全世界那么多的祷告呢?要是它们互相矛盾怎么办呢?上帝会听混蛋、魔鬼和恶人的祈祷吗?他们会祈祷吗?有没有上帝不存在的地方?上帝会存在于狐狸养殖场吗?他会怎么看待那个地方呢?上帝会在福南特沙克的屠宰场吗?他去那儿吗?我知道这些问题既愚蠢又天真,神学家们一定会笑话我。”^{[1]256}人类想当然地把上帝视为人类的上帝,但如果他是真的上帝,必定同时也是所有众生的上帝,否则他就只是人类崇拜的偶像。当沙沙神父认为动物没有灵魂,认为猎人狩猎、杀死野生动物是为上帝管理这个世界,是促进大自然的和谐时,沙沙神父无疑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因此杜舍依科把沙沙神父视为谋

杀犯,认为他在讲道坛上教唆犯罪,要让他滚下讲道坛。这是动物保护主义者直捣黄龙般的振奋壮举!

当杜舍依科反对狩猎,反对人类残害动物、食肉,积极地守护森林、守护野生动物时,她的生态人格是崇高的,是令人敬仰的。但是,当她说自己只是动物向人类复仇的工具,代替动物去杀死狩猎者时,她就蜕变成了一个令人畏惧的复仇女神了,她的生态人格便呈现出悖谬的一面。杜舍依科说:“它们在这么多人里选中了我,也许是因为我不吃肉。而且它们也希望我能以它们的名义继续行动。它们就像休伯特遇见的那只麋鹿一样出现在我面前,让我在隐匿的角落,成为正义的惩罚之手。不仅是为了鹿,也是为了其他所有动物讨回公道,因为它们在议会里没有发言权。”^{[1]279}的确,动物没有人类一样的语言,无法直接向人类争取权利,于是必须由动物保护主义者代为言说。但是当杜舍依科把自己视为正义的惩罚之手时,她也许就已经僭越了上帝的位置,就像她自己批判那些狩猎者站在狩猎塔上掌握着其他动物的生杀大权,变成篡夺王位的暴君一样。她还说:“如果是恶创造了世界,那么善就一定将之摧毁。”^{[1]283}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善只知道摧毁的话,所谓的善便沦为了彻底的恶。

彼得·辛格和汤姆·里根被视为欧美动物解放运动的理论旗手,他们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在保护动物权利时运用暴力。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中写道:“假如有动物解放运动的成员,试图用伤害人身的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即使只是极少数,都会犯灾难性错误。有些人认为让造成动物痛苦的人受苦,是罪有应得。我不相信报复,要是我相信的话,这会损害我们终止动物痛苦的任务。要做到使动物免遭痛苦,必须改变我们社会中有理智的人们的思想。我们或许以为,虐待动物的人是无情的和麻木不仁的,但是,如果我们伤害了这些人的身体,或者威胁要进行伤害,我们自己也变得残忍和麻木不仁。暴力只能孕育更多的暴力。”^{[5]5}在彼得·辛格看来,动物解放运动只能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所倡导的非暴力道路,舍此别无他途。汤姆·里根也曾说:“动物权利倡导者必须明确公开地从根本上远离纵火犯和其他暴力犯罪。”^{[6]24}并不是辛格、里根不爱护动物,不为人类残害动物的罪行感到愤慨,而是他们深切知道如果以暴制暴,最终只能导致更为可怕的暴力,只不过让当事人快意一时,但终究于事无补,甚至使得生态更趋恶化。

三、生态叙事的特质与局限

就生态叙事而言,《麋骨之壤》的题材独树一帜

帜,给读者深刻印象。欧美作家展开生态叙事,与美国好莱坞电影的癖好不约而同,多喜欢以科幻小说展开,著名的有君特·格拉斯的《母鼠》、多丽丝·莱辛的《幸存者回忆录》、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等长篇小说,也许此种叙事有利于以极端的想象震惊读者,促人梦醒。至于爱德华·艾比的长篇小说《有意破坏帮》讲述了环保激进分子阻挠美国西部土地开发的故事,法利·莫厄特的《被捕杀的困鲸》《与狼共度》《屠海》《鹿之民》主要关注加拿大人过度屠杀鲸鱼、狼、驯鹿等造成的生态危机,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崩塌的山岳》则讲述了吉尔吉斯斯坦生态意识觉醒的记者如何保护天山雪豹免遭中东石油大亨的猎杀。而中国的生态叙事多关注局部地区的物种灭绝或生态恶化等问题,较著名的有叶广苓的《老虎大福》、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李克威的《中国虎》、贾平凹的《怀念狼》等小说关注老虎、豹子、狼等明星物种的灭绝命运;杨志军的《环湖崩溃》、姜戎的《狼图腾》、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吴仕民的《故林旧渊》则关注青海湖区、内蒙古草原、可可西里、鄱阳湖区等地区的生态恶化问题;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则关注东北大兴安岭森林遭伐、鄂温克人的生活模式被迫改变等问题。应该说,在世界范围内,像托卡尔丘克《糜骨之壤》这样关注当今社会中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并彰显出他们孤注一掷敢于以非法的暴力手段反抗残害动物者的悲剧精神,的确是空谷足音,弥足珍贵。

在艺术手法上,《糜骨之壤》采用了悬疑犯罪小说的形式,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阅读趣味。世界文学作品中的生态叙事要么采用科幻形式,要么采用现实主义形式。科幻多刺激,能够引起人的好奇与兴趣,但是未必适合激发读者的生态意识,读者往往会认为所谓的生态危机都是未来的,与当下无关;而现实主义的生态叙事,往往过于拘泥于现实,缺乏足够的艺术距离感,很难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而《糜骨之壤》关注的是现实社会中的动物保护问题,但采用的是悬疑犯罪小说的形式,既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容易促使读者反思人与动物的关系,反思动物权利问题。《糜骨之壤》开篇就写杜舍依科和邻居“鬼怪”一起处理突然死亡的大脚的尸体,随后小镇上开始相继出现警察局长、福南特沙克、董事长等人的蹊跷死亡,当小镇人人都人心惶惶时,杜舍依科却说是动物在复仇;读者急于想知道他们的具体死因,最终沙沙神父被烧死后,杜舍依科给“鬼怪”、迪迦他们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狩猎队炫耀猎

物的照片,照片上就有杜舍依科的被杀死的两只狗,于是真相大白,杜舍依科承认了所有谋杀,但是她坚称自己是代替动物复仇。杜舍依科敢于挑战人类优先的不成文法,敢于为了保护动物而去杀人,这的确是对所有人类中心主义者的当头棒喝,也以凌厉的姿态逼迫现代人直视动物的生存权利问题。

《糜骨之壤》具有较为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还在于它有意构筑了一种孤独个人反抗庸众的启蒙叙事。众所周知,启蒙运动直接塑造了现代文明的基本框架,但是当现代文明造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第二次启蒙就变得迫不及待。杜舍依科就是一个孤独的生态英雄,她认识到现代文明的生态盲区,深深地领悟到生态智慧的核心内涵,呼唤人们从对动物的残害中觉醒过来,尊重动物,敬畏生命。但她所领悟到的生态智慧,在当今社会还只有少数人才拥有,大多数人还沉浸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中,对生态危机不闻不问,对动物的痛苦置若罔闻。因此在小镇的世俗人眼中,杜舍依科是一个失去理性的疯狂老太婆;但是从生态智慧的角度来看,杜舍依科却是一个孤独的先知先觉者。杜舍依科单枪匹马地反对小镇上伤害动物的人们,就像易卜生话剧《人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维护真理、反对当时的社会一样。让孤独个人反抗庸众的启蒙叙事与生态叙事相结合,极大地增添了生态叙事的艺术魅力。应该说,这种启蒙叙事与生态叙事的结合,在中国当代小说及电影中也有所表现,如雪漠的《大漠祭》、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等长篇小说,以及陆川导演的电影《可可西里》等。这也体现了人性和艺术的普世性。

互文与反讽,也是《糜骨之壤》增添生态叙事艺术魅力的两种策略。首先谈互文。小说篇名就引自威廉·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的《地狱的箴言》,原意为“用你的犁碾过亡者的尸骨吧”,表达的是布莱克离经叛道、勇往直前的先知精神。而《糜骨之壤》中的杜舍依科,就是一位布莱克式的先知先觉者,她为了保护动物敢于谋杀狩猎者,也是用她的“犁碾过死者的尸骨”。因此两者构成一种互文关系。此外,该小说每章前面都引用了一句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其中大多数与动物有关,多是呼吁人们能够聆听动物的痛苦申诉的。例如,第二章开篇引用的诗歌是:“一只狗饿死在主人门前,这预示着国家的毁灭。”^{[1]19}第七章引用的诗歌是:“在路边被虐待的马,呼唤着天堂,要人类血债血偿。”^{[1]105}第十章引用的诗歌是:“切勿屠戮飞蛾与蝴蝶,因为审判即刻将至。”^{[1]162}第十一章引用的诗歌是:“红

胸知更鸟被困于囚笼,天神为之震怒。”^{[1]176}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诗句形象凝练,又震撼人心,与小说主人公杜舍依科的动物保护旨趣不约而同,构成言简义丰的互文关系。

其次谈反讽。反讽体现在小说第十五章《圣休伯特》中。圣休伯特在成为圣人之前,是个败家子,钟情于打猎和杀戮。一次打猎时,他在猎物的头上看到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于是他跪下来,认识到自己此前的罪孽深重,痛改前非,誓不杀生,最终成为圣人。圣休伯特应该成为动物的守护圣人,但是小镇上的人们居然把他视为猎人的守护神,沙沙神父还在讲道台上大讲猎人是如何帮助动物的。因此杜舍依科早就看出了其间的反讽关系,以至于她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叱责沙沙神父。互文和反讽,使得《糜骨之壤》与更有影响力的历史文本产生联系,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阐释空间。

当然,托卡尔丘克《糜骨之壤》的生态叙事也有着局限。首先,动物视角的阙如,导致了该小说生态叙事的意义空间变得逼仄。文学的根本要义乃是促使人不断地转换眼光,体验不同的世界。对于生态叙事而言,尽可能地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自然是重要的,但是若能够以动物视角乃至植物视角来呈现这个世界,对于扩展人的生态体验,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例如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断头台》,有意在人和狼的视角之间自如转换;他的另一长篇小说《崩塌的山岳》则纳入了箭雪豹的视角,因此构建出更为震撼人心的生态叙事,更有利于促进人的生态意识的觉醒。陈应松的中篇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采用的就是豹子的视角,读来如泣如诉,具有极大的震撼力。而《糜骨之壤》从头到尾采用的是杜舍依科第一人称“我”的讲述,涉及的动物如麋鹿、野猪、狗等都是沉默的,好像动物保护问题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观念较量与搏斗。这种叙事,无疑极大地限制了生态叙事的复杂性。

其次,《糜骨之壤》缺乏呈现多种声音的复调叙事,制约了生态叙事的深度。陀思妥耶夫斯的小说总是尽可能地呈现不同的声音,让立场不同的人物彼此辩难,让不同的价值观彼此碰撞,他却往往隐身其后。这种叙事立场被巴赫金称之为“复调叙事”。应该说,《糜骨之壤》涉及的动物权利和动物保护的主体在当代社会中具有极大的争议性,恰恰是各种价值观念聚讼纷纭之地;更具有艺术魅力的生态叙事,应该致力于呈现各种价值观、各种声音的纷争、复调,那样更有利于生态意识的引导。但是《糜骨之壤》始终只有杜舍依科一个人的声音,其他人如大

脚、警察局长、沙沙神父等的声音都被尽可能地遮蔽起来了,或者以漫画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此一来,虽然能够增加杜舍依科动物保护主义者声音的分贝和犀利,但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价值立场的颀颀竞争,杜舍依科的声音很容易变得声嘶力竭,生态叙事的深度也就无法呈现出来。

最后,《糜骨之壤》没有处理好生态叙事的生态维度和灵魂维度的关系。托卡尔丘克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温柔的讲述者》中曾说,灵魂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温柔的讲述者。此言堪称真知灼见。但需要说明的是,最好的文学是灵魂在讲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漫游、沉沦、超越、悲歌的历程。换言之,最好的文学是灵魂自己要出场的文学。就《糜骨之壤》而言,杜舍依科在表达她对于动物的观点时,她呈现了灵魂伟大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但是当面对自己要杀死或已杀死的狩猎者时,她的灵魂之光就熄灭了,她的良知便沉沦了。小说写到杜舍依科看着大脚的尸体时,“我突然产生一种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脚之死可能是一件好事,使他摆脱了这一生的困境,也从他手里拯救了那些鲜活的生命”^{[1]17}。杜舍依科看到大脚死后,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和愧疚,居然感到死亡是一件好事。这是何等令人恐怖的心理反应!她还曾反复说自己只是动物复仇的工具,但是人之为人,可贵的恰恰就是他不能满足于当工具,他还有自己的良知判断、自己的灵魂审视。当良心的声音熄灭时,灵魂也就沉寂了。如果托卡尔丘克在塑造杜舍依科的生态人格时,同时能够充分地呈现杜舍依科的良心聚讼、内心冲突,让那些残害动物的狩猎者摆脱类型化的面具,呈现出另一种灵魂的维度,那样的生态叙事就更具有艺术魅力和思想魅力了。

四、结语

阿尔伯特·施韦泽曾说:“当还存在恶待动物的情况时,当轨道卡车上的动物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却无人留意时,当还存在如此之多低劣的屠宰场时,当我们的橱柜藏着那么多遭受生疏之手恐怖宰杀的动物时,当动物还忍受着没有良心的人所施加的闻所未闻的痛苦时,或者当把它递给孩子们做令人可怕的游戏时,我们所有人都有罪,必定遭到谴责。”^{[7]37}的确,面对人类带给动物的无限痛苦,所有人都有罪,必定会遭到谴责。人类文明若要更上一层楼,不但要解决好人类内部的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种族歧视、性别压迫、阶级纷争等,而且要解决好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乃至地球生态圈之间的关

系。但是在面对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到底该如何处理?是像托卡尔丘克在《糜骨之壤》中所塑造的杜舍依科那样决绝地站在动物一边,奋起向狩猎者复仇,不惜诉诸血腥的暴力;还是坚守非暴力原则,坚持守护动物生命,尽可能地传播生态意识,耐心地等待人类的幡然悔悟?从长远出发,已经具有生态道德的少数先知先觉者应该尽可能地身体力行,尽可能地守护动物生命,守护地球生态,同时还要坚守非暴力原则,耐心地呼唤和等待越来越多的人生态意识的觉醒。世界文学也呼唤着更具有思想内涵和艺术含量的生态叙事佳作问世,尽可能地推进第二次启蒙,敦促生态文明的转型。

参考文献:

[1]托卡尔丘克.糜骨之壤[M].何娟,等译.杭州:浙江文艺

出版社,2021.

[2]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M].张妮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汉斯·萨克森.生态哲学[M].文韬,佩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4]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彼得·辛格.动物解放[M].祖述宪,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

[6]汤姆·里根.动物权利研究[M].李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阿尔伯特·施韦泽.敬畏生命的伦理[M]//彼得·辛格.动物权利与人类义务[M].汤姆·里根,编.曾建平,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刘海燕)

Revenge of Animals or Distortion of Human Nature

—On the Ecological Narration of Tokarczuk's Novel *Pokot*

WANG Shud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Pokot*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Polish writer Tokarczuk who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18.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 miserable demands and tragic fate of animal protectionists, integrates the popularity of crime and murder stories with the vanguard nature of ecological narration, and calls for the awakening of modern people'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ranscending species discrimination and coexisting with other natural life. The theme of the novel is unique, which constructs a kind of enlightenment narrative of lonely individuals against mediocrity. The use of intertextuality and irony greatly enhances the artistic charm of the novel. However, the novel lacks animal perspective and polyphonic narration, and lacks balance between ecological dimension and soul dimension, which limits its ideological depth and artistic charm.

Key words: Tokarczuk; *Pokot*; animal protection; ecological narration

论苏童《罍粟之家》的意象交叠与话语蕴藉

王俊虎,张陆洋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苏童的《罍粟之家》具有丰富的话语蕴藉,作品内部包含多种意象的交叠,使得作品产生多重复杂的意义。小说所要展现的不仅仅是故乡“枫杨树”的历史和土地革命时期的乡村发展,更是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揭示地主与农民、男性与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及其命运,作家将时代的变化暗含在农村颓败的图景中,以人物形象为切入口,以此表达对时代问题的深刻认识与反思。

关键词:苏童;《罍粟之家》;话语蕴藉;命运悲剧;意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09-05

苏童是当代新历史小说以及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作品内容多以具体的历史事件作为依托,展现历史背景之下人物的真实存在状态。塑造独特的“香椿街”和“枫杨树”,是苏童文学的出发点,他常把自己对历史及人物命运的思考隐含在作品背后,其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罍粟之家》是苏童以故乡枫杨树为背景书写的一部乡村发展史及时代的变迁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展现刘氏家族的兴衰成败,以此来暗喻一个阶级的灭亡。小说中沉草、刘素子和演义为刘氏家族的第二代,也是被吞噬的一代,他们都以悲剧收场;而以刘老侠、陈茂为代表的老一辈,则是苏童笔下多重欲望催生的产物,是压抑下一代的“罪魁祸首”,其自身也难逃厄运。故事的表层意在书写刘氏家族的生活变迁,实则以此为依托来刻画故乡枫杨树乃至时代背景下的人性欲望;将真实的历史作为基点,来展现一个阶级的灭亡与鲜活的个体人物一步步陷入愚昧最终堕落的结局。

“小说中的审美意境是通过多种意象架构起来的,其中的情感和思想、语言和叙述都是与自然相呼应的。”^[1]在《罍粟之家》中,苏童将叙事节奏在“罍粟”“馍馍”等特定的意象中缓缓展开,在审美意象的映衬之下,呈现一个作家独特的审美关照。苏童

对意象的叙述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将多重意象交叠起来同具体的时代生活发生关联,形成了他笔下独特的文学情境。苏童运用含蓄、含混的手法,呈现了意象的多重意义生成的可能性,带来了多重的审美效果。

一、复杂意象的多重交叠

(一)农村图景下的“恶之花”

文学作品的书写要追求独特的审美价值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其中便离不开独特的审美意象以及审美场景的构建。在现当代小说中,罍粟花作为叙事元素常常被提及,且被赋予不同的文学内涵,用以展现作家独特的情感体验。在《罍粟之家》中,罍粟花作为苏童笔下的典型意象被反复提及,乃至有学者认为:“小说由一组组画面的碎片、一组组杂乱的意象组成,而小说的推进动力完全靠碎片与碎片的碰撞,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碰撞。”^{[2]26}在《罍粟之家》中,罍粟花是以“恶之花”的形象出现的,苏童将罍粟的“美”与“恶”一同书写在文本之中。小说中,罍粟花的“美”与“恶”,一方面象征地主阶级的表面绚烂与内在颓废,另一方面展现时代变迁下农民的生存状态及世相。

首先,小说中五次渲染罍粟花这一意象,将历史

收稿日期:2021-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18ZDA280)

作者简介:王俊虎(1974—),男,陕西大荔人,文学博士,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鸦片”同真实的社会环境相融合,罌粟花香味的迷惑性指向欲望和颓废的乡村图景。罌粟花第一次出现是在描述故乡的风景之时,“30年代初,枫杨树的一半土地种上了奇怪的植物罌粟,于是水稻和罌粟在不同的季节里成了乡村的标志”^{[3]4}。罌粟和水稻成了作家笔下故乡枫杨树的典型标志,作为分割了整片枫杨树土地的两种植物,它们以“善”和“恶”对立着。第二次出现是在沉草回家路途中,“一路上猩红的罌粟花盛开着,黑色佃户们和稻草人一起朝向马车呆望”,“沉草心烦意乱,听见胶木轮子辘辘地滚过黄土大道”,“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贴着胶木轮子发出了神秘的回声”^{[3]9}。沉草作为知识分子,是作家笔下有着自我意识的人物,但他的故乡与他似乎格格不入,故乡带给他的只有心烦意乱与摆脱不掉的悲剧命运结局。沉草回家时车轮发出的声音有着双重隐喻,一方面表达故乡企图占据他的生命意识所发出的赞歌,另一方面是对沉草的青春时光即将被罌粟碾碎散发出来的悲鸣。第三次出现是在沉草回家之后,“在罌粟的包围之下他感到自己已经与原来的世界相分离,他被推到与自己截然相反的生命轨道之中,他晕厥了”^{[3]11}。这是沉草与罌粟真正的接触,同时也为他最后沉迷于罌粟之中做了铺垫,以“晕”为隐喻。第四次出现是在讲述沉草已经坦然接受了罌粟,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即将与罌粟结合在一起。第五次出现是写沉草与罌粟彻底融为一体时,他通过吞食罌粟最终达到征服的欲望。文学话语蕴藉着作家的情绪与情感,苏童在文本中用大量篇幅描绘罌粟花的图景,将充满罌粟花的图景同笔下的人物联系起来,旨在从“罌粟花”这一意象出发,扎根于史实,反映时代生活中人与物的深切关联。

其次,作家通过对罌粟花的描写,绝不仅仅停留在对乡村景色的描写或者是对人物的表面映衬上,而是立足于意象背后的蕴藉进行深刻挖掘,描绘真实的社会原貌。罌粟花带给刘氏家族的富裕以及地位的攀升,迷惑了农民,使农民产生了欲望,用罌粟代替了粮食。但种植粮食是农民的使命,然而罌粟花所带来的财富,却使得农民甘愿委身于罌粟花之下,也意味着屈服在带来罌粟花种子的刘老侠身下。农民本应是自己的主人,应当在自身的劳作之中获得生存的意义,但却在欲望的驱使下做了“下等人”。苏童从这一角度出发,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关系映射在土地与罌粟花上,展现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和对立关系。

最后,作家将罌粟花与沉草合为一体,我们可以

从两者身上同时看到“美”与“恶”。罌粟花的外形颜色与沉草的新型知识分子身份是“美”的展现,罌粟花麻痹神经的作用与沉草地主阶级的腐朽是“恶”的体现,作家将两者串联起来构成小说文本的深层结构,以罌粟花象征地主阶级(沉草是地主阶级的典型)。含蓄作为文本话语蕴藉的典型形态之一,使作家能够在有限的话语之中蕴藉无限的意味,让读者能够在有限之中读到无限。小说通过写罌粟花的成长与没落和沉草的出生与死亡,一方面来“暗喻罌粟花的诱惑给这个封建地主之家带来了最后一夜的辉煌,亦引其走向终结”^[4]的命运结局,同时也展现了土地革命时期旧有势力的必然灭亡。

(二)孤立无援的心灵“叫喊”

《罌粟之家》的开篇,是以演义的叫喊开始的,“放我出去,我不偷馍馍吃了”^{[3]1}。贯穿文本的“馍馍”是演义的生命本真,同样也是农民阶级的本真。演义对“馍馍”的疯狂追求,属于生命的原始状态,他一生都在追逐的“馍馍”如同农民一生都在追逐的粮食的丰收。演义一家原是农民,他的身上延续着刘氏家族农民的血脉(他的返祖现象不难看出农民阶级的本性),而刘老侠却对之摒弃。为了生存而非生活的演义是旧地主阶级的代表,“馍馍”对他来说,不只是食物,更是活下去的动力。而刘家压抑着他的本性,这不仅是对演义个人的压抑,也是对整个农民阶级的压抑,越是压抑其反弹效果就越明显,演义一次又一次地发出“饿”的叫喊,其实是对生命本性的召唤,也是对生存欲望的恳求。作家以演义个人的农民本性来暗喻整个枫杨树的农民——被压抑的生存欲望。

苏童在开篇用一句话塑造了“演义”这个人物形象,小说情节由此展开,其中“馍馍”是作家笔下令人深思的审美意象,呈现着苏童一贯的写作风格——用具体事物表达作家对现实的感悟,即对封建地主家庭抹杀人的本性的嘲讽。苏童把演义在刘氏家族以及罌粟环绕的环境下的妥协视为一种自我保护,因为演义的返祖现象导致他被孤立,只有“馍馍”带来的饱腹感才能够满足他心里的安全感,然而演义最终还是因为“馍馍”而死。文中写到“演义的棺材里堆满了雪白雪白的馍,那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殉葬,他们说白痴演义应该瞑目了,他的馍再也吃不完了”^{[3]16}。在这里,作家把自身的价值判断移植到枫杨树“看客”的话语之中,借演义的死亡一方面显示“看客”的冷漠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对抛弃农民本性一味追求财富的故乡人的一种深切警示。作家将演义的生命同“馍馍”这一意象结合在一起,所要表

达的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欲望,更是要展现特定社会背景之下的地主阶级企图抹杀自身以及农民阶级本性的行为。

在《罍粟之家》中,多元意象及多种意象的交叠,让读者领略到了作家心中独特的故乡场景。作家以审美的视角构建文本脉络,以审美图景蕴含他对时代的见解,表达自身独特的感受,同时赋予具体可感的事物和人物以历史的厚重感及复杂性,使小说有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性。

二、人物形象背后的多重意蕴

(一) 男性形象的双重含义与共同的命运悲剧

在《罍粟之家》中,男性形象是小说的主要叙述对象,一方面以男性形象的话语蕴藉去展现一个特殊时代里的男性地位,另一方面又将男性形象放在阶级矛盾冲突之中去展现男权的争夺。此外,“苏童用欲望化的叙事,消解了农民参加革命的崇高目的,击碎了知识阶层的启蒙神话……”^[5]这种处理,增添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沉草与演义这两个人物,是小说中能够形成对比的一对形象之一。在作家笔下,演义是满口说着“我要杀死你,我饿、我要吃馍馍”的“农民形象”;而沉草是刘老侠传承家族意识的载体,即使他非亲生,但被“赋予了”地主阶级血脉的他被刘老侠视为己出,成了“知识分子型”地主。苏童以沉草的生命轨迹为线索,将沉草的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家族和时代的双重矛盾之中,呈现出人物角色的复杂性。作家一方面以演义为反面人物,甚至作为一种叙述视角去衬托沉草,他所要展现的不仅是新时代下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命运,更要以此来暗喻两者共同的命运悲剧。

演义是苏童笔下的“反抗者”,代表着人民最本质的要求,用话语喊出了农民内心反抗的渴望。作家一方面借演义与被迷惑的枫杨树乡民的愚昧作对比,凸显其追求生存欲望的本能,另一方面与沉草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加以对比,突出在地主阶级主导的时代下其作为附庸的悲剧命运。反之,“诞生于故事开首的婴儿一旦长大将成为核心人物,这在家族史中是不言而喻的”^{[3]9}。沉草是作家笔下重点渲染的人物,小说开篇以直白的话语点明了沉草的身份地位,并把他作为叙事的中心,将文本围绕着他的生命轨迹而展开。然而,作家想要揭示的不仅是沉草的个人命运,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阶级的兴衰,以他的死亡来标志地主阶级的灭亡,也以其人生的不幸来反思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一直在外念书的沉

草,本应是追求新思想的人物,以新型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小说中出现,但在苏童的笔下,沉草却是病态的,是被自我与他人所支配的工具。作家借沉草在刘氏大院里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在茅草亭子里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在罍粟缸里杀死了自己的图景,来暗喻乡村旧式地主阶级灭亡的内部原因。

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是现当代小说家书写的重要话题之一,苏童也不例外。苏童笔下的刘老侠和陈茂就是金钱和权力的欲望化代表,以刘老侠和陈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的叙事视角,来展现两者之间的依附关系和对立关系,是小说的另一个对比视角。刘老侠是第一代地主,他把罍粟带回了故乡,带领农民走向了种植罍粟的道路。这不仅使刘氏家族兴起,同时也开启了故乡枫杨树富裕兴盛的景象。然而,苏童笔下的刘老侠,是具有多重意义的人物形象,他既是刘氏家族的兴起者,又是使家族彻底衰败的人物,同时也是封建阶级瓦解与新时代到来时期顽固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苏童通过对刘老侠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了地主阶级走向灭亡的历史轨迹。

刘老侠的权力被陈茂所打破,陈茂用实际行动颠覆了他的权威。无论是使翠花花怀了他最上心的儿子——沉草,还是到最后用喷呐革了他的命,无不体现着农民阶级的觉醒与反抗。显然,陈茂作为与地主阶级对抗的人物形象的代表,其“革命”行为中,被作家赋予了“革命”与“报复”的双重含义。陈茂不仅有对刘家人的复仇心理,也有不纯的“革命”动机,即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企图摆脱低贱的身份。作家以此揭露农民阶级参加革命的盲目及从众心理,启发读者思考。此外,陈茂还是文本中“性”欲望的集中体现者,文本中多次用“狗”来描述他,刘老侠说他是“狗”,翠花花说他是“狗”,沉草也在他身上看到了“狗”的影子。作家一方面通过“狗”的意象来展现了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清晰的价值判断——“狗”即下等人。即使陈茂捆起来了刘老侠、踢开了翠花花、占有了刘素子,却始终逃脱不出他自身所谓的阶级地位。陈茂见到沉草时,唤一声“少爷”,放弃认同亲属关系的他,进一步被捆绑在低人一等的意识里,这不仅是一种阶级对立关系,还是陈茂自我与超我之间的一种矛盾关系。

苏童笔下的沉草和演义、刘老侠和陈茂是两对彼此对立的悲剧人物,他们是各自阶级的代表,但在罍粟弥漫的乡村中,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死亡。作家把沉草和演义的悲剧命运的导火索指向了“网

球”，一方面“网球”代表了沉草对新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呈现了演义的本性——把它当成了馍馍。当沉草失去“网球”的时候，演义也失去了生命。小说展现的不仅是沉草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衰败及演义农民本性的被压抑，更表达了作家对特定时代里不同人物的人文关怀。另一对人物刘老侠和陈茂，他们的悲剧命运在文本结尾展现得淋漓尽致。陈茂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接着又被重新吊到茅草亭子的木梁上。生前风光的陈茂被吊在木梁上，而他的东家躺在地上欣赏着他的“骄傲”，这一场景充满了讽刺意味。双方虽然都是以死为结局，但是刘家还是胜在了观众视角的死亡姿势上。刘老侠与陈茂的关系，看似作家鉴于历史的本质来揭露权力欲望的争夺与实现，实则展现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农村的颓败及人物的悲剧命运。

（二）女性角色相互映衬下的现实反思

小说以男性话语为主构思全文，但女性角色的刻画也很出彩，体现了苏童小说的经典建构模式，即通过塑造女性形象，借以表达男权的争夺，同时展现女性在旧时代的卑微地位，思考社会文明进程中的角色转变。

“作者精心组织自己的文学文本，正是为了通过话语实践，在特定的读者群体中造成强烈的感染效果，以便实现自己在想象之中调整社会权力关系的意图，而读者阅读文本也是为了在想象之中调整自己的存在状况以及自己所身处其中的社会权利关系。”^{[6]74}苏童笔下的《罍粟之家》，不仅仅从男性的视角来看社会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将社会关系的某些变化放在女性的视角之下来观看，以更全面地展现完整的社会大背景。小说对两位女性着墨不多却又不可缺少，小说中的两个阶级都与她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们并不只起到了承接文本的作用，也体现了作家对女性角色的思考，她们的命运呈现了旧时代女性命运的共同特征，即在挣扎之中存活，却又终究逃不出死亡的命运。这种旧时代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同样值得读者去思考。

翠花花是苏童笔下“放荡”女性的代表，她是文本中男性形象相互连接的枢纽型人物。翠花花原是城里的妓女，被刘老信带回家，又被送给了刘老太爷，刘老太爷死后，她嫁给了刘老侠，婚内又与陈茂发生关系。苏童把她书写成为男性欲望的发泄者以及疏通人际关系的工具，她的一生与文本中的男性人物捆绑在一起。然而，她的出现却破坏了固有的纲常伦理。翠花花大胆地追求自己的欲望，并未被

“规矩”所束缚。作家从这一角度出发，肯定了女性追求自我存在的现代意识，但在向人物内心发掘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她是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形象。她依附于男人，在陈茂身上得到了快乐，还在刘家中得到地位与权力，欣然地享受生活，安分守己。在刘老侠受批斗的时候，她主动去帮忙，刘老侠却推开她说：“没你的事，给我滚回去。”^{[3]50}接着她又去抢陈茂的枪，陈茂也对她骂了一声“臭婊子”，抬脚踢在她的乳房上，然后对她说：“没你的事，给我滚回去。”^{[3]50}在与刘老侠和陈茂的关系中，她双重受辱，却丝毫没有斗争意识，她是作家笔下旧时代的可怜人物，她的可怜不仅在于她身处封建家族中的卑微地位，更在于她对自己悲剧命运的无动于衷。

此外，文中的另一位女性人物刘素子，则是与翠花花截然相反的形象。冷峻又孤独的刘素子，在罍粟之家中，别具一格。性格的差异，正是两个女人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根源所在。作为阶级对立补充的刘素子，不仅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女性身份的卑微，还具有反抗意识。“在统治者这边，她只是一件物品，因此随时就可牺牲，作为交换条件，换取统治阶级生命的延续；在受压迫的群众中，她成了对于上层报复发泄的工具。”^[7]这是由女性地位的卑微所决定的，她成了实现男人欲望的最佳媒介，不仅使父亲获得了土地，同样也使姜龙和陈茂获得了向地主阶级复仇的快乐，而她自己所要的却一无所获，最终在迷失中走向死亡。然而，身为女性的刘素子，却又女扮男装，以男性的形象示人，体现着她强烈的反抗意识，也呈现了作家对社会转型时期女性形象的倔强书写。与翠花花相比，刘素子是更为典型的人物。

翠花花和刘素子都是作品中作家着重描写的女性形象，一位是市井风尘中的小人物形象，一位是冷峻孤独的形象。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她们都难以逃脱女性悲剧性的命运。如果说翠花花是通过男人获得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那么刘素子则是通过自己的反抗意识得到自我解脱（吊死的命运）。小说中的两个女性相互映衬，体现了20世纪初女性地位的卑微、生活处境的艰难以及寻找自我存在的苦痛历程。翠花花体现了对生存欲望以及性欲望的渴求，而刘素子则表现为对男女平等的诉求和对女性社会地位改变的抗争，她的抗争似乎停留在表面，但在文章的结尾处，刘老侠的一句“好闺女，男人都不如你”^{[3]58}，使她的抗争意识落在了实处，报之以肯定的态度。作家以性别对比为内在叙事立场，将女性话语潜藏于男性话语之下，其中包含对女性地位、女性价值及其琐碎生活的具体刻画，以此对女性依附

于男性的生存现状进行深刻书写,彰显女性话语的重要意义,对旧时代里的女性地位进行了深刻反思。

三、结语

苏童曾说:“以前的小说文本通常是将人物潜藏在政治、历史、社会变革的线索后面,表现人的处境。我努力地倒过来,将历史、政治的线索潜藏在人物的背后。”^{[2]27-28}在《罍粟之家》中,作家立足于人物关系,借以历史的氛围和情调,展现人物之间的生存境遇,把自身的思考放在历史的框架之中,呈现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同时“运用内视角的外化不断强化‘我’在场的声音”^[8],淡化了小说的虚构成分,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将鲜活的生存景象,生动别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此外,苏童的小说《罍粟之家》的审美意蕴集中地体现在话语蕴藉之中,“作家从完全游离于历史事件书写规范之外的艺术加工,解构‘历史’之于‘人’的复杂性,进而形象还原‘人’之于‘历史’的复杂性,以洞察的姿态提出源于历史的人性思考”^[9]。通过立足于历史史实、书写历史真实的笔法,来展现时代的复杂性;同时,苏童以单一的意象展现一个时代的背景,也以人物蕴藉着多重复杂的社会关系,让读者感受到在历史之下的乡村图景及其背后隐藏的人性图景。

作家马尔克斯曾说:“优秀的小说是现实的诗意再现。”^{[10]41}立足现实思考的作家苏童,以刘氏家族内部和地主与农民的种种矛盾关系,来展现城乡

以及人物的变化;他把历史深藏在人物背后成为依托,以一种“小型叙述”的方式,把人性原原本本却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体现了他在小说叙事中独特的人性关怀,同时也启发读者由过往历史来对当下社会现实做出思考。

参考文献:

- [1] 葛红兵. 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J]. 社会科学, 2003(2).
- [2] 苏童, 周新民. 打开人性的皱褶: 苏童访谈录[J]. 小说评论, 2004(2).
- [3] 苏童. 罍粟之家[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 [4] 牛宇娟. 《罍粟之家》: 旧式乡村终结的“演义”[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8(9).
- [5] 陈家堃. 遁逃与突围: 论苏童《罍粟之家》中欲望与历史的关系[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
- [6]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7] 陈九. 浅析《罍粟之家》象征性人物塑造[J]. 今日南国, 2008(7).
- [8] 李丹. 苏童小说的叙事策略[J]. 承德民族师专学报, 2001(2).
- [9] 易难于. 历史的恶之花: 解读苏童《罍粟之家》意象、人物、身份的三重对应[J]. 文学评论, 2012(7).
- [10] 马尔克斯. 番石榴飘香[M]. 林一安, 译. 海口: 海南出版公司, 201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On the Overlapping Images and Discourse Implications in Su Tong's *Poppy House*

WANG Junhu, ZHANG Luy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China)

Abstract: Su Tong's novel *Poppy House* has rich discourse implications and a variety of overlapping images, producing multiple complex meanings. The novel extends its theme beyond the history of maple and poplar trees as well as the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eriod of Land Reform, and focuses on the du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atus and destiny between landlords and peasants, men and women against the broader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writer implicates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in the picture of rural decadence, taking the characters' images as an angle to express his own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on of the problem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Su Tong; *Poppy House*; discourse implication; tragedy of fate; image

时空重塑·多重聚焦·诗画意境

——李子柒的古风IP短视频叙事策略探析

关键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以李子柒为代表的古风IP短视频是当下短视频浪潮中的一股中坚力量,这类短视频的爆红得益于:在内容题材上,选择了世界范围内都可通用的“饮食”文化符号;在叙事形式上,实现了艺术化生产,如自由转换的叙事时空、多元独特的叙事视点、疗愈焦虑的诗画意境。探讨以李子柒为代表的IP古风短视频的叙事策略等,可为“更多的李子柒”提供借鉴。

关键词:李子柒;叙事时空;叙事视点;散文化结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03

中图分类号:J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14-04

随着智能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传播方式不断更新迭代。短视频具有“短、平、快”的叙事特征,适合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进行传播,满足了受众在碎片化时间中获取信息的需求。短视频在2016年呈现井喷式发展,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到2021年短视频行业的用户总日活数量达到10亿之多。而以李子柒为代表的一批“古风”美食短视频制作者就是这股洪流中的中坚力量。

李子柒的短视频主要以中华美食制作、手工技艺展现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为主要内容,在2016年首次登上美拍平台,随后进军微博、抖音等媒体平台,逐步获取粉丝量,从而形成一定的传播规模。至2021年1月,李子柒的抖音平台账号粉丝量超过4267万,在微博平台粉丝量超过2728万。2017年李子柒开始将视频上传至YouTube,进一步占领海外短视频市场,至2021年1月,李子柒在YouTube上的粉丝量已超过1400万。2021年2月2日,吉尼斯世界纪录发文宣布,李子柒以1410万的YouTube订阅量刷新了由其创下的“YouTube中文频道最多订阅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国内各媒体平台中李子柒亦享誉众多。2019年12月,李子柒的经历也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

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关注与肯定。媒体认为,李子柒“把中国人传统而本真的生活方式呈现了出来,让现代都市人找到了心灵的归属感,也让世界理解了一种活着的中国文化”^[1]。2020年5月,李子柒突破“次元壁”,与袁隆平、冯骥才等名人一起被聘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随着李子柒在大众视野中的不断曝光,其他同类古风IP短视频博主如滇西小哥、二米炊烟也逐步在短视频领域崭露头角,获得了大众的关注度,实现了对“古风古食”短视频垂直领域的深耕。这类短视频的爆红得益于:在内容题材上,选择了世界范围内都可通用的“饮食”文化符号;在叙事形式上,实现了艺术化生产。本文以李子柒的短视频为例,从叙事时空、多元视角、叙事结构方面来探寻此类古风短视频的叙事策略。

一、时空重塑:叙事时空建构媒介田园景观

以李子柒为代表的将“古风古食”作为IP标签的美食博主,其视频所呈现出的美食符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无形中传递了传统文化,受到主流媒体及海内外网民的认可,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究其成因,应是得益于影像中独特的叙事时空建构。

收稿日期:2021-03-07

作者简介:关键(1995—),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9级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

(一)多重时距与复沓叙述,推动“快中有慢”的节奏

在影像叙事中,时间是一个复杂且重要的概念。“要讲好一个故事,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控制时间流程,如何重构乃至‘雕塑’时间。对时间畸变的富于匠心的营构,直接奠定了影片文本对故事重心的选择,对情节与结构的编织和对情感意图的取向。”^{[2]67} 热奈特在他的著作《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提出叙事中的两个时间序列:“被叙述的时间”与“叙述时间”,这两个时间序列的产生使一切时间畸变成为可能。此后热奈特根据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的距离,区分出两种关系类型,一是对故事时间进行剪裁、加速,使话语时间小于故事时间;二是故事时间等于叙事时间。

李子柒的短视频大多按照四季更迭的自然时序进行叙事建构,依据四季交替、传统节日带来的灵感进行食物制作,这些食物的生产制作过程不仅推进了时间进程,也完成了附着于其上的故事叙述。叙事时距讲求叙事速度,李子柒的多数视频都呈现为对原始故事时间进行折叠浓缩,以达到叙事时间小于故事时间的叙事时距建构,使整体视频呈现加速的“快节奏”。李子柒发布的数十个“一生系列”,如2019年12月2日发布的《用黄豆酿一壶传统手工酱油,中国味才养中国胃》等,都对叙事时间进行了重新“雕塑”。首先,视频制作者通常利用蒙太奇手法把正常时间周期比较长的发芽、发酵等过程进行省略剪裁,将种植、破土、结果等重要时间节点剪接在一起,着重凸显自然的生机。其次,在拍摄手法上,多使用延时摄影和微距镜头拍摄植物破土发芽的动态过程以及光影流动的瞬间,将植物需要历时一季的破土生长,呈现于3—5秒的镜头语言中。李子柒的视频在对时空进行折叠浓缩使整体叙事节奏更加紧凑的同时,也会出现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基本吻合的叙事时距安排。

截至2021年1月,李子柒在微博平台共发布了137个视频,她的作品呈现出似曾相识的叙事:事件与事件相似,人物关系固定,叙事主题也呈现出可进行大致分类的一致性。一是“朝花夕拾”系列,二是“非遗传承”系列。就“朝花夕拾”系列的短视频叙事构成来说,可轻易归纳出田园“慢生活”的叙事时间线:种植、采摘、冲洗食材、制作菜品、与家人同餐共享。复沓式循环叙述也暗喻自然生命的循环,而远离都市喧嚣的田园“慢生活”图景的重复呈现,在强化受众视觉记忆的同时,也有利于形成自身独特的类型化叙事模式。

(二)镜头空间与空间转换,营造“幻象空间”场景

短视频是以直观的视觉画面为媒介语言来叙述故事的,因而空间元素诸如画面构图、声音调配、镜头运动等,成为短视频叙事构成的重要元素。相对于用抽象文字呈现叙事的方式而言,这些视觉元素是短视频叙事的重要话语表达方式,而此类古风短视频叙事“正是由于拥有直观性视觉元素的空间呈现功能,才形成和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叙事个性和话语魅力,也才可能摸索出各种特定的叙事技巧与组合方式”^{[2]113}。

从镜头空间上看,李子柒的短视频在画面景别、色彩上都有着独特的影像造型追求,体现着画面构图的“语式”功能。在叙事学中,热奈特运用“语式”这个概念对文学中的距离、投影、聚焦做了系统阐明。那么将“语式”这个概念运用到短视频叙事中,意味着短视频画面构图中也存在距离、投影、聚焦等“讲述”环节,同样有着“讲多讲少”和“从这个或那个角度去讲”的“叙述信息调节”的叙事功能。^{[3]107-108} 首先,在李子柒的短视频中,景别的设置与叙述者要讲述什么有密切的关系,表明叙述者完成叙事行为的“意指性”。这类短视频多以山林、天空景色的大远景镜头作为叙事的开端,给人以宁静辽远的视觉效果;李子柒去山林间采摘时,也多用到全景镜头,引导受众体会田野间辽阔深远的意境。其次,李子柒的影像通过光影、色彩的多样配置,而拥有了影星斯托克威尔所描述的“语调”的“分离功能”^{[2]142}。李子柒通常身着亮色长袍行走于山林间,与饱和度较低的山林树木、草丛形成了色彩对比。同时,大自然色彩斑斓的植物、果蔬也为李子柒的视频提供了天然色彩基调,经过清水洗涤的萝卜、番茄、山楂、蔬菜显得亮眼诱人,与深色系的石磨水台、案板形成了不同的明暗层次和视觉节奏变化,充分调动起受众的食欲,这种不同的色彩也使人感受到“语调”上的抑扬顿挫。

在空间设置上,李子柒的短视频还呈现着开放空间与封闭空间的自由转换。李子柒多在室外的开放空间里进行种植采摘,用水牛耕地等与自然互动的行为,同时也会有很多转换到室内的镜头,展现在室内封闭空间中主人公进行食物的制作、与家人共餐一系列行为。这种由开放到封闭空间的自由转换,把大自然缓慢的节奏和立体化的人物形象结合在一起,为受众打造了心之神往的田园乌托邦景象。

由此可见,李子柒短视频的影像叙事“所呈现出的故事空间——世界,是能够与第一自然(现实本身)相媲美的最真切、最生动的‘第二自然’”^{[2]115-116}。

不过,与其说这些短视频是“真实的、现实的”,不如说是经过裁剪和滤镜美化的一定程度上的“乌托邦”式镜像,类似社会学家齐泽克所指涉的“幻象空间”场景。

二、多重聚焦:多元视点呈现慢食影像话语表达

叙事视点关注的是谁在看、谁来叙述的问题,热奈特以“聚焦”一词来为此命名,若斯特延展了热奈特叙事焦点的概念,把叙事中的视角分为视觉聚焦、听觉聚焦和认知聚焦,他认为:“影片组织者是通过某个视角被体现出来的,或者是高高在上的影像师的视角,或者是言明的叙述者的视角,或者又是什么别的人的视角,这就是视角问题。”^[4]李子柒的短视频中呈现多重视点融合的状态,以此强化视频中“慢食主义”的表达。慢食主义主张:回归传统的、本土的、自然的和有机的生产;力图揭露工业化农业的不可持续性;致力于保护本土传统农耕文化和烹饪免受跨国农业产业和快餐趋势的同质化影响。叙述者李子柒的视觉聚焦于一系列美食制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旨在传递回归本土田园生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而以摄影机为视点的外部视觉聚焦,主要起客观记录的作用,从宏观层面建构短视频的整体叙事,向受众传递“慢食”“慢节奏”“慢生活”的意识形态。

(一)内视角,书写李子柒式田园图景

内视角,亦称内聚焦,即从某一人物的视角出发,叙述其体验到的世界。李子柒是短视频中的主体人物,她以她的思维、视角进行讲述,形成独特的李子柒式田园图景。在她讲述的过程中,影像叙事呈现着鲜明的主体性,传递着她回归本土田园生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及守护中华美食文化的意旨。

在李子柒的短视频中,通常是将李子柒的“所见镜头”与她的“所见之物镜头”剪接在一起,也就是一个镜头表现人物在看,另一个镜头展示她所看见的画面。如李子柒在制作食物时,通常会先呈现人物眼部特写,紧接着是她所见的食物特写。在《甚于肉味的治愈美食,带些雨露的清甜——鸡枞菌》里,清晨,李子柒在丛林的鸟鸣声中进入山林寻找鸡枞菌,一个中景镜头展现她“寻”“嗅”的过程,随之“哇”的一声,画面紧接着是她看到鸡枞菌的特写。这里的视线具有暗示性,经历了“二次化”的过程。在次生内聚焦视点中,叙事者可以巧妙地隐藏起来,让受众更为真实地沉浸于影像叙事之中。

(二)零视角,建构整体叙事发展

零视角,即零视觉聚焦,也就是以摄影机的视角

进行叙事表达。在李子柒的影像呈现中,摄影机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处于人物之外,记录着李子柒的田园生活流程:种植果蔬、在鸡鸣犬吠的院子中剥麦打棉、劈柴织布。这时候摄影机可以处于任何人物之外,是一种客观记录真实世界的角色,它只展示影像,而使受众最大限度地忘记摄影机的存在,又无形中架构起整体田园叙事图景。

在零视觉聚焦叙事中,摄影机的取景通常会拍摄一些空镜头展现自然的广阔辽远,或拍摄一些有人物存在的全景空间镜头。如在李子柒的视频中,很多全景镜头展现李子柒在院子里与奶奶喝茶劳作,配以两人的对话和欢声笑语的原生背景音,这些镜头不与人物视点有任何的对话,反而与人物呈现一定的“距离空间”,更注重展现人物所处的环境,仿佛是一个客观的观看者在记录如此美妙的庭院图景。

三、诗画意境:散文化叙事结构疗愈现代性焦虑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更使得“速度”成为一种景观。哈特穆特·罗萨提出了“社会加速”的概念,他认为:“也许社会加速最紧迫和最惊人的方面,就是现代西方社会那种壮观而广泛散布的时间匮乏。现代的社会行动者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的时间常流失殆尽。时间仿佛是石油一样被消耗的原材料,越来越珍贵。所以,其短缺越来越让人感到恐慌。”^[5]^[23]“社会加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令我们视野开阔,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情感和心理问题。目前,有很多平台都积极推进剧情类短视频的创作,使得剧情类短视频层出不穷,但以李子柒为代表的“去戏剧化”的古风短视频却给受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美感,其整体叙事结构呈现散文化的叙事风格,给受众带来疗愈焦虑的情感体验。

(一)情节淡化,以情绪结构型为叙事方式

所谓散文化叙事结构,主要是指:“在叙事方式上,追求尽量淡化故事情节、弱化矛盾冲突;在镜头组接上,注重对记录琐碎细节场面的镜头和抒情空镜头的有效积累,以达到情节演进的效果;在影像画面上,更注重情景交融的韵味和意境的营造。”^[6]

李子柒的大多视频是对生活化流程的完整记录——起床、采摘、制作美食、邻里畅谈、与奶奶共进餐食等,看起来像生活原型一样自然、朴实,却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情绪的变化,使受众感受到的不是故事的惊心动魄,而是生活流中情感的力量。李子柒的影像不只是呈现食物的鲜美,展现食物和手工

技艺的制作过程,更是蕴含了对亲情的眷思,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在《千层底布鞋》中,李子柒为奶奶做了双千层底布鞋,在温习儿时一针一线的时光中,还带领受众重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手艺。这种叙事方式将人物和细节的描绘铺设开来,没有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但这些表达串在一起却形成了一股情感震撼力,达到“形散而神不散”的叙事效果。

(二) 细节积蕴,以写意疗愈为审美趋向

古风类短视频通常充分利用叙事时空自由的特点,着眼于生活的细枝末节,把零散的事件编织在一起,用含蓄的手法描画田园风光的诗画意境,尤其是这里的细节积蕴并不是为铺设情节,而是为累积情感、书写意境埋下伏笔。以李子柒为代表的古风短视频,在细节的积蕴中展现平凡生活的不平凡:小狗在田间尾随主人,人物在林间采花为饰,一身红袍驾马行于桃源之中……这些细节营造出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意境,使视频的艺术审美价值大大提升。李子柒在短视频中打造的这个“田园梦幻工厂”,以其秀美的乡野景色,淳朴的民风,慢节奏的闲适,为生活在快节奏中的现代都市人提供了心理放松和疗愈的空间,乃至成为他们向往的精神家园。

四、结语

在短视频行业迅猛发展的今天,以李子柒为代表的古风短视频博主,通过对通用性的内容符号以

及受众心理需求进行挖掘,继而将挖掘的元素与自身生活相融合,最终完成自身独特的叙事风格建构。这些古风短视频建构了现代都市群体心中向往的田园“乌托邦”景象,为现代都市群体带来精神放松,有助于缓解他们的精神焦虑;视频中运用的叙事角度、镜头转切、时空重塑等艺术手法,满足了受众暂时逃脱现实压力的情感需求及视觉的审美需要,此叙事建构方式值得“更多的李子柒”借鉴。

参考文献:

- [1]人民日报海外网. 2019 年度影响力人物落幕,李子柒获年度文化传播人物[EB/OL]. 2019-12-13. http://m.haiwainet.cn/middle/3543159/2019/1223/content_31687024_1.html.
- [2]李显杰. 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 [3]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4]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若斯特. 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 刘云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5]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M]. 郑作或,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6]翟萌萌. 中国散文化电影的美学品格[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Reshaping Time and Space, Multiple Focuses, Artistic Conception of Poetry and Painting

—An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Strategy in Li Ziqi' Short Video of the Archaistic IP

GUAN Ji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Represented by Li Ziqi, archaistic IP short video is a backbone of the current short video wave. The popularity of this type of short video benefit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 terms of the subject it selects “food” as the theme which is a universal cultural symbol; In terms of narrative form, it has realized artistic production, such as freely transformable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diverse and uniqu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and a poetic and artistic mood that heals anxiety. To discuss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archaistic IP style short video represented by Li Ziqi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more “Li Ziqi”.

Key words: Li Ziqi;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narrative view point; scatter cultural structure

科利奥兰纳斯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流变

杨康恩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在李维、普鲁塔克和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故事中,人物形象发生了主要变化的是以集体形象出现的平民、母亲伏伦妮娅以及科利奥兰纳斯。李维和普鲁塔克笔下的平民形象是安分守己的弱势群体,伏伦妮娅是一个普通的母亲,科利奥兰纳斯是一个普通的贵族强硬派;在莎士比亚笔下,平民以乌合之众形象出现,伏伦妮娅变为父权和国家利益的化身,科里奥兰纳斯变为骄傲的化身。人物形象在莎士比亚笔下发生重大变化,既有戏剧创作上的原因,也受到莎士比亚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形象流变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04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18-05

《科利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一部悲剧,塑造了以科利奥兰纳斯为代表的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一般认为,莎士比亚创作该剧参考了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公元46—公元120)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英国作家麦克利什指出,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同时参考了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的《罗马史》。^{[1]36}因此,对李维、普鲁塔克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科利奥兰纳斯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比分析,考察人物形象在流变过程中产生的变异情况及其原因,对于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独特魅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李维、普鲁塔克和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故事中,人物形象发生了主要变化的是以集体形象出现的平民、母亲伏伦妮娅以及科利奥兰纳斯。

一、平民形象的流变

在《罗马史》中,李维并没有对科利奥兰纳斯的故事做专门的描写,而是把科利奥兰纳斯的故事作为罗马“第一次撤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讲述。李维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了贵族对平民的压迫,对贵族两次违背诺言导致平民撤离罗马,并且强调平民

在撤离罗马期间的遵纪守法,只取用维持生存的物资,平静地驻扎在圣山(The Sacred Mount)。在科利奥兰纳斯逃亡伏尔斯之后,伏尔斯平民也并不好战,只是在科利奥兰纳斯设计挑拨之下才想攻打罗马。^{[2]122-130}

《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平民形象也是类似的。普鲁塔克对于平民与贵族和元老院的矛盾有详尽的描述,矛盾集中在贵族对平民的剥削;元老院偏袒贵族,对平民被欺压的情况视而不见。平民被逼无奈,选择离开城市,聚集在圣山。在此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发生暴力和破坏的行为”^{[3]404}。因此,李维和普鲁塔克笔下的平民形象是安分守己的弱势群体。

在莎士比亚笔下,平民则是以乌合之众形象出现的。莎士比亚把平民聚集的地点改在罗马,把离开城市的被动出走行为,转化为主动攻击元老院的暴动行为。在这里,莎士比亚建构了具有暴力性特征的平民的负面形象。

平民的负面形象的另一个特征表现为非理性的狂热。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虽然涉及平民受到护民官的煽动,但是也不乏对平民的理性特征的描写,例如在科利奥兰纳斯落选执政官的情节上,就是

收稿日期:2021-04-10

作者简介:杨康恩(1989—),男,河南睢县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戏剧。

平民理性思考而非被煽动的结果。本来赞同科利奥兰纳斯做执政官的平民,看到他在贵族中所引发的热情后,“平民的情绪开始有所变化……一个人如此强烈地维护元老院的利益,在贵族中间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要是把执政官的职位和权柄授予他的手里,人民仍旧保有的自由权利就会受到他的剥夺和侵害。结果他们拒绝接受马修斯,另外两人当选”^{[3]412}。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平民的理性变为了非理性的狂热状态。在科利奥兰纳斯被罗马平民骂作叛徒,他对平民同样咒骂后,平民狂热地喊道:“把他送到山岩上去!把他送到山岩上去!”^{[4]455}当科利奥兰纳斯在最后一场咒骂伏尔人时,受到煽动的伏尔人同样狂热,“撕碎他的身体——立刻杀死他”^{[4]505},体现了平民在非理性狂热状态下的冲动、急躁等特征。这些特征,不属于个体,而是他们在一种“集体逻辑”^{[5]4}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心理群体”^{[6]14}特征,具有这些特征的平民俨然是一群乌合之众。

莎士比亚之所以对平民建构这种带有明显负面特征的乌合之众形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戏剧创作方面考虑,平民的负面形象可以产生戏剧性的悲剧效果。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中,相比于之前的悲剧,“一种对悲剧实际效果的兴趣脱胎而出”^{[7]15},而莎士比亚无疑是当时最富有戏剧效果的剧作家。从莎士比亚改编后的戏剧效果来看,平民是作为科利奥兰纳斯这个英雄人物的对立面来设置,他们与科利奥兰纳斯的冲突贯穿了该剧的始终。如果把普鲁塔克笔下所描绘的正常平民形象作为英雄的对立面,并不足以产生一个好人“遭受不该遭受不幸”^{[8]97}的效果,而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也就变成了罪有应得。相反,设置平民的乌合之众形象,给科利奥兰纳斯对平民的偏见一种合理性的解释,在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的同时,也赋予“对与错”这种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以一种形而上学的辩证关系。

其次,平民的负面形象有着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关的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即当时的社会对平民的歧视,以及对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中平民所表现出的粗暴残忍的毁灭性力量的恐惧心理。自10世纪起,就在称呼上对社会成员进行了区分,“有权有势的贵族(贵人 eorls)和地位卑下的农民(贱民 ceorls)”^{[9]61}。在1381年农民大起义的相关记载中,有这样的描述:“叛乱分子以前属于农奴中最卑微的一群人,如今像领主一样进进出出,猪倌竟高踞于士兵之上,尽管他们不是骑士而是粗鄙的乡巴

佬。”^{[9]108}这种心理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数次农民起义中发展,在16世纪社会的持续动荡中达到高潮。“暴力出现在每一层面上……非政治性的残暴罪行和同样残酷的惩罚更是家常便饭……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都常有地方暴动和骚乱,间或发生大规模的叛乱。”^{[9]132}充斥于动荡社会中的暴力,无疑对那个时代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心理有着显著的影响。

二、伏伦妮娅形象的流变

在李维的《罗马史》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伏伦妮娅都是只在劝说科利奥兰纳斯退兵时出现的。所不同的是,《希腊罗马名人传》在讲述科利奥兰纳斯成长过程时,涉及了伏伦妮娅对他的影响。

古代罗马人非常注重荣誉观念,因为战事频繁,通过战争获取荣誉便成了古代罗马人获取荣誉的最普遍的方式。在此背景下,元老院“给予胜利者举行凯旋式”^{[10]247}也成了一种奖励方式。被寡母从小带大的科利奥兰纳斯,也非常重视荣誉,其重视程度要远超平常的罗马人。“他经常自我超越,心中一直在思考丰功伟业……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更大的荣誉与更高的颂扬。”^{[3]403}然而,不同于他人“创造荣誉在于炫耀自己,马修斯获得荣誉的终极目标是要取悦母亲”^{[3]403}。

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科利奥兰纳斯获取荣誉的目的是为了取悦母亲,间接说明了伏伦妮娅对科利奥兰纳斯的影响。在莎士比亚笔下,这种影响是被直接刻画的。

莎士比亚在第一幕第三场增加了对科利奥兰纳斯的家庭生活的描写,除了梁实秋所说的为了建构一种与悲剧气氛相对的松弛效果之外,还能够显示伏伦妮娅对科利奥兰纳斯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莎士比亚增加的这个家庭生活的场景中,到处可见:伏伦妮娅“因为想到名誉对于这样一个人是多么重要,要是让他默默无闻地株守家园,岂不等于一幅悬挂在墙上的画像?所以就放他出去追寻危险,从危险中间博取他的声名。我让他参加一场残酷的战争;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头上戴着橡叶的荣冠”^{[4]389}。要是她有十二个儿子,“也宁愿十一个儿子为了他们的国家而光荣地战死,不愿一个儿子闲弃他的大好的身子”^{[4]389};当知道科利奥兰纳斯受伤时,也丝毫不担心,反而认为,“那样才更可以显出他的英武的雄姿,远胜于那些辉煌的战利品”^{[4]390};在科利奥兰纳斯得胜归来之时,伏伦妮娅才会告诉科利奥兰

纳斯：“现在只有一个愿望还没有满足，可是我相信我们的罗马一定会把它加在你的身上的。”^{[4]414}显然，这个愿望就是科利奥兰纳斯顺利当上执政官。因为在当时的罗马，执政官掌握着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权力，“被认为是全国最高荣誉的官职”^{[11]33}。在这里，可以看出伏伦妮娅对于军功的追求、对荣誉的渴望以及对科利奥兰纳斯更高的期待。母亲的言传身教，激励着科利奥兰纳斯不断地获取荣誉。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最年长的男性承担着“家长”（Paterfamilias）的功能，对他们的子女拥有绝对的权威（父权），包括教育甚至是生杀予夺之权。妇女受其丈夫控制，处于“夫权”之下，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12]438}莎士比亚塑造了伏伦妮娅驱使科利奥兰纳斯建功立业、追求军功、参选执政官等情节的同时，也塑造了伏伦妮娅的“强母”形象。这种“强母”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权威性，填补了缺失的父权的功能，是父权的一种表征。因此，可以说莎士比亚笔下的伏伦妮娅形象是父权的化身。

同时，伏伦妮娅也是国家利益的化身。在科利奥兰纳斯面临个人尊严与集体冲突时，伏伦妮娅两次利用母亲的身份，逼迫科利奥兰纳斯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在科利奥兰纳斯竞选执政官时，因为对平民的蔑视——他认为向平民祈求同意是对自己尊严的侮辱，不愿展示自己身上的伤疤以获取平民的支持。在科利奥兰纳斯出言不逊激怒平民，贵族与平民险些爆发暴力冲突后，伏伦妮娅劝说他为了“避免流更多的血”，为了“招抚一个城市”，“不妨采用权谋，示人以诈”，认为这样的行为“对于荣誉并无损坏”。虽然科利奥兰纳斯表示，“它的耻辱是我终身不能洗刷的”，一旦这个计划失败，平民“就要把这个马修斯的体肤磨成面粉，迎风抛散了”，伏伦妮娅为了国家的利益却依然软硬兼施地逼迫科利奥兰纳斯去向平民道歉。伏伦妮娅把国家利益置于科利奥兰纳斯的个人尊严与生命之上，逼迫科利奥兰纳斯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4]447-452}在科利奥兰纳斯带领伏尔斯人围攻罗马时，伏伦妮娅再次把国家利益置于科利奥兰纳斯的生命之上，不惜带领全家向科利奥兰纳斯下跪的方式，利用家庭伦理逼迫他让步，使他成为国家利益的化身。

梁实秋认为，莎士比亚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一幕第二景的家庭生活描写，“是为与强烈的悲剧气氛作一对照，借以发生松弛之效”^{[13]8}。用这个原因来解释莎士比亚对伏伦妮娅的精心塑造，显然是不够的。莎士比亚把李维和普鲁塔克笔下的一个普通的母亲，改变成了父权和国

家利益的化身，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从戏剧创作来看，剧作家“应该寻求与个性相契合的环境，并且把它定性为具体的情境，使主体的命运与个性潜能相一致”^{[14]98}。以父权和国家利益化身的伏伦妮娅，是莎士比亚设置的戏剧情境的一部分。伏伦妮娅对科利奥兰纳斯的影响以及推动，代表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对科利奥兰纳斯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内在力度也与科利奥兰纳斯追逐荣誉、骄傲的性格特征相适应。在这种情境下，剧中科利奥兰纳斯所表现出来的无处不在对荣誉的追逐与骄傲的性格才更具合理性。

其次，莎士比亚塑造的伏伦妮娅的“强母”形象，同样也受到其所处时代社会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1560—1640年英格兰社会价值观念方面出现了变化：一方面，从“家族社会”的思维模式向“公民社会”的价值标准转变；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导致户主继承了牧师的威望和权力，导致当时社会出现了“父权制再度加强”^{[15]134}的现象。伴随着父权的加强，女性受到了极大的排斥和限制，“父权制社会中家庭的主要功能是促成子女的社会化，使其适应社会文化对性别角色与性别气质的界定……母亲若在儿子成年后还频繁干预其社会事务，会被视为导致儿子不幸的根源”^[16]。莎士比亚塑造的伏伦妮娅，影响并推动着科利奥兰纳斯走向悲剧的结局，被视为造成科利奥兰纳斯悲剧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受到了莎士比亚时代对女性偏见的社会文化的影响。

三、科利奥兰纳斯形象流变

相比于《罗马史》，《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科利奥兰纳斯具有更多性格特征，“节制、刚强和公正”，同时又“专制、傲慢和蛮横”。但是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科利奥兰纳斯并不排斥向普通平民展示他的伤痕，在竞选执政官当天，“马修斯像一般候选人那样，现实身体上依然清晰可见的刀疤和伤痕”^{[3]412}。在这里，科利奥兰纳斯能够接受竞选执政官必须用委婉的语气恳求平民的同意这一惯例；他对于平民的憎恨，也是由于平民对他的拒绝引发的。在此之前，科利奥兰纳斯针对的对象只是哗众取宠、煽动民意的护民官。

因此，普鲁塔克笔下的科利奥兰纳斯所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率直而非骄傲，这种率直造成了他“难以交往和目空一切的习性，无论哪一方面来看都会触怒到大多数的人民”^{[3]438}。科利奥兰纳斯与其他的贵族将领并无太大的区别，他的所作所为换成任一强硬派贵族成员都是有可能做出来

的。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主要源于当时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冲突,具有一定的历史因素。

莎士比亚对于科利奥兰纳斯的改动最大之处,就在于把他骄傲的性格推向了极致,使得科利奥兰纳斯悲剧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莎士比亚为《科利奥兰纳斯》设置了一个最为典型的情境——“情景和性格在一开场就清晰地树立在舞台上,在最初情况之后,便依据逻辑展开情节”^{[17]139}。科利奥兰纳斯被置于一种固定不变的极度骄傲的性格之中,对于平民的憎恨和厌恶是针对整个平民阶层,且贯穿始终的。导致科利奥兰纳斯悲剧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伏尔斯特大将奥菲狄乌斯在剧中表达了他的观点:

也许因为他的一帆风顺的命运,使他沾上骄傲的习气,损坏了他的完善的人格;也许因为他见事不明,不善于利用他自己的机会;也许因为他本性难移,只适宜于顶盔披甲,不适宜于雍容揖让;刚毅严肃本来是治军的正道,他却用来对待和平时期的平民。^{[4]482}

奥菲狄乌斯把科利奥兰纳斯被驱逐的原因归纳为三点:骄傲、缺乏判断力和不懂得驭民之道。然而,科利奥兰纳斯并非是失去了判断力导致他没有抓住做执政官的机会。虽然不情愿,但科利奥兰纳斯还是来到了广场请求平民的同意;虽然他嘴上说着“宁愿死,宁可挨饿,也不愿向别人求讨我分内所应得的报酬”^{[4]427},但是他并没有失去判断力,也极力地抓住机会,他为此安慰自己“待我憋着这口气演完那下半本吧”^{[4]427}。虽然科利奥兰纳斯极力压制自己向平民请求,但他坚持没有向平民展示伤疤。那样会让人觉得科利奥兰纳斯所受的伤,只是为了换取平民的赞叹,这种争取荣誉的目的性有损他的骄傲。

因此,科利奥兰纳斯在平时并不缺乏判断力,能够压制自己的情绪,唯有在他的骄傲被侵犯时,才会失去判断力。剧中有两处科利奥兰纳斯与平民的冲突——由于被骂作“叛徒”,他的骄傲让他难以压制自己的情绪,失去了判断力,继而对平民破口大骂……第一次冲突的结果是科利奥兰纳斯被罗马人驱逐,第二次冲突的结果是科利奥兰纳斯被伏尔斯特人杀害。

英国学者布拉德雷在《莎士比亚悲剧实质》(1902)一文中指出,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主人公身上,“我们看到一种显著的片面性,一种对某一特殊方向的癖性,一种在某些环境下对于朝这个方向靠近的力量的抵拒的完全无能为力,一种使整个存在

跟一种兴趣、目标、热情或癖性等同起来的致命的倾向”^{[18]33}。显然,在科利奥兰纳斯身上,这种片面性就是他的骄傲,他的整个存在都已经成了骄傲的化身。骄傲——这个我们人人身上都会存在的天性——也就成了科利奥兰纳斯悲剧的根源,使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超越了历史的特殊性,具有了更普遍的意义。

关于莎士比亚作品反映普遍人性的特点,曾被许多评论家阐释。18世纪的英国文学评论家塞缪尔·约翰逊认为,莎士比亚作品永恒的魅力就在于反映了普遍的人性,他“所描写的人物,其语言行动均受普遍的情感和原则的支配,能激励一切人的心,这是普遍人性的真实产物”^{[19]175}。约翰逊的这种看法,“对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观有深刻的内在的影响”^{[19]176}。梁实秋认为:“莎士比亚的重要作品,没有一部其主题不是与人生有密切关系的。莎士比亚把握住人的基本情感,所以他才成为‘不是某一时代的,而是为一切时代的’。《哈姆雷特》写复仇,《麦克白》写罪恶,《奥赛罗》写猜忌,《李尔王》写愤怒,这全是人类的基本情感。”^{[20]694}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科利奥兰纳斯》写的是骄傲。

以上几部剧作的主人公最初都是一个英雄,在情节上都属于“英雄陨落”这一类型的故事。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哈姆雷特》写的是复仇对英雄的伤害,《麦克白》写的是欲望对英雄的伤害,《奥赛罗》写猜忌对英雄的伤害,《李尔王》写自负对英雄的伤害,《科利奥兰纳斯》写骄傲对英雄的伤害。从整体上看,它们共同讲述了一个主题:英雄的脆弱性。这一点,在莎士比亚剧本里也多次强调,例如《理查二世》里,理查将王冠交给波林波洛克后,看着自己镜中憔悴的脸说道:“一道脆弱的光辉闪耀在这脸上,这脸儿也正像不可恃的荣光一般脆弱,瞧它经不起用力一掷,就碎成片片了。”^{[21]78}理查感叹的不是脸的脆弱,而是命运的脆弱,哪怕他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君王。在脆弱性这一点上,英雄与平民无异。

上述剧中所共同展现的英雄脆弱性的主题,同样与莎士比亚时代的历史背景有关。在十四、十五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和“红白玫瑰战争”期间,当时的英雄人物无论是贵族统领还是国王,都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以至于到了亨利八世在位期间,旧贵族基本灭绝。^{[22]12}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和生命的轻易被摧毁,必然构成当时英国人民“感觉结构”^{[23]57}的一部分。这种“感觉结构”作为当时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使沟通得以可能的深层的共同

性”^{[23]57}。这连年征战的年代与莎士比亚所生活的16世纪并不遥远,因此,在他的戏剧作品中,这种“感觉结构”就被自然地吸收了。

参考文献:

- [1] 麦克利什,昂温. 莎士比亚戏剧指南[C]. 曹南阳,刘略昌,译.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8.
- [2] Livy. The History of Rome[M].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 [3] 普鲁塔克. 希腊罗马名人传:上[M]. 席代岳,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
- [4]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四)[M]. 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 [5] 勒庞. 革命心理学[M]. 伶德志,刘训练,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 [6] 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7] 雷蒙·威廉斯. 现代悲剧[M]. 丁尔苏,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 [8] 亚里士多德. 诗学[M]. 罗念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 [9] 布里格斯. 英国社会史[M]. 陈叔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10] 丛日云.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M]. 大连:大连出版社,1996.
- [11] 于贵信. 古代罗马史[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

- [12] 莱斯莉·阿德金斯,罗伊·阿德金斯. 古代罗马社会生活[C]. 张楠,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3] 莎士比亚. 考利欧雷诺斯[M]. 梁实秋,译.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 [14] 谭霈生. 戏剧本体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15] 许洁明. 17世纪的英国社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16] 邵雪萍. 莎士比亚剧作中母亲形象的文化解读[J]. 外国文学评论,2010(1).
- [17] 布罗凯特,希尔蒂. 世界戏剧史:上册[M]. 周靖波,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5.
- [18] 布拉德雷. 莎士比亚悲剧实质[C]//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册.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19] 李伟昉. 梁实秋莎评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20] 梁实秋. 《李尔王》辩[C]//梁实秋文集:第1卷.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 [21]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三)[M]. 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 [22] 钱乘旦,陈晓律. 英国文化模式溯源[C].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 [23] 雷蒙·威廉斯. 漫长的革命[M]. 倪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Evolution of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of Coriolanus

YANG Kangen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stories of Coriolanus of Levy, Plutarch and Shakespeare, the images of the folk, Volumnia and Coriolanus are different. In Levy and Plutarch's works, the folk are vulnerable groups abiding by law and behaving themselves, Volumnia is an ordinary mother, and Coriolanus is an ordinary aristocratic hardliner. In Shakespeare's works, the folk appear as a group of mob, Volumnia becomes the embodiment of patriarch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riolanus becomes the embodiment of pride. The great changes of characters in Shakespeare's works are not only caused by the dramatic needs, but also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 of Shakespeare's time.

Key words: Shakespeare; Coriolanus; the evolution of character

中国老年群体的资本禀赋、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CGSS 2017调查数据的中介机制分析

杨毅, 黄延, 贺浩浩

(西南大学 a. 国家治理学院; b. 公共文化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摘要: 当今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数字化进程相叠加, 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研究基于CGSS 2017调查数据, 以互联网这一代表性数字技术为例, 将老年人的资本禀赋(经济、文化、健康、社交)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融入(接入、技能、产出)作为中介变量、主观幸福感作为被解释变量, 采取B-K逐步回归方程法与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进而考量变量间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 数字接入在经济、健康、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应; 数字技能与产出在经济、健康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应, 而在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中介效应。数字技术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个体间的资本禀赋所带来的幸福感差距。

关键词: 老年群体; 资本禀赋; 数字融入; 主观幸福感; 中介效应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05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1)04-0023-06

当今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数字化进程相叠加, 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虽然数字技术可以有效赋能大多数民众的生产生活, 但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却长期存在, 其在数字社会中被排斥问题日渐凸显, 这可能会降低他们的生活幸福感, 乃至引发或扩大人际、家庭与社会冲突。因此, 解决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不仅关乎老年个体尊严, 也关乎亲子关系与家庭和睦, 更关乎急遽变迁的中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对此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如国务院2020年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强调要切实解决老年人在智能技术运用过程中的问题, 让老年人更好地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客观上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受限于多方面的因素, 其中个体的经济、文化、健康、社交等资本禀赋尤为基础与关键。具体到“资本禀赋—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这一

传导路径, 数字技术究竟是扩大还是填平了个体间的资本禀赋所带来的幸福感差距, 现有文献并未较好地三者统筹考察。因此, 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 检验并分析数字融入在老年人的资本禀赋对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中的中介效应, 以期进一步明晰数字技术在老年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所造成的影响。

一、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资本禀赋与数字融入

老年人由于卸下工作与家庭责任走向个体化生活, 又处在这个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 因此他们的数字融入指向“身份的转换和调适”与“从现实社会向虚拟社会转移”的双重含义。随着数字技术的扩散与人们对其认知的持续深入, 目前数字融入这一概念主要涉及接入层、技能层与产出层^[1]:

(1) 接入层。“接入”是数字融入的基础条件,

收稿日期: 2021-05-20

基金项目: 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创新团队项目“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SWU1909101); 重庆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积极老龄化赋能适老型文旅业态创新的演进机理与实施路径研究”(S202110635268)

作者简介: 杨毅(1977—), 男, 湖北武汉人, 博士,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教授, 公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 区域社会发展与文化治理。

即独立拥有网络接入设备并可以在有需要时自主接入网络。如今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不断普及,数字接入的门槛不断降低。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1年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达9.86亿,而5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提升至26.3%,表明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

(2)技能层。相比于接入,更主要的问题在于个体是否充分掌握数字技术使用技能。互联网不仅提供信息资讯,还提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与服务。目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即时通信、网络消费、视听娱乐、教育医疗等应用软件,均需一定的操作知识与技能才能应对。面对当下信息超载、真伪难辨的互联网生态,不少老年人正是由于担心“被诈骗”“乱扣费”而产生科技恐惧感,对互联网畏而远之,即使是“勉强连接”的部分老年人,在具体操作时也会遇到各种障碍。

(3)产出层。如今人们基础性、关系性和发展性需求越来越多通过互联网实现。由于存在使用技能差异,不同个体在给定环境下利用数字技术所获产出也存在差距,那些被数字排斥的老年人往往难以享受社会交往、交通出行、医疗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红利。数字化服务在为一部分人提供便利的同时,却也成为另一部分人的生活障碍。例如疫情期间健康码成为不少地方远距离出行的凭证,但许多老年人不懂得如何申请与使用健康码而感到不便。

影响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相关因素较为复杂,例如个体的价值感知、外在的社会支持、技术的适老化程度,但从根本上来讲数字融入的指向主体仍是个人,因此学界多从个体资本禀赋角度探讨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机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1)经济资本。一方面,人们在考虑开始使用数字技术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是否拥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因为当前的互联网与终端设备品质与价格存在差异,付出更多的成本往往意味着更好的数字体验;另一方面,经济资本背后所隐含的阶层分化,反映了不同的个体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需求与方向不一而足,那些由于工作“被强制”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数字融入状况往往更好。

(2)文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教育文化水平是衡量ICT使用技能的最一致的预测因子,这不仅体现在老年人原有认知结构对新鲜事物的接纳程度,还会影响到学习新技术的信心。数据显示,我国80%左右网民的学历为初中及以上,但我国目前的

老年群体多基本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当时我国的教育普及程度不高,尽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卓有成效,但客观上我国目前相当数量的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

(3)健康资本。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会逐渐弱化进而影响数字技术使用,如视力下降影响对图文的辨识能力、肌肉退化影响对设备的触控操作。而除生理健康外,心理健康和精神状态也很重要,积极乐观的老年人更愿意尝试通过数字技术与他人建立联系,在学习数字技能时也会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

(4)社交资本。老年人对陌生事物的认知与接受常常受到家人、邻里、朋友等和老年人生活联系密切的初级群体的影响,既有实证研究表明子女代际支持会显著影响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态度、使用意愿和实际使用,而同龄群体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直接的使用体验进而提高其学习效率。

(二)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随着社会走向原子化,老年人易因脱离群体生活而导致幸福感下降,而数字融入又往往与社会融入相关联。例如,如今移动支付随处可见,甚至一些消费场所不再设置人工收费服务,可能会对部分老年人的出行、消费造成障碍,进而使他们的社会活动意愿下降。与鼓励老年人与社会相割裂的脱离论相反,互动论认为老年人对于社会互动有着基本需求,积极的社会参与和活跃的关系网络有助于老年人适应社会。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亦旨在创造有利条件让老年人回归社会,在各方面享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和权利,因此推动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内容。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有助于老年人的自我实现与增进其幸福感^[2-3],但“在场替代效应论”则认为互联网使用减少了老年人在场空间或物理空间的参与资本、人际互动、社会交往,从而增加了老年人的孤独感与恐惧感^[4]。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争议点实质是数字技术对个体资本禀赋的幸福生成效应究竟为增益还是削弱,而讨论此问题的前提是明晰老年人的数字融入程度。可以推知,若老年人具有良好的数字素养,他会懂得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改善生活、发展自我,同时规避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因此推动老年人的数字融入便成为利用数字技术增进其生活幸福感的关键。

综上所述,可以建立资本禀赋、数字融入与主观

幸福感三者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并得出这一假设:数字融入在老年群体所具有的经济、文化、健康、社交等资本禀赋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为验证这一假设,本研究以互联网这一代表性数字技术为例,将老年人的资本禀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融入作为中介变量、主观幸福感作为被解释变量,依据温忠麟等建立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5],采取B-K逐步回归方程法与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期从实证层面提供有力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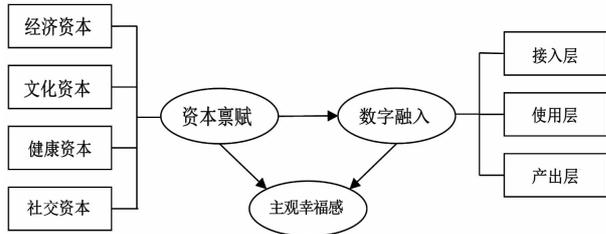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赋值

(一)数据来源及信度检验

本研究所涉及数据来源于CGSS 2017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含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居民互联网使用数据。依据所研究的问题域进行数据清洗,剔除回答问题时60周岁以下或相关题项有缺失的个案,最终得到301个样本。对样本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得到Cronbacha系数为0.837 > 0.8,表明样本信度良好,可用于实证分析。

(二)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为更好地使数据服务于研究,对其进行标准化赋值(具体变量、操作化指标及赋值规则见表1)。特别地,对数字技能与数字产出的评定,前者从打开网站、下载安装APP、查找信息、辨别信息真伪、表达想法和网络支付6个方面进行考量,后者从社交活动、自我展示、网络行动、休闲娱乐、获取信息和商务交易6个方面进行考量,最终取其均值作为得分。

表1 变量及对应操作化指标、赋值规则

变量	操作化指标	赋值规则
主观幸福感 (SW)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	非常不幸福=1;比较不幸福=2;说不上幸福不幸福=3;比较幸福=4;非常幸福=5
经济资本 (EC)	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	下层=1;中下层=2;中层=3;中上层=4;上层=5
文化资本 (CC)	目前最高受教育层次?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1;私塾、扫盲班=2;初中=3;职业高中=4;普通高中=5;...
健康资本 (HC)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健康状况是(包括身体和心理健康)?	差=1;一般=2;好=3;比较好=4;非常好=5
社交资本 (SC)	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您的空闲时间做社交、串门?	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非常频繁=5
数字接入 (AD)	您家里能上网吗?	能=1;不能=0
数字技能 (SD)	以下描述是否符合您的情况? ①我会使用电脑打开网站 ②我会使用智能手机下载安装APP ③在网上查找自己想要的信息并不难 ④网上(如微信、微博)看到周围人转发的重要消息,我会先验证再相信 ⑤当我想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我知道怎么操作 ⑥在网上进行支付或者交易时,我会观察使用环境来确定是否使用	非常不符合=1;不符合=2;无所谓符合不符合=3;符合=4;非常符合=5
数字产出 (OD)	在过去的一年里,分别因为社交活动、自我展示、网络行动、休闲娱乐、获取信息、商务交易而上网的频繁程度?	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总是=5

样本数据重新赋值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可知:整体而言,中国老年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较高;在资本禀赋层面,经济与健康资本较好、社交资本相对较弱,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老年群体的物质与健康保障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老年群体的人际活动和社会参与尚不充分;在数字融入层面,绝大多数老年人已经可以较为自由地接入互联网,且使用技能掌握较好,但从数字技术应用中受益的程度还略显不足。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SW	4.010	0.806	1	5
EC	3.578	0.919	1	5
CC	6.066	2.879	1	14
HC	3.296	1.081	1	5
SC	2.651	1.152	1	5
AD	0.957	0.204	0	1
SD	3.136	1.081	1	5
OD	2.530	0.805	1	5

三、中介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 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规避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模型估计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对变量进行初步回归并检验其多重共线性(结果见表3),可知各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与平均方差膨胀系数均接近于1且小于5,表明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确信后续的分析结果较为稳健。

表3 多重共线性结果

变量	方差膨胀系数	1/方差膨胀系数
SD	1.700	0.587
OD	1.600	0.625
CC	1.260	0.794
EC	1.220	0.819
HC	1.210	0.829
AD	1.080	0.926
SC	1.050	0.951
平均方差膨胀系数	1.303	

表4 主观幸福感与数字融入、资本禀赋回归结果

序号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SW		SW		SW		SW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AD			-0.117	0.215				
SD					-0.070	0.044		
OD							-0.055	0.057
EC	0.252***	0.052	0.253***	0.052	0.256***	0.052	0.254***	0.052
CC	-0.005	0.016	-0.004	0.016	0.004	0.017	-0.001	0.016
HC	0.099**	0.043	0.098*	0.043	0.109**	0.044	0.100**	0.043
SC	0.068*	0.038	0.069*	0.039	0.068*	0.038	0.070*	0.039
常数项	2.988***	0.171	3.090***	0.253	3.109***	0.187	3.081***	0.197
R ²	0.144		0.145		0.151		0.147	

注: *、**、*** 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级别显著。

表5 数字融入与资本禀赋回归结果

序号 变量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AD		SD		OD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EC	0.009	0.014	0.062	0.068	0.046	0.053
CC	0.008*	0.004	0.128*	0.021	0.083***	0.016
HC	0.001	0.012	0.169***	0.057	0.037	0.044
SC	0.007	0.010	0.005	0.050	0.045	0.039
常数项	0.865***	0.046	1.735***	0.224	1.693***	0.174
R ²	0.019		0.185		0.116	

注: *、**、*** 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级别显著。

(三) Bootstrap 检验

本研究设定重复抽样次数为 500 次,对四类资

(二) B-K 逐步回归检验

如表 4 所示,为验证研究假设,首先构建模型(1)以测算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被解释变量)与四类资本禀赋(核心解释变量)的直接关系,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与经济、健康、社交资本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而与文化资本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因此三者按中介效应立论,后者按遮掩效应立论。然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数字接入、技能与产出 3 个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即模型(2)(3)(4)。最后对数字融入与资本禀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 5),构成模型(5)(6)(7),结果表明数字接入与文化资本,数字技能与文化资本、健康资本,数字产出与文化资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但模型(2)(3)(4)表明主观幸福感与数字接入、技能与产出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无法判断这些变量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因此接下来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

本禀赋、数字融入的 3 个层面与主观幸福感分别进行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6—9。

表6 经济资本、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的 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

变量	EC→(AD→)SW		EC→(SD→)SW		EC→(OD→)SW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0.002	[-0.013 0.010]	-0.011	[-0.034 0.012]	-0.006	[-0.021 0.010]
直接效应	0.301	[0.182 0.419]	0.310	[0.190 0.429]	0.304	[0.190 0.419]
总效应	0.299		0.299		0.299	
中介效应占比	-0.006		-0.037		-0.019	

表7 文化资本、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

变量	CC→(AD→)SW		CC→(SD→)SW		CC→(OD→)SW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0.000	[-0.004 0.004]	-0.002	[-0.015 0.010]	-0.001	[-0.012 0.010]
直接效应	0.024	[-0.007 0.056]	0.027	[-0.005 0.058]	0.025	[-0.007 0.057]
总效应	0.024		0.024		0.024	
中介效应占比	-0.012		-0.103		-0.042	

表8 健康资本、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的 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

变量	HC→(AD→)SW		HC→(SD→)SW		HC→(OD→)SW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0.000	[-0.007 0.006]	-0.009	[-0.031 0.012]	-0.001	[-0.013 0.010]
直接效应	0.183	[0.095 0.270]	0.191	[0.101 0.282]	0.184	[0.097 0.270]
总效应	0.182		0.182		0.182	
中介效应占比	-0.002		-0.050		-0.008	

表9 社交资本、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的 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

变量	SC→(AD→)SW		SC→(SD→)SW		SC→(OD→)SW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系数	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0.000	[-0.005 0.005]	0.000	[-0.006 0.006]	0.000	[-0.008 0.008]
直接效应	0.113	[0.027 0.199]	0.113	[0.022 0.204]	0.113	[0.020 0.206]
总效应	0.113		0.113		0.113	
中介效应占比	-0.002		0.002		0.002	

据表6—9可知,经济、健康、社交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直接效应系数置信区间不包含0,可认为存在中介效应;文化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直接效应系数置信区间包含0,可认为不存在中介效应。结合模型(2)(3)(4)中主观幸福感与经济、健康、社交资本的回归系数显著,可知直接效应显著。

数字接入在经济、健康、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应,即数字接入使得这三类资本禀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强度减弱。这源于互联网世界中老年人往往可以享有比线下更为便捷的社会参与机会与权利,差异性较大的个体也可以打破地域和阶层的隔阂、更为对等地交流,进而拓展其社会交往层级与范围,使得原本的社交资本禀赋影响力趋于减弱。

数字技能与产出在经济、健康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应,即掌握数字技能并从中受益会减弱经济、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强度。但如前文机理分析所述,健康是对数字技能掌握影响较大的一个变量。数字设备的使用基本需要同时调动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这对身体机能退化的老年人来说并不友好。目前政府与企业也关注到这一问题,陆续推出各种数字设备及软件的适老化更新方案,如调整界面设计风格、添加方言语音识别,使其更便于老年人操作。

同时,数字技能与产出在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中介效应,即社交资本会由数字技能与产出得到增强,这理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强与旧有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系,二是结识新的社会交往对象。但也有研究表明,线上老年群

体更多的是维系家人、朋友等强关系网络,较少联系弱关系群体。从代际维度看,青少年、中年、老年群体大致分属于数字原住民、移民与难民,三者间存在着一定的数字鸿沟,随着社会交往活动的开展,他们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演化为数字冲突。老年群体面对数字技术时的不适应既会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也会诱发更宏观的社会群体之间的误解与摩擦,他们可能在无法适应技术或得不到外界支持时产生对他人及社会的不满与冲突。因此,数字融入较差的老年人还可能失去部分社交资本,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主要结论:(1)数字接入在经济、健康、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应;(2)数字技能与产出在经济、健康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应,而在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中介效应。可以将之归结为数字技术的“平权效应”,数字技术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个体间的资本禀赋所带来的幸福感差距,而对于幸福的追求却日益离不开数字技术的介入与赋能。因此我们需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社会支持体系,提供各类适老型数字设施和学习机会,帮助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

(二)讨论与展望

虽然包括本研究在内的多数研究表明,整体而言数字融入的确有助于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幸福感,但国外也有研究认为数字技术难以融入部分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这些个体并不视数字技术为有

价值的生活工具。这启示我们: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并非可以简单视为对于数字技术的适应,更是涉及生活方式的意愿和选择。在社会快速走向数字化的背景下,也应当尊重一些个体选择“断连”的权利。实际上,数字鸿沟并不一定会演变成社会问题,而是只有个体因为数字鸿沟难以融入社会、享受不到与他人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时才构成问题。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持续加剧,数字技术发展也日新月异,因此即使是如今仍能亦步亦趋的中年群体,未来仍可能变成“数字难民”。我们应构建一个数字包容社会,这不仅需要加强数字技术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针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数字弱势群体打造、更新易于获取、学习与使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最后,本研究虽然验证了“资本禀赋—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这一传导路径,但是事实上数字融入也有助于老年人拓宽经济收入渠道、接受科学知识与文化、维持或建立社会关系,即通过扩大老年人的资本禀赋来提升其生活幸福感,同时老年人从

数字融入中得到的幸福感越强,也可能越愿意融入数字化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与循环。因此,老年人的数字融入问题与机制较为复杂,未来还需进一步地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 [1] Dewan S, Riggins F J. The Digital Divide: Current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2005(12):298-337.
- [2] 徐旭. 互联网对老年人继续社会化的影响[D].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3.
- [3] 靳永爱,赵梦晗. 互联网使用与中国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基于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学刊,2019(6):44-55.
- [4] 杜鹏,汪斌.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J]. 人口研究,2020(4):3-17.
- [5] 温忠麟,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74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Capital Endowment, Digital Integr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mediary Mechanism Based on CGSS 2017 Survey Data

YANG Yi, HUANG Yan, HE Haohao

(a. School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 Public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superposition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digitalization of society in China today has brought man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soci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GSS 2017 survey data, this study takes the Internet as a representative digital technology. The capital endowment of the elderly (economy, culture, health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s taken as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Digital integration (access, skills and output) is adopted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s.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used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B-K stepwise regression equation method and the Bootstrap method in order to test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between the variabl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Digital access plays a masking effect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y, health,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2) Digital skills and output play a masking effect i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and health capital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while play a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other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has narrowed the gap in happiness brought about by capital endowments among individuals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the elderly; capital endowment; digital integrat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mediation effect

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探析

强 敏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与成长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其创新成长路径决定着自身发展速度及社会整体创新能力。在理论解析了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基本路径之后,利用科创板企业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当前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路径情况。研究发现,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并不是简单的仅选择某一种创新成长路径,而是选择以市场创新型成长路径为主的同时,选择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为辅助路径;技术创新对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复杂作用效应;科创型中小企业成长性受到组织管理创新的作用力很小,组织管理创新型成长路径在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中表现很弱。

关键词: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技术创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06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29-07

科创型中小企业是指在一定创新路径下依托创新人才从事科技研究与创新活动,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其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成长的中小型企业。随着科创板于2019年6月正式开板以及在科创板上市交易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科创型中小企业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其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成为理论界探讨的对象。科创型中小企业作为一种以创新求生存和发展的企业,通过何种路径实现自己的创新与成长是其必然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这对于其自身持续、深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培育高质量科创型企业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探索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与成长之路就显得尤为必要。但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方面的理论研究很少,关于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还没有形成统

一定论。所以,在目前市场环境下结合科创型中小企业的特征,研究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能够有效弥补理论研究空白,也能够达到推动实务领域前进的目的。

一、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类型

较强的创新能力是科创型中小企业实现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创新贯穿于其成长过程的每一阶段,无论企业走的是哪一种成长路径,创新是其成长目标得以实现的必然因素。企业的创新成长路径是在当前市场环境背景下,在创新思想的指导下,企业的内外部资源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应用以及重组而进行的多方面创新活动,进而实现企业效益提升和价值成长的过程。企业的发展历程和生命周期本质上可以看成是以各种发展路径的动态组合为基础的成长轨迹,企业之间的整体成长差异具体表现为各种成长路径的差异性以及其组合的差异性。

关于企业创新成长路径的类型,国内外学者进行过较多划分,比如 Nelson R. R. (2004) 在研究中

收稿日期:2021-04-25

基金项目:2017年度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优秀拔尖人才培养项目“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gxyq2017170);安徽财贸职业学院2019年度内涵提升全员行动计划“1+X证书”制度试点专业建设项目“连锁经营管理‘1+X证书’制度试点专业建设”(2019zszd07)

作者简介:强敏(1980—),女,安徽蚌埠人,硕士,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经济贸易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经营管理。

将创新型企业发展路径划分为技术创新型和管理创新型两种基本类型^[1]; Bose S. 和 Thomas K. (2007) 将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的创新类型划分为人才型、管理型和市场型三种^[2]; 吴运建(2009) 和徐华东(2013) 等学者在研究中将以创新为基础的企业的成长模式划分为创新型和技术型两种类型^[3-4]; 吕峰(2016) 将科技型企业的成长方式归纳为市场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三种^[5]; Zubieli G. C. D. (2016) 则在研究中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总结为管理模式型、市场营销型、产品技术型三种^[6]。可以看出, 学者们对创新类、技术类、知识类企业创新成长路径的划分基本上分为技术创新型、管理创新型、市场创新型三大类, 所以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将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路径归纳为技术创新型、市场创新型和组织管理创新型三种。

(一) 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

(1) 基本含义

该路径强调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发展及预期成长目标实现过程中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工艺、产品的技术含量等技术创新方面的内容依赖程度最高, 技术创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与成长的最主要动力因素, 而企业在市场、管理、组织等其他方面的创新对其成长目标的实现只起着辅助性作用。

(2) 核心点

第一, 在生产技术与工艺方面的创新处于企业整个创新体系中的最关键地位。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是各种创新因素共同作用和推动的结果, 而此时技术创新在各种创新因素中居于最核心位置, 也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最关注的创新点, 其他方面的创新虽然也会得到企业的关注, 但都是为了技术创新能够顺利实现而提供服务和支撑的。

第二, 生产技术和工艺的创新在相当大程度上带动企业其他方面的创新。技术创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核心创新因素, 科技型中小企业以生产技术和工艺的创新为主要动力源泉驱动企业在市场、管理等方面的创新。技术创新的实现为其他方面的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 同时也对其他方面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技术创新的强辐射性是选择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成长目标的重要条件。

第三, 对研发人才和研发资金的要求高。选择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归根结底还是源自生产技术和工艺的创新, 对技术研发强有力的支持和科学的规划是

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之一, 所以必须有高素质的技术研发人才, 同时也要有足够的研发资金与之相匹配, 高素质的研发人才以及充足的科研资金是技术创新目标能否实现、成长路径能否形成的重要保障。

第四, 企业预期盈利目标的实现是核心推动力。任何一家企业若要获得持续经营和发展就必须首先能够实现其预期盈利目标, 预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选择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时所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预期盈利的实现根源于技术创新, 同时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 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和物质保障。

(二) 市场创新型成长路径

(1) 基本含义

此路径主要强调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和成长目标的实现主要依靠在市场方面的创新和突破, 市场策略和市场行为的创新是企业成长的力量源泉, 而诸如技术、产品、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创新行为只是处于企业整个发展与成长过程中的次要地位和辅助力量。

(2) 核心点

第一, 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市场创新意识和创新倾向。企业家对行业状态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非常关注和重视, 企业经营利润主要来源于在市场策略和市场行为上的创新。实现企业的盈利目标和成长目标是选择市场创新型成长路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最终目标, 而其最直接的目标则是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活力和地位, 充分高效地利用企业有限的资源进而不断进行市场扩张和占有, 继而可以达到保持现有市场地位以及预期绩效和成长目标实现的目的。

第二, 市场的变化指引着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导向。通过结合在技术、产品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对市场进行研究和开发, 根据市场的最新动向制定企业的经营战略和发展策略, 推动企业在行业内的地位和优势, 进而实现成长目标。

第三, 市场创新推动作用。该成长路径主要强调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目标的实现是来自企业在市场策略和营销策略方面的创新实现的, 来自市场方面的创新因素在企业实现的所有创新中起着主导作用, 是引领企业其他方面创新实现的主要因素, 同时也是企业从事其他方面创新的落脚点, 其他的创新活动都是为了市场创新实现以及市场创新目标的达成而服务的, 一旦在市场方面的创新活动没有实质性成果则其他方面的创新便失去了存在意义。市场创新使得企业获得了新的市场和新的客户需求, 而如果在产品性能、质量等方面没有创新则依然无法有

效满足客户的需求,市场创新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三)组织管理创新型成长路径

(1)基本含义

选择组织管理创新型成长路径的科创型中小企业的经营目标和成长目标的实现主要依靠企业内部组织管理的创新和突破,企业经营效益也主要来自组织管理效率的提升,包括技术、产品、市场等在内的创新只是该路径科创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次要方面和辅助动力,通过不断构建和完善企业的组织管理体系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挖掘未知资源,进而推进企业的快速成长。

(2)核心点

第一,组织管理创新意识和创新倾向明显。选择组织管理创新型成长路径的科创型中小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意愿,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坚定地认为在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可以实现企业的长期战略规划和成长预期,而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保持地位和稳定发展也主要得益于在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能力,企业家对整个企业的组织架构的合理性、创新性以及管理的效率都非常重视,企业家的组织管理创新意识强烈,在推动企业成长过程中更多地倾向于通过组织管理的创新。

第二,以组织管理创新为中心点布局其他创新。该种创新成长路径更多地强调以组织管理创新为主导进而带动其他方面的创新,是企业以创新带动成长的核心因素,企业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的创新活动都是以组织管理创新为方向,是组织管理创新最终目标实现的辅助动力。选择该种成长路径的企业首先需要对企业组织管理的创新进行准确定位,将其放置于企业创新体系的核心环节,而后在此核心基础上布局其他方面创新以及相关工作的开展,同时也要在资源分配上给予优先考虑,以保证核心创新动力的成功实现,也是保证创新成长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

二、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实证分析

(一)样本与指标

1.样本选择

科创板是针对科创型中小企业上市交易的一个新型资本市场,自其开板以来,在该市场挂牌的企业越来越多,截至2020年底,在科创板挂牌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200家,合计募集资金总额达到2876亿元。在行业分布上,挂牌科创板的企业高度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领域合计占比达

55%,高端装备、新材料和节能环保等领域合计占比45%。在科创板上市交易的企业是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的优秀代表,所以本文以科创板挂牌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当前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路径情况。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连续性,本文选择2019年以前在科创板挂牌的企业,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共得到67家样本企业。各指标采用2019年第3季度到2020年第4季度的数据,个别时间点上的缺失值采用内推法弥补,各样本企业数据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平均,得到各指标的单维纵向时间序列数据。所有数据收集整理自CSMAR数据库,所有计算过程均由Eviews 8.0实现。

2.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前文内容,本文将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路径划分为技术创新型、市场创新型和组织管理创新型,拟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的方式探索当前我国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路径情况,以创新成长路径的量化指标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将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设定为被解释变量。关于企业成长性的衡量指标较多,参考胡卫敏(2007)^[7]、唐雯(2021)^[8]等学者的研究,本文选择多个指标综合反映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以销售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资产增长率和人员增长率4个指标作为衡量企业成长性指标。

技术创新型路径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产品以及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上,可以从此方面构建技术创新型变量,结合路径的含义和核心点以及借鉴和参考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可反映科创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的指标包括表1中的4个指标。市场创新型成长路径的形成主要来自企业能否通过一些创新型的市场举措占领市场、挖掘客户,所以本文选择科创型中小企业的网点或分公司的开设个数、客户群体细分或地域细分数量、市场调查报告的频率等3个指标作为市场创新型变量的测量指标。组织管理创新型成长路径的形成主要体现在科创型中小企业能够在组织管理方面实现创新和变革,其最主要决定性因素是企业家,而一个企业家组织管理创新意识的培养则主要来自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所以用表1中的3个指标体现组织管理创新型变量。

可以看出,成长性和各创新成长路径的衡量指标都有若干个,这些指标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它们相互之间又存在相似性和差异性,所以为了后文分析的便利以及分析结论的客观性,本文将这些指标分别综合为成长性变量、组织管理创新型变量、市场创新型变量和技术创新型变量。通过电子函询

或当面咨询的方式邀请了江苏大学、安徽大学、国元证券等高校和企业的 10 位有丰富经验和理论基础的专家对每个替代指标相对于上一层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赋值,而后根据每位专家给出的权重值计算出指标的算术平均数。由于每个指标的度量单位存在较大差距,出于后文数据分析和模型构建的需要,对获取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见表 1)。

表 1 指标权重汇总表

变量	代表字母	指标名称	权重
技术创新型 变量	I_tech	最新设备占比	0.2
		科研人员比重	0.3
		主营产品年均更新换代次数	0.3
		年专利技术数量	0.2
市场创新型 变量	I_market	年新增销售网点或分公司增加数量	0.3
		市场细分数量或地域细分数量	0.4
		市场调查报告的频率	0.3
组织管理 创新型变量	I_manage	核心管理层成员外出考察或交流次数	0.2
		核心管理层人均继续再教育时间	0.3
		战略性政策年更换次数	0.5
成长性变量	Grow	销售收入增长率	0.3
		资产增长率	0.3
		利润增长率	0.2
		人员增长率	0.2

(二) 灰色 GM(1,1) 模型构建

结合各指标权重综合计算得到 I_tech、I_market、I_manage 和 Grow 4 个变量,选择各变量 2019 年第 3 季度到 2020 年第 4 季度的数据实证分析各创新成长路径变量对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的影响。由于经典经济计量模型对数据量要求较高,所以首先在目前 6 期季度数据的基础上拟合灰色 GM(1,1) 模型,并预测每一个变量的未来 10 期值以补充现有数据在量上的不足(见表 2)。

表 2 各变量 GM(1,1) 模拟结果

变量	a	b	残差	平均相对误差
Grow	-0.23	8.62	5.71	4.05%
I_tech	0.07	3.37	0.02	1.78%
I_market	0.18	8.66	1.43	2.87%
I_manage	0.11	5.14	3.24	7.65%

计算各灰色 GM(1,1) 模型的方差比值 C 和小误差概率 P(见表 3),与拟合精度参照表进行对比发现,本文拟合的各 GM(1,1) 模型的精度都比较高,均达到 1 级的拟合精度,而且根据刘思峰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各模拟中的 a 值均小于 0.3,各灰色 GM(1,1) 模型均适用于进行中长期预测^[9],各变量未来 10 期的预测值如表 4 所示。

(三) 经济计量模型构建与分析

1. 平稳性检验与协整分析

将企业的成长性和各成长路径变量 2019 年第 3 季度到 2020 年第 4 季度的原始值和未来 10 期的预测值结合共同构成本文实证分析的样本数据。计

算各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数可以发现(见表 5), Grow 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都很高且都为正值,其中 I_market 与 Grow 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0.934483,是所有变量间最高的,其次是 I_tech 与 Grow 之间相关系数,达到了 0.909899。

表 3 各变量 GM(1,1) 模型检验结果汇总表

检验指标	Grow	I_tech	I_market	I_manage
P	0.988	1	0.932	1
C	0.122	0.172	0.216	0.137
精度	1	1	1	1

表 4 各指标未来 10 期的预测值

预测期数	Grow	I_tech	I_market	I_manage
1	12.41	2.40	17.81	11.12
2	12.39	2.56	17.95	11.36
3	12.59	2.75	18.14	11.59
4	12.86	2.89	18.30	11.74
5	13.12	3.04	18.49	11.89
6	13.52	3.26	18.62	12.04
7	13.94	3.48	18.88	12.35
8	14.23	3.61	19.03	12.67
9	14.55	3.88	19.34	12.92
10	14.77	4.05	19.58	13.11

表 5 相关系数表

	Grow	I_manage	I_market	I_tech
Grow	1.000000	0.823422	0.934483	0.909899
I_manage	0.823422	1.000000	-0.633648	-0.613573
I_market	0.934483	-0.633648	1.000000	0.551722
I_tech	0.909899	-0.613573	0.551722	1.000000

具有时间特性的回归模型是建立在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基础上的,直接用非平稳数据进行分析很容易出现“伪回归”问题,所以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是模型构建的必然步骤。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检验涉及时间的滞后因素,同时也是后续相关模型不可回避的因素,所以需要检验变量整体的滞后阶数状况。表 6 中统计量显示,5 个检验指标中 FPE、AIC、SC、HQ 4 个指标在 5% 显著性水平下都接受了变量整体的滞后阶数为 2 阶,所以 2 阶滞后就成为后文各模型构建的基础。

表 6 变量滞后阶数检验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23.47384	NA	1.12e-07	-2.675807	-2.047483	-2.947474
1	188.4533	192.4751*	7.22e-15	-20.05645	-23.96754	-20.86396
2	203.5656	21.9604	6.02e-17*	-33.37492*	-29.46338*	-35.76633*

表 7 为利用 ADF 法计算的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汇总表,在 5% 标准下,除了 I_manage 为平稳序列外,其他 3 个变量均存在 1 阶单位根,所以无法直接构建回归模型,需要进一步检验各变量间的协整性。

利用 Johansen 法的协整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可以看出,以 5% 为显著性检验标准下,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通过了检验,本文的 4 个变量间共存在 3 对协整关系,对比相关性分析和理论分

析内容可以认为是 Grow 分别与 I_tech、I_market 和 I_manage 这 3 对协整关系。

表 7 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汇总表

变量	检验类型(c,t,q)	5%临界值	ADF 统计量	单整阶数
Grow	(c,1,2)	-4.554125	-0.854615	
ΔGrow	(c,0,1)	-2.519484	-3.528791	I(1)
I_manage	(c,0,1)	-2.954158	-4.625841	I(0)
I_market	(c,1,2)	-1.258964	1.526487	
ΔI_market	(c,0,1)	-4.635284	-7.658856	I(1)
I_tech	(c,1,2)	-1.348745	1.954125	
ΔI_tech	(c,0,1)	-4.385415	-7.365184	I(1)

表 8 协整检验汇总表

假设	Eigenvalue	迹统 计量	0.05 检验值	极大似然 统计量	0.05 检验值
None	0.965744	158.36270	179.5782	70.47575	76.56742
At most 1	0.907482	62.11581	73.56472	35.56788	49.85774
At most 2	0.678559	27.67884	35.47820	17.56104	19.56883
At most 3	0.467449	9.876952	4.116595	6.046371	4.96054

2. 因果关系检验与回归模型拟合

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此时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更进一步了,但是并不能有效说明变量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所以需要运用 Granger 检验来进一步论证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变量和各种创新成长路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见表 9)。可以看出,仅有 I_market 是 Grow 变动的原因、I_tech 是 Grow 变动的原因、I_tech 是 I_market 变动的原因这 3 个假设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其中假设“ΔI_market 不是 ΔGrow 的格兰杰原因”的 F 检验最为显著,说明 I_market 对 Grow 变动的作用效用最为显著,和协整检验结论相吻合。结合前文内容,技术性因素显著作用于成长性变量的同时,也显著地对市场性因素产生影响,而市场性因素又显著地作用于企业的成长性,所以技术创新型变量对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在发挥显著的直接作用的同时,也会通过其他相关因素发挥间接作用。所以可以断言,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路径比较复杂,它并不是完全走的某一种成长路径,而是在一种创新成长路径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多种创新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表 9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汇总表

假设	F - stat	Sig.
ΔI_manage 不是 ΔGrow 的格兰杰原因	0.39548	0.24263
ΔGrow 不是 ΔI_manage 的格兰杰原因	0.25147	0.50673
ΔI_market 不是 ΔGrow 的格兰杰原因	3.65481	0.00139
ΔGrow 不是 ΔI_market 的格兰杰原因	2.59415	0.35147
ΔI_tech 不是 ΔGrow 的格兰杰原因	2.25941	0.04227
ΔGrow 不是 ΔI_tech 的格兰杰原因	1.95184	0.30545
ΔI_market 不是 ΔI_manage 的格兰杰原因	4.65184	0.19874
ΔI_manage 不是 ΔI_market 的格兰杰原因	3.95847	0.59415
ΔI_tech 不是 ΔI_manage 的格兰杰原因	1.36258	0.41954
ΔI_manage 不是 ΔI_tech 的格兰杰原因	2.00594	0.63948
ΔI_tech 不是 ΔI_market 的格兰杰原因	9.36415	0.00187
ΔI_market 不是 ΔI_tech 的格兰杰原因	8.05104	0.15949

下面以 I_tech、I_market、I_manage 为解释变量

(虽然 I_manage 变量对 Grow 的因果影响关系并不显著,但考虑到上文的分析内容以及本研究的目的,将 I_manage 也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Grow 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综合分析三种创新成长路径在科创型中小企业中的具体表现。

表 10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 - Statistic	Sig.
I_manage	-1.037227	0.520574	-4.657883	0.0218
I_market	3.985742	0.404692	5.574843	0.0001
I_tech	0.674345	0.145114	3.563373	0.0105
C	-31.67644	10.48552	-1.467856	0.0365
R - squared	0.945482	Mean dependent var		20.47594
Adjusted R - squared	0.928584	Hannan - Quinn criter.		2.048834
Log likelihood	-2.4758335	Durbin - Watson stat		1.887012
F - statistic	582.34965	Prob(F - statistic)		0.000000

表 10 中 R - squared 值为 0.945482,说明被解释变量 94.55% 的变动都能够由解释变量来解释,F - statistic 和 D. W 统计量分别为 0 和 1.887012,都达到显著水平状态,所以此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整体拟合效果显著。三个解释变量的 t 检验结果均非常显著,其中 I_market 的 t 检验结果的显著性为 0.0001,是所有解释变量中最显著的一个,市场创新型变量对科创型中小企业成长性的直接影响最深刻,从拟合参数值来看,市场创新型变量增加 1% 会同向带动科创型中小企业成长 3.99%。I_tech 估计参数 t 检验的伴随概率为 0.0105,显著低于 5% 的显著性水平,I_tech 每增加 1 个单位会同向带动 Grow 增加近 0.67%,明显低于 I_market。I_manage 在 5% 的水平下是 Grow 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拟合参数为负值,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会反方向带动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这与现实情况以及前文的分析相悖,表明 I_manage 对 Grow 有比较微弱且不稳定的影响。

前文的因果关系检验显示 I_tech 与 I_market 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分别以 I_tech 和 I_market 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见表 11)。

表 11 I_tech 对 I_market 回归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 - Statistic	Sig.
C	-11.64732	0.568421	59.36558	0.0000
I_tech	0.537263	0.215773	-37.228641	0.0000
R - squared	0.837452	Mean dependent var		14.58478
Adjusted R - squared	0.815467	Hannan - Quinn criter.		0.658221
Log likelihood	-3.658247	Durbin - Watson stat		1.684357
F - statistic	384.5882	Prob(F - statistic)		0.000000

从表 11 中的 R - squared 值、F - statistic 的伴随概率、D. W 值等可以看出此模型拟合效果较好。I_tech 的 t 检验结果显著,I_tech 对 I_market 的影响很明显,I_tech 每变动 1 个单位会同方向带动 I_market 变动 0.537263 个单位,技术创新会带动市场创新加速。

3. 模型拟合结果分析

从变量 I_{tech} 、 I_{market} 与 $Grow$ 之间的高度正相关以及 I_{tech} 、 I_{market} 与 $Grow$ 之间的协整关系可以断定 I_{tech} 和 I_{market} 是推动 $Grow$ 变化的原因,这说明现阶段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同时与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密切相关,技术创新型、市场创新型成长路径在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中都存在。但从相关系数以及 t 检验可以认为 $Grow$ 受到 I_{market} 的影响最深刻,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成长能力受到市场创新因素影响很深,可以认为市场创新型成长路径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目前最主要的创新成长路径。从 t 检验结果以及参数拟合绝对值来看, I_{tech} 对 $Grow$ 的影响也比较显著, I_{tech} 也是 $Grow$ 变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成长是技术创新因素带来的,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辅助创新成长路径。而在 3 个解释变量中,虽然 I_{manage} 的 t 检验通过了 5% 显著性水平,但是其拟合参数为负,不但与相关性分析结果相反,而且与实际经济现象不吻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受到来自组织管理创新因素的作用力很小,受到组织管理创新因素影响很有限。

此外,从 Granger 检验以及回归模型拟合结果可以发现, I_{tech} 对 I_{market} 的因果关系显著,而且回归模型结果也显示这种因果关系确实存在,且 I_{tech} 作为 I_{market} 的一个变动原因能够在一定幅度上同向带动 I_{market} 的不断变化,这进一步显示出技术创新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技术方面的创新不但能够直接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而且还能够通过影响市场因素实现对企业成长的间接推动。虽然从 Granger 检验和回归模型结果来看, I_{market} 是 $Grow$ 最显著的一个原因,对其影响也最大,但是 I_{tech} 对 $Grow$ 的影响情况最为复杂, I_{tech} 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同时影响着 $Grow$,这进一步体现出技术创新型因素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地位,虽然市场创新能够直接带动企业营业收入、经济效益的提升,但是产品的质量、市场口碑等还是要依靠技术创新,所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并不是简单地仅依靠某一种路径,而是选择以市场创新型路径为主的同时,在技术创新方面也会下功夫,选择以技术创新型路径为辅助路径。

三、结论与建议

(一) 主要结论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1) 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并不是简单地仅选择某一种创新成长路径,而是选择以市场创新型成长路径为主的同时,在技术创新方面也会下一点功夫,选择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为辅助路径。

(2) 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之间存在协同效应,突出表现在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和市场创新型成长路径之间,技术创新直接作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同时,也会通过市场创新间接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

(3)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受到组织管理创新因素的作用力很小,组织管理创新型成长路径在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中表现得很弱。

(二) 对策建议

(1) 制定多方位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科技政策。技术创新型成长路径目前是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选择的主要创新成长路径,政府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现实情况,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多方位给予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政策倾斜。技术创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来源,而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生产力主要来源,此二者可以说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形成以及成长目标实现最直接的动力,所以政策制定者应该提升对二者的支持力度,通过优惠政策给予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积极性,通过各种措施促成企业、科研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等多方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升,进而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速度。

(2) 注重企业管理层以及普通员工的继续教育与培训。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以及思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企业经营与行为,影响企业的成长路径的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成长速度和市场竞争力,所以在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径形成及市场竞争力提升过程中,企业家的专业水平至关重要,要加强企业家以及整个管理层不断学习和培训的力度,提升管理层的理论水平以及实践经验。同时也要加强对普通员工的培训力度,一方面为管理层人员的新陈代谢提供后备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提升普通员工的技术水平能够为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以及成长路径的形成提供人才力量。

(3) 注重各类资源的聚合与高效利用。资源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成长的基础,专业的人才、资金等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选择、实施、转换的力量源泉,路径的自由选择和形成需要充足的资源作为保障。所以,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现有的资源进行聚合并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于企业的成长以及整体竞争力的提升相当重要。首先要做到的

是积累通用性强的核心资源,这类资源的利用面广,对企业的整体实力的提升以及成长速度从多方面施加推动力。其次是建立内外部资源的长期累积机制,学会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科创型中小企业创新成长路径的形成、整体竞争力的提升需要一个过程,对相关资源的需求也是在路径形成过程中的每个阶段的需求,科创型中小企业要树立一个长期积累资源的观念和意识,把资源的积累作为企业发展和成长的一个中介目标。最后是在已聚合的资源的前提下提升对每一种资源的利用效率,以最小的成本换来最大的收益和最快的创新成长路径。

(4)企业家对创新成长路径要有全过程观念。无论科创型中小企业选择的创新成长路径是哪一种,通过各种手段推动此路径形成过程中都不能急于求成,应该放眼企业发展与成长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条企业创新成长之路。全过程观念既包含着路径的形成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长期过程的含义,同时也蕴含着每一个阶段对这个过程的推动的意思,也就是说企业家在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企业创新成长路径过程中需要把握全局和全过程,同时也应该着眼不同阶段。全过程观念也是指企业在整个生命周期里的全过程,在科创型中小企业存续的漫长时间里,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即使现在的创新成长路径能够很好地实现企业的成长目标,但是不一定就能够在未来时间一直推动企业成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需要不断地根据内外部环境适时选择一条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成长的最佳路径。

参考文献:

- [1] Nelson R R. Territories of Profit;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the Innovative Enterprises of G. F. Swift and Dell Computer (Book) [J].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2004(2):311-313.
- [2] Bose S, Thomas K. Valuat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Knowledge - Based Firms; The Need For New Methods in a Changing Economic Paradigm [J]. Management Decision, 2007(9):1484-1496.
- [3] 吴运建,孙成访. 创新型企业与技术创新型企业[J]. 生产力研究,2009(11):153-155.
- [4] 徐华东. 苏州高成长型中小企业成长路径与未来发展[J]. 求实,2013(2):56-58.
- [5] 吕峰,张仁江,云乐鑫. 组织原型、创业领导力与科技企业成长路径及内在机理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6):99-112.
- [6] Zubielqui G C D, Jones J, Lester L. Knowledge Inflows from Market and Science - based Actors, Absorptive Capacity,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A Study of SM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6(6):73-88.
- [7] 胡卫敏. 创新型企业评价体系研究[J]. 价值工程,2007(11):36-39.
- [8] 唐雯,王卫彬.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现状:基于200家企业的调查分析[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1(2):34-39.
- [9] 刘思峰,杨英杰,吴利丰,等. 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 7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63-16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nalysis on the Innovation - growth Path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MEs

QIANG M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Anhui Finance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 growth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MEs are important participa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novative country" and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th of innovation - growth determines their own development speed and overall soci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fter theoretically analyzing the basic path of innovation - growth of Chin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MEs, the sample data of STAR Market companies are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current innovation - growth path of Chin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MEs. The study found that Chine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MEs do not simply choose a certain innovation - growth path, but choose the market innovation - growth path as the mainstay,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growth path as the auxiliary pa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complex effects on the innovation - growth of SMEs. The innovation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MEs, and the innovative path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has a very weak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MEs.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MEs; innovative - growth pa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政府会计制度执行机制构建研究

秦 晋

(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 财务处, 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以政府会计制度改革为背景,首先,基于国内外对政府会计制度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可供政府会计制度执行机制构建的经验借鉴;其次,分析了我国政府会计制度变革的路径特征;最后,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权责发生制、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监督和评估的执行机制等四个层面构建了政府会计制度的执行机制,为我国政府会计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政府会计制度;执行机制;权责发生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07

中图分类号:F2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36-05

“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是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来的重大战略部署。新《预算法》也要求各级政府财政部门以年为单位对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进行编制。2014年12月,财政部出台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被国务院批复、转发,确立了改革的总体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具体内容、实施步骤、配套措施和组织保障。

我国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及相关配套规定。可见,目前首当其冲的就是针对新政府会计制度的落实构建完善的保障机制。

一、文献综述

我国政府会计领域的改革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也由此对此领域展开研究,主要包括国内外政府会计的基本理论研究、政府会计的改革研究、政府会计制度的执行与影响等。随着我国政府会计制度的发布,相关研究开始涉及政府会计制度的实施与影响,对照新旧会计制度,探讨新

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在会计核算、财务报告等方面的影响;对新旧政府会计制度衔接的具体措施以及对政府会计制度的完善进行研究。唐瑶^[1]对新旧政府会计制度衔接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给出了建议;康月、王玖^[2]引入制度变迁理论,探讨了政府会计的制度属性,提出了构建政府会计系统的整体思路。

政府会计领域的改革最早在20世纪初展开于西方国家,但对政府会计制度有重大影响的变革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发生变革的原因以及这些变革产生的影响和结果也从那时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相关研究内容围绕着英美法等国家的政府会计改革的动因、模式、成效等展开。目前,国外正在对政府会计改革的纵深进行研究,深入研究政府会计制度的实施情况。Cohen和Karatzimas(2015)^[3]对希腊政府会计改革进行了考察,主要涉及改革的背景、会计核算对权责发生制的重视、政府会计体系涉及的四大要素、新政府会计准则的颁布、评价政府会计改革的标准、改革实施的难度等内容。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关于政府会计制度的执行机制研究,虽然在国内外研究中有所涉及,但是在研究视角上,主要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缺少其他理论视角的指导;在研究对象上,还没

收稿日期:2021-05-16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新时代山东政府会计制度执行机制构建研究”(18CKJJ14)

作者简介:秦晋(1974—),男,山东日照人,硕士,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财务处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政府会计、财务管理。

有将政府会计制度在行政事业单位执行机制确定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多为宏观性的建议,尚未形成科学的、操作性强的宏观和微观内容兼具的制度执行机制研究。

二、政府会计制度的变迁特征

(一)需求诱致为基础的强制性变迁特征

按照行为主体的差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类型^[4]。在我国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相关会计人员的不懈努力,并把从上到下的领导和从下到上的探索结合起来,推动政府会计制度不断创新,使其日益完善起来。另外,我国对政府会计制度的改革具有明显的强制性。一方面,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导致其他相关制度的变革,所以要使微观制度与社会经济体制相适应;另一方面,是关于整体结构均衡的问题,当一种制度发生变迁时,原有的结构均衡就会被打破,使其他相关制度不得不发生变革。

(二)政府为主导的制度供给型变迁特征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随着制度的变迁政府会计制度也逐渐发生变革,也就是说实质上是契约的替代或变更引发了改革。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来推进政府会计制度改革,这样才能明确不同部门的角色和职责,避免因利益冲突而选择维护本部门的利益。这种基于会计制度对政府会计改革进行主导的强制推动力既能有效控制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调和契约相关者彼此的利益关系,还能用最小的代价来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制度安排,改善经济水平,为公民谋福祉。当前我国会计制度变迁所处的经济环境与新制度经济学下制度变迁的经济环境显著不同:一方面会计制度在形成过程中没有其他制度与其竞争,就会造成会计制度改革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是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有些信息不被重视,就会遗漏相关信息并可能会使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戴维·菲尼曾提出,知识积累、制度安排和制度成本均会不同程度地对制度供给造成影响,制度变迁的深度、方向、广度和形式与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所以,政府应该利用从上到下的领导权威、制度成本低和深厚的知识积累等自身独有的优点,增加对制度的供给。另外,以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中,政府应依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全面规划改革的形式、方向和步骤等,然后再以改革制定的总体规划为依据,对既定秩序进行调整,并制定出新的惩处方式或行为程序等,形成一套完善的约束机制和行为导向。

(三)立足国情的国际协调特征

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密切交流的背景下,政府会计制度在国际维度上越来越与企业会计制度逐渐趋于一致。公共部门委员会(PSC)于1996年由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成立,专门用来掌管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s)的制定和发布。我国在改革政府会计制度时分析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作为IFAC成员国,利用IPSASs标准增强我国政府机构的权威性。但是根据我国现在的国情,政府会计制度只能逐渐进行变革,还不能完全与国际标准趋同。所以,我国需要综合考虑当前所处的内在特征与外部环境,尤其是经济、政治环境,完成政府会计制度的改革。

三、政府会计制度执行机制构建

(一)基于权责发生制的执行机制

1. 确定政府会计目标

政府会计目标作为综合财务信息最原始的目标,同时也是政府财政工作的最终目的,包括信息核算原则、确定信息使用者,以及将这些会计数据输向何处。目前我国使用的政府会计规范还不完善,对财务信息使用者和政府利益相关者的定位也还不明确。目前仅仅只有内部信息使用者可以使用被政府会计准则认定的会计信息,也仅针对本单位财政管理和上级政府的需要处理规定财务信息。但目前政府财务与市场经济进行着大量业务往来,政府会计信息的处理披露程度决定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管控,所以仅内部信息使用者可以使用政府会计信息已不适合当下的市场环境。因此,为使财务信息更完整,应充分考虑政府、社会等相关人员各方面的要求,更加全面准确地定义有关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

2. 构建政府会计核算体系

通过汲取和学习国外权责发生制改革的经验,我国也应按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结合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的顺序渐近展开,最终完全实现权责发生制。这个演变过程一方面可以进行相关配套措施的研究和制定,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成本。这种逐步推进改革的方式,可以保障在社会经济稳定的环境下稳步推动权责发生制的改革进度。由于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的过程时间跨度大,所以要想全面反映这段时间政府的运行状况,应该根据用收付实现制计算的预算和用权责发生制记录的财务报表来安排财政上的预算,这样才能使预算更准确,并且可以提供全方位的相关信息和财务结果,提高绩效的合理性,为以后的发展

提供经验。

3. 完善政府会计法理基础

完善的法律法规有力保障了政府会计改革的进行。因为我国进行政府会计制度改革比较晚,有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现有的暂行办法和部门规章已不能适应政府会计改革的需要。在进行深入仔细的调研讨论后,应尽快制定与权责发生制变迁相适应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法规。这不仅在法律上支持和认可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也表明了政府坚定推进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决心,从而提高参与人员对改革的重视程度,有利于快速高效地推进改革。

(二) 基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执行机制

基于各个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差异,政府财务报告会将会计系统中的相关信息全面、及时、有效地传递给信息使用者。政府财务报告模式分为对内模式和对外模式^[5]。

政府财务报告的对内模式根据使用者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为政府内部管理者,用于满足公共管理部门的需要;第二类为本级政府,满足基本政府管理层面的需求;第三类是作为最重要的使用者的上级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因为我国政府内部实行包括单位部门之间上下级的垂直的委托代理关系,上级不仅控制下级还需对下级负责,所以上级在进行管理的时候要监督下级受托责任的履行,还需对下级提供的财务信息做出抉择。

政府财务报告的对内报告主体分为以下几个层次:首先是本级政府,把整个政府作为会计主体记录发生的交易记录和注意事项,不仅可以反映整个政府所拥有的全部资源和需要偿还的债务,也可以全面反映政府的收入和费用状况;其次是各级政府所设立的不同类型的部门,这些部门各自承担自己的职责,肩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应当以各级政府部门为政府财务报告的主体,负责管理配置该部门的预算资金;最后是行政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其获取财务资源的方式主要是转移支付、收费、税收,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涵盖其财政收支预算,同时承担提供公共服务和资金的责任。

政府的对内财务报告,信息内容越详细越好,同时信息越全面也越有利于内部管理者管理并做出正确决策,所以报告内容应该包括政府所承担的广泛的受托责任,并由财务部分、非财务部分、预算部分组成。其中,财务部分重点以财务报表为主,非财务部分则是以决策与内部管理相关的、不能在会计报表中反映的信息为主,预算部分主要包含有关预算

执行和其他相关信息。

政府财务报告的对外模式根据使用者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政府审计监察机关和立法机关,这类机关接受社会公众的委托监督,有权检查各级政府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所以这类使用者需要有关财务管理情况和财政收支合法情况的相关信息;第二类是与政府存在终极委托代理关系的社会大众,包括资源的提供者、服务的接受者、纳税人、财务分析师、媒体等,这类使用者委托政府承担其基本的责任;第三类是债权人、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等,这类使用者把自己的财务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投资或借给政府,因此需要根据政府的财务情况来做出相关决策。

政府财务报告的对外模式在报告主体上,应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出发,包括本级政府、政府部门以及所属单位和机构、基金、公益性国企。关于报告内容方面,对外报告的使用者需要做出私人决策、公共决策并且进行监督、评价,所以应该包括与政府经济活动相关的预算、各种财务信息和无法用货币衡量的非财务信息。

政府对外财务报告的报告期间,因为有些报告使用者不用做出相关决策或在未来才做出决策,需要以年度数据为依据做出判断,所以说报告期间具有滞后性,因此把年度综合财务报告作为首要选择,并且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这个选择也是根据成本效益原则的选择。

(三) 基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机制

1. 建立完善的政府预决算信息披露体系。首先,明确政府财务报告的主体。目前我国实行以政府为基本单元编制的预算合并报表的模式。其次,创新内容的披露。应该从政府总预算方面和部门预算方面积极填充预算公开报表的内容。应该创新专项报告,建立“三农”支出专项报告和财政转移支付专项报告,有效地防止腐败的发生,保证农民可以切实享受得到政府给予他们的好处,并且建立“环保资金”支出专项报告,来保证专款专用。最后,报告时间的确定。政府财政总预算和相关部门的预算应该经人大审核并确认无误后 20 天内公布。同时,应及时在批复部门预算后公开“三公”经费预算,通过多种形式接受社会的监督。

2. 建立统一规范的政府财务会计报告体系。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主要反映政府的财务情况以及资金流动情况;会计报表附注主要反映重要会计政策的变更等相关信息;文字说明部分主要分析政府的财务情况以及资金的流转和运用,并

对未来的财务情况和资金状况做出预判。当前,我国政府会计准则正在修订完善中,要健全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体系以促进政府会计制度的协调规范发展。

3. 强化监督协同机制建设。政府应该重视所公布信息的质量,只有信息的质量满足要求时,才能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完全履行所负的责任。会计信息的公布应遵守透明、真实、全面、清晰的原则,自觉接受公众的监督。应建立起包括多种监督在内的多元一体化的协同监督机制,实现监管机制的长效化,进而为政府会计信息透明化做好铺垫。

4. 增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激励机制。政府应该形成有利于会计信息公开公布的激励机制,使政府财政信息更加透明,增强披露信息的可信度,真实地反映出政府的财务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当社会公众信任程度提高时,能够更进一步扩展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深度与广度。

(四) 基于监督和评估的执行机制

1. 引入第三方审计。引入第三方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是进行外部监督的必由之路。目前政府财务报告审计需求与政府审计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而且社会公众普遍要求公共部门抓紧披露政务信息,所以引入第三方审计意义重大。注册会计师作为第三方监督力量,表现出了明显的独立性,加上审计经验丰富,能够保证高质量地完成政府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

2. 运用信息化平台。实施政府会计制度必须以内部监督信息化平台作为技术基础。随着政府会计改革渐入佳境,其财政信息系统也得到了更新换代,但财政监督平台尚处于酝酿状态,政府部门要抓紧完成此平台的设计和开发。政府部门应该以财政监督平台为依据,实现绩效考核、监督管理工作与资产管理、非税收入收缴、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与执行相结合,整合专项监督与日常监督,这样才能使得监督贯穿政府会计工作的全程。在这个基础上,为了满足大数据与智能化发展的要求,政府部门应该提高对信息化的整合水平,构建政府财务的共享服务平台,使多部门能够共同监管。此平台为预算单位提供了上传、下载、存储和共享财务数据的功能,使得财务信息的共享成为可能,不仅如此,管理部门能够不受时间限制地查看财务数据,消除了信息孤岛的现象,各单位联网后可以直接对预算单位的明细账、总账、会计凭证进行查看,掌握其财务和运营情况,从而更好地开展监督工作。

3. 优化评估的方法与流程。政府会计人员依据

实施的过程与内容,全面评估政府会计制度的实施成果。一方面,评估政府会计人员的工作情况时应该综合运用各种先进、成熟的模型和方法。比如,采用模糊综合评估法来评估政府会计人员的绩效水平,实现定性评价到定量评价的转化,集中量化和计算前期获得的数据,尤其是要量化报表编制指标和会计核算指标。再如,根据相关指标来判断财务报告和预算报告的及时性、准确性,将之作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用以反映政府会计人员的工作情况和成果,这样可以消除人为因素造成的评估偏差,能够降低评估结果的主观性,使得绩效考核评估方法和流程足够科学、系统。另一方面,整理涉及政府会计制度衔接问题的数据,从整体上评估政府会计制度的运用情况,期间还要对各部门、各单位实施政府会计制度期间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收集相关的数据和信息,用于判断核算规定科学与否,各类科目设置合理与否,这样才能为政府会计制度的改良提供依据,使得政府财务报告体系走向成熟。

4. 注重结果的运用与反馈,提高评估的实用性。新旧政府会计制度的衔接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改善评估的合理性有利于第一时间察觉当中的不妥之处,如外部阻力对新旧制度的衔接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新政府会计制度是否适用于本部门、本单位相关制度等。所以,政府自身也要学会运用和反馈评估结果,要将解决政府会计制度实施过程中各种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写于评估报告当中,交由会计主体对此进行分析和采纳,如果建议可行,那么要尽快实施,使得相关问题得以解决。比如,以评估报告为参考,对本单位的基础会计制度、政府会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对比分析,在不违背会计规则的前提下,实现管理制度的革新,使之与单位特点和实际情况相互辉映。笔者认为,也可以利用审计结果进行二次评估,使得第三方审计的监督作用得到充分体现,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政府机关,体现出审计结果的价值。所以,在实施政府会计制度期间,要灵活运用评估结果,通过分析和研究评估结果,得到科学的结果,使得评估的实用性得以保障。

5.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是指管理层通过制定准则,来保护本单位资源的安全,使披露的会计信息更加透明有效,实现其内部控制目标体系,其目标在于保证本单位活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政府的履职绩效、在运用资产方面合理高效、有效地预防营私舞弊行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得到有效保障等。政府单位应该建立起以预算管理为

主、以资金管控为关键的控制体系,把预算作为主要手段,衔接单位的主要业务,合理设置关键岗位,并确定每个岗位具体的业务权限、所具有的职能、所需的审批程序和每个岗位的具体责任,使单位的财产安全得到保证。重视对风险的评估,风险评估要求政府单位应该时刻关注和评估那些在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违法违规并造成一定损失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把握好宏观风险,而且也要兼顾好微观风险。政府单位在微观方面主要注意预算控制、收支控制、采购、工程、资产等。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内部控制体系构建应在充分考虑我国实际国情和特殊政治体制的情况下,突出多层级的特征,明确各级政府层级所对应的内部控制建设要求。

四、结语

在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进程中,通过不断完善会计准则,进而形成完整的会计准则体系;加大政府会计信息系统的研发投入,借助信息处理技术,并以政府会计制度与政府会计准则为依据,建立一个功能相对完善的信息系统;加强对政府财务报告的监管,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提高信息的披露质量;积极培养和引进政府会计人才,逐步提高职业判断能力

和自身业务素养,从而建设起一支高质量、高素质的政府会计专业队伍;政府在主导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同时,应积极宣传引导改革意识,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减少摩擦成本,减少策略依赖作用,激发相关经济主体参与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动力,为实现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目标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 [1]唐瑶.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对高等学校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建议[J].纳税,2018(8):51-53.
- [2]康月,王玖.制度变迁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动力机制探析[J].财会通讯,2018(1):42-46.
- [3]Sandra Cohen,Sotirios Karatzimas. Debate: Reforming Greek government accounting[J].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 2015(3):178-180.
- [4]张琦.经济危机催生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6):45-50.
- [5]陈志斌.政府会计概念框架结构研究[J].会计研究,2011(1):17-23.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QIN Jin

(Financial Department,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Shandong 27682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reform, this paper starts with combing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uts forward the experi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Then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ging path of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in China. Finally,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is constructed from four aspects: the government's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reporting system, the accrual system,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and the execution mechanism of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which provides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Key words: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人脸识别信息的法律保护与规制

苏佳伟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200042)

摘要:人脸,作为生物识别信息的一种,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进行辨识性社交活动的重要信息载体。近年来,随着传感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的发展,人脸这种独特而普遍的信息载体逐渐演化为个人数字信息的一部分,即人脸识别信息或数据。人脸识别信息相比于其他生物识别信息而言,呈现出敏感度高、采集方式多样、隐蔽和灵活的特性,不当使用可能会给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此外,人脸识别技术还面临独特的监管难题,在某些场景下甚至具有道德伦理的隐忧。面对更大范围的人脸识别技术的普及,在加强监管,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促进人脸识别信息的合法合规流通才是引导产业发展的最佳途径。

关键词:人脸识别;身份认证;个人信息保护;隐私保护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08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41-07

2021年4月9日,国内人脸识别第一案在原告上诉后于杭州中院宣判。本案的原告郭兵与妻子在被告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办理了双人年卡,并留存相关的个人身份信息、拍摄照片及录入指纹。此后动物园将入园系统从指纹识别升级为人脸识别,并短信通知已办卡客户,郭兵于2019年7月、10月两次收到动物园要求注册人脸的通知短信,后因不愿意被强制刷脸,协商无果后将动物园告上法庭。

本案一出,遂将“人脸识别”技术以及与其相关的个人信息维护、隐私保护等话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实际上,本案的背后折射出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公众对我国人脸识别信息保护滞后、不规范、不成体系的立法现状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信息泄露等一系列问题的普遍担忧。虽然本次杭州市中院在判决中提到“人脸识别信息比其他生物识别信息而言,呈现出敏感度高、采集方式多样、隐蔽和灵活的特性,不当使用将给公民的人身财产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应当做出更加严格的规制。经营者只有在消费者充分同意、知情的前提下方能收集和使用,且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但以上论述

仍是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性论述,在我国没有形成统一、系统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体系之前,对于早已深入我们生活的人脸识别技术使用的正当性、合理性的判断在司法领域的论断只能止步于此。因此,若要对目前人脸识别信息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制,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人脸识别信息的概念及特征

人脸识别信息作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一种,既是一种事实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法律概念,两者存在差别亦有联系,因此厘清人脸识别信息的基本概念及其特征,是探讨人脸识别信息存在的关于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问题的基础。

(一)人脸识别信息概念廓清

人脸识别信息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特征识别数据(Biometric Data),属于生物识别信息的一类。人脸与人脸识别信息的概念界分比较明确,前者指人的脸部生理形象,后者则是指通过对自然人的脸部生理特征进行特定的数据化处理而得到的个人数据,可以通过这类数据在模型软件中生成该自然人独特标识的脸部形象^①。也就是说,人脸识别信息,是先

收稿日期:2021-06-10

作者简介:苏佳伟(1996—),男,江西上饶人,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

利用传感器对人脸图像进行采集和检测,再将采集到的面部信息进行特征点提取,最后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数据化处理,人脸成为数字世界代码化了的一组“数字”。人脸识别的目的则是将该组数据用于现实中人脸采集、比对、耦合、校正,以实现数字模型和现实人脸之间的识别比对等^②。

(二)人脸识别信息的特性

1. 人脸识别信息的唯一性

人脸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即使是多胞胎,也存在脸部数据上的差异,故一个自然人理论上仅能匹配一份人脸识别信息。人脸识别信息的这种唯一性也促使在网络时代人脸成为主体身份认证的重要方法。相对于传统的如网络ID、密码或者URL^③等认证方式,人脸识别信息因其唯一性,所能达到的认证精度和匹配度显然更高,但随之而来的是其一旦被泄露或非法提供、滥用,可能存在的隐私风险和 Related 的人身、财产、名誉安全风险也随之提高。

2. 人脸识别信息的难以更改性

人的脸部信息是很难改变的,要改变一个人的脸部信息,目前只能通过彻底的整容达到,而这种方式是不可逆且异常复杂的。因此,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一旦面部识别信息被录入,由生至死,其面部识别特征都不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也是人脸识别系统能够在时隔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仍然识别出在逃罪犯的信息的原因。也因为人脸识别信息的不可变更性,一旦人脸识别信息遭到泄露、盗窃或冒用等不法侵害,对信息主体可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永久性的伤害和损失。

3. 人脸识别技术的普适性和便捷性

人脸识别技术经过长期的发展,特别是在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进行人脸识别的技术加持后,使其已经成为一项门槛较低且成熟度较高的生物识别技术,由此也决定了人脸识别技术在现阶段相对于其他的生物识别技术而言更加便捷高效。同时,相对于指纹或者虹膜等生物识别技术来说,人脸识别技术拥有“非接触性”的特点,目前已经可以实现远端一次性快速的数据采集,其数据采集能力、强度以及采集方式的便利性远远超过其他生物识别信息。此外,人脸识别的算法模型也已经趋于成熟,国内外有大量的相关公司可以提供完整的人脸识别数据分析和应用的方案。这也是为何自2010年以来,人脸识别技术被普遍运用于社会治理、公共场所安检、企业管理、金融授信、身份核验等领域。

二、人脸识别面临的挑战

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给身份核验、社会管理等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和便利,但技术永远是一把双刃剑,人脸识别信息的泄露、滥用等问题也层出不穷。目前我国针对数据信息安全的监管体系存在不完善之处,此外,还出现了关于人脸识别技术与个人自由之间的伦理讨论。解决人脸识别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更好地管理和使用保护人脸识别信息是法律建构和技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人脸识别面临的技术挑战

目前,人脸识别技术最大的隐忧就是人脸识别信息的泄露和信息被滥用的问题。诚如前文所言,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普及,对于人的面部信息的识别、采集、处理正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如今人脸识别技术甚至可以借助人脸而仅仅依据网络图片或视频信息完成上述工作。如美国的Clearview AI公司就从YouTube、Facebook、Venmo等网站进行了海量的人脸数据采集,建立起包含30亿张人脸照片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所包含的信息量远远超过美国联邦政府所构建的数据库,因此,其服务的对象包括多伦多、亚特兰大和佛罗里达等地的警察部门。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掌握海量人脸识别信息的巨头,却在2020年2月7日被曝出客户名单被盗的丑闻。该丑闻所产生的能量瞬间淹没了这家硅谷的初创企业,但喧嚣过后,人们不禁要问,人们的人脸数据应该得到怎样的保护,应该如何防止它被泄露和滥用。

实际上,不仅仅是Clearview AI公司存在人脸识别信息泄露的风险,在过去的几年中,如Facebook、微软以及国内的互联网企业也都曾有过人脸识别信息泄露的新闻。信息泄露带来的问题,一方面是民众对人脸识别技术深深的担忧,根据南都人工智能伦理课题组发布的《人脸识别落地场景观察报告(2019)》显示,79.31%的受访者担心系统运营者安全能力欠缺导致人脸识别信息泄露,65.17%的人担心换脸视频等虚假网络视频增多,近半数的人担心不法分子利用伪造的信息实施诈骗或盗刷;另一方面是信息泄露的风险也导致了人脸识别信息产业的局部倒退,如微软和IBM等科技巨头迫于商业道德以及隐私保护风险而相继宣布全面退出人脸识别业务以及相关的投资业务。

人脸识别信息泄露的具体风险包括:人脸数据作为个人隐私的钥匙,已经和其他个人隐私深度绑定,辐射个人人格权和财产权,一旦被打开,人就无隐私可言,易遭受财产或人身损害。以刷脸支付为例,人脸信息一旦被采集则无法再次加密,如果人脸

信息成为账户以及支付口令,则就相当于将用户名和密码完全暴露在外,很容易通过远程刷脸应用进行非法使用,造成当事人人身财产损失。最为关键的是,人脸识别信息一旦泄露,几乎无法追回,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还会造成所属单位和网格的相关潜在权益受损^[1]。如美国伊利诺伊州《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案》针对生物识别信息泄露和被盗用的风险时就指出:“生物识别信息,其是个人唯一的,一旦泄露,个人没有追索权,身份盗窃的风险更高,并且可能会被迫退出生物识别促进的交易。”

(二)人脸识别面临的法律挑战

1. 隐私权保护问题

人脸识别信息作为生物识别数据的一类可以被归入个人信息是无疑义的,在《民法典》第 1034 条以及《网络安全法》第 76 条中就明确生物识别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的一类。从法理依据上来说,人脸信息作为极具标识性的生理信息,能够被轻而易举地应用到识别个人的活动中去,符合国内外有关个人数据的相关的法律定义。但问题在于,人脸识别信息能否被归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根据我国《民法典》关于隐私权的定义,个人信息中仅有私密信息可以纳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而其他的信息则只能归入一般个人信息予以保护。换言之,人脸识别信息是否属于私密信息?

关于何为隐私的定义,波斯纳认为,隐私是“不当呈现某人特征的权利”,他认为,人们希望通过有选择地披露有关自己的事实来操控他们的周边世界,而其他有合法的利益揭穿这样的不当呈现^[2]。然而,波斯纳在讨论隐私权时并没有明确不当呈现的对象以及明确范围。隐私信息的特点在于,它严格遵循差序格局,即信息是按照隐私的程度由中心无隐私区域向周边加强。生活中的亲密关系之间,常常没有多少隐私可言,如夫妻,父母与子女之间,通常因为常年一起生活,相互之间非常了解,而少有隐私;然而随着亲密关系的减弱,隐私信息的数量也随之增多,最终达到与陌生人之间的“全隐私”的关系。

但诚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使完全的陌生人之间,也存在着丰富的信息交换的可能,即可以随时打破人与人之间“全隐私”的状态。而人脸信息作为人与人之间识别、交流的重要工具,常常是被打破的第一道所谓“隐私壁垒”,在前计算机时代,人脸识别信息为储存在个人头脑中的社交必须之数据,除非受极个别地区风俗习惯的影响,不会成为隐私。

然而在后计算机时代,人脸识别信息的使用场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脸数据不仅局限于特定的社交场景,使用场景的丰富化需要根据信息的使用情况进行具体考量。在某些使用场景下,如将人脸识别信息用于交友软件中,该信息在信息主体没有主动设置接触障碍时不应该成为隐私信息;而在另一些场景中,如使用人脸识别信息作为网络银行密钥,与个人人身财产安全息息相关,一旦泄露可能遭受财产乃至人身损害,则完全符合个人隐私信息的构成要件。故对于人脸识别信息是否构成隐私权的保护对象,笔者认为,该判断标准非唯一,应当遵循信息运用的场景原则,根据人脸识别信息的具体使用场景进行判断。

现今,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趋势是,可以逐步实现远程采集,并可能与其他信息库联动获取与个人相关的其他信息,如对个人行动轨迹进行追踪等。人脸识别信息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单一社交属性,成为个人身份认证的重要信息,与个人隐私、权利、自由的关系逐渐加强,因此其私密属性也得到了加强。如在 2020 年 3 月新修订的我国国家标准 GB/T 35273—2020《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明确规定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属于个人敏感信息。

2. 同意原则失灵问题

同意原则是个人信息采集和使用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意原则的法理基础是个人的自治和自由。每一个人天生就是独立和自主的,对于人所产生的个人信息,特别是具有极强人身依附性的生物识别信息,理所应当由个人控制。此外,同意原则通过使用个人信息必须经个人同意的手段,最终达到让每个人实现对自身信息的控制而不因他人的随意使用而遭受侵犯^[3]。法律之所以应该赋予每个人对个人信息的同意使用权(本质上是个人信息控制权的一部分),正是基于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而造成的资源损耗(这里面包含对个人尊严、自由的漠视以及直接的人身、财产安全风险)要大于个人信息完全自由流通所带来的效率的提升。

因此,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人场景,法律都要求采集、储存、处理个人信息需要经过个人同意。如针对公共场所对个人面部数据的采集,《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 27 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个人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公开或向他人提供,取

得个人单独同意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而针对私人场景,则主要通过签订用户协议的方式,信息采集事项告知并取得用户同意方可。但是人脸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机构和企业未经同意收集使用人脸识别数据的问题,人脸识别技术的功能性扩展突破了同意使用的合法性等问题^[4]。

随着人脸识别传感器以及算法技术的发展,目前人脸识别机器已经可以实现远程的二维图像采集,这种采集方式往往可以在不经意间就完成数据的采集。公共场所无处不在的人脸识别传感器正在全时段以极高的频率进行着信息采集的工作,并且将所采集到的人脸信息作为“密钥”与其他数据联结,信息聚合的后果构成了对个人的“透视”。如某些售楼部利用人脸识别系统,对前来看房的顾客进行记录分析,借此有针对性地对访客进行分析,分析的结果一方面可以帮助开发商防止飞单,另一方面可以为周期性营销策略提供数据支持。而顾客为了防止自己的面部识别信息被记录下以后被“大数据杀熟”而纷纷戴上头盔前来看房。

上述的开发商对顾客进行信息采集的行为显然是违法行为,但根据相关的调查,我国公共场所人脸采集设备早在2017年就已经达到3000万部左右,且视频监控的覆盖范围和监控点、卡口的数量都以30%以上的增长率在快速增加。目前对于人脸信息的采集和监控已经形成一整套由传感器和算法构成的自动流程,多数时候的人脸信息采集和监控是由传感器和算法在“无感”中完成,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突破法律原定的信息使用原则,在这样的自动化流程中要求经过所有被采集者同意客观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私人场景中,虽然个人通常会与信息采集者签订信息采集协议,但问题在于,这种同意是一种无选择权的同意,如果以个人信息保护为由拒绝提供人脸信息,便会被排除在信息网络服务使用之外,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接受来自服务商的便捷服务。对于个人来说,用户只有同意的权利,没有协商谈判的权利。而此时同意,意味着不仅仅向服务商提供面部信息,而是将其他个人信息的收集权利一并打包出让,以便服务平台对个人历史活动轨迹开展全方位的用户画像。如在文章开头的案例中,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并没有提供除了人脸识别之外的其他方式进入园区,商家这种“不同意,便退出”的营运模式,极大挑战了信息采集的同意原则。

(三)人脸识别信息的监管挑战

公共场所的公民信息被随意收集、滥用、贩卖,

或公民为接受服务而被迫用自己的信息作为交换,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我国对人脸识别技术的监管缺位有很大关系。然而这种监管缺位,究其原因,是监管机关“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尴尬处境。

数据空间的虚拟性导致的责任追查困难是监管困境的一个原因。人脸识别信息与大多数的信息一样,存在于浩瀚的虚拟网络空间之中,侵犯人脸识别信息不同于传统的对于个人信息的侵犯,常常具有隐蔽性强、转移快的特点。监管机关对于非法的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传输行为都难以做到完整的监控追查,故对于侵犯个人脸部识别信息的行为常常束手无策。

除此之外,因为早期有关人脸识别操作规范的缺失,使得现如今大量的具备人脸识别能力的传感器设备早已被运用到日常的生活中,已经采集和处理了大量的人脸数据。如果现在骤然加强监管,很可能使已经发展起来的相关产业轰然倒塌,已经被收集和传输的数据更面临被当作网络黑产贩卖的风险,可能引发更大的信息危机。

最后,关于监管难的问题,还在于个人信息或数据与公共信息难以分开,二者长久以来就是交织的关系,特别是在涉及如国家安全、司法鉴定、刑事调查等公共领域,保护个人信息的话语权并不强势。这也是法律之所以不能赋予某个主体对信息的专有权的原因,因为个人信息和数据承载着人类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的公共元素^[5],而并非完全为个人所控制。如果监管强调个人信息的私人专有属性,在某些场合必然与公共利益相悖;而如果不强调,则监管无依据,无抓手,可操作性不强。

(四)人脸识别的伦理挑战

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使得人脸成为打开私人生活的钥匙,而其不可避免地模糊了个人生活与公共领域的界限,面临着巨大的个人隐私的伦理风险。现如今,人脸识别技术正与其他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合流,使得人脸被视为行走的二维码,成为破解个人隐私的一把方便快捷且独一无二的钥匙。如通过对人脸的追踪,可以实现对个人行动轨迹的追踪,甚至可以透视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此外,通过与其他大数据相匹配,人脸识别信息甚至能够了解到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家庭成员、教育程度等深度的个人信息,与过去不同,这些追踪和分析几乎都是在人未察觉到的情况下发生,更不用说经过本人同意了。

此外,人脸识别技术在国外还存在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问题。这种歧视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因为生理因素(如特定场景下黑人的

脸部轮廓在光学镜头下不清晰)和数据样本较少造成的算法不精准,但在客观上,这确实造成社会少数民族群的不满。

三、域外人脸识别立法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和欧盟针对人脸识别的立法较多,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在我国出台相关的个人信息保护方案时,可以借鉴相关国家面临的具体问题和立法情况。

(一)美国关于人脸识别的规定

美国采取联邦和州的多层级立法模式,目前美国联邦尚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规制人脸识别技术使用。在2019—2020年美国参众两院提出了多项人脸识别法案,如《道德使用人脸识别法案》(2020年)、《商业人脸识别隐私法案》(2019年)、《人脸识别技术授权法案》(2019年)^[6]。在州立法层面,美国包括华盛顿州、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在内针对人脸识别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进行了规范,其中2008年通过的《伊利诺伊州生物特征信息隐私法》(Biometric Information Privacy Act,简称BIPA)更是以其“强硬”的面部识别信息保护规定而出名。

联邦层面的立法中,除了《道德使用人脸识别法案》《商业人脸识别隐私法案》《人脸识别技术授权法案》之外,在2020年制定的《2020年国家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案》对人脸识别信息的法律规制作出了专门性的基础性的规定。在该法案中,针对基础性的概念:首先,对生物识别信息的概念作出定义,并将人脸识别信息列为机密和敏感信息;其次,规定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所有生物识别信息私人实体均不得以出售、出租、交易、非法披露等方式利用;最后,针对侵权后的救济,规定了私人的生物信息遭受侵害的救济手段以及赔偿额度等。

在州立法层面,BIPA开创了号称史上最为严格的人脸识别规程。首先,BIPA要求在人脸面部信息收集前收集人脸识别的实体必须告知并取得被收集者的同意,且该告知及同意需以书面形式作出,将传统的同意原则具体区分为书面告知与书面授权,在收到信息主体或其合法授权代表的书面豁免协议书后才可进行收集,否则将被视为违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落实收集者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其次,该法案明确实体收集、存储和使用生物识别信息的目的和存储期限。最后,BIPA规定除非个人同意进行信息流通、披露或由于政府、法院要求披露以外,禁止任何生物识别信息的实体对已收集的信息进行流通或者以其他方式从中获利的行为。可以说,在生物识别信息保护方面,BIPA坚定不移地

站在较为弱势的个人一方,但这种对个人识别信息的强保护措施,也曾遭受可能阻碍数据流通的诟病。

(二)欧盟关于人脸识别数据保护的规定

欧盟目前并没有专门的关于人脸识别信息的保护条例,而是通过2016年生效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对人脸识别信息进行保护。此外,欧盟还通过了《数据保护执法指令》(Data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Directive,简称DPLED),专门针对执法部门,规定当执法者需为预防、监控、调查或起诉犯罪行为使用个人数据时,需遵守该指令。

在GDPR中,首先,欧盟将人脸识别信息纳入生物性识别信息的范畴。其次,GDPR严格限定了保护的面部识别信息的范围,规定并非所有含有人类面部的图像或视频数据都进行保护,而要求图像或视频经过“特定技术处理”(specific technical processing)并能够发挥生物识别功能,即能够识别或认证特定的自然人时,才将此种数据纳入到个人敏感数据的行列给予保护。对于受保护数据范围的严格限定,本质上是在数据流通和个人隐私保护之间寻求平衡,GDPR并不反对个人信息的流通,但其前提是个人隐私得到合理的保护。为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GDPR还明确规定了“匿名化”^④的个人信息保护方式。此外,GDPR还规定了数据的独立使用原则,这是为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设定的基本规则,要求处理数据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仅限于处理为满足业务需求最少量的数据,且保障数据处理过程的合法性、公开性和透明性。

在数据遭受损害后的救济模式上,GDPR设定了多元的救济模式,规定每一个数据主体都拥有向监管机构投诉、提起司法诉讼以及要求赔偿的权利。数据主体可以联合,提出集体诉讼的主张,也可以单独提起私人诉讼,同时适用小额索赔法律程序,监管措施等,多种渠道的救济方式从程序上保障了信息主体的权利,值得我国借鉴。

四、我国人脸识别法律规制与选择

人脸识别技术在促进社会效率提升,保障公共安全和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其关于个人信息泄露所带来的个人人身财产的安全风险以及公共空间和个人隐私之间模糊化的道德风险也不可忽视。故需要对目前我国关于人脸识别的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分析,结合新形势下产业发展的规律,制定更好的规制路径。

(一)我国人脸识别法律规制的进展

我国在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中就对个人

信息保护有所规定,在后续颁布的《民法典》中明确“生物识别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的一类,受到法律的保护,且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同时在《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中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都有相关的规定。然而以上的规定都是针对个人信息的普遍规定,并没有针对生物识别信息或者人脸识别信息进行细致的规定,而人脸识别信息有其易采集性和高私密性的特性,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不甚相同,故应当对人脸识别信息进行专门规定。

关于特殊场景的人脸识别信息运用规范和安全风险防范方面,目前已有相关的规定,如在对信息安全要求较高的金融领域,中国人民银行于2020年2月13日发布了《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对个人信息的机密等级进行分级,要求收集个人敏感信息的主体需要有相关的资质,且在传输、存储涉密信息时应当使用加密等安全措施。由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出,目前在人脸识别信息保护方面,我国采取的是软法先行的策略,这样的策略一方面可以满足具体领域的立法需求,另一方面在技术持续快速发展的时期,可以方便后续更改。然而,即使是软法先行的立法路径,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特别是生物识别信息中的人脸识别信息的保护也较为滞后,且存在软法适用范围狭窄,可操作性不强的缺陷。

(二)我国人脸识别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及对策

目前我国有关人脸识别信息的数据产业链已经完成了初步建设阶段,逐渐步入产业发展的黄金期,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有关人脸识别的信息产业每年的增长率高达30%。但隐藏在蓬勃发展之下的行业隐忧却时刻威胁着行业的发展,对于任何行业来说,科学有效的监管都是保障行业长久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因此,对于人脸识别信息产业,相关的规制政策既要从本质上推动产业发展,即从根本上促进信息的健康有序流通,发挥经济效能,同时也要排除行业中存在的严重侵害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的行为。

首先,根据场景化使用原则,人脸识别信息的采集、处理、使用是否构成对个人隐私和信息利益的侵害,应当根据场景的不同,有所区别。前文提到,将人脸识别信息用于社交场景,适当披露个人信息实际上是必需的,然而在金融及支付场景中,人脸成为支付的钥匙,则应当严格限定对该场景的采集和使用。“同意原则”也可根据场景和主体进行划分。根

据采集、储存、处理、使用的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政府机构和私人商业实体进行合理的区分,因为二者使用该技术背后的动因是存在较大差别的。政府机构在使用人脸识别信息时,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天然具有更加充分的正当性——如为了公共安全和稳定,在此场景下,有些人脸识别应用甚至可以不经个人同意就进行。如警方利用“天网”系统甄别犯罪分子时,可以采取树立探查采集标牌的形式告知公众,而不必取得所有被采集者的同意。但这种未经同意进行人脸采集的行为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即使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也应当明确界定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保障之间的边界。在此,可以参考欧盟《数据保护执法指令》对公共机关脸部信息采集的场景、频次、识别精度、数据调取等进行细致的划分,设定数据使用的层级制度,防止个人数据被过度采集或滥用。

而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一方面出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个人与企业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因此,必须严格遵循“同意原则”。应当规定未经被采集者同意私人企业不得进行面部识别数据的采集和使用,并且在涉及用户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场景下同意和告知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正是采用此种立法进路,但此种规定在面对现实中大量违法采集的传感器时,难免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无法阻止信息采集时,至少应当保障个人数据不会被滥用,或被采集信息的个人应当知道信息的具体使用方式和流向,避免个人信息成为“网络黑产”。故在规定数据采集遵循“同意原则”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信息采集者应当对数据的具体使用、储存方式、流向进行说明,并取得同意。

其次,数据泄露和违规使用问题,是困扰产业发展的重大障碍,它很可能造成相关公众对技术形成不信任的心态,最终阻碍产业发展。因此,必须在制度建构上彻底解决数据泄露和违规使用的问题。为了防止数据的泄露和滥用,在采集程序上,要防止信息采集实体过度采集个人信息,坚持采集适度原则,以能达到使用目的的最小限度为准。此外,还需建立人工审核机制,防止机器误采集和歧视现象。在信息的存储阶段,应当将个人面部识别信息与其他个人信息相区隔,防止信息相互串联、信息泄露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在信息的使用阶段,应当严格明确技术使用的边界、使用的范围,开辟除面部识别通道之外的其他使用通道。

最后,在责任追究阶段,应当明确信息收集及使

用的主体如存在违规操作以及信息泄露等事件的明确责任和处罚规则,同时建立完善的个人和集体受侵害的救济通道。针对个人维权困难的现状,可以参考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建立数据隐私维护组织,有针对性地同信息采集、储存和使用使用者进行协商谈判,维护个人的信息权益。

注释:

- ①如2016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将“生物识别数据”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加以定义。所谓“‘生物识别数据’是通过对自然人的身体、生物或行为特征进行特定技术处理而得到的个人数据。这类数据生成该自然人的独特标识,比如人脸形象或指纹数据。”
- ②以苹果公司开发的Face ID人脸信息采集技术为例,该技术的实现原理大致如下:通过给隐藏在手机前面板上方的原深感摄像头投射并分析30000多个不可见的点来捕获准确的面部数据,进而创建面部的深度图;另外该摄像头还会捕获面部的红外图像,利用手机的AI芯片将深度图和红外图像转换为数学表示形式,然后再将这个表示形式与注册的面部数据进行对比,对面部进行3D数据建模。而其中的红外镜头与泛光感应元件,则可以通过深度摄像头实现人眼瞳孔的特征定位,构建出一整套基于深度感知

的面部识别系统,从而最终将人脸数据与众不同的生理特征作为手机解锁的依据。

- ③uniform resource locator,统一资源定位系统。
- ④匿名化是指在采取某种方式对个人数据进行处理后,如果没有额外的信息就不能识别数据主体的处理方式。此类信息应当单独保存,并且已有技术与组织方式确保个人数据不能关联到某个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

参考文献:

- [1]胡凌.刷脸:身份制度、个人信息与法律规制[J].法学家,2021(2):41-56.
- [2]高富平.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控制到社会控制[J].法学研究,2018(3):84-101.
- [3]高富平.个人信息使用的合法性基础[J].比较法研究,2019(2):72-85.
- [4]林凌,贺小石.人脸识别的法律规制路径[J].法学杂志,2020(7):68-75.
- [5]高富平.制定一部促进个人信息流通利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J].探索与争鸣,2020(11):12-14.
- [6]闫晓丽.美国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法律规制及启示[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20(11):94-10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Legal Regulation of Biometric Information ——Taking Face Recognition Information as an Example

SU Jiawei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art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The human face, as a kind of biometric information, has long been an important information carrier for human beings to conduct discriminative social activitie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ensor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big data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human face, as a unique and universal information carrier,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part of pers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or called as face recognition information or data. Compared with other biometric information, face recognition information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ensitivity, diverse collection methods, concealment and flexibility, and improper use may bring unpredictable risks to citizens' personal and property. In addition,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lso faces unique regulatory challenges and even arises moral and ethical concerns in certain scenarios. Facing the popularity of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n a larger scale, the best way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s to promote the legal and compliant circulation of face recognition information under the premise of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safeguard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Key words: face recognition;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privacy protection

公共卫生事件的刑事防控及其展开

——论妨害重大传染病防治行为的罪与罚

白雅楠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基于我国公共卫生刑事防控体系现有规范内容,比较国内外公共卫生刑事治理模式,指出我国刑事防控体系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与困境。公共安全法益的精细化发展使得危害公共安全系列罪名边界虚化;非立法性规范的准立法活动扰乱了法治体系的应然模式;行政治理与刑事治理衔接失调不利于行刑二元规制体制的建立。对此,本文重申了法治原则、比例原则以及明确性原则在公共卫生刑事防控中的重要地位,尝试构建起行政与刑事“二次评价”路径来解决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之间的连结问题。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仍然应当厘清刑事违法评价的要素内容。

关键词:公共卫生事件;重大传染病;刑事防控;法益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09

中图分类号:D924.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48-08

一、绪论: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危与机并存。新冠病毒大流行给世界各国经济及人类生命健康带来巨大威胁,同时也为我国的疫情防控法治建设发展带来新机遇。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能够使中国更好地预防和应对未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蔓延的情形。

“公共卫生”含义甚广,涉及城市供水、废物处理、环境清洁以及疫情防治等内容,凡是影响社会普罗大众日常生活清洁和生命健康的,几乎均可归纳于“公共卫生”的范畴之中。世界卫生组织将公共卫生定义为对人类产生的废物进行安全处理等内容的公共服务,涉及个人家庭及其生活社区的整体环境,通常包括垃圾收集和废水处理等环境清理工作,较差的公共卫生环境会导致病毒的传播。美国公共卫生部门(Sanitation of Department)认为,“公共卫生”主要涉及城市公民的健康安全、环境清洁、废物回收处理等内容。我国将“公共卫生”目标设定为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努力,改善环境和卫生条件,预防控制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和文明生活方式。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通常具有突发性、危害性。猝不及防的状况让危害在短时间内即能影响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社会和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实现有效的预防与控制。根据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2条的内容,重大传染病疫情、原因不明的群体疾病和群体中毒事件等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属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此,有学者认为,公共卫生事件应当视为一种自然或者人为的灾害^[1],是一种不定期持续发生的社会事件,或者可以认为是一种隐藏的社会风险。

新冠病毒疫情是典型的重大传染病疫情,也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给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带来了巨大困难和挑战。作为此次“依法抗疫”的法治依据,我国现有法律条文及其司法解释、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虽散见于多处,但也形成了较完备的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法律体系,通过政策反应、多措并举、技术防控等多种途径,在实体和程序上实现了疫情控制效果。

公共卫生事件的刑事防控体系能为维持社会稳

收稿日期:2021-06-02

作者简介:白雅楠(1994—),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18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学院LL.M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定、保障疫情防控政策实施、维护社会经济与公民利益提供有力助益,但其作用不仅在于预防和控制,更能在突发紧急事件中明辨并保障“最低标准人权”。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性原则是政府实现社会事务管理职能的基本原则之一。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政府的应急权力往往优先于公民的个人权利,不同程度的疫情防控限制政策会给公民带来不同情况的权利紧缩。^[2]即使是在美国,宪法对于美国公民个人自由的保障,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的绝对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一案中指出,因疫情引起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对公共安全的典型威胁,地方政府基于维护公共健康的初衷而采取的个人自由限制措施以及接种疫苗的强制措施依旧具有合宪性。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随着政府行政权力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相对扩大,以限制公权力、保障基本人权为目标的刑事法律及刑事政策成了辩证权衡公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冲突的关键。

公共卫生刑事防控体系所包含的罪名主要可以划分为妨害疫情防控措施犯罪、妨害社会管理与扰乱公共秩序犯罪、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和公务人员失职渎职犯罪等犯罪类型。其中妨害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涵盖了妨害公务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均具有阻碍疫情防控、加剧病毒传播的危险。妨害社会管理与扰乱公共秩序犯罪则主要涉及寻衅滋事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以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等,三种罪行均具有对公共秩序的客观危害性。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则包括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罪以及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公务人员失职渎职罪则主要有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以及传染病防治失职罪。除了上述约14个罪名以外,该体系还包括数个司法解释、指导意见以及相关典型案例等规范性文件。^①但目前其仍存在不充分、不合理之处,需要加强法律适用的层次性和协调性。本文期冀以新冠病毒引发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刑事防控为例,反思防控过程中的合理性、正当性之边际,提炼出具有中国化、时代化的刑事防控模式,仅就管见所及,略述所知。

二、体系之反思:现有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的桎梏与困局

(一)公共安全法益精细化发展趋势下边界模糊的表象与理解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安全需求日益提高。不同领域的安全需求催使“公共安全”细化并衍生出不同内容的法益或者说是犯罪客体,呈现出精细化、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例如当前衍生出的“公共交通安全法益”“公共网络安全法益”以及“公共卫生安全法益”等。^②

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都起到了保护“公共卫生安全法益”的作用,但是两罪的适用边界模糊。有学者认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此次疫情中不具有适用余地,否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3]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合,认为这属于法条竞合或想象竞合。^[4-5]基于竞合的关系,提出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做出立法修改,改成情节犯或者认定为过失危险犯以便明确区别于危害公共安全罪。^[6]还有论者提出,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只需要从形式上判断该行为是否违反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而判断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需要就行为是否对公共安全造成危险或侵害进行实质判断。^[7]本文认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盘根错节的关系实质上是精细化、不可逆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两罪在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中都有可适用性。在以社会危害程度由轻到重的递进式治理妨害疫情防控措施犯罪的路径中,应扩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少用且慎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当下“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滥用现象横生,凭借“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罪以图治理所有犯罪的做法,违背了精准司法的理念。在未能有效遏制重刑主义思想的情况下,适用“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规制路径确实能在短时间内发挥刑法的规制机能,落实严惩政策思想,消解社会民众负面情绪,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但《刑法》第114、115条中“其他危险方法”的兜底性立法技术逐渐演变成对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要求的违拗。多年来,众多学者主张减少甚至消灭“口袋罪”,但“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普适性似乎已成为刑法中难以纠正的“顽疾”。从2003年《解释》来看,结合疫情防控期间从重处罚的刑事政策,多会带有“刑罚世轻世重”的旧有观念,不利于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忽略了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可能。这一适用边界模糊的现象,会直接混淆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公共卫生安全法益”是“公共安全法益”的特殊衍生内容,但缺乏刑法的独立保护地位。通常认为,“公共安全”即不特定且多数人的生命、健

康以及财产不受不法侵害的安稳状态^[8],是一种实际的公共需求。在风险社会法益保护早期化的背景下^[9],公共安全法益精细化发展会导致仅依靠“公共安全”这一个抽象概念来支撑的司法适用过程捉襟见肘,穷于应对。应当按照不同领域对公共安全进行细分,在公共卫生领域独立划分出公共卫生安全法益的概念。

其次,在公共卫生安全法益的内涵中,未突出“公共卫生防控秩序”的保护内容。公共卫生防控秩序是包括限制隔离、强制医疗等手段在内的卫生防疫工作稳定进行的有序状态,是公共卫生安全法益的基本内容。多数国家已注意到“公共卫生防控秩序”的保护价值,并体现在法律条文中。譬如:丹麦刑法典第 192 段(Paragraph):“行为人违反其他有关预防、控制传染病规定导致传染病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行为人引起的传染病属于法律规定需要公共措施进行预防、控制的疾病,处六年以下有期徒刑。”保加利亚刑法典第 355 章专门规定了行为人违反针对传染病传播或发生的法律规定,导致他人感染的,处缓刑或者三百列弗。匈牙利刑法典第 361 节规定了违反控制传染病法规的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第 330 条中的“甲类传染病”修改为“甲类传染病以及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扩大了刑法保护重大公共卫生防控秩序的范围,侧面体现了维护公共卫生防疫秩序稳定的重要性。在我国没有直接规定传播传染病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价值不言自明,其主要保护的法益就是“公共卫生安全法益”。基于这一主要的法益,也有学者提出了“多元法益”“双重法益”的解释路径,以便于明确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入罪标准。^[10]本文认为,刑法的谦抑性要求承认刑法保护法益的片段性,一个罪名并非是要保护所有法益受侵害的全部形态。在确定某个罪名所保护的法益时,找到值得这一罪名保护的重要法益就足够了。^[9]

最后,精细化发展的趋势最终会导致“公共安全”概念产生多个分支,并且各个分支都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在区别审视以达到层次清晰的同时,仍然不能彻底割裂彼此之间的衍生关系。因此,如何以动态辩证的思维审视法益精细化发展趋势,是理解区分“公共安全”与“公共卫生”的核心要义。结合近两年疫情防控中惩治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案例可知,行为人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多数是未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规定,应及时通报而未通报且实施了能

够“传播病毒或者引起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但该类型的行为又包含有多种不同的客观细节,不能一以概之。例如,行为人驾车外出走访亲戚,或行为人为人外出到网吧休闲。在这些不同的客观情节之中,尤其应当关注的是行为人是否存在“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情节。这一情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犯罪行为应当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还是“妨害传染病防治”。原因在于,我国对于故意、过失内容的认定坚持的是客观主义立场,多倾向于目的行为论。也就是说,行为人在已知自身携带病毒或者可能携带病毒的客观认识前提之下,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应当认定这些客观情节已然表露了行为人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而非仅仅是妨害了疫情防控的管理。这一客观的认定判断,显然也考虑了新冠病毒自身极强的传染能力,尤其是在人员自由进出、来往频繁的公共场域。

(二)非立法性规范“准立法”的纰漏与解释困境

为了解除甲类传染病自身法定性带来的禁锢,《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 330 条增设了“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本文将该种传染病称为“准甲类传染病”。这一立法修订正式将新冠疫情刑事防控中《四部门意见》等非立法性刑事规范的“准立法”内容提升到立法层面,立法原意是同一的。^[11]不置可否,此前社会为了实现及时的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效果,绕开立法层面直接通过非立法性刑事规范补充完善是一种打击犯罪的实质需要。^[12]但若缺乏《刑法修正案(十一)》支撑,仅依靠非正式法律渊源为《刑法》第 330 条提供法律依据,将使上述非立法性刑事规范难以获得立法层面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尤其对于度过初期紧急状态后的常态化后期而言。此外,区分危害公共安全和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是明确适用的前提,但《四部门意见》粗放的二分化列举规定反而使规范本身丧失了罪刑法定的明确性。除了列明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种表现以外,其他均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的入罪规定更是忽略构成要件要素的“兜底承包式立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是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中之重。《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修改是对“准立法”现象的纠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之前,刑法学界针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聚讼纷争,莫衷一是。众多学者基于教义学的立场,尝试调和 2003 年《解释》与

《四部门意见》的阙如之处,尽力理解二者之间的补充和具体化关系,厘清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异同。在传统刑法理论和德日刑法难以合璧的情况下,尤其在对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甚至过失危险犯还未形成统一认知之时,不同的评价解析路径会得出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要件要素内容不同的结论。接踵而至的是故意、过失之争,及对“危险方法”和“传播严重危险”解释争议等系列难以厘清的问题。^[3]形式法治的紊乱会对法教义学产生反作用。放任法教义学“野蛮生长”,使其依附于非立法性的刑事规范,导致其变成“准立法”现象的衣钵与锡杖,助长法教义学的“规范隐退论”和“反教义学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损害形式法治,造成恶性循环。^[13]因此,在非立法性刑事规范缺乏立法支撑、学理解释无法统一意见的情况下,只有回归到立法层面树立核心标准,才能为解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争议问题提供方向指引。

(三)行政规范与刑事规范衔接失调导致刑法保护早期化的滥觞

刑法规制机能对社会维稳具有重要作用,但在中国特色行政与刑事二元规制模式下,忽略行政法相同的规制机能,是没有站在限制刑罚权的角度去定位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的表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国家刑罚权不合理地扩张、泛滥,会剥夺或侵占行政法规范原有的领地,破坏部门法之间应有的协调性。除此之外,我国刑法学界现有的危险犯理论主要源于风险刑法,立足于风险社会的控制理论。为抵御风险社会阶段各种不确定因素,刑法采取提前保护的做法是必要且正当的。但想要在风险社会动态发展以及行政与刑事二元规制模式下理清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的外延问题,必须考量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之间的联系与效果,立足于更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法律防控框架下去审视刑事防控体系。

直到目前,立法、司法机关都没有出台更为明确的规范以明示“依法防疫”过程中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适用。“行”与“刑”的模糊边界不利于刑事防控的展开,这不仅对存在“兜底规定”的分则罪名留下了“口袋化”的隐患^[14],同时也是刑法学界无法精准定位并解释《刑法》第330条属于何种危险犯的重要原因之一。多数学者将焦点集中于《刑法》第330条与交通事故类和重大责任事故类的过失犯罪的比较研究^[15],未提及《刑法》第330条应当如何同《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进行区分和衔

接。但是任何由行政违法行为衍生出的行政犯都应溯本追源,割裂与行政规范之间紧密联系的刑法解释都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本文认为,考察此次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中各罪名同行政法规范之间的联系,是厘清包括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内的多数罪名的关键所在。例如,应当厘清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同《国境卫生检疫法》第20条之间的联系、妨害公务罪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之间的联系、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传染病防治法》第73条之间的联系等。

三、体系之重构:对基本原则和其他重要体系内容的再阐释

基于前文对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应然与实然的梳理反思,可以发现现阶段刑事规范中存在的本质问题。本文从基本原则、行刑衔接和重要罪名的要件解释三个方面展开,尝试对该体系进行重构与完善,增强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贯穿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全过程,体现刑事基本思想的准则,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意义。我国《刑法》第3、4、5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学术界关于刑法的基本原则内容也有多种倡议,如法益保护原则、责任主义原则、保障人权原则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16]针对前述三个问题,本文提出构建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所需的重要基本原则内容。

第一,法治原则是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的首要原则,它是以法律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基础建立的。与“罪刑法定”有异曲同工之处,要求犯罪和刑罚应当在刑事立法层面予以规定。^[17]¹⁰一方面,法益的精细化发展是一个不可逆的社会客观演进过程,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立法漏洞和法律本身的滞后性只能在立法层面予以解决。另一方面,刑法教义学的解释不能完全填补立法的缺陷。基于言语本身的弊端,法律文本无法总是确保立法意图的全面表达,刑法教义学存在的意义正是在于对法律条文的充分阐述。但当扩大解释无法填补刑法条文本身的缺漏,或者在具体个案中无法明确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之时,单凭刑法教义学的解释不仅无法弥补立法层面的滞后,并且穷于满足法治原则的要求,甚至很可能适得其反,使体系进一步模糊,混淆刑事司法活动,此时仍需要从立法层面考虑问题。以甲类传染病为例,《四部门意见》的内容属于扩大

解释还是类推解释无法辨别,仅通过非立法性的刑事规范无法釜底抽薪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刑法修正案(十一)》则从立法层面拓宽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从法治源头修正了甲类传染病的立法漏洞。因此,在科学立法、公正司法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法治原则,从根源上填补法律缺陷,使法律条文实现精准对位和犯罪治理效用的最大化。

第二,刑事防控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妥当性是比例原则的应有之意。国家刑罚权的公信力来源于刑事制裁的妥当性,而刑事制裁妥当与否取决于刑事制裁目的和刑事制裁手段。在刑事防控中,既要求制裁手段和防控目的之间的相当程度,又要求采取的刑事制裁是客观实际需求。立法层面的刑罚配置与司法过程的刑罚适用是比例原则蕴含刑事制裁妥当性的主要体现。首先,刑罚法规的适正要求罪刑均衡,比例之义不可或缺。比例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一样具有慎刑之义,在实现刑事防控目的的前提下,应选择对犯罪行为人损害最小的方式来达到制裁效果,防止刑罚的滥用与苛刑。^[18]这不仅要求刑事立法对罪名和刑罚的设置要合理、正当且必要,还要求刑事司法在适用罪名的过程中依据个案具体情况考量罪刑的均衡性。本次疫情刑事防控对此也有所体现,人民法院判决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案件的结果多为一年左右的有期徒刑,《刑法》第330条规定“后果特别严重”适用升格法定刑的内容,反而很少适用。^④本文认同这样的司法实务现象,并认为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严重传播危险的社会危害性本身不能匹配过重的法定刑。其次,比例原则可以调和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与法益保护机能。刑法不可能保护社会的全部法益,以及全部法益被侵害的各种状态,应当通过比例原则考虑哪些法益以及法益被侵害的状态是最值得刑法保护的。此外,刑法比例原则内容与行政法比例原则内容一脉相承,在基本准则内容中实现行政与刑事的衔接,使其在刑法法益保护早期化的过程中明确刑罚与行政处罚的二元分配体制。

第三,明确性原则是优化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法律体系的现实之需。内容明确、层次清晰是可操作性的前提,也是提供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必然要求。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法律条文的明确性都是基本要求。就刑法规范而言,罪名与刑罚的内容要明确。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和法定刑幅度是司法过程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依据。明确的刑法规范也是刑法教义学展开研究的基础,坚持明确优于不明确原则。^[19]关于“明确”的判断标准,应当从社

会一般人的视角去审视。如果刑事防控规范的罪名与刑罚内容不明确,会让国民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全部成为司法层面的事后判断,严重违反法律主义和禁止事后法的精神。^[17]^[17]不仅如此,这也会使法官“恣意”司法,难以形成统一标准,出现“同案不同判”的乱象。明确性原则应当贯穿于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的司法全过程,除了要求罪名与刑罚设置明确以外,还需要在司法过程中实现“无罪”“轻罪”“重罪”的明确适用。对刑事规范条文,应当以文义解释为主,多种法律解释方法并用的方式解读适用。尤其对于危险犯,要结合具体案情实质把握危险的“现实”“紧迫”程度。

(二) 行刑二元处罚模式下的“二次评价”路径

通常来说,以违反行政规范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行政犯,在我国行政与刑事二元处罚模式之下具有鲜明特点。关于行政犯的入罪口径,应当结合行政制裁内容与实际效果进行综合考察。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本身就是建立在行政防控基础之上的,因此罪与非罪的问题应当以行政制裁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作为出发点考虑。行政制裁无法实现控制的,惩戒性与违法行为危害性不匹配的,应当考虑通过刑事责任实现制裁与控制的目的。反过来说,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体系应当具有“后置性”,各罪名的具体适用应当联系相关行政规范来认定行政违法行为。本文认为,与公共卫生事件相关联的行政责任规范和刑事责任规范之间的联系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种:

一是存在引证关系的情况。刑法条文通过引证相应行政规范的概念与内容来描述罪状,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不言自明。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为例,违反《国境卫生检疫法》第20条规定,逃避检疫、隐瞒真实情况、擅自乘坐交通工具的,应当认为是“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基于客观层面的考量,如果在此基础上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危害结果,并且危害结果与前述客观行为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应当适用《刑法》第332条定罪处罚。像该条这样引证行政规范作为罪状的刑法条文不胜枚举,《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后的《刑法》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继续引证2013年修正的《传染病防治法》第4条“采取甲类防控措施的传染病”的概念,同时又引入《传染病防治法》第73条规定,增设“出售、运输疫区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物品,未进行消毒处理”的行为类型。

二是不存在引证关系的情况。虽不具有引证关系,但从法律制裁的角度看,仍能够与刑事防控体系形成有效衔接。以妨害公务罪为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了相同的行为类型:“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二者区别在于,妨害公务罪针对的是带有暴力、威胁性质的行为,危害性更重;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可以是普通的软暴力行为。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应当严格把握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所具有的暴力性质。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扰乱机关、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医疗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应当处以行政处罚。该行政规范与针对“医闹”型寻衅滋事罪可以形成有效衔接。具体而言,在审判过程中,应以行为人扰乱医院公共秩序的结果为评价依据,评估对医疗工作造成的负面影响,决定行为人应当受到行政还是刑事的制裁。

除此之外,关于疫情期间的造谣、造谣行为也有类似的联系。《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5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了“造谣”“造谣”扰乱公共秩序处拘留和罚款的情形。这与《四部门意见》中描述的疫情期间“造谣”“造谣”引起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直接以寻衅滋事罪、制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的内容难以明确区分。可以理解的是,重大传染病疫情响应机制启动后,社会公众因封闭状态会产生恐慌,此时散布、谎报虚假险情疫情信息的危害性显著高于正常生活状态,将其直接认定为犯罪行为并定罪处罚顺应了严惩的刑事政策。但是在疫情常态化的后期,上述现象中行政法与刑法之间的冲突仍然需要厘清。根据行为有无危害及危害程度的不同,依次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5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寻衅滋事罪、制造传播虚假信息罪的顺序,进行不同轻重程度的制裁。

总而言之,不论是内容上存在引证关系,还是在形式上存在衔接适用的联系,刑事防控都应当遵守“后置性”,发挥自身对行政规范的补充作用。随着疫情常态化,行政规制模式和治理经验会不断完善和积累,凡是通过行政处罚足以实现制裁目的的,就应当考虑让刑法评价做出无罪处理。相反,若与行为危害性相比,行政规范的评价和制裁明显不能达到惩戒效果,就应当继续适用刑法评价路径考虑入罪问题。

(三)厘清重要的刑事违法评价要素

尽管《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甲类传染病的法定禁锢进行了修改,但《刑法》第330条仍然存在需

要解释的地方。将“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这一文义所指代的具体危险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内容时,应当如何解释并适用到现实生活的问题值得商榷。有文章指出,这需要专家鉴定委员会作出结论^[20],但在面对突发多变的重大传染病时显然不能满足抗疫实际需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曾发布相关文件提供指南,认为行为人造成共同生活以外的多人被隔离进行医学观察的,属于“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有文章指出防疫措施不能直接等同于客观危险,在具体个案中判断“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应当坚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本文认为,在综合案情判断的过程中,应当着重通过类比的方式进行实质解释。“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属于具体危险状态,既然能够和“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引起准甲类传染病传播”同时规定为犯罪构成要件,那在客观上具有的危害性应当是相当的。以此次疫情为例,病毒的潜伏特性使人们无法立即得知病毒已经被引起传播的实害结果。在此种情境中,有引起病毒传播严重危险是一种高度盖然的状态,在客观上具有同等的社会危害性。除此以外,关于“后果特别严重的”这一加重处罚要件也有相同的问题。由于“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应当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多数学者认为该罪的行为人主观认识为过失。但本文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不论是传统刑法理论的主观罪过还是德日三阶层理论中的主观责任都不是以法定刑轻重作为划分依据的。尽管加重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档相似,但仍然需要严格认定“引起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同“危害公共安全”在具体案件之中的差异,包括行为本身以及行为人主观上的“加害意思”。^[21]本文认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当从两个层面进行区分:就客观层面而言,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否能实际支配、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只有行为人对病毒传播所施加的影响力和贡献力大于病毒自然的传播能力,才应当认为行为人实施了会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方法”。就主观层面而言,行为人是否具有控制、支配病毒传播现象并危害公共安全认识或者认识的可能性。如果不具有这样的认识,或者根本预见不到自己控制支配病毒传播的事实,那就说明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不以行为人意志为转移的。此时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足以惩治行为人的主观恶性。

基于行政防控规范与刑事防控规范之间的紧密相接,对于公共卫生事件中失职渎职行为也可以做进一步的理解。《传染病防治法》第65—71条分别

对地方政府、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供采血机构、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动物防疫机构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赋予更高的职务义务。上述国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职责,瞒报、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行为属于失职行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有监测职责和保障他人信息的职责,未主动监测、及时监测,或者在监测过程中泄露他人隐私信息资料的,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都会受到行政处分,《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3条也有类似规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条例》对相关国家工作人员有更为详细的行政处分条款。上述行政规范均属于调整刑法层面“失职”“渎职”行为的前置规范。在程度不足以认定为“失职”“渎职”犯罪之时,客观上类型相同的行为应当受行政法规制,以行政处分的方式实现制裁。我国涉及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的公务人员失职渎职犯罪的罪名主要有《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和第409条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尽管两个罪名的罪状与前置法之间不存在引证关系,但在认定犯罪主体刑事责任时,对行为人客观层面的犯罪行为可以前置法的行政违法行为作为参照。若失职渎职行为未达到行政违法行为的最低标准,仍坚持将行为人进行有罪认定就有违法治原则,有失偏颇。因此,在行为人需要承担行政处分责任的基础上,需要进行“二次评价”定性刑事责任。以《刑法》第409条为例,“严重不负责任”应当是以行政规范中的失职、渎职行为为基础,危害更严重的客观犯罪行为构成要素。

四、余论:制定单行刑法进一步协调刑事立法与司法

当下,我国刑法正处于积极的立法态势之中,《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增设了部分轻罪以实现妥当的处罚^[22],更显现出我国刑法变革的新气象。究其本质而言,该现象是以传统刑法理论为基础,汲取德日刑法理论精华,立足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在法益精细化发展趋势下应运而生的立法走向。自2003年以来,短短18年内我国经济、法治社会发展已经遭受两次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重创。新冠病毒疫苗的成功研制,预示着此次疫情终将成为过去式。但它同时也警醒着世人,重大传染病疫情在未来或将成为常态,公共卫生事件刑事防控法治建设势在必行,犹如箭在弦上,刻不容缓。本文认为,可以考虑制定单行的公共卫生刑事防控法,以便在立法层面明确相关内容的罪与罚,进而也为疫情期间的刑事司法提供明确指引。科学立法是公正司法的行动指南,只有明确立法体系的层次性、针对性、

可操作性,才能保证在司法过程中导向明确、精准适用。司法解释紧紧依附于公共卫生刑事防控法,通过司法解释结合立法内容二元完善刑事防控法治建设。^[23]贯彻法教义学的基本理念,拉近刑事规范内容同疫情防控实际的距离,力求应然与实然统一。公共卫生刑事防控的指导性案例要紧紧依托于司法解释,统一刑事诉讼程序具体操作步骤,统一办案人员的正确认识,追求实体与程序统一。全方位、多角度完善刑事立法与司法层面的协调,提前为未来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做好准备工作。^[24]只有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避免临时“立法”与慌乱“执法”。

注释:

- ①司法解释主要指2003年《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2003年《解释》”);指导意见即2020年2月10日《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下称“《四部门意见》”);相关典型案例则包括《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均在实际司法审判过程中起到了指引作用。
- ②当下,我国刑法理论正在经历以传统四要件评价体系为基础吸收德日刑法三阶层理论的变革之中。此处的“法益”一说来源于德日刑法理论,与四要件体系中的“犯罪客体”有异曲同工之处。本文均以“法益”一词进行描述,也可以理解为犯罪行为的“客体”。
- ③目前,“过失说”是通说。如贾宇、刘宪权、陆旭等持“过失说”的观点;陈兴良、欧阳本祺等持“故意说”的观点;李晓明等持“混合过错”的观点。
- ④参见《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第三批)》。

参考文献:

- [1]赵秉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犯罪刑法适用:以“非典”事件为中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
- [2]邵永生.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中权力的扩张和限制的关系[J].医学与社会,2005(11):53-54.
- [3]张开骏.疫情防控期间拒绝隔离的刑事责任[N].人民法院报,2020-04-09.
- [4]王新.全聚焦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彰显刑事司法理念进步[N].人民法院报,2020-04-18.
- [5]邓毅丞.拒绝新冠病毒防控措施的行为定性[J].法律适用,2020(6):101-109.
- [6]叶青.四方面健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规定[N].检察日报,2020-03-12.
- [7]张勇.抗拒疫情防控措施行为的刑法规制[J].法律适

- 用,2020(6):40-48.
- [8]张明楷.刑法学(下)[M].5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687-688.
- [9]马克昌.危险社会与刑法谦抑原则[J].人民检察,2010(3):5-9.
- [10]秦长森.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法益理论的教义学研究[J].医学与法学,2020(5):95-100.
- [11]李文峰.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N].检察日报,2020-02-12.
- [12]王瑞.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司法适用[J].法律方法,2020(2):417-428.
- [13]刘艳红.“规范隐退论”与“反教义学化”:以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为例的批判[J].法治与社会发展,2018(6):95-110.
- [14]张宇琛.从“兜底条款”和“新口袋罪”看刑治主义的法律传统[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94-96.
- [15]刘宪权,黄楠.论拒绝执行防疫措施行为的刑法定性[J].法治研究,2020(2):3-10.
- [16]张明楷.刑法学(上)[M].5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43-68.
- [17]山口厚.刑法总论[M].3版.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18]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26.
- [19]姜涛.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J].政治与法律,2020(5):2-17.
- [20]孟庆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几个构成要件问题[J].法学论坛,2004(1):57-60.
- [21]俞小海.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刑法教义学分析[J].法律适用,2020(22):67-79.
- [22]周光权.论通过增设轻罪实现妥当的处罚: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再阐释[J].比较法研究,2020(6):40-53.
- [23]陈伟.新冠疫情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解释扩张及其回归[J].政治与法律,2020(5):18-29.
- [24]朱笑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刑法介入的特别模式[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0(4):157-16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Crimi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ublic Health Events and Its Expansion

—A Discussion of 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towards Obstructing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s

BAI Yanan

(School of Law,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content of Chinese crimi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bout public health,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riminal management modes of public health, and points out the specific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Chinese crimi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The refin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curity interests makes the boundary of a series of crimes blurred, especially for the public security; The quasi-legislative activities of non-legislative norms disturb the proper mode of the rule of law system; The maladjustment between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and criminal governanc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ual regulation system of execution. Therefore, this dissertation reiterate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rule of law,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clarity in crimi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ublic health, and tries to build a “secondary evaluation” path between administration and criminal to solve the connection problem between administrative sanctions and criminal sanctions. In the specific governance process,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elements of criminal illegal evaluation.

Key words: public health events;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s; crimi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egal system; refined development of legal interests

正在加速演变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柴生高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针对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提出的重大战略判断。2020年全世界多点爆发的新冠疫情,世界格局进一步发生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对全球事务的认识一语中的、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高瞻远瞩。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如何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局势的影响和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外部重大机遇,也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做好自己的事情,持续提升经济优势,全方位增强中国实力。

关键词:加速演变;世界百年;大变局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10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56-05

2020年伊始,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面临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欧美和亚太重要经济体纷纷陷入停摆和衰退状态,世界经济增长前景黯淡,而中国经济率先冲出疫情的阴霾乘风破浪稳健前行。2020年4月,《华尔街日报》称,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久改变世界秩序。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2020年全世界多点爆发的疫情,总书记对全球事务的认识一语中的、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高瞻远瞩。何谓百年大变局?面对疫情的冲击,世界百年大变局将走向何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又将会发生怎样深刻复杂的调整与变化?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总书记的讲话都有明确的认识。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大背景

(一)西方引领下的全球化正在悄然变化

毫无疑问,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现代化的推动者、先行者。500年来,通过对外强力殖民扩张、率先进入工业革命等,西方国家各方面实力远超世界其他地区,形成了对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话语权”等方方面面的垄断地

位,世界秩序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二战后,虽然存在着美苏争霸,全球进入冷战时期。但总的来讲,超级大国似乎找到了相互妥协的办法,大国之间未发生诸如一战、二战那样的直面冲突,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新的科技浪潮推动着世界市场的开放,稳定的金融体系支撑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二战后不到30年的时间内,全球化的发展使原本领先世界的欧美国家在各方面更加突飞猛进、迅猛发展。站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顶端的欧美曾经风光无限,对各国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大家纷纷学习和模仿的样板。但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欧美各国开始遭遇困境。霸权顶端的“盟主”美国先后发动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从2008年次贷危机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美国不断由顶峰开始跌落。政党争斗、精英对抗、社会分裂、民粹主义、暴恐频发、信任危机,等等,尤其新冠疫情让拥有世界最强医疗资源的西方国家损失惨重,剥去了他们曾经靓丽的外衣。

同时,伴随着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诸多被西方殖民的国家和地区纷纷获得了独立,新兴国

收稿日期:2021-06-22

作者简介:柴生高(1977—),男,河南唐河人,历史学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教育。

家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尤其进入 21 世纪以来,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所占全球的比重大幅提高,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作为世界人口最多、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以来,保持了经济长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经过 70 多年的苦苦追赶,尤其 40 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是惊艳世界,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成为世界第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工业化国家。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1]

(二)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所面临国内外形势准确判断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机遇、新挑战,以及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深度调整,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对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一些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

2014 年习近平主席纵观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大变局,明确提出“三大趋势”“三个前所未有”“三个重大危险”等战略判断。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当今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从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我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看,主要存在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挑战。这些重大战略判断,科学回答了我们处于什么环境、站在什么方位、面临什么挑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体现了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形势发展的深刻把握。^[2]

2015 年 10 月 12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 27 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治理体制“正处于数百年以来的大变局之中”^[3]。

2017 年 12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 2017

年度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1 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4][42]}。他首次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起国内外社会广泛关注。

(三) “世界百年大变局”引起巨大反响

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所讲到这一重大战略判断。2019 年 5 月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他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4][77]}。

2018 年 7 月、9 月,在出席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时,总书记均提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洲国家普遍赞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点。

2018 年 11 月,中俄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公报提出:“双方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转型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关系深入调整。”^[5]“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得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友好邻邦俄罗斯的共鸣。

2019 年 3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上讲道“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均积极响应。

2020 年 9 月,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习近平总书记讲道:“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战胜各种挑战和困难的历史。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6]

2021 年 4 月,博鳌亚洲论坛以“世界大变局:共襄全球治理盛举,合奏一带一路强音”为主题,15 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99 位部长级以上官员、29 位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近百名世界五百强知名企业高管、众多学者和文化精英出席并展开多场讨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在全球范围获得广泛共识,得到各国普遍认同。

二、如何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曾强调,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大战略

判断。我们应准确把握这一大变局的丰富内涵和发展趋势,适应时代的发展。

(一) 生产力发展蓬勃之势“百年未有”

16世纪、特别是18世纪以来,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经历了多次产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深刻改变了世界的发展面貌和基本格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新旧转换、新陈代谢,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领域取得重大颠覆性技术,信息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领域科技成果转化明显加速。新科技革命不断创造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失业、安全失控、伦理失序等风险,对人类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颠覆性挑战。

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兴起,对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作用将变得更加突出。高科技竞争更是空前激烈,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对竞争国家进行技术封锁和管制成为常态,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新的产业革命给世界带来无限发展的潜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二)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百年未有”

纵观全球,当今,国际力量对比经历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格局,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正悄然发生变化,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北强南弱”“北主南从”转向“南升北降”“南北对等”。多极化与民主化大势难逆,老牌与新兴大国综合实力此消彼长大势所趋。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性国际机制崭露头角,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正产生重大影响。而老牌发达国家困境加剧、阶层与族群矛盾凸显、政党对立、社会撕裂,影响式微。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已成为重要的多极力量。世界银行统计显示,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经济比重接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三) 社会治理之新冲击“百年未有”

国际关系行为体“非(国家)升国(家)降”,从主权国家“一统天下”,向“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转变。影响国际事务的行为体不再限于传统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

司等影响上升,越来越活跃,甚至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和份额。各类经济和金融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宗教和精神领袖等纷纷对全球重要事务建言献策,且所提方案得到认可和采纳。

当今世界有5万多个国际组织,形成了覆盖范围极大的规则、决议和标准,想走进国际社会的国家,必须遵循相关法律和条例。

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全面融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引领作用逐步增强,全球社会治理正向数字化转型,数据开放共享正加速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局势的影响

当今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美国一家独大的时代一去不返。西方社会的分裂、民粹主义兴起,正在侵蚀着各国之间政治互信,西方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西方治理”走下神坛,不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理念正迅速走向世界,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加速了百年大变局演变,世界进入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时期,人类未来发展的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空前突出。

(一) 国际关系进入深度调整期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大国间博弈和战略竞争加剧,国际局势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纷纷重新厘清定位、内外战略,力求更好地应对变局,大国关系的合作面明显下降,竞争面明显上升。他们以制度创新和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为支撑,以重塑国际规则为主要手段,力求各自在日益显现的多极格局中抢占比较有利的国际地位,国际体系的变革愈显深刻,发展模式和道路多样化趋势越发凸显。个别大国秉持“本国优先”,多边主义正面临单边主义的挑战,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以及通过多边协商解决国际纷争的安全机制遭到破坏。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在应对共同挑战的过程中,居于主导核心地位的西方大国不仅不愿意承担治理责任,反而强化自身利益、阻碍其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恶化了推进全球治理的政治环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反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巨大,国际技术合作、经济合作及产业链、物流链等面临政治干预,世界经济面临长期风险。

(二) “西方治理”模式跌落神坛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秉承“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将自己的文化价值理念视为唯一先进体系。“西方治理”一度寄托了人类期望全球和谐稳定的

美好愿景,在西方大力吹捧下更是曾一度被视为应对全球化问题的“最优方案”。

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西方的制度和模式则遭遇了巨大困难。“特朗普式折腾”“黑天鹅”事件、黄马甲运动等,使西方一些国家政治活动偏离常道,呈现出政治局势失常之“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凸显,对世界挥舞关税和制裁“大棒”。新冠疫情发生后,西方国家因意识形态的偏见让他们一再贻误战机,当病毒肆虐,束手无策、应对无序、集体沦陷。西方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糟糕表现反映了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

“灾难是共同的”,“努力是各自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之治。中国政府高效率、有条不紊地应对疫情,是最先从疫情中走出的大国,体现了卓有成效的治理能力。中国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一个又一个方案,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模式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

(三)疫情加速百年未有之变局

疫情暴露和加剧了世界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的矛盾,强化了许多国家的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风潮。美国基于一己之私,将疫情问题政治化,大大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与对立。大疫之后,制度之争、国力之争和影响力之争引发的对立和冲突,极可能进一步升级变异。疫情进一步凸显了原有国际秩序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问题上日益不适应的矛盾,也进一步呼唤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

全球经济重心将加速转移。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各大经济体,成功摆脱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将重心转移到经济恢复上来,中国2020年二季度GDP由负转正同比增长3.2%,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西方国家,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全球经济重心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加速转移。

世界秩序和格局走向主要取决于疫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新变化。面对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国际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空前凸显。世界主要大国在疫情中的国内和国际表现、应对疫情的能力,以及疫后经济恢复的效果将直接决定其新的国际地位,由此带动地区和世界地缘经济、地缘政治以及国际安全格局发生新的变化。

四、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制度优势显著,经济长期向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并且,具有“社会大局稳定、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

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等持续发展的优势和条件。

(一)坚定走好自己的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政治稳定、社会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朗。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能够快速实现产品研发成果的量化生产,并保持高频灵活的产品升级迭代。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124家,位居全球第一。2020年,我国GDP超10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人口红利仍然存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6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努力做好自己的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之“新”,就在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发展阶段要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动作为、善于作为,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着力打通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及其联系,在总体上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通过发挥内需潜力,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阶段要落实好新的部署。新的发展阶段,围绕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六个方面,擘画了2035年宏伟远景、描绘了“十四五”美好前景。从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等12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创新性、针对性的重大举措,明晰了今后五年至十五年怎么干、干什么,对于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重塑竞争新优势意义重大。我们要做的就是主动担当作为,更好做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一棒接着一棒把美好蓝图化为现实。^[7]

(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全球视野和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大大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创造人类美好未来发挥巨大引领作用。

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和提速,成为不断一体化的人类发展大趋势的主流,人类早已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与共的整体。全体人类早已凝结成一个存亡相依、生死与共的整体。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全球合作抗疫是一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在抗疫斗争中,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介绍中方经验、分享最新研究成果、防疫理念及综合举措等,展现了世界大国的担当,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中方做法得到了广泛赞誉,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蔓延,正让全世界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常识、规律、规则、实践等不同维度被人们不断接受。大疫之后,我们应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和挑战,开创命运与共、和衷共济的美好未来。

纵观历史与现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外部重大机遇,但与此同时,也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们所见证和经历的这一切,只是百年大变局的开端。未来30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论述的“揭晓期”,也是塑造“大变局”历史内涵真正的决胜期,更是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期。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最重要和最首要的依然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持续提升经济实力优势,全方位增强中国实力。

参考文献:

- [1]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总体国家安全观”知多少? [EB/OL]. 央广网 2017-04-15 08:35:00http://news.cnr.cn/native/gd/20170415/t20170415_523708738.shtml. 转载 2015-03-02 求是网.
- [3] 极有为. 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 解读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EB/OL].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28318652.htm.
- [4] 习近平. 习近平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5] 张蕴岭. 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171.
- [6]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EB/OL].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9/22/c_1126527652.htm.
- [7]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Accelerating Evaluation of World's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CHAI Shenggao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world is undergoing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s a major strategic judgment put forwar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2017 regarding the profound changes that were taking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 2020, the world structure has further change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affairs means that he has a high and far-sighted view of the future world developmen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to understand the world's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n the current background, and how will those changes affect the global situation, The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have provided unprecedented external opportunities for, and it also proposed high demands for China's own development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e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our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enhance China's strength in all aspects.

Key words: accelerated evolution; world in a century; major changes

论民国初年杨增新对于入境柯尔克孜难民的应对措施

刘国俊

(新疆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1916年,俄属中亚地区爆发了民族大起义,导致了中亚各族人民的大逃亡,其中有20多万人涌入了中国新疆沿边各地,其中主要为柯尔克孜人。面对这次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当时的新疆督军杨增新,从维护新疆安全和稳定出发,采取了灵活细致的应对措施,一方面进行防堵和驱逐,一方面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予安置和救济,对其加强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最后通过外交手段,与沙俄政府进行协商,最终于1918年秋冬之际妥善地完成了大部分难民的遣返工作。同时,也有部分柯尔克孜人滞留未归,成为现今阿克苏柯尔克孜人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柯尔克孜;难民;新疆;杨增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11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61-06

1916年7月,因反抗沙俄的征兵令,俄属中亚的七河省爆发了民族大起义。俄军对于参与暴动的各族群众展开了残酷的镇压,结果引发了该省30多万人的大逃亡,其中有20多万人逃入中国避难^{[1]29-32},主要集中在当时新疆所属的塔城、伊犁、阿克苏、喀什等地,其中主要为柯尔克孜人。

一、民国初年入境柯尔克孜难民的人数

当时的新疆官方以及民间,对于柯尔克孜人有“布鲁特”“布回”“布民”“克尔格斯”“黑黑孜”等多种称呼,或者与其他民族的逃亡者一道被统称为“俄哈”“逃哈”“逃俄”等。当时柯尔克孜难民较为集中在伊犁、阿克苏、焉耆以及喀什等地。

(一)伊犁

伊犁河谷与俄国七河省相邻,而且地形开阔,易于难民进入。1917年4月,据伊犁道尹许国祯报告,“伊犁沿边逃哈房子有千余顶之多,内分布鲁特、阿勒班(“阿勒班”为哈萨克部落名)两种,管理该逃哈之头目博罗斯(即部落首领)其有十一六人,丁口牲畜,为数甚巨”^{[2]1989}。而在办理难民回国事务的过程中,发现实际人数要多得多。5月24日,许国祯又称,“霍尔果斯、特克斯河南岸等处,前后

共已驱去逃哈两万三千余户,丁口约十数万人,各种牲畜约二十六万余头”^{[2]1997}。以每户5人计,当时涌入伊犁的难民总数应在10万—12万人之间,以其人口比例一半计算,柯尔克孜人至少有五六万人。

(二)阿克苏

阿克苏与俄国七河省接壤,边界线漫长而且边防力量比较薄弱,因此,大量俄国难民由此闯入边卡,进入阿克苏道所属的乌什、阿克苏、温宿等县,并继续向拜城、库车、沙雅、轮台等地逃亡。由于阿克苏边外主要为柯尔克孜牧区,因此,由此路进入的所谓“逃哈”应以柯尔克孜人为主。据记载,1916年9月13日,据阿克苏道尹朱瑞堦报告,“有俄国艾仁阿提巴西地方布民五百余家,来到中属恰拉布拉克等处,人数太多,无力阻拦”^{[2]1836-1837};9月30日,杨增新在电文中称:“又有两千余人从乌什边卡入境”^{[2]1846};11月14日,又据当时驻守乌什别迭里达坂的李策胜营长报告,“俄国逃来布民愈来愈多……近日贡古鲁卡一带,又窜入四五万人”^{[2]1893};1917年6月11日,杨增新又在电文中提道:“(拜城)察尔其为该县第一繁盛之区,民间果园田苗甚伙,逃来俄国布民至八九百家。”^{[2]1982}上述记载综合

收稿日期:2021-07-15

作者简介:刘国俊(1982—),男,山西繁峙人,民族学硕士,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新疆历史。

起来,当时进入阿克苏的柯尔克孜人,也应在五六万人左右。

(三)焉耆

当时,也有部分柯尔克孜难民由伊犁翻山逃入了焉耆。1917年5月22日,据焉耆县(当时归阿克苏道管辖)知事刘希曾报告,“该(旧吐尔扈特)蒙部科利达坂地方,逃来俄国布民五十余家、三百余名,查此项逃民,随带毡房、牲畜,突来蒙地游牧”^{[2]1996}。据当时正好路过焉耆考察的谢彬回忆,当时蒙古汗王“住帐环居者皆俄国逃哈,共计八十余家,六百余人,牲口四千余头,其人自呼克儿格斯,土人则称为黑黑孜”^{[3]98}。

(四)喀什

喀什的北部与西部也与俄国接壤,而且紧邻柯尔克孜牧区,因此,也有大批难民涌入。1917年1月10日,杨增新在给北京政府的汇报中称:已将喀什入境俄民悉数劝离出境,(其中)“除被拦阻于界外以及零星户数、随时劝回之俄民不计入外,共计劝回难民一千一百余户,两万多人。”^{[2]1931}

由此推算,当时逃入新疆各地的柯尔克孜难民应该在12万到14万人左右,其分布地区主要为伊犁与阿克苏,其次为喀什。

二、1917年以前杨增新对于入境柯尔克孜难民的应对措施

杨增新,清同治三年(1864年)生,字鼎臣,云南蒙自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进疆为官,先后担任阿克苏道尹、迪化道尹兼新疆提法使等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于1912年成为新疆首任都督。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特别善于处理各种危机事件,有效地维护了新疆的安全与稳定。面对这股突如其来的难民潮,杨增新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应对措施。而其中以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为标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17年以前,杨增新主要通过通过对难民进行防堵并加强后续的安置管理等方式,以减少难民潮对于新疆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其主要措施包括:

(一)调兵防堵,力图将难民堵截于卡外

1916年9月,为加强伊犁边防,杨增新派出新军马步队各一营,由窦居徐统领开赴伊犁,以资防范^{[2]1824},同时,为了保证阿克苏边防的安全,杨增新派出陆军营长李策胜、黄远鹏率马步队各一营,前往乌什驻防;9月30日,杨增新又命李策胜率马队开赴依不拉引卡,对于入境难民进行防堵,同时,“又因贡古鲁克卡地方寒苦,亦应驻兵,可将新添之布民卡兵四十名驻贡古鲁克卡,极为相宜,又山内西南有

奇恰达坂,该处为通俄属阿图什巴什及纳林桥之路,又西南有鲁乌达坂,该处亦通俄属并通喀什,此两卡官兵暂难兼顾,可责成布民卡兵守之,俟有马队可派,仍以派队赴该处堵截为是”^{[2]1847}。在喀什方面,9月7日,当得知俄国柯尔克孜难民由伽师附近入境后,杨增新即派新军营长马凤章率马队前往防堵,并令喀什提督马福兴派陆军马队40名先期前往侦查^{[2]1834};又巴楚县与乌什县有小路相通,9月29日,杨增新致电县知事卢殿魁,命其“酌量派兵扼守要卡,阻挡(难民)入境,如有潜行入境者,仍应驱逐”^{[2]1845};又恰克玛克为疏附县通俄要隘,10月4日,杨增新电飭新军马队营长童明才派兵一哨前往驻防^{[2]1852};待童明才派兵进驻明约路及乌里克卡等地后,杨增新又电告:“该处乃通俄要道,仰即严为防范,如有俄国逃难之布哈回缠及无护照逃难之人民入境,应切实阻止,善为开导,劝令返国为要。”^{[2]1886}

(二)要求地方官以和平手段驱逐难民

当时逃入新疆的柯尔克孜难民的境遇相当悲惨,据阿克苏道尹朱瑞墀报告,“俄属布民因畏俄人剿办逃入中国,原系死中求活,据禀不问有路无路,到处纷窜,如遇险要山岭河涧,即将牲畜推下,任其跌压籍为路径,然后入口,从而过之,似此情形,亦殊可怜”^{[2]1875}。同年11月,又据李策胜汇报称,“俄国逃来布民越来越多,塞外天寒,早已积雪冻冰,俄布民之转死沟壑者,不知凡几……昨下雪数日,山内冻冰甚厚,人马难行,俄布民或有用毡席皮物铺放冰上,转相递接,强为上下者,雪深数尺,俄难民之冻馁而死者甚多,尸骸枕藉,填塞道途,惨不忍言”^{[2]1893}。对此,杨增新认为“俄国哈民、回民、缠民、布民,因反抗挑兵逃入中国,由伊犁、塔城以迄阿克苏、喀什,沿边七八千里,几乎处处牵动,亦无处不请添兵,新疆财力实难办到,且此等俄民若办理操切,反至铤而走险,牵动全局”,而“新疆财政万分支绌,岂能无米为炊,中央同一困难,亦难拨款接济”^{[2]1823-1824}。所以,他一再告诫地方官,让他们以和平的方式劝导难民回国,万不可以武力驱逐。

(三)通过外交途径与俄国交涉,要求其就近收回难民

1916年9月13日,杨增新以“乌什、温宿等县连接俄境,头头是道,俄国布哈回纷纷逃入境内,或占据民间草湖,或混入城市腹地,人类庞杂,良莠不齐,加以会匪地痞勾通煽惑,势成巨案,于邦交关系綦重”,电令喀什道尹与俄国驻喀什领事商量,“由俄副领事到乌什各处,就近收回难民,免生枝

节”^{[2]1837}。10月23日,杨增新又致电北京政府,以“(难民)既来者已难驱逐,方来者络绎不绝,现在纷纷调队堵截,防不胜防……虽经地方文武晓谕俄民,劝其回国,而伊等均以畏俄苛政,良莠不分,肆行屠戮,既来逃命,未敢回国再入死地为词”为由,恳请“(外交)部与俄使严重交涉,并由驻俄公使向俄政府婉为劝告,将逃来中国之哈萨、布鲁特、回、缠各种俄民宽其逃亡之罪,凡归回俄国之后,概予免究,并飭在新领事设法收回,该逃民知罪由可原,自必仍回旧居,收回较易”^{[2]1864-1885}。而俄国领事对此置若罔闻。11月14日,杨增新又电北京政府:“查俄属布民因乱逃窜,乌什人数最多,现在天气严寒,该俄民等饥寒死亡,实属伤心惨目,增新电请与俄使交涉,将该俄民收回,俄人置之不理,效果毫无,听其死亡,实属有伤人道……仍请与俄使交涉,将该逃民从速收回为祷。”^{[2]1893}然而,俄国对此始终置若罔闻,使得难民遣返工作一再拖延。

(四) 加强对于入境柯尔克孜难民的管理

1916年9月13日,杨增新致电阿克苏道尹朱瑞墀:“至逃来之俄民,令在城外偏僻地方居住办法亦是,总之无论中民、俄民,皆不可听其在城久住,俟李策胜、黄远鹏两营到乌,即可认真勒令出城……惟俄民军装,令其缴官代为收存,将来发还最好。”^{[2]1838}11月3日,杨增新又批准朱瑞墀的建议,“招该布民等砍伐枯树运至山外,派人接收,每驼二百四十斤,发红钱银一钱六分,再由缠民运至县城,每百斤发红钱银八分,每月用银二百六七十两,各营烧柴便足供给,免向民间采买办法,较为妥善”,同时“严飭地方约束收柴司事等,不得用大秤勒收,或估计斤数,以百余斤作三四十斤,反令布民吃亏,又生无穷流弊”。另外,又以当时“难民遗骨暴露,倒毙牲畜遍满山谷,乘此冬令严寒时收捡一处,积为大塚,来春便无腐化,以免瘟疫盛行,有害卫生”^{[2]1883-1884}。1917年3月,杨增新又致电新任阿克苏道尹刘长炳:“现当节交春令麦苗遍野,该逃哈等牲畜践踏民间田苗在所难免,或因此口角厮打,势必酿成交涉,应由该道尹飭所属知事传谕各头目,不准逃哈在村庄近处牧放牲畜,以防未然,此为最关紧要之事,由温(宿)赴乌(什)之路计一百八十里,路旁村庄甚多,应责成温(宿)、阿(克苏)两县乡约随时稽查,如有沿途抢劫之逃哈,即行送地方官转交俄领事惩处,以儆刁风”,同时严禁地方官向难民收纳羊税并进行需索等^{[2]1983-1984}。4月2日,杨增新又指令乌什县知事,对于“逃来叛首如布回夏不旦之后裔等,非寻常逃犯可比,该知事若遇此辈要十分注

意,第一要著先设法将伊之快枪解卸,第二要著须密侦其行为动作,勿使勾结生事,破坏我国治安……现在住乌贫穷布民既令各户权宜雇佣以便谋生办法尚属可行,须密谕乡约头目人等,将此项逃民零星散开,充作各处佣工,万不可聚集一处,人数过多,不免滋生事端”^{[2]1984-1985}。

(五) 飭令各县对入境柯尔克孜难民的情况进行调查

1916年11月21日,杨增新致电阿克苏道尹朱瑞墀,认为“俄国此次逃来难民散处边境,人畜既众,种类庞杂,极应查点户口牲畜数目,明则为便于稽查矜束,暗则将来实行驱逐庶有把握,故暗中调查一层,最为紧要”,并令其转飭所属乌什、温宿、阿克苏三县知县,着手展开调查^{[2]1898-1899}。12月22日,据朱瑞墀汇报:“在乌什县境山内查出被俄布民掳去之俄国妇孺二十八名,均交由俄约阿不都哈的具领,随派俄商四拉送喀什,由我国地方官……妥送至喀什,交俄国领事验收在案,兹又查出前项俄人大小男女二十五丁口,就近交于乌什俄约具领清楚。”^{[2]1904-1905}

(六) 力阻俄兵跨界捉拿所谓“叛首”

1916年12月,俄国领事照会喀什道尹杨增炳,称俄七河省“已派营长贝其科夫,由哈拉湖启程前往中国乌什县地方,收抚被俄哈拐出之俄国妇孺并缉拿此次在哈拉湖叛乱之首要犯沙布达诺夫弟兄暨其余滋事之人”,杨增新认为沙布达诺夫在乌什亲属部众甚多,俄国越界拏捕,必然激成事变,危害边局,要求外交部与俄使严正交涉,拒绝俄兵越界拏捕,只许“俄兵将俄国妇孺迎护,仍将逃来乌什俄民全行收回,俟收回时自行拏办首要,以免扰害中国治安”^{[2]1915,1919}。据此,外交部随向俄方发出照会,然而,俄方对此并不理会。1917年1月7日,俄国武官行至温宿,不分良莠拏捕了所谓“匪首”11人,对此,2月2日,杨增新又电呈外交部,就此请其“与俄使交涉并由驻俄公使与俄政府交涉,请其对于收回俄民一事力主和平,务从宽大,以收散失之人心,并请飭派来乌什之俄兵迎护被掳妇孺回俄,勿得纷纷拏办,致生事端,至于此项逃民,应请俄政府一律收回,不胜盼祷之至”^{[2]1958}。

(七) 拒绝出兵帮助俄国缉拏“叛首”

1917年1月8日,喀什俄国领事照会杨增新,要求新疆方面帮助其缉拏所谓的叛乱头目54名,杨增新害怕由此激生事变,危害边局,电飭各地方官仅将名单之人密为调查即可,不必认真缉拏。^{[2]1937}1月10日,俄国驻喀什领事又请其电飭喀什提督马福兴派

兵协同俄官到乌什缉拏“叛首”，杨增新则以“喀什陆军巡抚各营，回队居十之七八，此等兵队用以平乱尚能胜任，若用以办交涉，殊不相宜……而阿克苏所属各营，向不归喀什所辖……未便由喀什派兵赴阿，致生流弊”，予以拒绝^{[2]1928}。2月3日，杨增新又致电外交部，指出“只阿克苏一处，（俄国）要求中国代拏头目至数十人之多，中国兵力实难办到，况今日单开拏数十人，明日单开拏数十人，势必将俄哈逼变，扰害中国治安，甚或生出意外交涉，彼时俄国反得有词以中国为办理不善……应请严重交涉，力为拒绝”^{[2]1959-1960}。

三、1917年以后杨增新对于入境柯尔克孜难民的应对措施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沙皇政权被推翻，俄国临时政府宣布大赦，并开始接受柯尔克孜难民回国，^{[1]220}由此，杨增新这一阶段的应对措施，主要围绕如何遣返难民展开，主要包括：

（一）不断催促各地方官，让其从速办理柯尔克孜难民回国事宜

1917年4月17日，杨增新致电伊犁道尹许国祯，称“既经与俄领定义，准其（难民）自行回国，仰该道尹会商杨镇守使，督同军队，乘此时机认真驱逐出境，点交俄官接收”^{[2]1990}；4月19日，杨增新又电温宿县知事杨继昌，称“该县居留俄布民甚多，现在俄政府已将该逃民赦免，应以从速开导回国为根本上之解决办法，即由该知事查明，分起发给护照，拣派干役送至乌什出卡，仍取具该头目回国募结，注明人口牲畜数目为已经回国之凭证”^{[2]1990-1991}；6月11日，杨增新又指令拜城县知事冯德纯，认为察尔齐难民“应急劝导回国，会同温宿杨知事派差护送，由乌什出卡，勿令久事逗留，致践踏民间苗稼为要”^{[2]2000}，同时，杨增新又饬令阿克苏、温宿两县，逃民“应由乌什出卡方为正办，万不可任其转逃拜城”^{[2]2001}；8月4日，杨增新又电告杨继昌，令其“严谕玉尔滚等处乡约头目等，嗣后遇有拜城解到之俄属布民，应督促劝导，送至县城，转送乌什出卡，以免半途逗留可也，如有库车、沙雅、焉耆、轮台等县送至拜城地方者，该知事应即查照人数，督催接替前往，不准在拜逗留为要”^{[2]2004-2005}。

（二）恰当解决当地人收买难民子女问题，减少难民回国的后顾之忧

当时，柯尔克孜难民入境后，有人因生活所迫，将子女卖与当地人收养或者成婚，1917年10月，据当时库车县知事陈宗器的呈报，仅在库车就有16人属于此类情况，对此，杨增新认为“此或结婚或收

养，实因该逃民等当颠沛流离之时，为此权宜之计，恐日后终不免纠葛，相处稍久，夫妻或不和睦，要求离异，女家亲族寻觅到库（车），出而干涉，此种情节在所难免”，因此，除“当结婚收养之时，有主婚之人暨结婚字据收买银钱过付者……准其完婚收养”外，如“买来之俄女法土满一名，来路不明，必有后患，应作为收养道路遗失子女，若能访明家族，准其领回方为妥善”，而对于“马存收留之俄布民阿拉哈及其妻子三人，为在家佣工，业已期满，应速遣其回国，以免流落”^{[2]2018-2019}；11月16日，杨增新又致电阿克苏道尹刘长炳，认为“乌什人民所买俄布民子女，该复布旦之子既要求赎回，如能指出买主姓名，其人确在乌什者，可准其传案对质，照原价赎回，卖契存案，以绝后患”^{[2]2023}；1918年6月14日，据温宿黄营长呈报，“温（宿）、阿（克苏）两县查出民人收买布民妇女约六七十人，而俄员阿不都拉阿比思仅赎去二十余人”，对此，杨增新认为，“其余未经赎回之妇女四五十人能赎与否亦听俄人之便，并非我国不准收赎，俄员虽狡辩百出，亦当无词可指”^{[2]2046}。

（三）对于回国难民采取一定的资助，并加强管理

1917年7月，当时焉耆县呈报将俄哈大小男女共计135口遣送出境，按名日给食面一斤，共发麦面405斤，杨增新认为“此项麦面既为资助逃哈所需，应准由该知事在仓储项下照数提用，造册作正开报，捐给驴脚一节，具见热心慈善，并候令财政厅查照”^{[2]2003-2004}；8月4日，杨增新又致电拜城县知事冯德纯，“该县属逃布民内，因无衣食牲口乞食度日之十三家，如有年高不能步行者，应准酌量雇给驴头，送至温宿县交收，再由温宿派差送至乌什，催令回国，以示体恤”^{[2]2005}，8月17日，据报该县又转解库车俄国逃民三起共计260余丁口，由该县发给食面1320斤，每起雇驴驮四五十头，杨增新认为“查发给食面，系指最穷之户不能行动者而言，若一概按照人数发给面斤、代雇驴驮，官家实无此办法，嗣后遇有逃哈过境，当酌量发给，勿稍冒滥为要”^{[2]2009-2010}；同时，在护送难民回国的过程中，对于其携带的枪支、鸦片等违禁品也予以收缴，1917年9月22日，杨增新在给乌什黄营长的电文中指出：“近来由库车、拜城、温宿等处来乌（什）之布民大半回国，沿途尚无滋扰情事，办理颇为妥慎，惟由贡古鲁卡回国之布民携单响枪一支，经该营排长雍禄没收缴营，此项枪支仍应于出境时发还原主……嗣后无论俄人中民，如查获有私贩烟土者，应将烟土及人一并解交地方官，分别讯办，不准将烟土私行扣留，

将烟贩放走，致生枝节。”^{[2]2015-2016}

(四) 通过与俄国的交涉，制止其对于归国难民的虐杀行为，保证难民顺利回国

1917年6月12日，据当时乌什县知事呈报，“布民克南木等供称，俄民七百余丁口回国，行至距哈拉湖一站，概被俄兵挡至山沟，枪毙殆尽”，对此，杨增新认为：“查俄民逃入中境，誓死不回，我国笃念邦交，费尽财力、兵力曲为劝导，并俄领布告一律收回，准予免罪，该民等始愿回国，兹据前情，殊属惨无人道，是已归者险遭杀戮，而未归者裹足不前，不知该政府准免罪收回，继又令行枪毙，究竟是何用意？此等行为，不惟俄政府失信于边民，恐此后中国地方官劝导之言，亦归于无效，现在留居新疆各处逃来俄民当复不少，皆穷饿待毙，设铤而走险，谁负责任？请钧部速向俄使质问，复示遵办。”^{[2]2002-2003}8月30日，又因逃居沙雅县之俄哈头目依沙木丁“恐回国之后被俄官办罪，不敢回国……以未见俄国赦罪明文，尚多疑虑”，杨增新遂请外交部“向俄使交涉，将俄政府准予赦罪一层明白回复，以便宣布，使俄哈一律得知，俾速回国较易为力”^{[2]2011-2012}；9月28日，又据阿克苏道尹刘长炳称，“据在阿俄哈而沙雅加等公禀内称，前后回国布民到哈拉湖巴斯空及阻克地方，被俄人杀伤甚众，前十日又在白带力卡地方，杀伤回国布民一百二十三家”，对此，杨增新再次请外交部“转向俄使严重质问，并请其将赦罪条文明白宣布，以释俄哈之疑”^{[2]2016-2018}。

(五) 对于难民因种种原因无力回国者，准其延期回国

如1917年4月，镇守使杨飞霞报称：俄国驻伊犁领事声称，“接得逃入中境克尔格斯禀称，贵国军队驱逐伊等出境甚急，不准伊等收拾房屋什物并一切放牧牲畜，途中冻馁而死者不能埋葬，该克尔格斯等恳请贵镇守使并道尹发慈善心，暂缓驱逐，给伊等期限三个月自行回国，实为公便”，对此，杨增新认为：“俄官既不允俄哈回国，虽强迫驱逐，未必遂有效力，且以俄国境内情形而论，现在尚未大定，故俄官办理收回俄哈之事，或有为难情形……如准从缓驱逐，仍请与俄公使言明，至多以三个月为限，不得任俄哈久留中国为要。”^{[2]1992-1994}12月4日，有逃亡温宿之俄国布民头目马土力等电称：“布民等逃难来宿已驻年余，屡奉劝谕回国，理应遵命，以现值天寒，回俄路远，中途冰雪峻岭险阻数处，又无水草，民等三百余家，牲畜变卖早尽，此时阿道派兵催走，无衣无食，惟有于途中冻馁待毙而已，处此万难之际，不得已仰恳军帅恩施展期三月，明春早发冰消时，定

即回国，若以民等为伪言推诿，愿具甘结，满限时不走，听从军帅惩办，实无有怨言”，杨增新认为：“该布民如果实系贫苦不能行走，应即取具该布民头目确结，限期明年三月以前悉数回国，不得稍事迁延。”^{[2]2027-2028}1918年1月，又有俄布民161户、男女丁口400余人，“又复不肯回俄，陆续潜来该县北乡，逗留不去”，杨增新指示温宿县知事，“应准留住过冬，惟该布民等，所有牲畜不准践踏民间冬苗并有偷盗劫掠等事，以免该县人民受累为要，俟来年三月，即由该知事委员等勒令由乌什出卡，不准再发表面，以节浮费”^{[2]2031}。3月27日，杨增新又电令阿克苏刘道尹，认为：“前准留冬之期已满，应由该道尹督飭温(宿)阿(克苏)乌(什)各营县，将境内逃哈催令从速扫数出境，以结全案可也。”^{[2]2034}5月30日，杨增新又电喀什、阿克苏两道尹：“喀什俄领前电请将逃来阿克苏之俄哈展期三个月回国等因，查现在俄国粮食缺乏，新疆尚未成熟，俄哈回国恐成俄殍，本省长心实不忍，准展期两个月，候俄国新粮收割后再行回国，以示体恤远人之意。”^{[2]2042}6月14日，杨增新又电温宿黄营长，认为“温宿俄布民中之十分贫穷无力启程者，业经批准展期两月，未便失信，如实系稍有资财、马匹、牲畜，不十分为难者，由俄员启程时，带领一同回国，更为妥善”^{[2]2046}。

这样，经过杨增新以及各级地方官的不懈努力，到1919年3月，杨增新在给北京政府的电文中称：“除塔城、伊犁、喀什三道各属逃来俄哈先后全数遣送回国二十余万人，迭经呈报政府有案不计外，惟阿克苏一道各属逃来俄布、俄哈人民，因畏俄人虐待，抵死不肯回国，或已去而复来者亦属不少(外)……现已于七年秋冬之间，将该俄国逃哈人等遣送回俄，一律肃清。”^{[2]2053}据此，当时进入新疆的难民已于1918年秋冬之际全部回国，然而，实际上仍然有少量柯尔克孜难民留在新疆。如1918年8月28日，乌什县知事报称，“该县俄逃布民四乡查逐出境者亦居多数，惟由阿(克苏)温(宿)各县逃窜者尚不复少，应请两县协力防堵搜逐，不使容留一人，方能肃清”，据此，杨增新认为：“温(宿)阿(克苏)两县境内逃哈，迭据该知事等前后呈报，一律肃清有案，何以俄逃民又由温宿境内窜至乌什者尚不复少？足证该知事等轻听头目等无凭报告，并未认真搜查，可知事关交涉要案，如此漫不经心，实属疏忽。”^{[2]2050-2051}可见，直到当年8月底，当时在温宿、阿克苏、乌什等地依然有部分柯尔克孜难民四处躲藏，不愿回国，而地方官玩忽职守，未能详查，竟以难民全数出境上报，结果遭到杨增新的痛斥。至于这部分难民后来

回国与否也无明确的记载,应该留在了当地,成为现今阿克苏各县柯尔克孜人的主要来源。

四、结语

20 世纪初的中亚与新疆,都处于历史的动荡期。一方面,俄国爆发了“1905 年革命”,1914 年又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 年,又先后爆发了“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18 至 1920 年,又爆发了大规模内战,这些都对中亚的局势造成巨大冲击,进而对于新疆的安全稳定造成重大威胁,其中 1916 至 1918 年的柯尔克孜难民问题就是典型事件,当时新疆面临的外部环境是比较险恶的。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很快陷入了军阀混战、内乱不止的局面,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边疆,新疆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来稳定政局、处理各种危机,而新疆本身情况比较特殊,一旦问题处理失当,将导致不可收拾的严重局面。当时的新疆,可谓是内外交困,命运多舛,危如累卵,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就对执政者的政治智慧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作为一个封建旧官僚,杨

增新虽然思想比较保守,但“才智绝伦,机警过人”^{[4]479},在处理柯尔克孜难民问题的过程中,能做到刚柔相济,灵活多变,既做好充分准备、加强防范,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现实需要不断调整,变换手法,同时,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力主通过和平手段以及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最终未酿成重大事端,化解了危机,可以说是其“为政大于细”^{[5]48}的执政风格和高超政治手腕的一次集中体现。

参考文献:

- [1] 王治来,丁笃本. 中亚通史:现代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2] 吴福环. 补过斋文牍:第二辑·俄哈编下[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1955-2055.
- [3] 谢彬. 新疆游记[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 [4] 曾问吾. 中国经营西域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5] 熊铁基,成洪基. 老子集成:十二卷[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On Yang Zengxin's Countermeasures to the Entry of Kirgiz Refuge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LIU Guojun

(Institute of History, Xin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rumchi, Xinjiang 830011, China)

Abstract: In 1916, the ethnic uprising broke out in the Russian Central Asia, and mass of population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entral Asia escaped. More than 200000 people, most were Kirgiz, flocked into the border areas of Xinjiang, China. In the face of the unknown refugee crisis, Yang Zengxin, the military governor of Xinjiang at that time, took flexible and meticulous measures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Xinjiang. On the one hand, he carried out anti-blocking and expuls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humanitarian perspective, he gave resettlement and relief, strengthened its management and maintained social stability. Finally in the autumn and winter of 1918, he completed the most refugee repatriation work validly. At the same time, some Kirgiz people stayed and became the main source of the Akesu Kirgiz people nowadays.

Key words: Kirgiz; refugees; Xinjiang; Yang Zengxin

转型之道:莫里斯总督制的建立与影响

苏 聪,石 旭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莫里斯继承了拜占庭早期的政治改革成果,尤其借鉴了查士丁尼时期的“军政合权”,同时结合东哥特王国与汪达尔王国逐渐形成的“蛮族”治理军事化的因素,最终在北非和意大利实行总督制改革。总督区内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比较活跃,其在政治上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策具有一定的调适性,在宗教上见证了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在本地区的博弈。总督制的实行有效缓解了帝国的外部危机,但却为内部的分离与地方势力的增强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拜占庭;转型;总督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12

中图分类号:K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67-05

莫里斯统治的二十年被视为早期拜占庭的最后阶段,此后帝国从危机中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逐渐摆脱自“三世纪危机”以来的不利局面,向中期拜占庭迈进。莫里斯的统治是早期拜占庭国家向中期拜占庭国家过渡和转型的重要时期,他在任内所推行的行政和军事领域的改革对当时或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改革为在意大利和北非推行的总督制,它奠定了中期拜占庭的基本制度军区制的基础,这一改革措施表明莫里斯意识到自晚期罗马时代延续至早期拜占庭的政治遗产不符合时代需求,他必须推动国家向更能适应时代要求的方向转型。

总督制受到研究晚期罗马帝国、古代晚期与早期拜占庭的学者的重视,诸如布瑞、查尔斯·迪尔、瓦西列夫、奥斯特洛格斯基、康纳特、弗兰兹思卡等,他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布瑞在研究中首次注意到总督制建立的重要作用,考证了“总督”的内涵;^[1]奥斯特洛格斯基认为总督区是地方管理机构军事化的发展方向,为国家转型提供一种选择路径;^[2]查尔斯·迪尔细致探究了总督制的起源与运行,对北非与意大利总督区的运行环境进行对比

分析,认为军政合一管理效能的提升并不必然导致民众的认同与地方治理的有效性,在转型时期国家需要加强地方的文化建设;^[3]弗兰兹思卡的研究则着重分析总督制的起源与影响,认为总督制来源于罗马的政治传统、哥特的治理体系与地方实践的需要。^[4]本文以帝国治理模式的转型为主要切入点,探讨总督制的历史背景,考证该项制度是否为莫里斯所创建,并进一步勾勒总督区内的政治与经济生活图景。

一、查士丁尼时期的“军政合权”

为了理解莫里斯统治期间帝国行政管理的特征,首先要注意这一时期管理制度上的变化,即建立拉文纳和迦太基总督区。首先追溯一下自查士丁尼征服西部以来北非和意大利的情况,以便了解自查士丁尼时代以来帝国的管理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进而合理地评价其重要性。

早期拜占庭时期,国家在地方治理上实行严格的军政分权制,查士丁尼上台以后,对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所确定的军政严格分权的制度做了一些调整,使之适应各地区出现的新形势。他首先撤销了

收稿日期:2021-07-10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西摩卡塔《历史》研究”(2016FSS003);2021年度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20世纪英国的生态思想及其实践研究”(2021JD033);2014年度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塞奥非拉克特《历史》的翻译与研究”(社科博[2014]15号)

作者简介:苏聪(1983—),男,湖南株洲人,世界史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拜占庭史研究。

政区这一行政建制,以便中央集权管理。这一举措是为了应对边境地区蛮族威胁和加强皇权对地方的控制,对莫里斯皇帝在意大利和北非正式实行总督制奠定了基础。534年贝利撒留率领军队征服北非汪达尔王国,随后查士丁尼皇帝发布命令,确立帝国在该地区的行政管辖与治理体系,“新建非洲大政区,设立大政区总督,首任大政区总督为阿切劳斯”;贝利撒留则被任命为“东方大区将军”^{[5]10}。前者负责行政事务,后者负责保卫非洲大区的安全。非洲大区总督与东方大区和伊利里亚大区总督的地位和权力是一样的,负责所辖区域内的行政司法事务,其官邸坐落在迦太基最繁华的地区。非洲大区行政机构拥有约四百名行政人员,他们分属在不同的民事和军事部门,其下属官员大体可以分为行政司法事务官吏和财政官吏两大类,大政区总督制始于君士坦丁大帝的改革,他废止了戴克里先时期的四帝共治制度,在行省—政区管理结构之上,设立了大政区制度,大政区总督也由此成为皇权在地方上的最高代表。^{[5]13}据《查士丁尼法典》记载,查士丁尼不止一次告诫非洲大区总督要诚实地履行身上所肩负的重要责任,不要玩忽职守和贪婪奢靡。他认为,“如果罗马的官员能秉行公义,善待民众,那么上帝也会由此高兴,长时间在野蛮人残暴统治下的民众也终将得到自由”^{[5]15}。此外,《查士丁尼法典》还规定驻守非洲官员的薪酬待遇和升迁路径,明确了不同官员级别的薪酬待遇。

在军事建制方面,贝利撒留大区将军之下,组建了若干战区,战区军事首脑由边防长官担任,战区由若干兵团组成。军情传递的路径是这样的:兵团指挥将军情传递至边防长官,边防长官上报至大区将军。^{[6]263}普罗柯比在《建筑》中详细记载了军事设施的分布和修筑过程,他还要求军队加强军事训练,严防死守,边防士兵需要一边从事军事防御,一边耕作土地,将耕种的粮食用于日后战争的需要。从理论上说,边防军队无须依靠外来补给便可供应军队后勤。在加强军队纪律方面,也有诸多立法措施,诸如“边防军队的各级将士必须严守自己的领地,不得随意向外拓展”,“军事长官们必须让士兵们时刻保持备战的姿态,使他们经常处于严格的军事训练当中”,“军事长官们要经常清查士兵的人数,防止士兵逃亡或外出挣钱”等。^{[5]20}当贝利撒留向军队公布了这些查士丁尼指令之后,他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在他离开之后,很多军事长官齐聚大区将军官邸,他们希望改变发布的法令,制定新的条款,即政府有责任供养军队,向他们支付军费和提供后勤补给。

从以上指令中我们大致可以明晰查士丁尼治理非洲的初衷,他希望建立大政区总督与将军军政分权治理的体制,通过种种努力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荣光,使其臣民恢复古老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查士丁尼试图改变昔日国家对非洲的治理方式。然而,新设的非洲大区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与此同时,东方波斯战局僵持不下,贝利撒留被派往东方战场,此后摩尔人掀起日趋严重的反叛。查士丁尼于是派遣贝利撒留的部将所罗门前往非洲,担任非洲大区将军。^{[7]284}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查士丁尼不得不调整对非洲的治理政策,实行军政合权的行政体制。所罗门被赋予拥有大政区总督的职权,加上他此前拥有的军事权力,现在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是帝国境内首次实行军政合权,此举为提升行政与军事领域内的运行效率、迅速调动资源以应对摩尔人的反叛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央政府通过细化地方政府层级、削弱行省长官权力的方式来加强对意大利的统治。查士丁尼希望由民众选举出来的行省长官忠诚、可靠地履行自身职责,避免徇私枉法,使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地方得以顺利实施。查士丁尼希冀教会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可以发挥监督地方政府的责任,但由于国家形势的复杂,这类政策一直停留在商讨的层面。除了法律典籍,在其他的文献中仍然可以看到查士丁尼寻求为国家奉献的第三方或者个人的努力,旨在抑制地方政府权力,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威。

然而因为根据文献记载,自从584年以来,在意大利出现了“总督”,地方行政长官也不是由选举产生。568年,查士丁二世试图在意大利恢复选举官员的做法,但是他最终失败了,因为捐官佣金制度已经在整个罗马世界得到推行。^[8]执事保罗的作品中有一段关于纳尔西斯的记载,查士丁二世统治时期,索菲亚皇后派人给纳尔西斯送去一根金色的纺纱杆,暗示年迈的纳尔西斯不适合继续担任行政职务,应该告老还乡,纺纱种地。据说纳尔西斯果真决定告老还乡,他于568年从意大利大区总督的职位上退下来,回到罗马,卒于573年,据此推算,他统治意大利长达十多年。^[9]纳尔西斯这个大政区总督在意大利行使的是总督之实,但缺乏“*exarch*”这样一个名称。因此,帝国在非洲和意大利实行的大政区总督主导的军政合权体制为莫里斯时期推行的总督制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总督区的建立与运行

第一次出现“拉文纳总督”字眼的文献记载是在584年罗马大主教贝拉吉乌斯二世的一封书信

中,而“迦太基总督”则出现在 591 年的历史文献中。关于总督制由哪位皇帝创建,学术界已基本达成一致,认为总督制由 6 世纪末期的莫里斯皇帝分别在拉文纳和迦太基创建。总督制的核心是领有兵权的总督统领地方行政官员,使地方官服从总督的权力,行政官员必须为军队的行动提供一切便利,以便在战争时期减少指令传达环节、提供行政运行效率。相比查士丁尼时期的军政合权制,其区别在于总督制是军事权与行政权分置,由总督与行政长官分别担任,然职位上略有高低之分,由总督来统领管辖地方行政事务,而军政合权则是地方军政职责与权力合在大政区总督一人身上,由大政区总督行使地方军政管辖权力。

记录总督制的主要文献是《格里高利书信集》和执事保罗《伦巴德人的历史》,前者记载了罗马大主教格里高利与拜占庭莫里斯皇帝的书信交往,双方谈论在意大利和北非新近实施的总督制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如何界定总督的权力范围、总督是否对教会具有管辖权以及总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等。后者在记述伦巴德人对意大利北部威胁的同时,也关注到了拉文纳总督区内的行政治理和社会生活,然而着墨并不多。除此以外,塞奥非拉克特·西摩卡塔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该文献主要记述莫里斯时期国家的军政要务,理应对莫里斯创建的总督制有所涉及,然而,在这部作品中却没有留下“总督”的蛛丝马迹。《历史》中记述了伊拉克略皇帝的父亲在军事上的丰功伟绩,后被擢升为迦太基的军事长官,但他的头衔没有被冠以“总督”。然而很多史书上都记录了 610 年迦太基“总督”小伊拉克略从北非起事,一举推翻福卡斯的统治,建立伊拉克略王朝。

莫里斯皇帝于 584 年和 591 年分别创建拉文纳和迦太基总督区,它的兴起不仅根植于晚期罗马帝国地方政治治理的传统,同时也结合东哥特王国与汪达尔王国逐渐形成的“蛮族”治理军事化的因素,在伦巴德人和摩尔人等“蛮族”侵袭浪潮肆虐的情况下,帝国首先在意大利和北非实行军政合一的总督制改革。莫里斯时期建立的总督区是建立在此前意大利所实行的的大政区总督制的基础上,自晚期罗马帝国直至哥特人统治,意大利始终实行大政区总督制。然而,莫里斯时期总督的权力与职责范围类似于一种战时军事体制。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行政司法权与军事权的合并,然而这种合并并不意味着直接取缔行政官员,行政官员仍与军事管理者同时存在,只是在军事总督下工作,后来,行政官员才似

乎被军事官员所取代。^{[6]272}

而东哥特首领塞奥多里克被拜占庭中央政府任命为“高级军事长官”,后来又从元老院获得“贵族”头衔,拜占庭皇帝在此后不久双方的通信往来中称呼东哥特首领为“王”。显然,东哥特是拜占庭的附属政权。自此以后,东哥特“王”具有军政合一的权力,对拜占庭的依附仅是形式上的,东哥特在意大利的统治自成体系,其政治和经济中心在意大利中北部,对南部拉文纳地区统治薄弱,拉文纳与拜占庭的联系趋于紧密。自查士丁尼统治以来,哥特人则试图与君士坦丁堡恢复先前的密切关系,国王托提拉希冀凭借其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功使他有资本与拜占庭皇帝达成协议,使皇帝同意四处飘散的哥特人余部定居在意大利,^{[7]334}但是他的计划最终落空了,查士丁尼在新颁布的法令中规定,从塞奥达哈德以后的东哥特继位者所制定的法律一概无效。在查士丁尼皇帝看来,“从维蒂吉斯到德亚的东哥特王国都是暴君统治,是未经拜占庭授权的非法统治”^{[5]101}。

拜占庭帝国征服意大利之后,他们发现此前东哥特人在拉文纳的影响较小,而罗马帝国的大一统观念已然深入人心。于是查士丁尼决定将帝国在意大利的行政中心建立在拉文纳。行政长官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皇帝任命,他甚至可以不是意大利人,但是由皇帝任命的拉文纳行政长官与中央的关系并不比哥特国王密切多少。自 568 年纳尔西斯征服东哥特以来,拜占庭人优先考虑的是如何稳定意大利政局与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当时伦巴德人盘踞意大利北部地区,对帝国新收复地区形成威慑之势,至莫里斯时期,伦巴德人的威胁愈发严重。此外,罗马教会的受困及寻求中央政府的帮助和法兰克人要求结盟等因素共同促使莫里斯皇帝在拉文纳首先推行总督制。

莫里斯在意大利推行军政权力合一的总督制,继承了戴克里先时代以来的帝国治理传统,在四帝共治基础上形成的的大政区总督制一直是地方行政治理的有效手段,莫里斯借鉴了大政区总督制的合理要素,结合哥特人军事专制化统治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调整。6 世纪末期形成的总督制吸取了这一经验教训,使总督不仅具有贵族头衔,而且相比此前的大政区总督,其地位与权力有所提升,此举旨在应对复杂的军事局面,以利于总督调集一切资源来投入作战。^[10]然而,实行总督制也有不利的一面,位高权重的总督有时候会制定符合自身或地区利益的政策,而这与国家的整体利益不符,总督作为皇帝权力在地方的代表,在他的辖区行使皇帝所钟爱的皇帝

教权主义原则,这一原则表现在诸如作为最高权威对总督区内的宗教事务进行干预或仲裁。^{[6]273}

在非洲,迦太基总督区于591年被正式确立,改变了以往大政区的治理方式,将军政权力合于总督一人身上。首任总督为潘塔利奥,其建立原则与拉文纳相同,也得到了拉文纳总督那样的无限权力,总督被赋予皇家的荣耀。坐落于迦太基的总督宫殿被视为是神圣的,称作“圣宫”。军事事务、行政统治、司法、财政与宗教事务都处于总督的全面控制下。^[11]在非洲的总督区,由于其面对侵扰的摩尔人实力不甚雄厚,拜占庭军队能较好地保卫领土的安全,且总督们是由莫里斯慎重选任的,他们在治理这块土地时表现得经验丰富和充满活力,他们成功地抵抗了当地土著的进攻,保护了这片土地。

在政治上,总督区内实行一定的“自治”,总督在所辖区域内拥有军事、行政、司法与宗教管辖权,然而,中央政策在总督区的实行仍是持续和高效的,这表明莫里斯时期延续了查士丁尼所确立的皇权“至尊权”,尽管允许总督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但从总体上却不能与中央政府相背离。

晚期罗马时期,由于秉承圣彼得所建立教会的传统,罗马教会的地位一直较高,然而随着拜占庭帝国确立以及帝国的政治重心转移,代表中央权威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地位逐渐提升,尤其查士丁尼确立皇权在与教会的关系上所享有的“至尊权”,这一方面保障了中央权力的集中,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代表中央宗教权威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权力日益凸显,在五大教区中,君士坦丁堡教会俨然与罗马教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至莫里斯时期,双方围绕“普世教权”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辩。罗马大主教格里高列一世反对君士坦丁堡牧首采用“普世教会”的称呼,在一封致莫里斯的信中,格里高列指责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四世太骄傲自大,控告后者企图用“普世教会”的称呼来凌驾于皇权之上。当然,格里高利没有赢得莫里斯的支持,为此他曾一度停止向君士坦丁堡派驻使节。当602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反对莫里斯的起义时,格里高列给新皇帝写了一封颂词,希望获得福卡斯的支持。福卡斯显然十分高兴,因为随后他就禁止君士坦丁堡牧首有“普世的”头衔,并宣布罗马主教为所有教会的领袖。在福卡斯统治期间,与罗马的关系以他对罗马教宗的服从为前提,双方关系维持着友好、和平的状态。为了纪念这段友好关系,拉文纳总督在罗马议会广场竖立了一个石柱,上面镌刻有颂扬福卡斯的铭文。^{[6]271}显然,在宗教问题上,拉文纳总督与罗马大主教的立场

保持一致,即都是为了维护帝国西部的宗教和政治利益。

三、总督制的影响

莫里斯时期推行总督制改革是顺应当时国家面临的内部和外部情势的必然举措,其改革的核心要义在于加强地方军政要员权力的集中,由过去的“军政分权”到逐渐的“军政合一”,从长期来看,这种集中权力势必会造成地方分离势力的壮大。然而从当时的国家层面来看,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外来侵袭来临时如何迅速、集中地调集一切资源来应对,以及如何通过赋予军事将领更大的权力来灵活、机动发挥战争事务主导权。莫里斯皇帝深知军事将领权力加大的利弊得失,在充分权衡利弊之后,他通过派遣亲信执掌帅印、加强督查等方式来克服这一制度的弊端,使这一制度的良好效应逐渐显示出来,国家也逐渐从危机中走出来,进入相对安定的局面。

总督区的建立,反映了拜占庭行政体制的改革日益朝着军事化的道路发展。总督制的实行,把地方行政官员的权力置于军事指挥官之下,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应付紧急情况战斗力。610年,正是来自北非总督区的伊拉克略,应元老院要求从地中海西部进入君士坦丁堡,镇压了福卡斯军人暴动政权,建立了伊拉克略王朝。此后不久,普及全帝国的军区制改革就开始了。波斯战争之后,为了对阿拉伯人、斯拉夫人的进攻予以有力反击,拜占庭先后在小亚细亚、西亚和巴尔干地区建立了军区制,将这些地区建成由军事首领统帅的大区,实现了帝国的军事化。在各军区内的驻军,不仅是保卫国家的战士,也是建设国家的劳动者。政府将他们驻扎区内的土地划分为一块块的份地,分给该军团的士兵们,将这些士兵变成军事小土地所有者。这一制度的形成和推行是伊拉克略王朝时期拜占庭国家进行的最重要改革,为以后帝国数百年的中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因此,总督制作为军区制的先导和基础,为拜占庭国家从早期向中期的转型与发展确立了方向,奠定了基调。

四、结语

拜占庭帝国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是与皇帝权力专制独裁化发展过程相一致的,这类改革试图为保卫帝国和管理内政提供多种手段,同时还力图将各种各样不同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为此目的,就要建立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以便能够控制帝国的所有细枝末节。拜占庭政治体制的核心是皇权,任何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更有效地贯彻皇帝的意旨。拜占庭政府体制的持久原则首先由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所奠定下来,在庞大的帝国内划分为大政区、政区、行省等三级行政序列。这三级序列后经查士丁尼改革后最大的变化在于在大政区一级实行军政合权,然而军政合权制并不能完全解决国家的边患危机,继而莫里斯在军政合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总督制,伊拉克略继而在总督制的基础上略有调整,在帝国更广大区域实行军区制。促使这一系列行政体制变革的关键因素是帝国所面临的持久的、此前从未缓解的外部压力,它迫使国家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以便持续保持对帝国全部资源的利用,并在边疆地区通过“放权”的方式使地方长官随时调动一切资源来应对外部战争压力。这一举措缓解了帝国的外部压力,使国内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安定的局面,有利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然而,无论是总督制抑或军区制,其核心要素在于军政合权,倘若国家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地方的“总督”或“将军”势必会逐渐壮大自身的力量,与中央政府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到马其顿王朝后期,军区制的消极影响逐渐显露出来,中央政府开始制定保护小农、打击大地主的政策,此后的拜占庭外来威胁的程度有所减弱,但内部大地主、大军事官僚的势力日趋上升,他们与中央官僚围绕最高权力的博弈成为中晚期拜占庭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 Bury J B.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

dus to Irene (A. D. 395—800) [M]. London: Cosimo Classics, 2008:20.

- [2]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 拜占庭帝国 [M]. 陈志强, 译.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59.
- [3] Charles Diehl. Etudes sur l'administration Byzantine dans l'exarchat de Ravenne (568—751) [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198.
- [4] Shlosser Franziska. Military and Civi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Emperor Maurice (582—602): A Reassessment [D].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1980:33.
- [5] Codex Justinianus. Corpus Iuris Civilis II [M]. Berlin: P. Kruger, 1915.
- [6] A. A. 瓦西列夫. 拜占庭帝国史 [M]. 徐家玲,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7] Procopius of Caesarea. History of the Wars [M]. trans. by Dewing H B.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8] Theophylact Simocatta. History [M]. ed. Michael and Mary Whitb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123.
- [9] 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M]. Leipzig: Reclam Verlag, 1878:22.
- [10] Jones A H M.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 - 602 [M]. Washington D. C.: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341 - 344.
- [11] Diehl C. Byzantium: Greatness and Decline [M]. trans. by Naomi Walford,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7:455.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Way of Transformati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Influence of Maurice Governor System

SU Cong, SHI Xu

(History and Political Colleg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ina)

Abstract: Maurice carried on the political reform of Byzantine in the early period, especially drawing lessons from Justinian's "combination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combined with the factors of the militarization of "barbarian" governance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Orogothic Kingdom and the Vandal Kingdom, and finally implemented the vicarage system reform in North Africa and Ital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in the viceroy area was relatively active, which was politically adaptable to the unification polic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religion, it witnessed the game between the Roman Church and the Church of Constantinople in this area. The viceroy system effectively alleviated the external crisis of the empire, but foreshadowed the internal separation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local power.

Key words: Byzantine; transformation; the governor system

战争·危机·自救: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山西国货运动(1931—1936)

刘越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1931年后,徐永昌成为山西省主席,开始其在山西长达六年的经济建设活动。在民族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下,1930年代中央政府与山西省政府达成合作与共识,山西省进行政治动员与思想动员以推行国货,希望借发展国货一事助推经济复兴,进而为抵御日本入侵积攒国力。围绕山西发展国货一事,不仅是山西本省在危机之下进行经济建设与抵御日本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展现出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化与统一。

关键词:徐永昌;山西;《徐永昌日记》;国货运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13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72-05

一、问题提出与主要资料

自清末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发生多次国货运动的浪潮。西方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促使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愈发觉醒,使用国货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当时的中国洋货盛行,国货几无生存空间,这不仅使国内企业生存困难,更使得大量资金流向国外,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近十几年来,史学界针对1920—1930年代国货运动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谓颇丰,近来更有以新文化史角度诠释民国时期上海的百货商场与民众的消费文化。然而,学界对于国货运动之研究,大多局限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对于内陆省份研究却明显不足,尤其是一直以晋商著名的山西省爆发的国货运动更是少有关注。1930年代,随着日本逐渐对华北各省进行蚕食,处在抗日前线的山西省时刻有被侵略的危险,拥有强烈国家意识的军人徐永昌成为山西省主席,国货运动在山西开始兴起。山西省的国货运动为发展山西本省经济做出重要贡献,也为应对日本侵略提供了一定物资与经济保障。基于此,本文以1930年代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山西省国货运动为研究对象,以时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对国

货运动的态度及措施为主要内容,主要基于完整保留下的《徐永昌日记》,辅之以台湾“国史馆”馆藏档案、徐永昌及其同僚的回忆录、函电、政府公报与社会报刊,以“国货运动”为主线,重点论述在1930年代的山西,如何在徐永昌的领导下推行国货运动,并展现其主要贡献,以期进一步深化有关国货运动的研究。

二、内外交困的复杂局势与国内应对

1927年的“五三惨案”发生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逐渐超过西方各国,成为国民政府严加防范的对象^[1],同年“田中奏折”提出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胀。在日本对华采取猛烈进攻态势之下,全国范围内的国防与经济发展计划由此展开,国家自救运动正式启动,而发展国货与抵制洋货(尤其是日货)成为增强实力以御外侮的重要途径。

充足的资金与先进的技术是保证商品质量与销量的关键,与西方企业相比,中国民族企业无论在资金还是技术方面都无法与西方企业匹敌。“火柴大王”刘鸿生曾经对上海的经济状况发出感慨:“上海为亚东国际贸易之唯一市场……数十年来,洋货输入,金钱流出,至不可以数计,吾国贫弱之源,实在于

收稿日期:2021-06-15

作者简介:刘越(1998—),男,山东潍坊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

此。”^{[2]10}资产丰厚的实业家都发出如此感叹,其他小企业的发展境遇也就可想而知。

面对上述所提及的种种问题,以建立“现代国家”为目标的国民政府则无法再对风起云涌的国货运动熟视无睹。1928年6月6日,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薛笃弼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提出使用国货的倡议。例如在中央党部,凡党部人员均应积极宣传国货,首先从自己的家人亲朋开始,劝说他们少用洋货而多用国货。中央党部还要组织各级党部分别赶赴城镇乡村当中,亲身宣传使用国货的意义与价值所在^①。1928年7月13日,提倡国货议案由薛笃弼提交后得以通过,随后下发国民政府各行政部门予以执行^②。

国货运动是由民众发起,而与此有着密切利益相关的民族企业,相较于政府来说则更为积极。1933年,上海中国国货公司成立,方液仙担任公司总经理,他在公司章程中对提倡国货的背景做出了说明,“乃自海通以还,外货输入,与日俱进。长此以往,民生安得不弊,国势安得不蹙”,要想从根本上推动国货发展,只能“端赖积极生产,努力振兴国货,庶足为根本之解决”,为了方便人们挑选质量上乘的国货,故成立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待“他日公司营业蒸蒸日上,实为国货前途之光荣”^{[3]19}。

综上所述可得,伴随着日军与洋货的侵入,中国在政治、经济与外交方面接连遭遇巨大困境。面对此种复杂局势,政府与民间均将推行国货运动视作一项重要举措,希望借此发展民族工商业,借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但以上所述均以中国为整体的叙述对象,下文以山西为例,讨论其推行国货的种种措施。

三、徐永昌与山西国货运动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等反蒋势力在北京“另立中央”,与中央政府成南北对立之势。9月18日张学良率东北军南下,目标直指平津一带,并要求晋军于津浦一线的部队“迅速撤退”^③。在双方夹击之下晋军很快被击败,而阎锡山也被迫离开山西,山西省内部出现暂时性的“权力真空”。尽管出身晋系的商震早在1929年便出任山西省主席,其能力较强并得蒋介石赏识^④,但此时的商震却并未得到阎锡山与山西本省士绅的认可。1931年8月11日,真正被视作是阎锡山接班人的徐永昌被任命为山西省代理主席,10月3日正式上任。

严重的民族危机成为徐永昌推动国货发展的出发点。1931年9月19日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真国家存亡之关键,奉天事件乃唤醒吾人迷梦之

事件也。”^{[4]466}在徐永昌看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根源是中国国力太弱,要想改变中国“国势衰危”的状况,具体来说可以分成两条途径,一为治标,即“强制国人用国货,以诱导其爱国心”,二为治本,即“改善教育与明是非”^{[5]1}。

山西在明清时期是闻名天下的商业大省,但在1930年代,山西经济却是破败不堪。徐永昌曾在晚年所著回忆录中如此记载:“我常想纸烟、煤油、洋布、洋针、洋线、洋洗脸盆、洋糖等,将农人、工人以及小商人以血汗换得之钱,一一吸吮而去……使本国劳动者无工可做,企业家无业可兴,这便是我们国家的直接致穷之道。”^{[6]226}

山西经济的破败带来了一连串的问题,工商业者破产或失业,农民则有货卖不出,生计没有着落。徐永昌看到了问题的根本,即工农商业的破败不但使得经济面临崩溃,而且会创造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失业者众,社会如何能安”^{[4]484},如果社会充满了生计无着落的失业者,不待日军前来攻打,山西便早已崩溃。要想改变局面,振兴国货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上文所言,是否发展国货决定着山西是否安定,而山西在徐永昌心中的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其安定与否关乎全国。他认为山西对内可以“控制黄河流域各省”,对外可以成为“北方之一核堡也”^{[6]229}。山西一省的安危关乎整个华北地区是否稳定,“先使山西安定,然后才谈到北方安定之根据点作用”^{[4]521}。此后徐永昌更是将此观点进一步延伸,“山西不唯是华北之核堡,亦且为大江以北之要塞”^{[5]359},要想实现华北地区乃至整个长江以北地区的稳定,抵御日军南下带来的强大军事压力,就要先发展山西。作为山西省主席,相较于之前的阎锡山只关注山西一省,徐永昌则立足山西,关注全国。

四、发展国货:从纸面政策到切实推行

(一)政治动员

改革是触动现有利益群体的事情,想要达到效果,政府必须从自身做起。1931年11月,徐永昌上任一月之后即下令山西省内的“凡属公务人员,对于服食等日用品除无国货代替者外,其余皆需选用国货……违者以违背公令论”^{[4]477}。但凡是国货,“只要有,虽不好,也得用”^{[6]226}。1933年,山西省政府实业厅服用国货委员会成立,该机构以“绝对服用国货为宗旨”,其工作之一就是要“宣传劝导服用国货”。如果加入该机构,其成员“本良心之主张均有使用国货之义务”^{[7]234},若有违背,则由大会公议取消其会员资格。

此后徐永昌将使用国货的命令扩展到其他部门。1932年,他规定商会“民国二十一年以后,山西不准再有日货”,对报馆要求其用纸一律“改用国产,纸价不必计”^{[4]479}。对此,徐永昌的老部下赵正楷晚年仍记忆犹新,“当时全省公教机关,除非无国货可资代替之必需品外,倘有采用外货者一律严厉处分”,即使是省政府举办宴席也“绝不用鱼翅、海参等外来产品”^{[8]146}。政府举办的宴席上最珍贵的一道菜仅是一道由被称为“猴头”的当地土特产做成的菜而已。

面对愈发严峻的民族危机,徐永昌认为时人普遍存在一种叫作“自己不努力,只是嫉妒别人”^{[9]174}的病,并认为要想治疗这种病,唯有“自责”二字。对于如何发展国货,他一贯主张从内部着手,在发布禁止政府公务人员使用洋货之后,他将此项命令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山西省普通公民身上。他认为“国事衰危,非过激思想所能救,余以为治标莫如强制国人用国货,以诱导其爱国心,先强制公务人员服用国货,并提倡一般人民用国货”^{[5]1}。从强制政府内部使用国货到提倡一般民众使用国货,在发展国货一事上,山西省的政府动员能力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

(二) 禁修公路

按正常逻辑判断,修整公路与发展交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徐永昌却不以为然,对于修建公路一直持否定态度。徐永昌认为修公路百害而无一利,持如此观点的原因:其一,公路和汽车密切相关,但“汽车、汽油皆是外国物”,而其“只能运载奢侈品”,多修公路的结果“即无异为欧美奢侈品及汽车汽油开辟市场”^{[6]235}。其二,公路的修建会带动汽车数量的增加,而新型交通工具的发展又会损害依靠传统交通工具生存的人的利益。1933春,关中及河东地区已遭遇数年干旱,其“灾情之重为民国以来所仅见”,各地的物资纷纷送往河东及关中地区进行救灾,但徐永昌却认为“汽车运价太贵,尚不如人力车之合算”^{[5]6}。

徐永昌反对修公路的原因非常明确,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及此事,1934年徐永昌曾与何应钦有过一番对话,谈话时曾提到国货与公路问题,他在日记中抱怨道:“我前年在南京与何敬之谈修汽车路之害,何漫不经意,且云中国人多地大,不比外国有几万失业者,即大不了,中国此等问题不算事也。余颇惊其颞颥,大意。”^{[5]166}与相对冷漠的何应钦相比,徐永昌反对修建公路的观点完全站在失业者等社会边缘人群的立场之上,后来他甚至产生过取缔修建公路的想法,在其数次日记中他都将“公路之取缔”^{[5]290}作

为政府应办之事。

(三) 思想动员

教育是塑造公民品格与思想最为根本的方式,徐永昌在大力提倡政府与民众使用国货的同时,下令将使用国货的内容添入教科书内。自1934年8月起,徐永昌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教育与使用国货之间的关系,“不服用国货国必亡,不改革教育种必灭”^{[5]150}，“消极的救国是服用国货,积极的救国是要改革教育”^{[5]370}。他要求在承担着“国民教育材料”任务的中小学教材中要编入“国民爱国,第一必须服用国货”^{[5]81}的内容,并进一步要求在国语课本中的第五到第八册的前三课内容中加入“爱国”“服用国货”和“爱人”。^{[5]288}而且教科书也得“先用国纸”^{[5]143}来印刷。这样既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了改革,使其内容充满着“爱国”思想,又将发展国货的思想融入其中,可谓一石二鸟。

在改革教科书内容的过程中,“国货”作为一个符号黏附到可以塑造国民记忆的教科书上,徐永昌认为,“我以为最好于每一教科书上,开首即订此一页,展卷可见,即养成儿童用国货之道德观念也”^{[9]189}。教育的实施主体为教员,徐永昌为此还专门召开教员暑期培训班,培训的重要内容便是训练教员要使用国货,尤其是“应将购用国货之利,及不能不购用之理由,普遍宣传”^{[9]191},使其成为学生的固有道德。

在既往研究中,已有学者对国民政府所采取的修建中山陵、举办总理纪念周、发起新生活运动等行为所着力营造的神圣公共空间与各种仪式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因素进行探讨^⑤。按此来看,徐永昌所采取的措施也在努力营造一种教育领域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内经过“爱国培训”的教职员通过使用经过改良过的“国纸”教科书将包含有“爱国、服用国货、不吸烟、不打牌”^{[5]258}的课文内容传授给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学生接受“爱国”和“爱国货”教育的同时,又在受教育过程中主动地完成了自我价值观的再塑造。

在学校课堂之外,社会同样是引导学生使用国货的重要场所。当时有报纸记载:“学生服用国货,五月五日在海子边自省堂举行第一次宣誓典礼……同时各校童子军出发街市服务,劝导行人,一律服用土货国货。”^{[10]11}在典礼上,演讲者向学生们传授中国之所以衰弱都是由于“中国人不用中国货”,如果不愿意亡国,“就得决心服用土货和国货”。进而要求学生不但要自己用国货,更要推动亲朋好友都使用国货,若是不使用国货便是“不爱国的国民,不配做我的

父母兄弟”，而若是使用洋货，“便是自杀”^{[11]3}。

学生是容易受演讲所鼓动的，演讲者通过将“爱国”与“使用国货”联系起来对学生灌输此概念，号召学生与不用国货的行为作斗争，利用语言构建起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场。正如美国学者葛凯对国货运动的阐述一样，民族危机使得政府有意识地通过国货运动将消费民族化，并加上了民族主义的视觉想象^{[12]27}，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如果不使用国货不但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甚至会被学校开除。

（四）与新生活运动的互动

随着山西省国货运动的发展，由中央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与之相融合，许多县城内新运会将发展国货作为推行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工作。例如孟县新运会认为使用国货是“推行新运至必行工作”，偏关县新运会直接以“提倡服用国货及推行新生活，为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要图”^{[13]43-44}为宗旨。一些地区的新运会不但要求成员“所有新旧外货衣服，一律不准服用”，还派遣成员赶赴各机关和学校成立新生活服务团，“期由城内各机关学校团体，以身作则，再推及民众云”^{[14]35}。新生活运动与国货运动的巧妙结合同样表明，山西地方推行的国货运动与中央所号令的新生活运动融为一体，前者成为后者所进行的工作内容之一，这也可以说是国家与地方合作的范式。

1930年代的山西国货运动的确取得了一定效果。通过政府的强制性政令与舆论性宣传，服用国货宣誓礼与兴办国货年等活动在山西省各县纷纷展开，且参与群体不断扩大，“除全市小学校师生……各机关团体代表二百余人，军警宪士兵军乐队等各一排，亦均出席参加”^{[15]1}。反映出使用国货在山西渐成流行趋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山西省各县纷纷建立起了国货或土货商场，销量也十分可观。在抵制洋货方面，山西的西北火柴厂和西北洋灰场所生产的产品均广受好评，在全国范围内销量都非常高^{[16]684-685}，而就山西省洋货输入的数量来看，1935年山西省的洋货输入价值人均均为3.387元，较20年代下降了0.613元^{[17]19}。从数据上看，徐永昌所采取的发展国货的种种举措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间段内的国货运动已是一项国家提倡、全民参与的国家性运动，在发展国货一事上，可以说是中央与山西、国家与地方的通力合作。

五、余论

根据曹树基研究民国时期山西鼠疫一文可知，在帝制社会当中，政府几乎不承担公共卫生的职能，即政府对社会实行有限管理，诸如公共卫生等现代

政府工作的重点问题并不在其考虑范围内。^{[18]178-190}将曹文观点进行延伸可得，即使是在较晚清已有进步的民国时期，1920年代的山西政府也并未对发展国货一事进行过多关注，不是政府在发展国货一事上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是商界。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及徐永昌成为省主席之后，山西省政府才给予使用国货一事较多关注。可以说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成为山西省政府转变的一个标志，此后的发展国货运动也成为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的事件。

1930年代的民族危机与经济危机是全国性的，这就决定了发展国货一事不再只是含义广泛的“国家”的事情，而是具体到全国各省都应当关注的事情。徐永昌曾于1932年10月南下入京，在拜见诸多中央军政要员与蒋介石夫妇时，他多次提及发展国货一事，期望中央能予以支持。徐永昌意识到单凭山西一省的力量是不够的，要想“创辟以国货抵洋货之路，当以广东作一机车以引动各省”，原因是广东省的“技术财力与一般工商之知识皆优于他省”^{[5]531}。徐永昌并未将山西视作“独立”发展的省份，他着眼于全国，希望全国各地共同振兴国货，在谁也无法逃脱的民族危机面前，唯有共同迎接挑战。

危机之下，国家希望借发展国货以实现自强之目的。1936年3月，蒋介石电令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要求“行政院各部会以及市政府自股长、科长以上人员，皆须着中山装制服……夏季用黄色斜纹布，冬季用里呢一律皆用国货为要”^⑥。4月，蒋介石再度下令，要求“军政各机关以后印刷品纸张须全用国货……以后如有其机关再购用上等洋纸者，应由其主管者负责受处”^⑦。由此可见，山西与中央两者之间存在互动与调适。

洋货盛行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及日军入侵带来的民族危机构成了对国家政权稳定与安定的威胁，正如徐永昌所说，唯有“备战、外交、自强三事”^{[6]352}才能救中国，使用国货也就成了一件保卫国家与挽救经济危机的方式与手段。此后政府愈发关注使用国货之事，对社会各项事务的介入愈发明显，权力愈发下沉，在中国由传统帝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有实现自强并增加政府对地方社会秩序与民众行为习惯的控制与整合的意图。

中国近代产生的诸多问题，在传统时代多被政府所忽略。随着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近代中国在构建现代化政府的同时也发现了诸多之前忽视的问题。发展国货一事体现的是中国政府权力不断下沉、民众生活被包裹进国家机器当中的过程，而这

个过程至今仍未结束。

注释:

- 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函国民政府为薛笃弼提出提倡国货办法建议书,1928年6月9日,国民政府001-110010-00036-001,台湾“国史馆”藏。
- ②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咨国民政府为提倡国货请分令各部院会遵办,1928年7月20日,国民政府001-110010-00036-008,台湾“国史馆藏”。
- ③阎锡山电复徐永昌接傅电张学良已飭部开天津并望我津浦军撤退,1930年9月21日,阎锡山史料116-010101-0090-292,台湾“国史馆”藏。
- ④1931年1月,蒋介石曾向张学良发电称:“如无相当之人,不如暂留商震为主席较妥也。”《蒋中正电张学良晋省委中无成见如无相当之人不如留商震为主席较妥》,1931年1月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00009-069,台湾“国史馆”藏。
- ⑤详情见李恭忠. 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陈蕴茜. 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⑥蒋中正电翁文灏行政院各部会及市政府股科长以上人员须着中山装制服并皆用国货,1936年3月2日,002-080200-00419-006,台湾“国史馆”藏。
- ⑦蒋中正电行政院军事委员会通令军政各机关印刷品纸张须用国货如再购用上等洋纸应由其主管官负责受处,1936年4月1日,002-080200-00420-003,台湾“国史馆”藏。

参考文献:

- [1]罗志田. 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J]. 历史研究, 1996(2).
- [2]刘鸿生. 上海之国货事业[J]. 上海市之国货事业, 1933(1).

- [3]柯定鑫. 中国国货公司的发展与成立[J]. 上海市之国货事业, 1933(1).
- [4]徐永昌. 徐永昌日记:第2册[M].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 [5]徐永昌. 徐永昌日记:第3册[M].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 [6]徐永昌. 徐永昌回忆录[M].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14.
- [7]山西省政府实业厅服用国货委员会组织简章[J]. 山西实业公报, 1933(13).
- [8]赵正楷口述, 陈存恭访问, 陈美惠记述. 赵正楷先生访问纪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3.
- [9]赵正楷, 陈存恭. 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
- [10]太原学生宣誓服用国货宣誓礼[J]. 公教学校, 1935(10).
- [11]学生服用国货宣誓典礼大会告小学生书[J]. 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 1935(14).
- [12]葛凯著. 消费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M]. 黄振萍,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13]偏关小学生讲演服用国货及新生活运动[J]. 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 1935(18).
- [14]吉县倡用国货并成立新生活服务团[J]. 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 1935(19).
- [15]太原市小学生服用土货国货宣誓典礼[J]. 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 1935(19).
- [16]刘建生, 刘鹏生. 山西近代经济史[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5.
- [17]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J]. 山西建设, 1935(1).
- [18]曹树基. 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行为中心[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War · Crisis · Self – help: Shanxi National Goods Movement Befor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1931—1936)

LIU Yu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In 1931, Xu Yongchang was inaugurated the governor of Shanxi, and he launched a series of projects to develop the economy in the next six years. The national and Shanxi governments reached a consensus under the national and economical crises. Shanxi government mobilized political powers to propagandize the public to buy Chinese goods, aiming to revive the economy and defend Japanese invasion. National Goods Movement initiated by Xu Yongchang in Shanxi was not just a local affair to resist Japanese invasion, but also represented the split and unity between the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Key words: Xu Yongchang; Shanxi; Xu Yongchang diary; national goods movement

新媒界生态环境下公务员媒体素质与提升探析

冯 歌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5)

摘要:公务员媒体素质关系国家治理能力、政府形象、官民互信认同等诸多方面,基于新媒界生态环境特点与其对行政管理活动的影响,对公务员的媒体素质及构成进行探析,并提出公务员媒体素质提升路径,即:优化权力格局,加强身份自律;转变媒介理念,善待善用善管媒体;遵循传播规律,改进言说方式。

关键词:媒界生态;新特点;公务员;媒体素质;提升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14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77-05

一、问题提出

当今时代,随着传媒业的蓬勃发展,媒域风云际会,媒体对个人生活和社会公共领域,乃至政府执政环境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渐成为重要的治国理政、引导舆情、凝聚共识的助手。公务员承担社会公共管理的责任,与媒体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其言行也常被置于聚光灯下,成为媒体监督和全民审视的重要对象。当前,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社会压力和竞争加剧,各阶层利益诉求复杂多样,大众心态和社会情绪发生明显变化,政府需要应对的问题和矛盾更加复杂,治理“风险”的难度和挑战增大,加之传播手段和机制发生巨大变化,人人都是自媒体,舆论都是以分秒为单位进行即时性传播,公务员面对媒体时的表达不当或应对舆情突发事件时的失范行为极易扩散,再加之媒体传播过程中的放大效应和“破窗效应”,一些本来不大的媒体事件可能失控发展成为社会围观的舆情风暴。这些舆情事件中部分是因为某些公务员政治素质不过硬曝出“雷语”引起民愤,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当事官员言语不当的表达问题而引起民众误解或被居心叵测“恶解”而造成的次生灾难。一些公务员由此而陷入对媒体的恐惧,以“缄口不言”、避而远“媒”消极应对,如2019

年就曝出山东省台儿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王某面对媒体采访表演哑语的荒唐闹剧,虽然当事人已被停职检查,但此事也再次引起公务员“媒商”和媒介素养的舆情。很明显,乱说和不说、敌视和逃避都不是与媒体打交道的正确之道,唯有善待善说善用善管才能保障政府媒体执政的效能。公务员媒体素质关系国家治理能力、政府形象、官民互信认同等诸多方面,如何应对当前媒界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基于政府治理能力对公务员媒体素质的新要求,明晰公务员媒体素质构成体系并大力推进公务员媒体素质建设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二、新媒界生态环境特点

(一)媒介技术:数字化、交互性

作为数字化网络技术普遍应用的产物,数字技术毋庸置疑是新媒介在技术层面的最主要特征。从传播内容到技术,再到管理,都实现了数字化,数字化使巨量信息的存储、传播、搜索、共享成为可能。网络是新媒介在技术层面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网络改变了以往的单向传播的信息流动方式,多点对多点传播使交互性强成为新媒体生态的重要特征。加之手机、电脑、DV、CV的普及,使得普通大众都能成

收稿日期:2021-04-28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舆情治理视阈下政府媒体语言失范及对策研究”(2018-ZZJH-591);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语言舆情视角下政府语言社会认同研究”(2017BY018)

作者简介:冯歌(1974—),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媒体素质。

为社会事件的记录者、传播者和参与者,不仅促成传播活动的生成,而且还影响了媒体事件的发展方向,拓宽了对话渠道,最终完成传播活动,这也就意味着普通公众的话语权开始变得有力。

(二) 传播内容:多元化、碰撞性

新媒体时代,传播内容呈现高度多元化的特点。媒体不仅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提供展示平台,草根文化也聚集呈现。由于公众的差异性和对新媒体诉求的多样化,新媒体成为信息集散、设置议题参与社会管理、服务生活、娱乐、社交、排遣情绪等的重要场所。传播的内容除了具有新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信息和动态外,各种八卦娱乐、家长里短、色情暴力、造谣生事等毫无营养,甚至“毒素”极高的内容也充斥其间。新媒体环境中,多种文化汇聚、多种观点交锋,信息真假混杂、内容良莠不齐,因此,内容甄别和善于防控观点碰撞中的风险,以及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显得尤为重要。

(三) 媒体格局:立体化、融合性

改革开放后,各行各业先后进入转型期,传媒业也不例外。在以往的媒体格局中,报纸、广播、杂志、电视等是最主要的传播载体,而当前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网络、手机等新的媒体形式迅猛发展,对媒体市场重新洗牌。新媒体形式为个人和某些社会团体提供了随时进行信息发布、沟通和传播的可能性,传统主流或官方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商业媒体、自媒体等新兴媒体的不断加入而被打破,媒体格局趋于复杂化、立体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媒体深度融合发展,顺应时代大势的全媒体格局逐渐形成并向纵深推进发展。

(四) 传播理念:人性化、人文性

新闻报道离不开人,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一直以来都是传统主流媒体所遵循的重要传播理念,但囿于部分媒体人员个人素质,“人性化”传播和“人文精神”体现得还不充分和到位。近年来,随着社会民主政治更加进步,民众不仅对知情权的诉求越来越高,而且对媒体向公众传递信息的姿态也越来越敏感和“在意”。“平民视角”“人文关怀”被社会广泛提及,媒体对新闻事件中公众诉求的理解、感受的体察、情感和生存状态的关切等成为人性化传播和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例如,媒体在对灾难性事件进行报道时,不仅要传播事件本身的信息,还要为解决受灾群众的实际困难服务,而且要注意报

道过程中理性与感性的处理及媒体姿态。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当前异常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中,部分媒体,尤其一些商业媒体和自媒体,简单将眼球经济视为生存法则,操控和利用民众情感,制造噱头,提高流量,有时甚至不惜违背“铁肩担道义”和“为真相而生”的媒体操守,这是对媒体人性化和“人文精神”的背离。

(五) 社会舆论场:个性化、差异性

由于技术的局限,过去的传统媒体几乎都是大众化的。加之公众个人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媒体意识所限,普通公众更习惯于通过单位、社区等非媒体渠道表达个人观点和诉求,真正有能力和有意愿通过媒体表达的情况不普遍,因而媒体上所呈现出来的舆论“差异性”不明显。这种舆论场的优点是舆情稳定,易于把握和引导,缺点是舆情信息较为单一,对政府社会治理提供资政信息的价值不突出。网络的普及、自媒体的发展壮大、公众媒体意识的增强打破了上述局面,舆论表达的平台和渠道增多,便捷性增强,普通公众发表观点、表达诉求的积极性得到极大释放,而且开始因相似的兴趣或者利害关系而聚合成不同的群体,“大众传播”中分化出“小众传播”的形态。社会舆论表达格局中公众主体体量增大,地位凸显,同时由于“小众”出现,媒体传播的个体性、差异性随之增强,而这种变化提高了社会舆论引导的难度。加之自媒体传播和管理机制不健全,以及部分媒体主体唯利是图,为赚取流量不惜牺牲媒体道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媒体舆论存在鱼龙混杂、甚至别有用心情况。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自媒体生态,进一步加大社会舆论引导难度。要分辨自媒体信息的真假良莠、要处理好保障公众表达权利和自媒体有序发展的关系,要重视社会不同舆论并引导自媒体坚守并践行关心社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初心,这需要政府和公务员拥有很大的智慧和魄力。

三、新媒界环境对公务员行政管理活动与能力的影响

一方面,新媒体环境为群众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提供了便捷的平台和渠道,是政府和公务员联系民众的桥梁和纽带,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仅有利于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下的政府”,防止权力滥用;有利于政府“问政于民”,了解民意,发挥民智作用,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及时反映社会中存在或潜伏的问题或矛盾,有利于群众表达态度,宣泄情绪,纾解怨气,发挥“预警器”和“排气阀”的作用,提高

政府社会动员、防控舆情的效能。另外,在文字传递信息之外,新媒体还大量使用音频、视频、动画、全景图片、H5 等元素或媒介技术手段,不仅可增强新闻的真实性、说服力、趣味性,增强了阅读体验,极大提升了传播效果,而且也有助于塑造亲和、务实的政府和公务员的形象,拉近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这是新媒体环境带给公务员行政管理活动的良好机遇。

另一方面,新媒体环境改变了话语权的格局。自媒体给普通大众提供了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以及观点态度的途径,使过去“你听我说”的交流形式转变为“大家都在说”。“众说纷纭”和“自我言说”让各种不同主体不同类型的媒体对社会议程和舆论的走向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传统媒体在以往的公共管理领域发挥作用主要侧重于行政指令的方式,媒体是可控的,但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结构的多元化、隶属关系的复杂化,媒体主体的私人化、普及化、自主化,让过去指令式管理模式继续存在的空间严重压缩,发挥主要作用的可能性极度降低。新的媒体环境下,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小众传播的界限趋于模糊化,不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可以相互转化,这给政府对媒体的管理和运用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媒体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是社会情绪的“排气阀”,是矛盾张力的“减压器”,更是一块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社会稳定,争夺十分激烈的思想舆论阵地。西方媒体“要用互联网崩裂中国的长城”的念头始终强烈,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为实现这一野心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便利条件。纵观媒介,西方媒体遮遮掩掩的渗透和大张旗鼓地攻击一刻都没停止过,各种动机和利益驱使在以自由、虚拟为特点的网络媒体环境的遮挡下,虚实不明,相互掺杂,而那些唯以经济利益马首是瞻,忽视社会责任,传播低俗信息和不实言论的媒体网站存在进一步加大媒介失序、甚至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上述种种情形给行政管理带来巨大的“安全”挑战,也是对公务员队伍行政管理活动和行政职业能力的巨大挑战。

四、公务员媒体素质界定与构成

国内关于公务员媒体素质的认识得益于对媒体素质认识的发展和新闻政治实践的要求。媒体素质(也称为媒介素养)的术语起源于英国,一般认为是“一种正确理解、建设性享用大众传媒资源的能力”^[1],之后在美国得以成熟和完善,由 Aspen 媒介素养教育领导协会提出的定义得到学界和媒介界的广泛共识,即:“媒体素质是一种理解、分析、评价与生

产各种形式传播信息的能力。”^[2]美国媒体素质研究中心对媒体素质进行补充,即:“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3]我国关于媒体素养的研究起步较晚,一般认为发端于 1997 年学者卜卫论文《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2006 年前后复旦大学成立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上海市闸北区启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活动,开启对媒介素养更广泛、深入的探讨和实践^[4]。学者陈先元教授认为“传媒素养是指受众对于传媒以及传媒信息的认知、读解、评判及接受的基本素质和实际能力”^[5]。

随着政府新闻执政能力理念的深入发展以及对前些年个别官员媒体表达不当引发舆情事件的深刻反思,公务员媒体形象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从学理层面对公务员媒体素质概念及其构成的表述尚且语焉不详。公务员作为公众特殊一员,考虑其特殊社会角色和职能,以及新闻政治实践的需要,笔者认为公务员媒体素质可以表述为:是公务员对各种媒介信息正确辨识、解读、批判、传播、使用的能力,是公务员一种善于运用媒体工具分析掌握舆情、管理公共事务、实现新闻执政,传达政府意志、塑造政府形象的行政素质。具体来讲,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熟悉媒体生态环境,充分认识到我国媒体生态正在向数字化、多元化、立体化、差异化、市场化、民本化等方向转型,并能够及时更新媒体理念,顺应媒体发展趋势,具备科学先进的“媒体人”理念;第二,了解各种媒介传播特性和传播方式,能够运用媒体正确传播信息、表达观点,能够对媒体上纷繁复杂的各种信息鉴别真伪虚实,准确理解和扩散真实信息,批判、阻止虚假信息,消弭不实信息的负面影响,具有合格“媒体人”的基本媒介素质,这是公务员实施媒体执政的重要基础;第三,能够运用媒体“问政于民”,汇聚民智,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通过媒体了解和把握舆情,正确引导舆论,预判风险,化解危机,展示良好的媒体形象,具有运用媒体执政的高级能力;第四,能够以平等的姿态面对媒体,以平视的视角、共情的态度、良好的表达技巧与新闻现场的媒体和民众沟通,说话办事基于事实和政策,有理有据,有力度也有温度,不仅能够实现真实信息的有效传播,政府意志和行政指令的准确传递,还能够促进政府与公众的有效对话,实现社会动员和力量凝聚,助力达成政府媒体执政目标。

五、公务员媒体素质提升路径

媒体是各级政府机关和公务员开展政策宣传、

社会动员等各项工作的必要手段,公务员媒体素质高低直接影响个人工作能力和政府执政效能及形象。提升公务员媒体素质意义重大,可从以下路径着力推进。

(一)优化权力格局,加强身份自律

“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6],部分公务员面对媒体和民众表达“出位”,“雷语”滚滚,究其本质,权力观异化、心中没有群众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强公务员权力观教育,优化考评和选任干部机制,加强公务员身份自律是提升公务员媒体素质的根本之策。

第一,加强公务员权力观教育,明确权力代理、责任、服务三义。认清权力来源于人民,公务员是代替民众行使治国理政的权力,权力与责任相匹配,要把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宗旨意识贯彻落实到公务员与媒体和群众打交道的所有活动中,坚持人民立场,秉承人民情怀,如此这般,违背民意、伤害民心的歪话邪说自然不会脱口而出。

第二,厘清权力边界,优化考评选任干部机制。各级政府、各类职能部门的公务员要对本机构的法定职能和权力予以清楚的认识,对其他政府部门和媒体职能和权力实现予以保障,重视社会力量对权力的监督,畅通意见渠道,加强民意在公务员考评中的权重,把了解媒体、善用媒体作为考评和选任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改变部分公务员轻视媒体和民意的官权意识。

(二)转变媒介理念,善待善用善管媒体

转变媒介观念是提升公务员媒体素养的前提,善待善用善管媒体是迎接新媒体生态环境下各种挑战和机遇的关键。

第一,在观念上,公务员应看清媒体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不能对媒体厚此薄彼,改变对传统媒体,尤其官媒敬若上宾,对新媒体,尤其草根媒体“傲慢与偏见”,要适应新媒体环境的政治生活,尊重媒体监督,充分认识到媒体,尤其互联网媒体作为“信息聚散地”“公共话语平台”“社会舆论放大器”“心理解压阀”“情绪排气筒”等在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充分认识到对公务员而言,融媒体素养和能力不仅是个人工作方法、工作能力的体现,而且关系着政府形象和治理能力,要对媒体表达失范的政治、社会治理风险有深刻的警醒,对于暴露出来的自身媒体素质问题和媒体执政能力短板,要勇于正视和积极改善,绝不能讳疾忌医,甚至视而不见。

第二,在行为上,不“谈媒色变”和躲避媒体,用善待、善学、善用、善管迎接新媒体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媒体执政的理念虽然已经得到各级政府和公务员的广泛接受,但毕竟是出现时间不很长的新生事物,因而在媒体执政途径、媒体执政方式方法、媒体执政政策法规、媒体执政伦理道德、政务信息公开、各类媒体应对策略、网络、微博、突发公共事件等各种情境中的政府应对等等很多方面,还尚未完全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因而公务员队伍媒体执政的能力也不可能十分整齐地都达到了政府、社会和公务员自身满意的较高水平。正如美国学者班尼特曾说:“在当今时代,处理媒体关系,已经从原来的通过个人的聪明才智就能驾驭的一门艺术,变成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来把握的一门科学。”^[7]因此,公务员系统参加自主学习和业务培训非常必要。理论学习要博,传媒学、沟通学、舆情学等知识和学理都要广泛涉猎,业务培训要实,通过深入研读典型案例和任务驱动式培训,提高媒体执政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具体来讲,首先,正确把握媒体特性,熟练掌握与媒体良性互动的方式方法,对群众通过自媒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要给予重视和积极处理,真正做到“上网问政听民声”,“下网落实解民忧”;其次,主动担当新媒体“意见领袖”,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要善于分辨媒体上传播的不同声音的真假善恶,能够将恶意造谣攻击和戏谑吐槽、情绪宣泄区分开,把信谣、传谣和围观区别开。应对或处理造谣传谣攻击等严重违规事件时依法处理,不越位处理,处理时注意度的把握,根据本质和危害程度分层处理,不会大面积过度打击,也不会大事化小,消极应对,任由谣言和负面信息病毒式传播。

第三,在制度方面,各级政府部门可组织一定数量的专业力量,通过专业水准和专业手段,积极探索和建立专业化常态化机制,如公务员接待媒体采访审批流程与纪律、各级政府或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属地管理及新闻协调机制、政府与新闻单位联席通报制度、媒体危机公关应对处理制度、预防犯错和纠错机制等,这不只是给公务员如何使用媒体立了规矩,也是一种保护和保障,保护公务员不受因不知如何做而无心做错的职业困扰,保障公务员与媒体打交道时合法合规合度合适,保障媒体执政目标的实现。

(三)遵循传播规律,改进言说方式

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媒体传播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遵循传播规律是尊重科学、善用媒体的内在要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等讲话中多有强调。传播是一项十

分复杂的活动,善于把握合适时机、运用合适的言说方式、表达合适内容于传播效果而言意义明显。

第一,秉承“金字塔塔尖原则”,向媒体和公众表达核心观点。对于一些比较复杂、比较紧急的事件,公务员在对外宣传或应对外界采访时,要善于利用“首因效应”,把最主要的信息安排在第一时间传递,这样表达的好处是:首先,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主导舆论,清楚醒目,不仅有利于控制新闻议程的核心观点,而且不容易被媒体记者后期加工剪辑造成观点异化,引起公众“曲解”;其次,这样表达也符合公众信息需求和接受信息、处理信息的规律。如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政府不仅在电视台、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也在互联网官媒和主流媒体平台上,甚至直接推送给公众手机端,将每日各地确诊、疑似、病亡和治愈出院人数等数据及时发布,避免了公众因不知情而产生的猜想恐慌,也有利于公众配合政府开展抗疫工作。危急关头,公众急于了解事件的重要信息,如果公务员不了解公众急切了解事情的心情,固守四平八稳、稳健滞后的话语习惯,和公众“打太极”“绕弯弯”,不仅会给公众留下作风不爽朗的印象,也会延误公众第一时间的配合。

第二,明晰媒体语言与公文语言的差别,提升政府媒体语言的温度。说话写文章都讲究“对体”,公文语言和媒体语言面对的公务活动性质、面向的阅读对象不同,其表达形式和特点自有区别。媒体语言面向的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和领导,而是普通民众,承担的也不是工作成效汇报的职责,而是传递公众迫切想要了解的事件信息,因此在表达上应该弱化政府部门和领导身份,可以适当牺牲理性、面面俱到的表达原则,侧重民众关心的事实和细节,用更加温情的语言体现对公众诉求的满足和情绪的安抚。公务员的媒体语言要有高度,也要“接地气”,要准确

传递政策信息,也要适度兼顾民众阅读习惯和言语方式,如民众喜欢用流行语,热衷于网络语言,网络书面沟通喜欢用表情包等,都可积极学习和有效运用,从而提高公务员媒体语言的亲和力,优化传播效果。

六、结束语

当今时代,媒体素质已成为公务员的“基本功”,“媒体形象”是连接“客观形象”与“公众形象”的纽带^[8]。公务员们应内修媒体素质,外塑公众形象,在新媒界生态环境中努力做到主动不妄动、正视不敌视、运用不利用、引导不操纵,尊重不愚弄,发挥好媒体引导舆论、联系群众、凝聚社会力量的正向作用,堪当平息舆情风波的“定海神针”。

参考文献:

- [1]陈学紫.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公职人员媒介素养的构成与提升[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9.
- [2]周葆华,陆晔.从媒体使用到媒介参与: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状况[J].新闻大学,2008(4):58-66.
- [3]张雪梅,阎国华.大学外语教育视阈中的媒介素养教育转向[J].前沿,2010(7):194-197.
- [4]于风.新媒体环境下提升公务员媒介素养的思考[J].科技传播,2019(4):197-198.
- [5]陈先元.大众传媒素养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46.
- [6]习近平.之江新语·善于同群众说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46.
- [7]W·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M].5版.杨晓红,王家全,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16.
- [8]郎竞宁.融媒体背景下政府公务员的媒介形象建构[J].新闻传播,2019(16):18-19.

(责任编辑 吕志远)

An Analysis of the Countermeasures of Improving Officials' Media Quali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ntrolling Risks and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Media

FENG Ge

(School of Chinese and Law,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Zhengzhou, Henan 450015, China)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official media language is related to the abilit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image of the government, the mutual trust and identity between the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media and the influence towards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 officials' media quality, and puts forward the ways to improve it.

Key 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media; new feature; officials' media quality; countermeasures

论新时代隐性思政的媒介环境价值及路径

张 雯

(阜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00)

摘要:新媒体主导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普及化,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的新特点。新媒体环境具有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的隐性特征,传播速度快、结构复杂、互动性强。新媒体环境对于提高思想政治时效性意义重大。思政工作者应抓住新型媒介环境带来的新机遇,遵循网络运行规律和思政工作原理对新媒体环境进行优化和重构,使媒介环境优化和隐性思政工作在新时代条件下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同时,以生成性课程弥补预设性课程之不足,利用新的媒介环境设计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方法,推进思政工作创新。

关键词:媒介环境;隐性;生成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15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82-04

各种新型媒介的出现使新时代思政工作环境五彩缤纷、日新月异,具有社会化和生活化特征的信息体系与传统媒体相映生辉,孕育出崭新高效的思政工作环境。思政工作者应该积极行动,抓住信息传播新环境带来的红利,开辟新渠道、打造新方法,提高思政工作效率。当然,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放任自流,无用信息消耗人们大量宝贵时间,不良信息还会乘虚而入。新时代的媒介环境具有明显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控制新媒体风险、优化新媒体环境是时代赋予每一个思政工作者的分内职责。

一、新时代条件下的媒介环境价值分析

新媒体环境是新时代各种信息载体和工具的总和;新媒体是指新出现的各种信息传播形态和媒体介质,经由网络传输的数字技术、移动技术、网络技术,借助电脑和手机等多种终端来实现,具有交互性、虚拟性、共享性等特点。随着技术进步,更具个性化和主动性的新媒体会不断出现。媒体论坛“迎接全媒体时代”(2011年)标志着人们正式把“新媒体”放在认知和思考的台面。“新媒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首先,新媒体的速度与激情为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新的媒介涵盖了4G、5G为主的高速网络传播途径,但新媒体并不排斥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从信息传播覆盖的范围来看,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还有自己的用户。新媒体为时代造就的速度与激情则更受青年群体的欢迎,二者并行不悖。在新媒介背景下,信息借助各种形式全方位地传达给受众群体。新媒体引发的媒体形态重大变革,导致当下信息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是时代的进步,是当代人的需要和追求^[1]。随着技术手段不断创新,新媒体的市场份额会远远地超越传统媒体。新旧媒体交叉融合的局面,标志着新型媒介时代的到来。对于思政工作者来说,需要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新媒体提供的有利条件,对具体教育内容和方法进行及时调整。

其次,新媒体成为助推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新媒体标志着时代的节奏和社会的发展,信息的加速传播必将进一步助推科技进步。新媒体可根据消费份额主体的信息需求特点,以市场调节为主导,主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精准命题,迎合多种服务要

收稿日期:2021-05-10

基金项目:阜阳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项目“新时代隐性思想教育研究”(2020CXJH05)

作者简介:张雯(1987—),女,河南浉池人,阜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求。借助大数据平台,形成根据市场变动来调整服务内容的信息产出机制,对大众的需求进行细化和区分,做到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服务”。新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彰显包容性。在信息技术推动下不断创新和开发新工具的同时,继续满足部分群体对传统媒体的需求。在传播过程上,新型媒介将传统独立运行的媒体有效地融合起来,把个体整合转化为整体的一部分。在新媒介发起的信息融合过程中,注重资源的优化组合,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组合,追求信息价值最大化^[2]。从传播效果来看,新型媒介更侧重回应最大多数受众的需求和喜爱。

最后,媒体新介质推动社会进入学习型社会。借助随手可得媒介终端,人们迅速而便利地获取需要的信息。手机、电脑和多种智能电子设备是人们能够接触到的最常见的媒介终端,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传播工具。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人们这样获取信息的事实无法回避。被动不如主动,帮助人们提高甄别信息的能力,提高人们在新时代获取多种信息的素养,有益于发挥各种各样的有效信息对人们的积极影响。所以,传统思政工作方法必须进行变革,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变化。

信息社会的发展伴随着技术更新和传播方式创新,不断创新和更新成为信息社会的常态。新型媒介本质上就是新旧媒体的不断融合和创新。

二、新时代条件下媒介环境呈现的新特征

(一)信息内容精彩纷呈

新型媒介的时代步伐无法阻挡。人们通过手机和其他各种电子产品不断缩短着彼此距离,拉近了人们与现实的距离。新媒介提供人们的信息内容精彩纷呈。丰富的信息给思政工作带来了可以运用的素材。教育工作者主动迎接和消化多媒介环境提供的信息资料,是避免“网络冲击”的最好方式。新型媒介信息的灵便鲜活与传统信息内容的陈旧单调形成鲜明对照。新媒介承载的丰富信息为思政工作的案例分析提供素材,推动传统教育的内容更新。

当然,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教育者要有对丰富多彩的媒介信息进行辩证分析,去伪存真、批判运用。灵活运用其中有价值的成分,服务既定的教育目的。对于丰富多彩的网络信息,要警惕削弱意识形态引导力的情况发生。在现实社会中,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电子信息占用了太多家庭情感交流时间、甚至青少年的休息时间,严重损害了一些孩子身心健康。青少年激情犯罪的案例显示,冷漠和不理解等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丧失,并在极端个体身上演变成人的社会性的丧失。所以,在新媒介环

境下的思政工作,更要注重线下耐心的思想说教。

内容的更新是传统思政工作的短板。传统思政工作常以书本为承载工具,把以文字为主的预设内容讲授给受教育者。教室是书本内容传承的场所,班级授课是校园里的主要活动形式。这样的教育和学习方式使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都有压力:在单调的传授与接受过程中完成课程任务,很难保证教育内容内化与外化的效果。

(二)传播方式双向互动

在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介环境中,个体是信息接受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媒介信息具有即时性和互动性特点。人们在接受和传播信息过程中,又是信息加工制作者。运用网络平台进行互动的过程就是复杂的信息产出过程。思政工作可以利用这一特点,在信息传递平台上开发相应的思政工作板块,论坛网站、APP互动、电子邮箱、微博等,都可以成为思想教育的新天地。在专门开辟的交流平台上,围绕设计好的论题进行讨论和互动,尽可能地延展网络教育空间。网络平台成为教育双方沟通的媒介和渠道,极大地拓展了思政工作的有效传播途径。充分利用新媒介提供的强大信息库并赋予传统教育方法以新生命,是思政工作面临的新问题。^[3]受媒介环境影响,思政工作模式不断发生着巨大改革。虽然学校教育中的信息传递途径还主要是课堂教学,但运用新媒介于课堂,增加课堂交流的质量和数量,能够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新媒介时代,学生参与教学成为教学改革重要推动力。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即使是以课堂灌输为主的理论课程,也可以开辟特色单元,提供利用新媒介增加交流的机会。当然,对于信息传播来说,传统教育教学方式除了在传播人类积淀的文化成果上的高效率之外,教育工作者可以作为一道阻隔有害信息的“防火墙”,阻断和遏制不良信息的传播。

利用媒介信息的即时性和互动性,发挥教育工作者的导向作用,在信息双向交流中极大地提高思政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同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遵循思政工作内在规律,通过对受教育者使用媒介信息的启发诱导,运用好传统教育教学方法,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教育效果的最优化。

(三)心理体验丰富饱满

新型媒介环境下,每个人都能够便捷地获取信息。人们在网络畅游过程中,信息的接受与传播受伦理道德和法规制度的约束,涉及知、情、意、行的心理体验。与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思想教育的体验不

同,人们在新型媒介环境下的心理体验丰富饱满。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信息把社会连接成一张密切相连的网。校园不再与社会脱离。新媒介传递的信息中充斥着不同价值观,学生有了更多接收信息的渠道,给高校思政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也多了被不良信息污染的风险。当然,机遇和风险并存。教育者可以利用分析和运用复杂信息的时机,锻炼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让信息接受者认识到在国际政治大变局的新时代,世界是充满斗争的大舞台,接受信息的过程不再像课堂那么单纯。启发受教育者在享受信息带来的便捷的同时,养爱国心、立报国之志、做爱国事,培育知情意行统一的爱国品格。

媒介环境下,教育工作者可以节省大量用于收集信息和素材的时间,花费更多时间思考网络空间素材的价值与危害,在可控范围内设置情感和意志冲突情景,训练青少年在应对挑战的能力。既然媒介环境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环境,就应该鼓励青少年主动接受知、情、意、行的综合磨炼,养成更加多元和广泛的学习兴趣。运用丰富饱满的心理体验让受教育者的心灵得到洗礼和净化。在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认识西方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的价值体系,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在丰富的心理体验中认识网络社会遵循伦理道德与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形成科学而正确的价值取向。

(四)传播过程随机再生

新媒介环境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是随机再生的。生成性是现代信息传播过程的重要特点,这与学校教育中的传统教学方式的预设性截然相反。传统的学校教学活动,教学内容是经过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科学设计构成预设的基础,由教师按课程体系组织实施。预设性教育虽然单调,但它是最高效的传播人类文明成果的方式。

网络信息的随机再生,极大地弥补了传统课程的不足。课内、课外可以互连,线上、线下可以互动。新媒介信息技术的运用,具有动态化、形象化、直观化特点,是弥补预设课程不足的最好方法。抽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很难实现生动活泼。但是,借助新媒介手段和网络信息技术,把课内课外和线上线下结合起来,使课程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得到心性的陶冶。同时,信息渠道的丰富能使人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新媒介的运用,有效地提高了课程内容的生成性。生成性课程设计会造成教育者工作量大幅增加,但收获往往也是丰厚的。主次分明、制作精美的

多媒体资料,既能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又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这样的教学过程对受教育者的成长弥足珍贵。新媒介环境下的课程弥补了教育者讲授之不足,又激发人们热情,还可以呈现巨量信息^[5]。

在新媒介的运用中,要处理好课程的预设性内容和生成性内容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度”十分关键。在自由开放的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途径不仅不会降低预设课程的质量,还可以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自主设计和更新教学内容,完成信息传递,提高教学效率。

三、新时代媒介环境设置与优化的对策思考

(一)积极探讨新媒介环境下思政工作新模式

新媒介环境对于思政工作影响愈益深刻。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迫使我们探讨思政工作新模式,在分析、评测、试验、总结等科学研究基础上实事求是、避害趋利。

首先,要有开放的态度。探讨新媒介环境下思政工作新模式,要把新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现代工具,对信息传播工具的更新持积极有为的态度。主动地开发利用,才会有所成就。信息载体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其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信息传递的内容和目的。思政工作者对待新媒体理应以积极的态度,顺应时代发展,紧跟时代发展潮流。

其次,要有正确的方法。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发挥新媒体容量大、更新快等特征,与课程特点相结合,寻找教育或教学活动的结合点,提高学校工作的效率。在利用新媒介施加教育影响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新媒介的大数据功能,不断更新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

最后,传统与现代的模式融合。在具体的信息传递过程中,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可以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综合发挥教育效益。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比例,应该根据受教育者(信息受众)的特点和差异而定。因时因地制宜,避免极端做法。新媒介与传统方法的辩证统一,可以把信息传递与信息使用有机对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传统模式与现代方法的融合,活跃了氛围、提高了效率、解放了人力、更新了方式,抬升了信息传递的质和量,实现新媒介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最佳状态。

(二)教育者主动提高素养以驾驭环境挑战

主动使用新媒介,让受教育者在提高获取有用信息效率的同时,增强抵御不良信息的能力。把新媒介作为教育载体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但可以提高受教育者对信息科技的适应能力,还可以帮助青少年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全面发展所需要

的综合素养。在品德养成和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同时,有足够的信息技术能力驾驭未来环境的挑战。

就像免疫能力可以阻止病毒侵袭一样,在互联网传媒环境下,培养受教育者运用各种新传媒的素养,进行积极的正面的预防和辨识教育越来越重要。预防是指预防敌对意识形态的恶意攻击,让人们了解现状,明白实质;辨识是将判断技巧传授给受教育者,提高抵制不良信息的能力。

对于教育者来说,要知晓社会所需人才除了要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外,还要具备知识更新的素养和能力。如果个体不能随时运用新媒体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就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教育者要树立并传授终身学习的理念,主动学习新媒体技术。

随着现代新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运用最新信息对教材内容进行再加工的能力十分重要。用最新信息整合预设内容,调动视觉和听觉等多种感知通道,使学习者在接受教学信息时尽可能从声音、文本、图片等多渠道同时获取信息。多媒体课件可以极大地增加知识容量,有效地搭配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资料,突破教材有限性,活跃课堂氛围。多媒体教学提高了教学的效率,解决了课时少和内容多的矛盾。科学合理的多媒体教学对于学习者有效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引导受教育者认识新媒介的优势和弊端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虽然信息技术的普遍运用给思政工作带来了便利,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使用不当或应对不力,网络信息带来的弊端也不容小觑。信息技术运用不当,会降低教学效果,甚至还会影响受教育者身心健康。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普及,要求人们必须具备识别有用信息和正确使用信息的能力。

学校教育中的多媒体运用,高质量的多媒体资料会让受众赏心悦目,其效果也就事半功倍;质量低劣的教学课件会引发学生逆反心理。把新媒介技术简单地当作知识搬运工具的做法,无疑降低了教育目标,忽略了教育过程中人的积极作用。一些把未经再加工的视频资料直接搬上屏幕的做法,随便改变了授课内容,只会让学生感受教育者的不负责任,严重危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效益。

培育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对信息价值的判断,是网络时代学生分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积极的信息加以运用和传播,对不良信息自觉抵制和证伪。只有在不断地同不良信息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提高对于各种有害信息的“免疫力”。互联网具有及时性、互动性和隐蔽性特点,个体在享有信息使用自由的同时,模范遵守伦理和法律制度。树立正确的网络信息观念,紧跟时代步伐,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公民。

参考文献:

- [1] 林沛. 新媒体环境下受教育者思政工作载体研究[J]. 领导科学论坛, 2019(9): 90-92.
- [2] 刘辉. 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政工作创新研究: 以桂林理工大学为例[J]. 智库时代, 2019(20): 150-151.
- [3] 涂鸣. 媒介深度融合和全媒体环境下的新闻教育[J]. 声屏世界, 2019(3): 12-15.
- [4] 潘红. 全媒体时代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方法创新研究: 以“概论”课为例[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9(3): 149-151.
- [5] 唐俊. 全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形势[J]. 课程教育研究, 2018(39): 69.

(责任编辑 吕志远)

On Implicit Education Value of Media Environ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ZHANG Wen

(School of Marxism,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000, China)

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ode led by new media has become a new featur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environment in the new era.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has the recessive character of imperceptibly exerting influenc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fast propagation speed, complex structure and strong interactio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timeliness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ers should seize the new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making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preset courses with generative courses, designing content and methods close to life with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Key words: media environment; implicit; generative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的几点思考

苏 炜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其育人效果是检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情况的重要依据。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实践中,可以从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铸魂育人作用,建设一支能胜任育人重任的教师队伍,充分发挥高校育人功能,结合第二课堂等活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施育人效果综合考核等方面着手,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1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86-0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要把思政课“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1]。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大学本科阶段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等必修课组成,各门课程间有着严谨的逻辑关系。

高校十分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铸魂育人作用,采取有效措施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学校党委定期专题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工作,主要领导人班听课,带头讲好思政课;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确保满足教学要求;加强教学管理,规范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评价与考核;落实经费保障,确保任课教师的教学科研与培训工作。这些措施有效保证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顺利开展,在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现象。如部分学生不认真学习,认为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用途不大,弄不清楚思想政治理论课对自己人生和未来的指导意义,认识不到课程对提高个人综合素质的作用。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枯燥乏味,没有联系社会实际,没有与学生思想实际紧密结合,不能解决学生关心的问题,缺少亲和力 and 针对性。上述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原因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意义认识不到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节中,以教学为目的,忽视育人问题,弱化学生主体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作用无法有效发挥。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象主体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不能及时掌握学生群体的思想状况,不了解学生的个体需求,无法准确把握育人的切入点,从而造成教师所讲与学生所需“两张皮”,学生对一些客观现象带来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答。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解决学生的思想“困惑”,也就无法走近学生,无法被学生喜欢,更谈不上入脑入心了。

收稿日期:2021-05-20

作者简介:苏炜(1962—),男,吉林长春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长期从事高校课程思政及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和教学。

二是教学方式方法需要改进提高。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重视教学进度执行和教学内容的完成,轻视教学效果,教学改革意识不强,没有结合学生实际对教材内容进行组织加工,缺乏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创新。一些教师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性,忽略实践性,不能对具体问题做出全面客观分析,没有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个别教师片面地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政治宣传,轻视学术研究 with 自身理论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和育人效果。

三是课程考核评价方法需要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以课堂教学为主的课程,目前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效果考核多采取集体命题、学生作答,统一阅卷的方式。这样的测试方式只是检验了学生对教材内容的掌握情况,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无法全面反映思想政治理论课入脑入心后产生的“化学反应”结果,不清楚课程对学生后期成长的影响程度,不能对育人效果做出真实评价,不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的进一步提升。

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是在复杂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实现的,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值得不断探索。

一、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铸魂育人作用

铸魂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前提和保证,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神圣使命和职责,落实铸魂使命重在培育青年学生以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尚道德情操为核心的精神支柱。

(一) 坚定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并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领导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重要途径,要把培养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首要任务,使学生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不断认识真理、追求

真理、坚持真理、实践真理,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 增强青年学生的“四个自信”

要把增强学生“四个自信”教育贯穿思想政治理论课全过程,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帮助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增强坚定“四个自信”的定力、迎接各种挑战的勇气、战胜各种困难的信心与决心,奠定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之奋斗的思想基础。

自信是力量的源泉。增强“四个自信”是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基础,坚定“四个自信”可以使青年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汇聚成报效祖国的强大力量,自觉投身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

(三) 强化青年学生的使命担当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培养青年学生的使命担当意识。学生通过系统学习国史、国情,理解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深刻理解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坚定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也强化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勇于担负起民族复兴大任,为祖国强盛贡献力量。

担当意识是树立与实现远大理想的精神基础。拥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必将激发学生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形成迫切的本领需求和刻苦学习的内在动力,努力掌握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技能本领。

(四) 提高青年学生的综合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提升青年学生综合素质作为重要内容。大学生综合素质是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和各种能力的综合反映,通常认为由政治思想素质、文化业务素质、身心健康素质等方面构成,这几个方面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制约。政治思想素质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核心与灵魂,影响着其他素质的方向,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和对社会所起的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导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正确的法治观念和行为规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和时代精神,筑牢政治思想素质基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

二、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的切入点

(一) 坚持政治性,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导向作用

政治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本属性与核心,

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价值取向的根本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只有牢固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性,才能确保其铸魂育人意义。

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培养学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跟党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认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要理直气壮地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性,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引领作用,引导学生自觉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立自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

突出政治性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主导作用,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其他各类课程中的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引导各类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同向同行,成为开展不同课程育人的理论支撑,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显性教育与各类课程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协同育人。

(二) 强化问题导向,解答学生困惑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以问题为导引,把解决问题作为课程重要任务,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的有效途径。大学生思想活跃,视野宽阔,不能有效解决学生困惑与问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很难与学生产生共鸣。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需求,从解决学生思想困惑和问题入手,主动参与到学生所关心的问题之中,解疑释惑,回答好学生的问题,才能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对课程的认同感。

以问题为导向教学要积极引导发现和思考问题,在启发中解决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学生个人生活、社会实际密切相关,涉及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等历程与事实,不能把授课与实际问题相分离,不能把教学脱离于发现问题和直面问题,简单走过场甚至逃避问题。任课教师要敢于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有提出问题的勇气和回答好学生问题的本领,通过全面客观地分析回答好学生的问题,使学生真懂、真信。

要关心关注学生的生活现实,理解学生对人生的期待和憧憬,联系学生成长与发展开展教学,帮助学生解答恋爱、情感、就业等问题,站在学生的角度用理论阐明道理,用事实说明问题,纾解思想困惑,使学生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价值,体会与自身的紧密联系,感受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合力。

(三) 以学理性为基础,用思想理论说服学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强调,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

学理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属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性的保证和真理性的体现。忽略学理性基础的强调政治性、突出政治观点、强化政治立场,只能是照本宣科,生搬硬套,成为宣传式口号和强迫式说教,最终失去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的亲和力和育人功能。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发挥学理性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材料归纳、理论演绎和逻辑推理等解答学生的问题与困惑,用思想理论说服学生,把以理服人作为打动学生、感染学生的基础,使学生愿意学、学得懂、真心信,充分释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效能。^[2]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

(一) 提升教师素养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对教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严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的政治关是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性的基本要求,是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意义的前提。教师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讲人,对其政治立场的严格要求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六个要”的要求,其中第一个就是政治要强,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3]

严把政治关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任课教师只有具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才能讲好信仰,才能彻底讲清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才能真正做到用坚定的信仰引领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确保高质量完成育人工作的基础。马克思曾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现存世界的联系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9页)责任感和使命感能有效地激发人的内动力,提升自觉性和奋斗精神,以高度的工作热情投身到所从事的事业中。具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责任

感和使命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然会满怀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自觉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担当精神,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拓宽视野,创新方法,努力提升教学科研水平,更好地担负起时代重任,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教师对学生有着强烈的熏陶作用,形成巨大精神感染力,自觉成为学生崇拜对象和榜样,提高学生对授课内容的认同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更高标准的师德建设,努力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知行合一,成为高尚、纯粹的人,饱含深厚的民族和国家情怀,满怀仁爱之心,理解、尊重、包容学生,得到学生的尊敬与爱戴,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用高尚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成人成才。^[4]

(二) 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创新可以有效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活力,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育人效果的必要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能局限于照书讲、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要增强创新意识,多考虑青年学生实际状况,深入探索课程内在的教育教学规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结合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的具体要求,大胆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与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永葆思想政治理论课活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做好创新基础工作,深刻理解课程内容,广泛吸收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知识并灵活运用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把准时代脉搏,掌握社会发展和各种思潮对学生的冲击影响,有解决问题的热情、信心和能力,找准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突破口,在不断创新中提升课程育人效果。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落脚于解决实际问题,了解学生关心什么、困惑什么、需要什么,在摸清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等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创新方式方法,要杜绝形式主义,不能为创新而创新、为出成果而创新。

(三) 增强教师培训的针对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的针对性要强,要覆盖到全体任课教师,着重加强政治立场、师德师风和业务能力等方面的提高。

崇高信仰和坚定信念是在不断的思想培植和实践中练就的,应将党性锤炼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培训的有力措施。通过系统培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一步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增强立德树人使命担当,守牢政治、法律和道德底线,严守教师职业行为规范,大力弘扬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精神。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培训,提升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有计划安排教师参加培训研修、考察调研、社会服务、挂职锻炼等形式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提高学术水平和自身能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业务培训要注重系统性、及时性,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习与研究相结合,全面分析学生思想状况,及时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规律和最新情况。

四、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综合考核

(一) 加强学生知识运用能力考核

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知识掌握为重点的传统课程考核方式,减轻学生死记硬背的压力,避免会背就能得高分,会考试就能有好成绩的现象。加强知识运用能力考核,把学生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课程考核重点,通过案例分析、研讨辩论等形式,在全面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同时,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热情,提高知识运用能力。

(二) 实施育人效果综合评价

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是一个综合指标,可以认为由思想品质、政治品质、道德品质、法律纪律等内容构成。思想品质是个人在意识形态、思维活动、行为作风等体现的思想、品性,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优良思想品质的具体反映。政治品质是学生内在政治心理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观念、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等;道德品质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中表现出的稳定、一贯的特点和倾向,涉及道德情感、道德意识、道德信念;法律纪律包括守法意识、法律捍卫意识和法律监督意识,具体表现在严于律己、自我控制以及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等方面。

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评价是一个受多因素影响的综合性问题,具有显著层次递进特征,可以构建以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为评价目标,以思想品质、政治品质、道德品质、法律纪律等为评价准则,以各准则项所包含内容为评价指标,形成多目标评价体系,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实施多属性综合评价。

五、构建多方协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机制

(一) 建立全员育人格局

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覆盖到各环节,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各部门工作的重要指标,彻底消除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讲,思想政治教育由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做的错误认识。

建立全员参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整个教育教学全过程。充分发挥课程育人功能,努力探索课程思政工作,深度挖掘各学科门类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解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互配合问题,构建课程全覆盖、依次递进、相互支撑、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的课程育人体系。

(二)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育人

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同第二课堂等实践活动相结合,增加课程亲和力,促进学生对思政课理论知识的进一步理解、价值认同,实现由理论学习到思想觉悟的提升。

第二课堂是高校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与第二课堂活动,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学生社团以及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等活动有机结合,使第二课堂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育人。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生充分接触社会、感知社会,在发现问题的同时,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分析问题,在实践中提升思想认识和解决问题能力。青年学生志愿者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奉献精神,在奉献社会的过程中感悟人生价值,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生社团是由具有共同的兴趣与志向的高校学生自发组建,有高度的自我教育功能,利用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和入党积极分

子培养等工作,使学生骨干、团员干部成为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典范,起带动作用。

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育人纳入教学管理,制定实践教学计划,明确实践教学内容,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实践环节中的专业指导作用,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育人的有效性。

六、结束语

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工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守鲜明的政治底色,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守好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紧紧围绕育人主题,坚持与时俱进,务实求效,在守正中创新,在改进中提高,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EB/OL]. (2019-08-14).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8/14/content_5421252.htm.
- [2] 冯务中. 如何“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J].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9(1):13-17.
- [3] 师吉金,郑艳凤. 思政课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从何而来[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6):115-119.
- [4] 江燕,班高杰. 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J]. 中国高等教育,2017(11):51-53.

(责任编辑 许峻)

Thoughts on Improving the Educational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SU Wei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constitute the major channel and main front for fost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and key role in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Its cultivation effects are thus major groundwork to testify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cultivation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we can highlight the building of the competent faculty with high moral standards to enhance its cultivation effect. By giving full display to cultivation functions of colleges and by combining with second-class activities, pragmatic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can be conducted and such fronts as overall assessment on cultivation effects can be initiated to boost cultivat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Key words: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cultivation; effect

百城提质背景下建筑高等职业教育改革路径的研究与实践

焦 涛,袁新华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64)

摘 要:在百城提质背景下,分析建筑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筑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路径,着重阐述了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在完善思政育人体系、打造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特色专业群、创新双主体四阶段的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重构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主体的模块化专业群课程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探索和实践。

关键词:百城提质;建筑产业升级;高职教育;改革实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17

中图分类号:G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91-04

一、百城提质工程及其影响

(一)百城提质工程建设概况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是河南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豫发〔2016〕39号),是河南省对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2017—2020年共完成项目30953个,完成投资23201.53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类7223.9亿元,占31.1%;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类2581.57亿元,占11.1%;城市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类750.38亿元,占3.23%;产业发展类项目完成投资3371.68亿元,占14.5%;老旧小区改造类5631.42亿元,占24.3%;特色小镇建设类845.78亿元,占3.64%;智慧城市建设类181.43亿元,占0.78%。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项目涵盖了城市基础设施、城镇公共服务设施、智慧城市、城市双修、特色小镇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多个建设领域,带来了巨量的建设项目和投资,促进了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和市场繁荣;为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优化城乡经济结构,增强区域竞争力,让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强大支撑。

(二)百城提质工程建设对建筑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河南是建筑业大省,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10%左右,但劳动生产率较低,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已初见成效。河南省政府高度重视建筑业的发展升级,制定了《河南省建筑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豫政办〔2017〕152号),全面推动建筑行业转型升级,推动河南省由建筑大省向建筑强省转变。

百城提质工程为河南建筑业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机遇,在百城提质工程的众多项目中,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智慧城市、城市双修、地下管廊等项目占较大比重,建筑企业逐步向装配式建筑、市政、地下管廊、轨道交通、高铁、港口、公路等新兴领域或高附加值专业拓展,产业结构优化。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持续增长,推动了装配式建筑相关产业和市场发展壮大,建筑骨干企业向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企业转型。BIM(建筑信息模型)、大数据、智能化、3D打印等信息技术应用逐步扩大,尤其是BIM技术应用发展迅

收稿日期:2021-06-20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重点项目“‘百城提质’背景下的建筑职业教育改革研究与实践”(2019SJGLX676)

作者简介:焦涛(1968—),男,河南沈丘人,硕士,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建筑工程教学与研究。

速,表明建筑行业信息化水平提高,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绿色建筑规模扩大,建筑品质提升,新建建筑的能效水平提高,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提高,实现了绿色建筑的量质齐升。同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开拓境内外市场。由此可见,河南建筑业转型升级步伐逐步加快,河南建筑业正逐渐成为技术先进的现代产业、绿色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 建筑行业人才需求的变化

随着百城提质工程及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城镇公共服务设施、智慧城市、城市双修、特色小镇建设、棚户区改造等建设项目的快速增加,区域建筑产业迫切需要优化结构、转型升级,向高端化、智能化、特色化、集群化以及国际化方向发展,对建筑人才的需求不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主要是对建筑新技术应用、信息技术应用如轨道交通、高铁、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BIM、建筑智能化等方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增加,尤其是跨专业、一人多岗、综合能力强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需求旺盛。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技能人才已成为建筑产业升级的必然需求。

二、建筑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 专业发展滞后于建筑产业升级

在百城提质及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高职建筑专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建筑产业升级的步伐: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等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不匹配,不协调;专业群结构与产业链契合度不高,核心专业引领作用不强,专业资源分散,产业服务能力弱。

(二) 人才培养难以满足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近年来,建筑专业细分造成专业口径过窄,培养目标过专,就业导向单一,适应度不足,难以适应现代建筑企业对建筑技术技能人才的综合性、跨界性和多元化的需求,致使部分毕业生存在就业瓶颈,职业发展后劲乏力。

(三) 教学内容滞后,新技术技能实训不足

在建筑产业升级背景下,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建筑信息化智能化等发展迅猛,建筑“四新”技术日新月异,受多方面主客观因素影响,教学内容往往滞后于建筑技术的更新;同时,校企合作不够深入,受到实际工程实训机会少、模拟实训自身局限性、教学组织缺乏灵活性等因素影响,导致学生新技术技能训练有限,岗位技能尤其是综合能力不足,难以胜任产业升级下的职业岗位要求。

(四) 思政与创新教育仍需加强

由于唯技能评价标准的导向,客观上造成高职德育工作的相对弱化。目前高职教育普遍存在重学校发展扩大规模,轻思想政治工作;重专业技能培养,轻思想政治素质提高;重专业课程构建,轻课程思政建设;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高等职业教育以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教育同质化、形式化,与专业教育融合度低,师资缺乏等因素造成对学生创新精神与能力培养的不足。

以百城提质建设为抓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建筑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也面临传统技能人才可能在建筑产业转型升级中遭遇就业与发展困难的窘境。因此,必须积极探索建筑高等职业教育改革路径,提高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才能更好地服务建筑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百城提质背景下建筑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路径

(一) 构建思政教育体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充分认识育才先育人的重要性,转变重技能轻德育的观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明确“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构建思政教育体系,全面实施“三全育人”,把思政教育融入课堂、融入校园、融入生活。

(二) 紧扣建筑产业升级,打造“新”建筑专业

在建筑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建筑职业教育必须对接产业需求,提升、整合传统建筑专业,打造“新”建筑专业和高水平的特色专业群,以全面服务建筑产业升级发展。

(三) 创新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

一是确立学校和企业双主体培养,强调校企双方对等的主体地位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责、权、利,以促进校企双方互利共赢,协调发展。

二是深化产教融合,促进专业群与产业链、岗位链融合,“以链建群”,打破专业壁垒,实施专业集群发展;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融合,遵循建筑工程建设规律将教学过程融入生产过程,实现学做一体化;专业课程与生产项目融合,将“课程项目化”,实现理实一体化;学历证书与 X 证书融合,将职业技能标准融入课程体系,实现书证融通。

三是持续推进现代师徒制,学生即学徒,学习即工作,采取双导师制和灵活多样的工学交替形式,促进理论知识与岗位技能的融会贯通,加强综合能力的培养。

(四) 构建专业群模块化课程体系

以专业岗位群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岗位

描述、任务分析、能力定位”为依据,以职业岗位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素养目标为主线,对接建筑行业职业标准及 X 证书标准,依据“基础通用、资源共享、模块互选”的原则,构建专业群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以满足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在职业技能多元化、专业知识与技能融会贯通和综合应用方面的要求。

四、百城提质背景下建筑职业教育改革的实践

在百城提质和建筑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在职业教育双高建设的大环境下,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索和实践建筑职业教育的改革路径,以产业需求建专业,以技术发展改内容,以办学主体促改革,以学生志趣变方法,以内外资源创条件,全面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复合型建筑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以适应河南建筑产业升级发展和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需求。

(一)完善思政育人体系

学院紧紧围绕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目标,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完善和构建以专业教学体系、日常教育体系、管理服务体系、安全稳定体系为主体,以队伍建设体系和评估督导体系为基石的思政育人体系,使思政育人工作贯穿学校教学、管理、服务、安全各方面。办好思政理论课,完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深入挖掘建筑专业知识中所蕴含的思政价值和德育元素,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中;繁荣校园文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教育活动,加强互联网育人功能,全面深化“321”学生导师计划,领导干部通过联系党(团)支部、班级、宿舍,做好学生们的成长导师和生活德育导师;强化校园政治安全,加强国家安全教育 and 网络舆情管控,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培育思政课教学创新团队,加强专职教师课程思政培训,构建思政工作督导和评估制度,形成从个体到总体、从课内到课外、从线上到线下全面覆盖的“三全育人”格局。

(二)打造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特色专业(群)

学院以百城提质和河南建筑产业转型升级为契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围绕建筑装配化、绿色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凝练专业特色,打造适应建筑产业升级的特色专业(群)。

为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先后设立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等多个新建筑专业;为适应装配式建筑发展,设立了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等专业,校企合作建设装配式建

筑技术训练中心;为顺应 BIM、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建筑业应用推广,全院多数专业增设 BIM 技术相关课程,校企合作建设 BIM 应用研训中心;建筑经济管理专业调整为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建筑会计专业调整为大数据与会计专业。

特别是发现由于高铁的快速发展,高速铁路在运营期的各种测量、监测和线路维护等需求增加,高精度测量、精确监测、精准维护等交叉学科和复杂工程技术应用人才匮乏。学院迅速依托并整合工程测量技术、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等专业,设立高铁精测精调专业,并与北斗万方测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校企合作,成立现代学徒制班,毕业生供不应求。

在此基础上,基于“基础相同、技术相通、岗位相近”的原则,以建筑产业链内在逻辑为主线,构建分别以建筑工程技术、建筑造价、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为核心的五大特色专业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作为河南省高水平专业群发挥引领作用,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集群发展态势。

(三)创新双主体、四阶段的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学院以河南省建筑职业教育集团为依托,与省内外 20 余家大中型建筑企业深度合作,在建筑工程技术等五个特色专业群的 10 多个专业持续推进“双主体、双导师、双身份”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

1. 学院积极探索实践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强化双主体培养。双方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构建、师资队伍建设和、教科研资源库建设、新型教材编写、典型工作任务开发、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开展多样化、深层次的合作,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互利共赢”的校企合作局面。

一是推进产业学院的实体运行,与奥的斯电梯管理有限公司在校企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基础上打造电梯技术产业学院,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和“三培养一服务”工作。

二是建设混合所有制技术服务机构,与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合作成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成为集技术开发、工程检测服务、现代学徒制培养及技术培训为一体的检测技术服务中心。

三是引企入校,与河南兴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作,创办技能大师李维工作室,学生在工作室边学习边工作。

2. 在以专业群与产业链相融合、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融合、专业课程与生产项目相融合、学历证书与 X 证书相融合为主线的产教融合模式下,进一步凝

练四阶梯四结合两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如图1。



图1 四阶梯四结合两融通培养模式

根据认知和技能成长规律,将整个教学过程分为“职业认知、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技能、综合职业能力”四个阶段:职业认知阶段在第1学期,突出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人文体育素质、职业认知与体验;专业基本技能阶段在第2、3学期,突出专业群基础知识、通用技能的培养,强调理实并重、模拟训练;岗位技能阶段在第4、5学期,突出学生专业知识、岗位技能、就业能力的培养,强调课程项目化,工学交替,跟岗实习;综合职业能力阶段在第六学期,突出在实际工程中的职业精神与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强调顶岗、轮岗实习。

在四阶段培养中,强调教学标准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相结合,课证融合;实习实训与技能大赛相结合,相互促进;学校考核与企业评价相结合,多元评价;专业教师与技术专家相结合,双师培育。同时将思政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融汇贯通到四阶段,强调思政教育与技能培养相融通,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通。

目前,开展的“1+X证书”有建筑工程识图、建筑信息模型、装配式建筑构件制作与安装、虚拟现实应用开发、Web前端开发、财务共享服务等6种,2020年约600名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实现双证毕业。

赛训结合成效显著,技能竞赛成绩斐然,2020年在建筑工程识图、建筑装饰技术、网络管理系统、建筑装配施工员(构件制作与安装、构件深化设计)等国家级、省级技能竞赛中获得一等奖8项,二、三等奖多项。

(四)重构以典型工作任务为主体的模块化专业群课程体系

模块化专业群课程体系的构建以基础通用、资源共享、模块互选为原则,强调课程项目化,以岗位胜任为核心设置项目,整合内容,实现理实一体。课程模块具有灵活、独立的特性,可以职业岗位需求变化为导向,以建筑业四新技术为引领,及时增减、更新。模块化课程适合弹性化的教学组织和管理,利

于工学交替,利于互联网+教学资源库建设,满足学生跨专业、个性化、一专多能的学习需求。

以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为例,课程模块首先分为四个层次,即公共课程模块、专业群平台课程模块、岗位课程模块、职业拓展模块;公共课程模块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和职业规划;专业群平台课程主要是专业群共享的、通用的基础性专业课程,如建筑识图、建筑构造、建筑CAD等;岗位课程模块主要是专业群面向的主要岗位和相应X证书的项目化课程;职业拓展模块是对岗位职业技能的提高和综合职业能力的提升,为学生的后期发展奠定基础。

模块化课程的核心是校企合作开发的典型工作任务。依据每个职业岗位的工作领域和技能要求,凝练出若干不同难度层次的典型工作任务,形成专业群典型任务模型,如图2。典型任务模块随建筑产业发展动态更新,既满足技能训练要求,满足X证书标准要求,满足分层次教学要求,也满足专业群资源共享、集约建设、协同发展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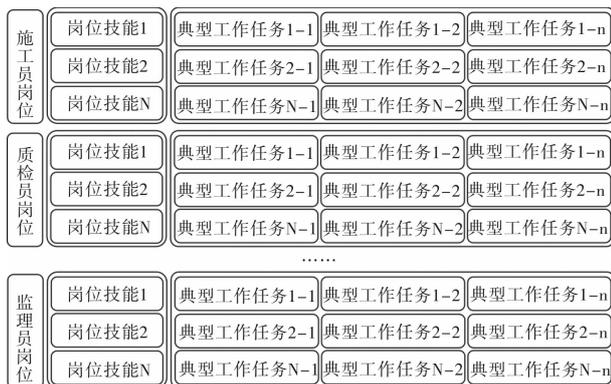


图2 典型工作任务模型

五、结束语

在以百城提质为抓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河南建筑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河南建院积极探索和实践建筑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途径,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全面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以建筑产业需求动态调整、建设新建筑专业(群),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重构模块化课程体系,培养跨岗位、多元化的复合型、创新型建筑技术技能人才,以更好地适应学生成才和职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推进学校特色发展和创新发展,更好地服务河南建筑产业升级和中原经济社会发展。

(责任编辑 许峻)
(下转第99页)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协同模式研究

陈晓璇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背景下,探析二者的关联性、必要性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找寻创新创业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结合点,并探讨了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协同模式。

关键词:创新创业;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18

中图分类号:G641;G64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095-05

大学生的创业创新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社会对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校在开展素质教育的同时,必须对创新创业教育重视起来,尤其是要积极探究并寻找有效的办法,把创新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让大学生在离开校园步入社会的时候,知识理论与实践能力并存,让二者的有机结合为大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石。

一、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效结合的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为创新创业教育带来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在理论上为大学生提供政治层面的思想意识,同时还会为大学生未来工作和生活提供指导,它是一门实践性与指导性并存的一门学科。要想倡导和实行好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推广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渠道,其作为大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也应当及时紧跟时代发展,从思想政治角度出发,用大学生感兴趣的时事政治对大学生创业就业进行指导。二者的有效结合旨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相互融合,以

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为目标,借助思想政治教育优化创业环境,激发大学生自主创业积极性。同时也旨在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理念,确保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从而实现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创新创业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全新的教学视角

在我国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之前,国外的高校已经开始进行创新创业的教育,尤其是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有着显著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其目的就是为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就能学习到一系列大学生应具备的职业素养和能力,立足于创新创业的视角,通过创新创业项目活动、创新创业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创业成功人士的经验分享等形式,最终让大学生获得个人能力、个人品质、职业素质等方面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教育性、先进性和引领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创新创业教育也是高校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时期的关键点,因此,二者的有效结合不仅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是教育改革的需要,同时也可以借助创新创业教育里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和创业成功

收稿日期:2020-12-18

基金项目: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协同模式研究”(2020YBLX009)

作者简介:陈晓璇(1992—),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率。

(三) 国家人才战略工作发展趋势使然

从当今的国际发展形势和我国社会需求来看,拥有创新型人才是竞争发展的关键因素。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职业能力、职业素养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同时也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的目标相一致。创新创业教育可以让大学生在校园里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了解国家未来发展和社会需求最新动态,形成时刻关注国家大事和国家相关政策方针的习惯,站在政治角度思考问题,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更加灵活,内容更有针对性。而思想政治教育又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导依据和发展实施的新模式,二者的有效结合也为高校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效结合的因素

(一) 目标

创新创业教育,强调的是以创新创业基本素质为核心的职业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的教育,培养具有首创精神、冒险精神、创业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交、管理等技能的、有着开创性个性的人。

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意识形态形成的关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由此看来,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相一致,都是为了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则是培养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二两者在目标理念上具有相通相融的特质,用符合社会发展的思想政治意识去提升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使大学生有把理论知识转化为行动实践的能力。

(二) 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相关的理论知识开展教育教学,从而树立大学生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等等,重点在于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层面的教育和培养。

而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并掌握创新创业的内涵与特征、企业家精神和品质、创新创业的形势与政策、创新创业个人能力和团队精神等基础性和实践性知识,重点在于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教育和培养。

两者在主要内容上可以实现教学内容的有效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正面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良好的创业操守及纯正的创业动机。创新创业教育可以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更大限度激发每个学生的潜能潜质;可以进一步将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内容的理想信念教育由抽象变得更具体。^[1]

(三) 形式

思想政治教育一般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教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知识学习,并结合时代发展规律,着重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现实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更偏重于理论教学形式。

创新创业教育一般侧重于实践活动的教学,通过对商业计划书的撰写、小组模拟商业实践活动、组织到企业参访调研等形式开展,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去把理论化为实践能力,了解创业风险与机会,学会用企业家的思维去创业,创新创业教育更多侧重的是实践教学形式。

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在教学形式上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理论教学的指导依据,提升创新创业教育中的行为规范和思想政治指导,引导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更加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规范。创新创业教育可以在教学形式上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实践教学的指导依据,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创新性和实践性,引导学生在学习思想政治的同时培养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和方针政策的习惯。

三、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协同模式的必要性

(一) 为大学生树立良好的创业就业价值观

科学正确的创业观是指在正确认识自我的前提下,客观的评价市场,合理的判断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需要完美结合的创业观念。^[2]当代大学生普遍缺少正确的创业就业价值观,缺乏沉着、冷静稳定的心态,导致大学生在创业中出现的价值观不稳定,价值取向迷茫,社会责任意识淡漠等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不仅仅需要去培养大学生正确的创业就业价值观,同时更加应该注重对创业就业认知和道德的培养,让大学生在创业就业过程中,有过硬的抗压能力和良好的心态素质,可以从容冷静地面对创业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尤其是在面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职业道德等层面,能有坚持正确决策的决心,从大局出发,在确保不违法不犯法,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不

受侵害的前提下再考虑个人利益。

(二)为大学生提升创业就业能力

想要提升大学生创业就业的能力,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大学生步入社会前,他们对社会的认知程度较低,也没有足够的职业经历和人际交往,对各行各业的发展和前景的认识也不充足,又缺乏应对市场变换的市场经验。

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可以培养大学生们必不可少的能力,如培养他们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激发对创新创业的热情,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可以了解并正确看待到当今社会就业压力大、剩余劳动力过多、创业之路坎坷等问题,培养大学生有良好的抗压和抗打击能力,能够正确处理创业就业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打击,从而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三)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创业就业心态

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案例分析的教学模式,引导大学生对创业就业的各种观念有一定的认识了解,模拟大学生面临各种创业就业的挫折和困难时,应怎样保持良好的心态去积极面对并加以解决。同时也应当通过小组活动或者创新创业大赛等形式,检验大学生是否掌握了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在团队合作中能否保持独立思考的同时又兼顾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优良品质。

(四)为大学生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

高校应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职业素养的教育教学,让学生懂得脚踏实地,有“干一行,爱一行”的奋斗精神,任何岗位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专业技术得到锻炼提升,从而获得升职加薪等较好的待遇。尤其是要根据大学生不同的性格去培养他们的职业素养,发现他们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教会他们拥有企业家的人格,用企业家的精神去创业就业,提前为大学生在今后创业就业的道路上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创新创业教育辅助思想政治教育

(一)有利于教育教学的巩固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内容是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现实教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学习,二者充分地将理论学习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创新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方法都强调顺应社会时代的发展,强调人的思想意识和实践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发展,不论是从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上来看,两者都有较强的共通性、包容性。

思想政治教育注重的是培养大学生思想层面和政治意识层面的发展,而创新创业教育则是更加注

重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发展,把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就是用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思想政治意识去引导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使大学生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用正确的思想意识转化为行动。

(二)有利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随着我国对高校教育的不断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也在逐渐加强,尤其是实践性的要求,将创新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就可以有效地提高创新创业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普及率,切实有效推进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以此触发不同专业的学生思考创新创业教育该如何和自己所学专业相结合,让学生有意识地去强化自身的综合实践能力。同时,创新创业教育也可以充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课,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奠定基础,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和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是促进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持续有效提升,更有利于创新创业人才的全面培养,缓解就业压力。

(三)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

高校应积极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将其作为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将能够切实有效推进教学活动取得良好进展,提升总体的教学效果。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着缺乏创新性、实践性、与时俱进性、时效性等问题。而创新创业教育与我国所倡导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完全相符,创新创业教育充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同时突显出了时代发展的特征,提升学生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能力。^[3]从上述观点来看,创新创业教育不仅仅是顺应的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满足我国高校对培养高素质人才提出的教学改革需求。

五、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偏差

目前,我国高校开展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极少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意识层面去授课,没有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学生。而思想政治教育类的课程,也是极少从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性教学模式层面去授课,对于创新意识、团队合作、抗压能力等精神品质的重视也比较欠缺。二者在教学内容方面仍然缺少融合性,没有较强的交叉渗透,这样就容易造成大学生缺少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意识层面的创业就业价值观,使得大学生在今后创业就业中遇到挫折和打击

时,没有坚定的信心和明确的目标,加大了大学生创业失败或者总是不停换工作的概率。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新创业知识匮乏

经验丰富的教师,清楚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整体能力的引导是有多么重要,同时也善于在课堂上运用合适的教学模式来激发大学生的创业兴趣和创业思维,并通过案例分析等形式,让学生沉浸在运用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结合专业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术能力。

在我国高校中担任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任课教师,大多数没有管理过商业部门或自主创业的经验,“双师型”教师的数量也不是特别多,单纯的课本理论知识难以去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热情,更没有生动形象的案例分析或丰富的创业实践经验,这样的教育模式就难以从实践教学层面教授大学生创新思维、创业能力等方面的培养,难于满足培养有较高素养创业者的授课目标。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单一

高校在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设置上通常偏向于专业课程创业价值观的培养变成了理论性和的通识性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让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学习意识有所淡化,对于开展因材施教、因人施教的模式也是困难重重。加上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创业价值观内容单一,理论知识占比较大,难以顾及大学生创业教育中价值观与情感的变化,这样就使得任课教师在教授相关知识理论时没有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没有根据市场大环境需求的变化去不同程度地引导学生要应对不同阶段性的市场规律,也没有对大学生在不同环境中所需要的不同类型职业素养的进行培养。由此看来,因为授课方式的不足,就会减弱对大学生创业就业中创新意识和灵活应变能力的培养。

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协同模式

(一)教育教学理念的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大学生基本的思想政治意识教育,同时也要去塑造大学生步入社会上所需的职业必备素养。

应注重思想政治理论与创新创业实践的有机融合,通过对成果故事案例的分析、自我测试、课堂演练等方式进行授课指导,通过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融合,不仅能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也能提升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从

而达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目标。因此,要在培育时代新人的整体观中把握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课教学的内在统一性,积极发挥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课教学之间的融合功效。^[4]

(二)教育教学内容的融合

从创新创业教育来看,应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导作用,从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及精神等方面教育,培养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所需要的思想品质和职业精神。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有及时吸取经验教训的能力、正确认识挫折和抵抗挫折的能力、正确认识自我过错的能力,让大学生尽快树立良好的创业素质,形成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从而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使其能灵活应对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各种挑战和挫折。

(三)实践活动的融合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应以创新创业内容为载体,让思想政治教育变得触手可及。作为高校,应该对创新创业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探讨交流,寻求二者相融合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在实践活动上面的融合,让大学生能自主地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提升大学生在实践中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和社会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入手,积极鼓励大学生针对目前大数据创业的优劣势、就业现状和解决办法等方面展开调查分析,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和对国家相关方针政策的理解,为大学生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校外实践中,按照高校的教学目标,组织带领大学生到知名创业企业参观访问,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企业家精神的魅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与创业成功者的交谈中,也能学习到创业的艰辛和毅力,同时也能了解到自身在创业就业中所缺少的部分,能够提升大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四)培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创新创业知识

高校教师应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创新创业新理念,将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充分结合起来。高校应提供给教师优质的资源平台,与有创新创业经验的教师和高科专业教师多交流探讨,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方法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在保证专业基础课的前提下,加强对教师的创新创业知识培训,组织教师与创业成功者交流经验,共同寻找提高大学生创业素养的所面临的问题和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 [1] 郭立群. 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同行”的思考 [EB/OL]. [http://theory. people. com. cn/n1/2020/0320/c40531-31640509. html](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320/c40531-31640509.html).
- [2] 刘咏梅, 习洁, 论高校德育教育中个体创业观的培养 [J]. 理论与改革, 2009(2):107-109.

- [3] 彭坤. 基于高职院校学生社团建设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以山东某高职院校创新创业类社团为例 [J]. 明日风尚, 2017(4):128-129.
- [4] 陈宝生.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N]. 人民日报, 2019-04-23.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EN Xiaoxu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ir relevance, necessity and problems. To seek for the combination point betwee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discusses the collaborative mode of integra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上接第 94 页)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Reform Path of Architectur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undreds of Cities Quality Improvement

JIAO Tao, YUAN Xinhua

(Hen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Zhengzhou, Henan 45006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undreds of Cities Quality Improvemen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Henan continues to optimize, transforms and upgrades rapidly, and demand for construction talent is changing. By analyz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rchitecture, this essay proposes the reform path of architectur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focuses on the refor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Hen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in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creating a characteristic professional group oriented by industry needs, innovating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with double main body and four stages, reconstructing the modular professional group curriculum system with typical work tasks as the main body.

Key words: Hundreds of Cities Quality Improvement; construction industry upgrad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practice

新时代课程思政在高校音乐鉴赏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刘旭琦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新时代,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高校贯穿教育教学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保证。课程思政是在思政课程的基础上,在各类课程中引领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世界观,注重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相结合,充分发挥各学科协同作用。高校音乐鉴赏课程作为综合素养课,在教育教学中发挥本课程的德育功能,把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贯穿课程思政全过程。

关键词:新时代;课程思政;音乐鉴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19

中图分类号:G641;J6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100-05

高校音乐鉴赏课作为高校综合素养课程,主要针对大学低年级非音乐专业学生。这一阶段的青年学生处在“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的青年学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也逐渐进入活跃阶段,课程思政在其思想引领和指导尤为重要。“才为德之资,德为才之帅”,做好课程思政的贯穿教育工作,才能培养出以人民为中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高校音乐通识教育在培养学生审美意识、提高审美能力的同时,应注重将课程思政与音乐教育教学规律相融合。应当把满足当代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音乐教育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本课程的德育功能,提高文化自信能力,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怀、树立青年一代“四个自信”。

一、新时代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九大标志着我国进入新时代,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强调“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在思政课程的基础上,对各类学科建设提出新的要求,结合课程的育人功能和教师的育人职责,逐步从单一的“思政课程”向多元化的“课程思政”相转变。推进“课程思政”实践,是完成新时代教

育教学的新定位、新要求、新任务的内在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新青年深刻认同并积极践行的思想教育,青少年时期是大学生思想活跃充满活力的时期,是最需要学校的引导和教育栽培的时期。高校课程围绕思政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育人模式树立大学生成人成才的目标,加强马克思主义原理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教育,就是“要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1],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引导青年大学生积极向上的意识形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课程思政是以大学生思想政治观为理论基础构建各类课程的一体化育人体系,具有综合性、创造性和渗透性的特点,其教育内容由专业教育课、综合素养课和“第二课堂”构成,可在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实践实训类课程中融入。引领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更好的确育人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这也是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要求的体现。

课程思政涉及各专业各种类的课程,通过在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个方面相统一的教学原则基础上,各门课程能够从中融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内容,明确立德树人的育

收稿日期:2021-06-17

作者简介:刘旭琦(1989—),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教师,主要从事钢琴音乐教学研究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人目标和塑造学生价值观为中心的教学过程。在加强思政理论学习的同时,教育效果与学生接受程度以及社会的需要,是对新时代对思政课程提出的新要求。应对新时代的新要求,高校不断开拓创新推动教育教学目标改革、优化课程建设,修订相关教材,发掘梳理各门课程的思想教育元素,把这些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环节,更好地引导和把握大学生思想意识形态。新时代高校培育的正是以厚重的中国文化为德行养成,延续传承并面向未来,迎接挑战的新时代人才,这正是传承美德又开拓创新“文化自信”的教育自信!正是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既相互联系但又有不同,课程思政是落实在各类学科专业的基础上融入思政理论内容。这个理念最先由上海提出,经过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最终不断发展并形成理论体系。2014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2],高校教育要坚持立德为先,通过教育来引导学生、感化学生、激励学生。从而坚持以学生为本,通过适合学生年龄阶段的教育方式来塑造学生、发展学生、改变学生从而达到“树人”“育人”目的。高校作为培养新时代人才的主要阵地,高校的思政和德育工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轻视道德价值观的教育,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人才竞争的今天,不顾忌祖国的培养,向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提供自己的知识,为他国谋取利益遏制我国发展的知识分子,已然没有了坚定的爱国之心坚决为祖国奉献自己力量的政治信仰,思想是腐朽的。这对我国高校育人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因时而化、因时而进、因时而新”,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

二、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思政建设现状与成效分析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利用好课堂这个主渠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and 针对性,其他各门课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3]。学校教育要时刻围绕课堂,在整个教学环节中注重思政内容的引导:专业教育课,是以专业知识为主进行专业类科目的学习课程,多为必修课程,是大学生专业知识的基础也是学习最多的科目种类;综合素养课,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拓宽学生的知识范围,其中音乐鉴赏课程属于这类科目,为选修课程;“第二课堂”,是主课堂的延伸课程,让学生结合第一课堂学习内容自主创新、开发探究式

学习,可参加专业比赛和竞赛等能力项目。在各门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理论内容,这要求教师自身具有扎实的政治理论基础,能够将本专业课的知识点与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点很自然的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丰富了专业课的内容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的重新整合和阐释。为了进一步了解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思政建设情况,分别从教师、学生、教材、课程思政效果,四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对于“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思政建设主要从哪些方面开展”这一问题,由郑州已开设音乐鉴赏的4所高校任课教师,共25名专业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式调查。通过访谈,发现教师都一致认为在音乐鉴赏课程中融入思政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并希望通过更多创新的教育方式对本课程进行深度挖掘更多方面的融入思政内容。有72%的教师认为高校音乐鉴赏课程应在音乐作品中把爱国主义情怀、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与信念融入课堂教学中;68%的教师认为可以从中西方不同的音乐作品入手,让学生感受中国音乐文化的魅力,加强对民族音乐的认识与了解,更好的传承民族音乐文化;88%的教师认为音乐鉴赏课程要发挥美育作用,不仅通过鉴赏音乐作品提高审美能力,更应该引导学生塑造完美人性培养积极向上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及发现生活中美的心灵。

通过以上调查问卷及访谈,教师对课程思政的思考和探索需要构建合理的教育教学体系,要以德为先,德育教育为指导,思想政治理论内容与专业知识相结合,真正实现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一个重大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要完善课程体系,解决好各类课程和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发挥融入式、嵌入式、渗透式的立德树人协同效应”^[4]。

高校音乐鉴赏课程作为高校的辅修课程,主要针对大学低年级非音乐专业学生^[5]。这一阶段的青年学生处在“拔节孕穗期”,思想上的引领、课程思政的贯穿尤为重要。大学通识教育在培养学生审美意识、提高审美能力的同时,应注重将课程思政与音乐教育相融合。目前高校音乐鉴赏课程的开设由各高校根据自身学生及教师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但音乐鉴赏课程因地域文化与学校理念的差异,所以较难找到合适的教材进行统一教学,教授的内容会受到因音乐专业教师自身的专业及研究方向存在的差异的影响,而侧重不同教材的教学活动。查阅关于音乐鉴赏课程的教材,属于全国普通高校公共艺术出版及“十二五”“十三五”

规划教材的有,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大学音乐鉴赏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音乐鉴赏》、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赏析》、高等教育出版的《音乐鉴赏新编》。分析不同版本的音乐鉴赏教材中可发现,其鉴赏内容包括:乐理基础、西方音乐、民族音乐及戏曲等几个方面。内容多以专业知识为主的梳理式内容,理论性较强,音乐鉴赏课程属于音乐理论专业课中的一部分,音乐专业必修的学生与全校非专业选修的同学,在选用教材的难度和深度有所不同(如表1)。在这些教材中,有55%的教师注重乐理基础知识的讲授,让非专业选修的学生掌握例如认识五线谱及节奏等最基础的乐理基础知识,有67%的教师在中西方音乐史部分进行重点讲授,例如不同西方时期音乐的特点和不同朝代中国音乐的特点,有88%的教师都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音乐作品进行鉴赏和分析,通过创作背景的介绍更深层次的理解作品表达的内容与情感。

表1 教材的选用

教材选用	占比
教师注重乐理基础知识的讲授,让非专业选修的学生掌握最基础的乐理基础知识	55%
教师在中西方音乐史部分进行重点讲授	67%
教师都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音乐作品进行鉴赏和分析通过创作背景的介绍更深层次的理解作品表达的内容与情感	88%

综合调查结果结合高校普遍开设音乐鉴赏课程的实际情况,在全校非专业通识课程的课堂中融入思政元素并结合课程教学内容,更好地把具有德育功能的音乐作品融入课堂中去,是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一环。教授专业性太强的理论知识,非音乐专业的学生缺乏一定的音乐基础,会大大降低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度及知识获取,这样对思政内容的融入也较为被动。应以学生为中心,制定符合学生心理需求的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满足学生对音乐鉴赏课程知识需求的同时,从情感出发加入符合作品乐思的思政内容融合与课堂。

通过对我校及郑州市已开设音乐鉴赏课程的4所高校进行调查,在全校各专业选择音乐鉴赏课程的学生中,关于“您期待从音乐鉴赏课程中获得什么能力”这一问题中,有65%的大学生希望能够了解音乐,增强自己的艺术欣赏能力;20%的大学生想通过音乐鉴赏课程,学习理论知识,掌握一定的识谱能力,可以弹奏吉他或者口琴等乐器;15%的大学生有一定音乐基础,想进一步学习音乐相关内容,更加丰富提高自己。

结合以上特点,制定相关的教学内容满足不同层次学生需求,应以兴趣为出发点,抓住大学生的心

理需求。以兴趣为主导选择学生感兴趣的音乐作品,以经典的中国作品为主围绕音乐创作的背景及意义,通过介绍作曲家的生平及音乐创作时的背景,重温历史弘扬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学生分析音乐中的和声效果,在音乐旋律高低起伏、强弱对比中感受艺术之美,提高艺术修养。抓好课堂这一关键环节,结合“以人为本”的艺术教育育人观念,在音乐作品鉴赏的同时深入学生内心深处,用音乐之美润化心灵,音乐情感与政治情感产生共鸣,点燃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报国热情,真正把思政内容融入课堂,润化学生。在此课程教学过程中插入爱国主义教育,强化民族精神,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引入音乐鉴赏课程的效果如何”这一问题中,选择“效果很好”的为66%,选择“效果一般”的为24%,选择“效果不好”的为10%。

其中有72%的大学生表示民族音乐家们用音乐表达深厚的爱国之情,可以在鉴赏中国音乐作品中感受到中国精神。48%的大学生能够感受到中西方音乐作品的差异,了解民族音乐文化背景对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产生兴趣。56%的大学生认为通过鉴赏中国音乐作品在提高审美能力的同时,陶冶爱国主义情怀。在作品中学习一定的理论知识,更好地引导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在“润物细无声”的鉴赏课程中建立文化自信。

通过以上从教师、学生、教材、课程思政效果,四个方面进行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当今部分被调查的高校教师,都能够意识到在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相关内容。但整体教师队伍思政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知识更新不够及时,不能够把最新的思政内容融入课堂中。大学生对于音乐鉴赏课程从提高自身专业知识、培养审美能力方面的发展需求是积极的。可能受到对音乐专业认知不够的影响,大学生对于自身综合素质、理论知识掌握的发展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与要求,也没有具体实际的计划性行动,对音乐理解缺乏主动性。教材的种类及选取方式较单一,为丰富课堂内容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可以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对作品进行鉴赏分析,调动所有学生的积极性。对于课程思政效果,大学生对音乐鉴赏教育的育人功能有一定的认知,从学生感兴趣的音乐作品入手融入思政内容是主动接受的,但对音乐教育全面发展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意义还不够了解。从侧面反映出当今高校的音乐鉴赏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发挥的育人功能较弱,学生音乐理论水平略低,音乐鉴赏课程在高校中的地位也处于弱势状态,对其育人功能及课程思政的建设的

探索有待提高。

三、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思政在教学中的实施路径

立德树人是学校课程思政理念的基本遵循,已成为课堂教学的具体要求,明确要求高校落实课程育人工作。由此探索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是高校思政建设的突破,是高校教育教学的革新。从课程思政课程体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课程思政融合专业衔接体系、定制课程思政教学路径四个方面进行课程思政的实践探讨。

一是打造以德育为教育目标的课程体系。当今社会飞速发展,人们对科技知识的开发和应用不断更新的同时,更应注重价值观的引领。在专业课程讲授的基础上正面对学生进行引导,避免思政教育成为“孤岛”的现象,有利于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立足在专业知识上的价值观教育,让音乐鉴赏课程激发学生对艺术的兴趣,为价值观引导提供理论的依据和内容的支撑。这样学生从内心更容易接受,德育教育通过专业课程进一步内化形成自身内在的价值观。学生在音乐鉴赏课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和综合素质,通过鉴赏音乐作品对中国音乐作品及民族音乐家的认识中,树立文化自信、热爱祖国之情,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是打造课程全过程同向同行的育人体系。高校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各个课程教学环节中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增强社会责任感及团结创新精神,在实践课程中锻炼实践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所要求的那样,我们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上好思政课,另一方面要做好课程思政的建设。深入挖掘音乐鉴赏课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使音乐基础知识内容与思想价值引领相结合,充分发挥本课程的育人作用和德育功能,通过对音乐作品的分析与鉴赏使全课程德育目标变成现实。抓住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的契合点,在音乐鉴赏课程中立足音乐作品本身,把思政元素与鉴赏教学相融合,发挥音乐教育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相互促进作用。因此,挖掘音乐鉴赏课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政元素巧妙的融入课堂教学中,才是实现协同育人的正途。

三是打造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衔接体系。音乐鉴赏,重在“鉴赏”,与音乐欣赏在概念和程度上有所不同。“鉴赏”本意为鉴定和欣赏艺术品、音乐作品、文物等。但作为一门课程,“音乐鉴赏”更好的理解是:通过音乐作品更好地让学生对音乐艺术

形象进行感受、理解和评论的一种感知体验和思维活动的过程。而“欣赏”则更倾向于学生因个人喜好或爱好对一些音乐作品自主的进行观看,“音乐欣赏”多在乐趣中享受音乐,而音乐鉴赏是在欣赏的基础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判断、鉴别”的教学活动。选修课作为通识教育,可结合本地域音乐文化特色选取音乐作品,在音乐作品的选择上更好地融入本地音乐特色,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民族传统音乐,具有价值观和精神指引的作用。学生主动地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能力对音乐作品进行聆听和再创作,了解当地音乐文化主动去感受音乐艺术带来的美。正如课程思政建设要求“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如盐在水一般自然而然地把德育、美育融入音乐鉴赏课程中去。

四是打造具有特色内容的音乐鉴赏课程思政教学路径。我校作为四所河南省戏曲成果展示的高校之一,拥有良好的教学资源,更应该让非音乐学院的学生,通过音乐鉴赏通识课程把河南戏曲作品深入到课堂鉴赏中去。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为培养大学生了解和传承中原文化,感受中国传统音乐之美,抒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之情,建立文化自信。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河南音乐文化之美、河南戏曲之美,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怀。为了更好地结合教材贯穿课程思政,以音乐鉴赏课程为载体,立足中原特色以河南省戏曲、中国传统器乐、声音作品作为鉴赏内容。教学内容以河南省戏曲特色文化为主题,根据学期课时设置,可分为32个课时,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课程设计。第一部分,立足中原以河南省戏曲文化为课程的引入点,结合每学期“戏曲进校园”活动中所演奏的曲目,从作品的创作背景、演唱特点、歌词配器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例如豫剧《朝阳沟》《挑山女人》,歌颂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劳动者的奉献精神,学生通过对作品的学习更深刻的理解作品所体现的中国精神、河南精神。第二部分,配合戏曲作品中所使用的民族传统器乐为拓展,进一步讲解中国传统器乐在世界音乐的地位和贡献。例如认识琵琶、二胡、唢呐等民族独有的乐器,欣赏民族器乐重奏作品感受民族乐器与西方乐器不同音色之美。第三部分,实践环节,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作品,进行模仿表演。深入作品体现内涵,更好地让学生感受和传承传统文化艺术。从感受作品的情感内容和思想内涵中获得丰富的审美体验,与自身思想与情感产生共情并升华,转化为欣赏者深刻而持久的自觉行为。这是音乐审美的最高层次,也是音乐鉴赏的本质所在。通过了解音乐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对音乐进行

不同角度的审美分析,深度挖掘音乐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领略音乐的深层魅力,感受其蕴含的精神力量。基于课程思政的时代背景,促进学生艺术修养和思想道德的全面提高。从音乐作品入手,发挥本课程的德育功能,把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贯穿课程思政全过程。丰富上课形式,在欣赏的同时学习一定的音乐作品,做民族艺术文化的传承人,培养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结语

这种“欣赏性德育模式”,把作品中的精神与自我很自然的融合一起,引导学生在欣赏中完成思想政治教育。音乐鉴赏教育以音乐作品丰富的情感感染特称潜移默化地对学生情感得到升华,培养其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爱国情怀、建立审美观、提高审美能力。本文通过对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做出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将音乐鉴赏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不断提高教师政治理论基础、加强音乐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构建有利

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音乐鉴赏课程培养体系、立足本地音乐文化特色打造适合本校音乐鉴赏作品分析体系充分发挥德育育人功能的路径,以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希望为促进我校课堂思政建设、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的开展做一点贡献。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7-02-28.
- [2] 张晓昀.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传承及其当代价值[D].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2017.
- [3] 张玉.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吸引力问题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 [4] 艾四林. 以更强的自信办好思政课[J].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19(1).
- [5] 曹建业. 高校音乐教学中流行音乐资源的调查与研究: 以冀东三所高校为例[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17.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Music Appreciation Teaching in New Era

LIU xuqi

(School of Mechanotronics and Vehicle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a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and adhering to the direction of socialist school running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train socialist successors through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n the basi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uides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and world outlook,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value shaping,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ynergistic role of various disciplines. College music appreciation course, as a comprehensive quality course, plays its moral function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trains students' good moral quality throughout the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ocess.

Key words: new era; ideology and politics course; music appreciation

高校聋生体育教学实现快乐融合路径研究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王献福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a. 体育学院; b. 康体测评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特教聋人学生体育教学进行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对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教学院专家、三届聋人学生和手语专业学生进行调研,总结教学经验和不足,提出聋生体育教学实现快乐融合的路径:一是重塑聋生体育教学理念;二是重塑聋生体育快乐观;三是重视课程思政、“微课”和武术特色课程在聋生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四是高校体育教师与时俱进,一专多能。提升我校聋生体育教学水平,也为同行提供借鉴。

关键词:高校;聋生;体育教学;快乐融合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20

中图分类号:G762;G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105-04

一、前言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残疾人占世界总人口约10%,重视特殊教育已成为世界共识。在课程思政的教育思想指引下,强力发展特殊教育是我国教育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推进教育公平的社会背景下,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作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第一个创办聋人高等教育的院校,自从2001年招收(高考通常采用单招形式)聋人学生以来,我校公共体育教学始终采取与听人混合编班授课的教学模式,经过近二十年的教学实践,取得了聋生高校体育教学经验,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相对听人而言,针对聋人学生缺失自信心的心理特点,采用的体育教学理念、方式和途径,要引导聋生快乐融合到体育教学过程中,对体育运动产生浓厚兴趣,积极参与到体育教学活动中,要增强学习和生活自信心,把大学体育课程融入“课堂思政”元素,尤其借助武术、足球、篮球等教学平台,充分挖掘各类体育活动所富含的体育精神(中国武术传统文化、团结拼搏的集体主义精神等思政元素),疫情期间借助互联网,采用企业微信、雨课堂等APP,把“微课”纳入到大学体育教学整个过程。

二、聋人学生体育教学现状与分析

(一)聋人学生的界定

聋人学生简称聋生,就是指具有听力障碍的学生。所谓听力障碍,就是指听觉系统中的传音、感音以及对声音的综合分析的各级神经中枢发生器质性异常,而导致听力出现不同程度的减退,习惯称为耳聋。^[1]只有听力严重减退才称之为聋,其表现为患者双耳均不能听到任何声音。而听力损失未达到此严重程度者则称为听力减退。在我校近二十年的高招(特招)过程中,多数聋生天生跟正常人一样,在后天生长发育的过程中,由于疾病、服错药物等导致听力障碍,“聋而不哑”成为这部分聋生的显著特点,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聋生称呼为“聋哑人”。

随着科技事业的发展,医疗器械的改良和信息革命的快速发展,给聋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具体表现在:不断升级换代的听力助听器,听力效果更好,佩戴更便利和舒适;“5G”时代的到来及普及,使聋生与外界的沟通更直接、高效;企业微信、雨课堂、钉钉等带来线上教育的春天,提高了聋生的学习效果及学习效率。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对聋生进行有效体育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聋人学

收稿日期:2021-06-11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武术国际化传播路径研究(192400410198)

作者简介:王献福(1974—),男,河南鄢陵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体育研究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理论与实践。

生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力,前提就是如何创设有利于他们能力发挥的教学环境和条件。

(二) 聋人学生体育教学现状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特殊教育备受关注,并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教育质量和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体育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体育课程作为体育教育的核心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得到了不断完善。体育课程的教育教学过程就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过程,就是促进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成为完整的人的发展过程。多年来,学校主管领导一直重视聋生“全人教育”,并在学院领导的管理和指导下,公共体育教研室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根据聋生身心特点,制定实施一系列体育教学文件和措施,教学效果在每学期体质健康测试、学校体育协会及学院各种运动会及课余锻炼中得到检验。

通过近二十年的教学管理与实践,我校初步形成一套具有“郑工特色”的高职教育模式。与“听人”教育相比,我校体育教学具有鲜明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体育教学排课安排方面,新学期开始,以教务处安排的总课程安排表为前提,根据学校聋生单招及高考招生情况,对选项(开课体育项目)、人数(聋生、听人)进行合理布局,进行网上选课,原则上,拥有聋生的每个教学班都有同届手语专业学生混合编班在一起,便于聋生与任课教师、听人(正常学生)的沟通与交流;教学师资方面,原则上安排责任心强且经验丰富的教师,任课教师基本是普通高校师范类专业毕业,本身没有经过系统的手语培训,都是在多年的聋生体育教学过程中,经过长期教学过程中的交流而形成的手语知识,手语动作简单、不系统,具有不规范性;另外,任教聋生混合教学班的教师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教学进度、计划、教案及考核标准等教学文件方面,包括编班上课学生人数、教学场地条件等方面,都与正常体育教学班几乎没什么差别;教学评价作为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其评价标准的科学制定是重中之重,迄今为止,我校对聋生混合教学班的体育教学评价标准与正常学生教学班也是无区别的,亟待公共体育教研室进行探索和研究,制定出符合聋生体育教育特点的体育教学评价标准,不断完善聋生体育教学文件,形成切实可行的聋生体育教学体系。

(三) 聋人学生体育教学的短板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主旋律。在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人才培养和储备成为核心生产力,也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因此,创建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特殊体育教育作为人类弥补自身缺陷的一种教育活动,并在高校体育教学指导纲要中强调要针对特殊群体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合理地设置特殊体育课程。近20年来,我校经历了不断升级发展过程,2016年,我校通过教育部的评估验收,升为普通本科院校,这就造成我校在体育教学管理的各个细节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尤其是在聋生体育教学方面,在落实本科高校体育教学指导纲要要求方面,就存在一定的短板,这就要求我们在聋生体育教学过程中,善于发现自身在聋生体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通过教研活动,及时找到应对措施,以文件形式进行总结和推广,逐步完善本科高校聋生体育教学全过程,真正形成我校特殊教育的特色教育亮点。

通过对比分析,我校聋生体育教育方面存在的不足。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和任务,不同体育项目、不同规模教学班在备课、上课难度系数是不一样的,我校在配套政策上存在需要完善之处,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的工作量都一样,这就无法调动任教聋生混合班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尤其是近三年来,我院公共体育教研室在编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教师教学工作量大,教学任务繁重,每学期教学周数由原来的18周缩减到现在的16周,但专任教师的基本工作量却还是360学时,没有做出相应合理调整,严重挫伤了一线专任教师的积极性,亟待学院领导与学校主管部门和领导协调。针对我校在编班上课人数、教学场地设施条件、教学文件等方面与正常学生班基本相同,通过访谈与调研,与听人相比,聋生容易孤僻、自卑、自主参与能力弱,在学习中不能很好地发挥自我优势,无法以最佳状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这样开展教学活动,就无法很好地保证因材施教、教学进度完全一致,聋生与听人无法实现完美融合,快乐体育本源及其人文价值更难得到体现、升华,教学效果也会打一定的折扣。针对我校聋生体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短板问题,公共体育教研室广泛开展聋生体育教学教研会,并形成文字材料,为上级领导部门提供可靠信息,学校主管部门、特殊教育学院和体育学院领导不定期召开聋生体育教学协调会,采取积极有效有效的教改措施进行解决,进而完善符合我校聋人学生教育特点的体育教学体系。

三、体育教学实现快乐融合路径

(一) 重塑聋生体育教学理念

在新形势下,要切实改变我校聋人学生体育教学现状,必须首先调动他们的自主参与积极性,通过多种教学方式来提高聋生自主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与能力。这就要求参与聋生体育教学的教师与时俱进、改变特殊教育观念,重塑特殊教育理念。

体育课程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体育课程的教育教学过程就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过程,学校体育课程不仅可以教会学生体育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培养学生团结协作、拼搏、友爱、集体主义精神等良好品质,还可以进行智育、德育和美育的训练,发展学生的个性。^[2]同时,体育,作为人类文明生活的一部分,蕴涵着丰富的德育资源,是人类追求自身价值的体现。思政教育和体育教学应该是合二为一、血浓于水的关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融合过程。^[3]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基础上,力求自由的释放,个性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的价值,享受个人的快乐、成就与幸福。特殊教育是人类弥补自身缺陷的一种教育活动,作为高等特殊教育,我们应站在更高起点推进教育公平,切实保障每一位聋生充分享受到“平等、参与、共享”的受教育权。高校聋生体育教学过程就是要最大程度地消除聋生和听人的身心差异,走向两类人群彼此共生共融,即强化融合教育。

(二) 重塑聋生体育快乐观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在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而体育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观念和内涵也得到新时代的阐述。现代体育教育已摒弃了畸形教条的体育观念,重新接纳游戏的功能,逐步找回中国体育教育早已遗失的娱乐,迎来体育文化属性的回归。

高校体育教师首先应具有快乐体育观。快乐体育指的是从终身体育与个性和谐发展需要出发,把体育运动作为大学生将来的生活内容教给他们,让他们体验从事理解、掌握、创造运动的乐趣,从而激发大学生积极参加运动的自觉性的体育教学思想体系。^[4]从快乐体育观的角度,就要求从事特殊教育的体育教师具备:课堂教学手语语言要生动形象,表达准确又不失幽默诙谐感;场地器材安排明快、有序,又不失安全感;适时处理好快乐与严格的关系,又不失其平衡感;最大限度地处理好快乐与兴趣的关系,达到二者最佳结合;始终处理好快乐与教学质

量的关系,达到二者最佳课堂教学效益。

总之,在聋生体育教学的过程中,高校教师始终要站到教育强国的政治高度,具有高度责任感,对特殊教育拥有一颗敬畏之心,从聋生终身体育与个性和谐发展需要出发,让体育的娱乐功能真正回归,通过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让聋生在体育教学活动中,用灵魂来体验到从参与、理解、掌握到创造运动的乐趣,不断激发聋生对体育活动的参与兴趣,逐渐矫正补偿聋生的身心缺陷,增强生活和学习自信心,逐步实现聋生体育价值与生命意义的快乐融合。

(三) 重视课程思政教育、“微课”和武术特色课程在聋生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为了更好地实现大学体育的教育目标和育人目标,应强化课程思政教育在体育教学中的“全人”育人功能,充分运用好大学体育这个优质载体,不断丰富体育教学内容体系,把体育精神融入体育教育全过程。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5G时代的来临,企业微信、钉钉、雨课堂等APP软件已然成为线上教育热点载体和授课工具,已成为一种新的线上教学方式,尤其是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微课”在停课不听课的前提下,凸显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复合体,被称为“国术”,也是学校教育中培育勇武精神的实践途径。^[5]武术特色课程的授课内容,更适合将民族精神和中国梦核心精神融入人学过程中。武术在“立德树人”、刚健自强、增强防身自卫本领、培养审美意识和树立优美形象等方面具有自身鲜明的育人功能和特点;另外,聋生对武术套路更易于观察、学习模仿和掌握,容易激起聋生的求知学习兴趣。在聋生高校武术育人过程中,充分挖掘河南武术之乡的代表拳种,并以武术拳种为单位,从中提炼几个简单实用的组合,作为武术教育的主要教学内容,同时融入道德礼仪教育。在复学后的聋生教育教学活动中,强调教师在基本手语技能、计算机软件技术、授课创意等方面狠下基本功,充分挖掘“微课”优势,适时把课程思政内容贯穿其中,依托得天独厚的河南武术之乡底蕴,创编聋生兴趣十足的系列武术拳种简单组合套路,与体育教学实践课互为补充、遥相呼应,最终使聋生在兴趣中收获健康和快乐,同时,其缺陷也得到补偿,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

(四) 高校体育教师与时俱进,一专多能

作为特殊教育学院的聋生体育教育工作者,我校体育教师都来自普通高校体育专业毕业,虽然学

历层次和结构合理,但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特殊教育专业学习经历,要想胜任聋生体育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教学评价考验。因此,在实现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下,作为“郑工人”,必须认真学习,不断挖掘与聋生体育相关的医学、教育学、运动学、心理学相关知识,掌握聋生体育教育规律,研究适合聋生体育教育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具有创新精神,根据所教聋生特点,量身定做、不断创编一系列武术套路、体育舞蹈、球类等自编教材,持续改进和提高聋生体育教学水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鼓励我院体育教育工作者多与特殊教育学院的同仁们多进行交流、互动、学习,不忘初心,积极进行聋生体育教育科学研究,持续推动我校的聋生体育教、科研水平,争取多出教学成果,也为中国高等学校聋生体育教育理论做出点贡献。

针对聋生体育教学过程的复杂性、嬗变性、综合性、艰巨性,建议学校领导部门:重新审视聋生体育教学,进一步加大体育教学经费投入;加强对聋生体育教学的督导和科学评价,加大聋生体育课时的权重,提高聋生体育教师的福利待遇,以期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四、结语

个体天生的器官缺陷会使其产生自卑,而个体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补偿自身缺陷。^[6]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总是希望可以借助体育的力量来改变一些

事情,对待聋生既不是悲天悯人的道德补偿,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或施舍,而是通过体育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融合。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高校体育工作者更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郑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该校特殊教育的发展出发,认真上好每一节聋生体育课,让这些精灵快乐融合,健康成长,勇敢面对生活,成为有用之才。同时,在高校聋生体育教育的道路上,不断创造,无问西东,走适合时代特色的特殊教育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1]唐艳.聋生体育教育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9,37(9):87-89.
- [2]汤万松.人本关怀下的体育课程改革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6.
- [3]郭利洁.《大学》中的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开封:河南大学,2014.
- [4]吴红群.关于高校快乐体育教育的理论基础与路径探索[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8,22(4):120-122.
- [5]杨建营,黄康辉.学校武术普及教育改革的立足点探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0,43(1):106-113.
- [6]刘济良.生命的沉思:生命教育理念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许峻)

A Study on the Ways to Realize Happiness and Integr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for Deaf Students

—Tak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WANG Xianfu

(a.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b. Recreation and Sports Evaluation Research Center,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literature method to study physical education for deaf students in special education, and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experts from School of Special Education, deaf students and students majoring in sign language graduated in consecutive three years to find valuable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deficiencies.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we propose a path to achieve happiness integr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for deaf students: reshape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for deaf students; reshape the concept of sports happiness for deaf students; highligh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lectures and special martial arts courses in physical education for deaf students;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featuring one specialization with multiple a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education of deaf students i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lleague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eaf students; physical education; happy integration

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短期电力负荷预测

易礼秋¹, 谷云东²

(1. 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乌鲁木齐 830012; 2. 华北电力大学数理学院, 北京 102206)

摘要:为提高电力负荷预测的精度,提出一种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短期负荷预测模型。首先,选取28个影响电力负荷变化的因素作为预测输入候选特征,同时对部分定性表述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表征,对电力负荷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其次,借助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选取了23个相关性较强的主要影响因素,进一步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分析影响因素对负荷的影响。最后,为了减小高输入维度对预测模型泛化的影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特征降维,简化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该模型将提取的主成分确定为预测输入特征集,对时间序列历史数据进行输入输出关系化展开,进而构建预测相空间。对LSTM预测模型的参数设置进行实验测试并筛选出最优的训练参数来提高学习效率,利用LSTM进行模型训练,实现短期电力负荷预测。实例分析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有效性。

关键词:短期负荷预测;预测相空间;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21

中图分类号:TM715;TP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109-08

0 引言

作为电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环节,精准的电力负荷预测^[1]不仅是国家电网规划运行和调度的重要依据,更是电网安全运营的重要保障。研究表明,若能将一个10GW的电力设备的负荷预测准确度提升1%,每年能够节省的成本为1600万元^[2]。近几十年来,有大量预测方法和预测模型来提高负荷预测精度。国内外研究人员不仅分析了时间序列法^[3-4]、相似日法^[5]、指数平滑^[6]等经典预测方法,还对随机森林^[7-8]、支持向量机^[9-10]、神经网络^[11-12]等智能预测法进行大量运用。

随着电网智能化的升级,电力负荷数据也更加多变^[13]。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作为智能预测方法之一,由于其具有较强的深度学习的能力被广泛应用于电力负荷预测之中。为了进一步提高负荷预测的精度,很多学者提出了改进以及优化算法的长短

期记忆神经网络预测模型^[14-20]。阳曾^[14]等为了提高负荷预测的准确性,提出一种基于变分模态分解(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 VMD)和长短期记忆(Long Short Term Memory, LSTM)神经网络相结合的短期负荷预测模型,算例分析表明所提方法有效地提高了短期电力负荷预测的准确性。Heng Shi^[16]等提出了对电力系统在不同层次进行负荷预测做了全面的深度学习评估,表明在最先进的深度递归神经网络与浅层神经网络相比所提出的深度预测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陆继翔^[18]等人提出一种将卷积神经网络(CNN)与长短期记忆(LSTM)网络混合的负荷预测模型,经过算例分析表明了混合模型大大提高了预测精度。近期,为了进一步提高电力负荷预测精度,陈振宇^[20]等人提出了基于LSTM与XGBoost相结合的负荷预测方法,通过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和XGBoost的组合与GRU模型进行比

收稿日期:2021-03-25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671064);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XJUF2019K012)

作者简介:易礼秋(1995—),女,四川宣汉人,理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数据挖掘与智能预测。谷云东(1976—),男,山东聊城人,理学博士,华北电力大学数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数据挖掘与智能预测、模糊系统建模、优化决策等。

较,新的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使用单一的不加改进的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电力负荷预测问题,而经过改进或结合其他预测技术的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不仅有效地提高负荷预测的精度,也能解决负荷预测中常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利用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去研究更有效的负荷预测方法是提高预测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

1 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原理

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是被广泛应用的神经网络机器学习方法之一。LSTM 最早起源于 1997 年,是被 Sepp Hochreiter 和 Jiirgen Schmidhuber 共同提出的,主要是为了有效解决 RNN 难以解决的人为延长时间任务的问题,以及 RNN 容易出现的梯度爆炸与梯度消失问题。

LSTM 细胞是由输入门(input gate)、遗忘门(forget gate)、输出门(output gate)以及单元状态构成。其中遗忘门表示输入的有上一序列的隐藏状态 h_{t-1} 与本序列数据 x_t 通过 *sigmoid* 激活函数得到遗忘门的输出 f_t ,即通过其判断之前的信息是否对此时的单元记忆有影响,如图 1 所示。

$$f_t = \sigma(W_f \cdot [h_{t-1}, x_t] + b_f) \quad (1)$$

其中: W_f 、 b_f 为线性关系的系数与偏置系数, σ 为 *sigmoid* 激活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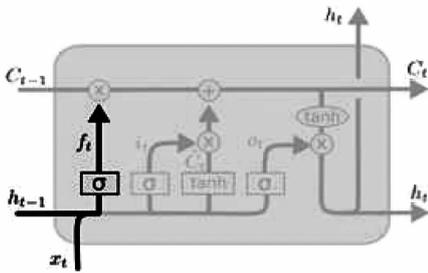


图 1 LSTM 的遗忘门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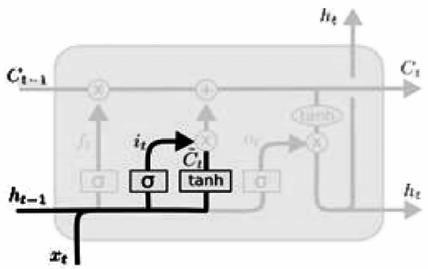


图 2 LSTM 的输入门结构图

输入门用来计算哪些信息保存到状态单元中,包括两部分信息,一部分是:

$$i_t = \sigma(W_i \cdot [h_{t-1}, x_t] + b_i) \quad (2)$$

该部分可以看成当前输入有多少信息需要保存

到单元状态。另一部分是:

$$\tilde{c}_t = \tanh(W_c \cdot [h_{t-1}, x_t] + b_c) \quad (3)$$

如图 2 所示,该部分用来把当前输入产生的新信息添加到单元状态中,这两部分产生新的记忆状态。由此,当前时刻的单元状态由遗忘门输入和上一时刻状态的积加上输入门两部分的积,即:

$$c_t = f_t \odot c_{t-1} + i_t \odot \tilde{c}_t \quad (4)$$

上式中, \odot 为 Hadamard 积。

输出门的状态用于计算当前时刻信息被输出的程度,如下图 3 所示。

$$o_t = \sigma(W_o \cdot [h_{t-1}, x_t]) + b_o \quad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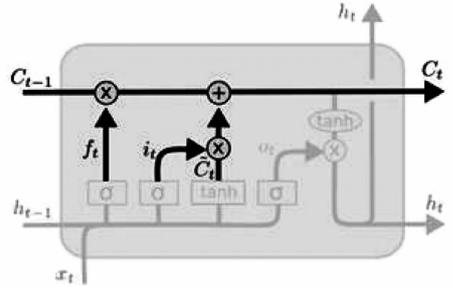


图 3 LSTM 细胞状态更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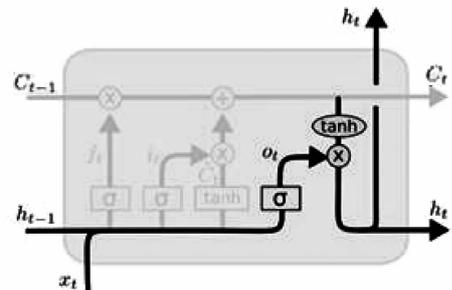


图 4 LSTM 输出门结构图

输出门用来计算 LSTM 单元在时间 t 中输出值,具体如图 4 所示:

$$h_t = o_t \odot \tanh(c_t) \quad (6)$$

2 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负荷预测方法

2.1 主要思路

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负荷预测方法包含三个主要步骤:首先,对电力负荷特性进行分析。通过对历史负荷以及气象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力负荷特性,为预测输入候选特征的选择提供依据。其次,进行预测输入特征提取。通过对影响电力负荷内外部因素进行相关度分析,筛选出与该地电力负荷变化相关性较强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成分作为预测的输入特征组。最后,以已得到的输入特征组为输入,待预测负荷为输出,基于输入输出对应关系,构造预测相空间。在预测相空间上,引入 LSTM 网络的预测模型,借助实验分析

选取最优参数,并借助实例分析验证其有效性。

2.2 电力负荷的特征分析

2.2.1 电力负荷的随机波动性

电力负荷具有随机性,负荷的随机性是由内外部随机性构成。图5为某地连续11天的日负荷变化图,从中可知负荷值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由于每天都有多种内在和外在的影响因素使得负荷不断变化,从而导致负荷值不断地升高或者降低使其处于上下波动的状态。

2.2.2 电力负荷的多重拟周期性

电力负荷的变化具有周期性,对其影响因素来说,时间日期因素则是影响负荷周期性变化的主导者。如图6所示,该图为美国里士满市圣诞节前后相邻几天的每小时负荷值,显然工作日比非工作日耗电量多。经上述分析可知,该地区用电量的大小变化与日期类型有着紧密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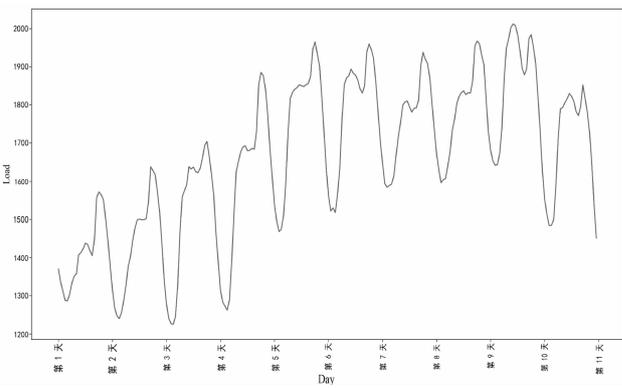


图5 日负荷变化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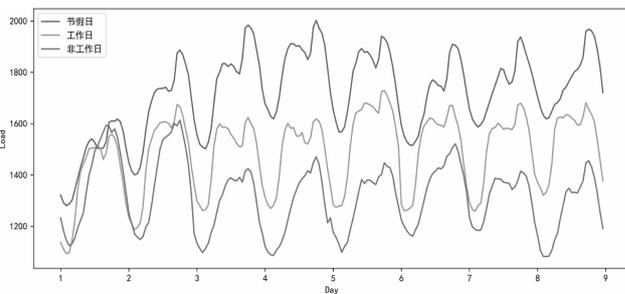


图6 三种日期类型日负荷曲线图

图7反映了电力负荷的多重拟周期性,首先是年周期的体现,该图为某地2016年和2017年的年电力负荷趋势变化图。

紧接着是周周期的体现,图8为某地2017年7月2日至7月29日四周的周电力负荷趋势变化图。无论是年周期,还是周周期的负荷曲线都是呈现出较强的规律性。

2.2.3 易受气象等外在因素影响

影响电力负荷变化的因素不仅是日期时间因素,如气候、温度、湿度以及气压等气象因素都会导

致负荷的上下波动。如图9和图10是美国里士满市三月份的每日最高温度、最低温度以及平均温度的变化曲线图和每日的负荷峰值、谷值以及平均负荷值,如图可知,负荷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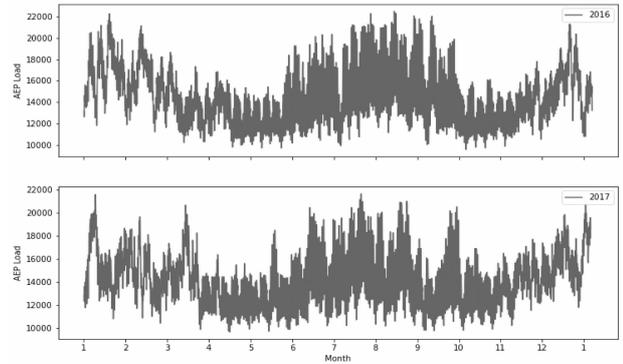


图7 2016—2017年某地区年负荷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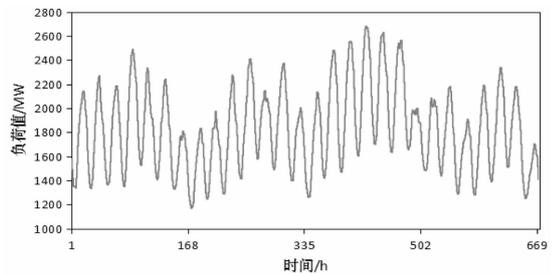


图8 2017年某地区周负荷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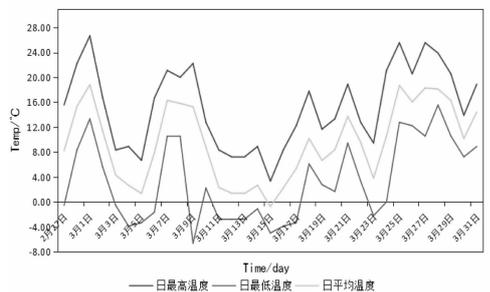


图9 不同温度类型的变化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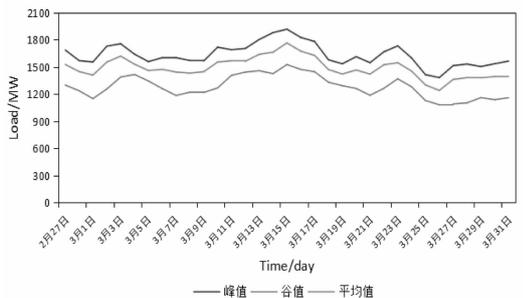


图10 不同负荷值的变化曲线

2.3 电力负荷预测输入特征提取

本文以美国里士满市的数据为例进行分析,对影响该市的因素进行前期收集,主要包括负荷因素、气候因素、风向风力因素、时间因素四个方面。首先,针对美国里士满市的短期负荷预测初期筛选出

28 个影响因素。其次,对 28 个影响因素进行正态性检验,剔除不满足正态分布的相关数据;再依据时间粒度尺度对皮尔逊相关系数的影响并确定最优时间粒度。随之,对进一步筛选的影响因素进行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从而选出与该市有较强相关性的影响因素。最后,借助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简化 LSTM 神经网络的输入,从而避免在利用神经网络预测所出现的过度拟合等常见问题,并缩短网络训练时间。历史负荷数据的筛选主要从前 1 天同一时刻负荷、前 2 天同一时刻负荷、…、前 17 天同一时刻负荷值作为负荷自身因素指标;选取温度、湿度、露点、气压、天气类型、季节类型作为气候影响因素指标;将节假日、星期、星期类型作为时间因素。

2.4 基于皮尔逊相关系数的特征相关性度量

分析 25 个影响指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来判断其对该市的负荷曲线的相关度。

通过分析表 1 可知:

表 1 25 个影响因素的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

类别	指标	皮尔逊相关系数	显著性
负荷类因素	前 1 天同一时刻负荷	0.878 **	0.000
	前 2 天同一时刻负荷	0.737 **	0.000
	前 3 天同一时刻负荷	0.650 **	0.000
	前 4 天同一时刻负荷	0.605 **	0.000
	前 5 天同一时刻负荷	0.609 **	0.000
	前 6 天同一时刻负荷	0.662 **	0.000
	前 7 天同一时刻负荷	0.684 **	0.000
	前 8 天同一时刻负荷	0.610 **	0.000
	前 9 天同一时刻负荷	0.516 **	0.000
	前 10 天同一时刻负荷	0.469 **	0.000
	前 11 天同一时刻负荷	0.480 **	0.000
	前 12 天同一时刻负荷	0.526 **	0.000
	前 13 天同一时刻负荷	0.615 **	0.000
	前 14 天同一时刻负荷	0.660 **	0.000
	前 15 天同一时刻负荷	0.600 **	0.000
	前 16 天同一时刻负荷	0.506 **	0.000
	前 17 天同一时刻负荷	0.479 **	0.000
气候类因素	温度	0.537 **	0.000
	湿度	-0.371 **	0.000
	露点	0.305 **	0.000
	季节类型	-0.318 **	0.000
风速类因素	气压	-0.192 **	0.000
	风速	0.306 **	0.000
时间因素	星期	-0.329 **	0.000
	星期类型	0.264 **	0.000

** .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1)第一类因素中,在 0.01 水平(双侧)上,前一天的同时时刻负荷与该地短期负荷有强烈的正相关,且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878。其余的历史负

荷特征与该市的短期负荷相关性都很高,且皮尔逊相关系数数值在 0.6 左右,即该影响因素与该地区的负荷值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2)第二类因素中,在 0.01 水平(双侧)上,温度以及露点都与该地区的短期负荷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其中,温度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537,露点相关系数为 0.305。其次,湿度、季节类型以及气压三个影响因素都与该地区的短期负荷曲线呈负相关性,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 -0.371、-0.318、-0.192。

(3)第三类因素中,在 0.01 水平(双侧)上,风速与该地短期负荷呈较弱的正相关,且风速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306。

(4)第四类因素中,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星期类型因素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264。星期影响因素指标对该地的短期负荷呈较弱负相关性,其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329。

综上所述,通过进一步对 25 个影响因素进行筛选,通过表 1 可知仅有气压和星期类型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192 和 0.264,对该地的电力负荷变化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因此,设定相关系数绝对值阈值为 0.3,选择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 0.3 的 23 个影响因素作为与该市短期电力负荷呈相关性的影响因素。他们分别是前 1 天同一时刻负荷、前 2 天同一时刻负荷、…、前 17 天同一时刻负荷、温度、露点、湿度、季节类型、风速、星期。

2.5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特征提取方法

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需要判断该数据是否能进行降维处理,则对 23 个影响因素数据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 - Meyer - Olkin 度量。		0.863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97099.072
	df	253
	Sig.	0.000

从表 2 可知,表中 KMO 的值为 0.863,是大于 0.5 的;其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的 p 值为 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因此,所分析的数据比较适合提取主成分。

主成分分析提取主成分的关键是选取的特征值需要大于 1 且累计方差贡献率要满足大于 80% 的成分。表 3 可知,前 5 个提取的成分特征根分别为 12.421、2.125、1.598、1.494、1.009,都大于 1。所以共提取 5 个主成分,且其能够反映原始影响因素 81.075% 的信息。

表3 影响因素的因子方差分析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12.421	54.004	54.004	12.421	54.004	54.004	6.659	28.950	28.950
2	2.125	9.241	63.246	2.125	9.241	63.246	6.539	28.431	57.382
3	1.598	6.946	70.192	1.598	6.946	70.192	2.641	11.484	68.866
4	1.494	6.494	76.686	1.494	6.494	76.686	1.585	6.893	75.758
5	1.009	4.389	81.075	1.009	4.389	81.075	1.223	5.316	81.075
6	0.927	4.031	85.106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表4 旋转成分矩阵

影响指标	成分				
	1	2	3	4	5
温度	0.368	0.292	0.747	0.015	0.240
露点	0.166	0.005	0.947	-0.046	0.028
湿度	-0.318	-0.484	0.411	-0.097	-0.400
风速	0.050	0.124	0.042	-0.086	0.901
星期	-0.001	0.029	-0.053	0.886	-0.079
季节类型	-0.089	-0.275	0.748	-0.005	0.071
前1天同一时刻负荷	0.346	0.657	0.287	0.086	0.245
前2天同一时刻负荷	0.319	0.729	0.251	0.318	0.174
前3天同一时刻负荷	0.279	0.796	0.205	0.299	0.139
前4天同一时刻负荷	0.274	0.838	0.170	0.112	0.064
前5天同一时刻负荷	0.315	0.832	0.134	-0.131	0.040
前6天同一时刻负荷	0.390	0.788	0.101	-0.282	0.046
前7天同一时刻负荷	0.467	0.729	0.078	-0.272	0.065
前8天同一时刻负荷	0.546	0.668	0.051	-0.029	0.050
前9天同一时刻负荷	0.615	0.619	0.008	0.206	-0.011
前10天同一时刻负荷	0.664	0.562	0.006	0.182	-0.028
前11天同一时刻负荷	0.714	0.493	0.040	0.002	-0.021
前12天同一时刻负荷	0.774	0.412	0.077	-0.178	-0.004
前13天同一时刻负荷	0.830	0.334	0.130	-0.243	0.028
前14天同一时刻负荷	0.855	0.273	0.197	-0.178	0.117
前15天同一时刻负荷	0.845	0.258	0.219	0.087	0.136
前16天同一时刻负荷	0.802	0.278	0.209	0.324	0.114
前17天同一时刻负荷	0.732	0.313	0.212	0.298	0.108

提取方法:主成分。

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表4表示23个影响因素指标的旋转成分矩阵,该表是反映提取的成分主要是由哪类影响因素构成。为了方便观察将表中大于0.5的数值进行阴影标记,所标记数值代表哪些影响因素在其对应主成分中的占比较大。结合表3可知,成分一的占比最大,该成分主要为历史负荷因素指标,占比为28.950%;成分二主要是由历史负荷因素指标构成,最大占比为28.431%;成分三主要由气候类影响指标组成,最大占比为11.484%;成分四由星期指标构成,占比为6.893%;成分五则由风速指标构成,占比为5.316%。

表5为23个影响负荷因素的指标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假设23个影响指标实际值根据表5的顺序

分别为矩阵A到W,从而得到新的五个成分矩阵为 $Z_1、Z_2、Z_3、Z_4、Z_5$ 。

表5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影响指标	成分				
	1	2	3	4	5
温度	-0.007	-0.048	0.297	0.006	0.176
露点	-0.016	-0.081	0.417	-0.025	-0.011
湿度	-0.012	-0.066	0.236	-0.048	-0.313
风速	-0.042	-0.083	0.004	-0.043	0.840
星期	-0.002	-0.011	-0.020	0.564	-0.062
季节类型	0.101	-0.064	-0.323	0.006	0.112
前1天同一时刻负荷	-0.078	0.120	0.074	0.034	0.136
前2天同一时刻负荷	-0.104	0.158	0.058	0.179	0.064
前3天同一时刻负荷	-0.133	0.203	0.038	0.163	0.023
前4天同一时刻负荷	-0.141	0.240	0.020	0.040	-0.057
前5天同一时刻负荷	-0.120	0.241	0.000	-0.116	-0.085
前6天同一时刻负荷	-0.076	0.210	-0.021	-0.211	-0.078
前7天同一时刻负荷	-0.029	0.162	-0.035	-0.202	-0.054
前8天同一时刻负荷	0.021	0.110	-0.050	-0.045	-0.057
前9天同一时刻负荷	0.066	0.072	-0.072	0.106	-0.106
前10天同一时刻负荷	0.101	0.038	-0.075	0.093	-0.116
前11天同一时刻负荷	0.136	0.002	-0.061	-0.019	-0.105
前12天同一时刻负荷	0.178	-0.044	-0.047	-0.130	-0.084
前13天同一时刻负荷	0.216	-0.094	-0.025	-0.168	-0.045
前14天同一时刻负荷	0.235	-0.143	0.006	-0.122	0.048
前15天同一时刻负荷	0.233	-0.161	0.019	0.049	0.073
前16天同一时刻负荷	0.212	-0.147	0.018	0.199	0.055
前17天同一时刻负荷	0.175	-0.112	0.024	0.181	0.046

2.6 基于预测特征的预测相空间构造

通过将上文所提取的五个主成分作为预测模型的输入特征,待预测时刻负荷作为输出特征,构造输入特征与输出特征的笛卡尔乘积,即构造预测相空间。

将五个主成分序列记作为 $S_i = \{s(t), t = 1, 2, \dots, N\} (i = 1, 2, 3, 4, 5)$,将序列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记为 S_{\max} 与 S_{\min} ,并记主成分时间序列的取值论域为 $X(f) = [S_{\min}, S_{\max}]$ 。提取的主成分特征记为 f_i ,将电力负荷时间序列记为: $L(t) = \{L(t), t = 1, 2, \dots, N\}$ 待预测时刻负荷 $f_0 \subset L(t)$,则可记 $F_t = \{f_1, f_2, f_3, f_4, f_5\}$,为 t 时刻对应的负荷历史预测特征集。

2.7 基于对比实验分析网络参数设置方法

LSTM网络参数的设置分为基础参数与超参数

设置。其中,基础参数一般指的是权重参数和偏置参数,而超参数的种类较为繁多,主要包含了输入和输出层的维度、隐藏层单元数目、激活函数的选择、正则化参数以及批尺寸 (Batch_Size) 等参数。模型依据训练样本以及需求数据的不同,会对其相应的超参数进行设置。但是,往往网络学习只有基础参数才是自动更新学习,超参数都是人工依据经验所得,进行不同的尝试来进行较优参数的选择,从而导致缺乏有效学习的方法。因此,本文通过设计系列的参数对比实验进行选取参数,先依据实验确定超参数,再通过手动调整单个参数的值从而获取最优参数。

3 算例分析

本文以美国里士满市的电力负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选取 2017 年 8 月 1 日—11 月 30 日的采样间隔为 1 小时的电力负荷数据作为数据集,每天共采集 24 条数据,一共 2928 个数据。其中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3 日为训练数据集 (共 2760 个数据),对 2017 年 11 月 24 日—30 日 (记为 $T_1 \dots T_7$) (共 168 个数据) 的电力负荷数据进行预测。

本文运用的编程语言为 Python 3.9.1 版本,主要采用 Anaconda3 中的 Tensorflow、Numpy、Keras 等工具包进行模型搭建。Tensorflow 是用于现实深度学习算法的工具框架,属于人工智能中的技术层中的学习框架,并且运用 Tensorflow 的版本为 2.0.1 的 CPU 版。

3.1 实验设计

(1) LSTM 神经网络参数设计

初始权值是神经网络模型的重要参数设置之一,本文对初始权值的设置主要是依据过往的历史经验所得,并将其设置为 $[0, 1]$ 之间的随机分布。

批尺寸 (Batch_Size) 的设置对于深度神经网络模型预测结果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会直接影响到预测模型训练的时长以及预测精度,因此批尺寸也是神经网络中重要超参数之一。通常情况下,依据 GPU 的显存来设置最大值,并且以 8 为倍数为最佳,例如 32、40 等,这样使得 GPU 内部的并行运算的效率达到最大。

实验以总体数据的 10% 的数据作为训练集进行训练,不同的批尺寸的训练时长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批尺寸设置与训练时长

训练时长	75s	70s	56s	49s	45s	48s	50s	55s
批尺寸	32	40	48	56	64	72	80	88

由表 6 可知,针对本文的模型训练效果,批尺寸设置为 64 时,神经网络训练所用时长较短。

前文选取批尺寸的参数实验默认的激活函数与优化函数分别为 Relu 函数和 Adam 函数。但是,考虑到神经网络中激活函数与优化函数是多种多样,由以往网络训练的经验所得激活函数一般常用 Sigmoid 函数和 Relu 函数,优化函数常用 RMSprop 函数与 Adam 函数。通过设置控制变量实验,选取合适本文网络训练的函数类型。将激活函数与优化函数进行随机组合,分为如表 7 所示的四种模型情况。为了节约训练时长,随机选取 10% 的数据为训练数据,迭代步数设置为 10 步,训练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7 激活函数与优化函数组合情况

模型	激活函数	优化函数
LSTM - 1	Sigmoid	RMSprop
LSTM - 2	Relu	Adam
LSTM - 3	Sigmoid	Adam
LSTM - 4	Relu	RMSprop

表 8 不同组合下的模型的误差对比

结果对比	LSTM - 1	LSTM - 2	LSTM - 3	LSTM - 4
训练时间	35s	38s	33s	40s
MAPE	14.12%	14.75%	13.21%	13.78%

通过表 8 的结果可知,从网络训练时长上看,LSTM - 1 和 LSTM - 3 时长相近; LSTM - 2 与 LSTM - 4 所用时长差距不大。从模型性能来看,LSTM - 3 和 LSTM - 4 的 MAPE 值较为接近,其中 LSTM - 3 模型的激活函数与优化函数的误差最小。所以,通过实验分析,下文的模型预测训练分别以 Sigmoid 函数作为激活函数,Adam 函数作为优化函数。

(2) 预测分析设计

本文通过实例分析证明所提出的预测相空间上基于改进的 LSTM 神经网络短期电力负荷预测模型的有效性。数据集选取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 2017 年 8 月 1 日到 2017 年 11 月 30 日的电力负荷数据进行预测,其中 2017 年 8 月 1 日到 2017 年 11 月 23 日的历史电力负荷数据设定为训练样本,2017 年 11 月 24 日到 2017 年 11 月 30 日的负荷数据作为预测数据集。

3.2 预测结果

通过对比预测模型的相对误差 (Relative Error, RE)、最大相对误差 (MRE)、MAPE 以及相对误差的标准差 (SD - RE) 等指标,对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预测模型与 RNN 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为 (MAPE):

$$MAPE = \frac{1}{n} \sum_{i=1}^n \frac{y_i - \hat{y}_i}{y_i} \times 100\% \quad (7)$$

相对误差的标准差 (SD - RE):

$$SD - RE = \sqrt{\frac{1}{n} \sum_{i=1}^n (RE_i - MAPE)^2} \quad (8)$$

通过上述的内容对改进后的 LSTM 与 RNN 预测 2017 年 11 月 24 日的预测值进行对比的结果如图 11 所示。

由图 11 可知, LSTM 模型的预测值较之传统 RNN 的预测值与真实值更接近, 说明改进的 LSTM 的预测效果比传统的 RNN 的预测效果好一些, 有的时刻预测值较为接近, 但在部分时刻他们与真实值具有较大的偏差。

通过对比以上 2 种模型方法预测 11 月 24 日—30 日负荷得到的 MAPE 值来分析模型预测效果, 具体结果如表 9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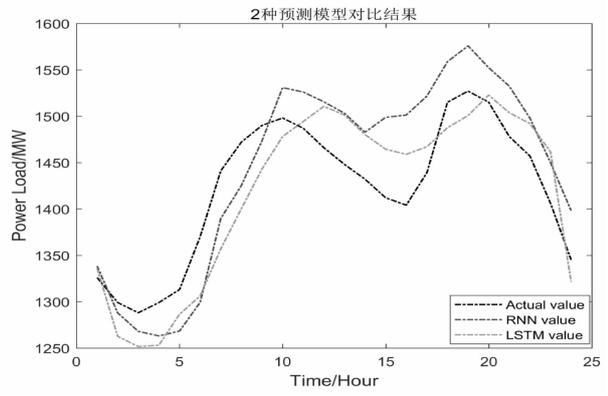


图 11 2 个模型预测的电力负荷预测值对比

表 9 不同预测模型的 MAPE

	T ₁	T ₂	T ₃	T ₄	T ₅	T ₆	T ₇	Avg	改进	Max	改进
LSTM	2.728	2.906	2.019	1.782	2.352	2.547	1.875	2.316	—	2.906	—
RNN	3.292	4.073	2.675	2.929	3.017	3.347	2.839	3.167	0.851	4.073	1.167

注:表中所有取值加%。

经分析表 9 的结果,对比 RNN 预测模型 LSTM 将预测的 MAPE 均值改进了 0.851%; 并将最大 MAPE 值改进了 1.167%。

将 2 种预测模型从 2017 年 11 月 24 日~30 日负荷预测得到的 SD-RE 进行结果对比分析, 具体结果如表 10 所示。

表 10 不同预测模型的 SD-RE

	T1	T2	T3	T4	T5	T6	T7	Avg	改进
LSTM	1.392	1.719	1.498	0.984	1.457	1.554	1.113	1.388	—
RNN	1.501	2.482	1.075	1.577	1.670	3.006	1.656	1.852	0.464

注:表中所有取值加%。

由表 10 可知,改进的 LSTM 相比 RNN 方法所得的 SD-RE 均值, LSTM 将预测变化波动降低了 0.464%。通过观察表 10 数据表明,改进后预测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模型的稳定性。正是因为各种预测方法在性能方面存在不同效果,以至于改进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预测方法所得的 SD-RE 值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4 结论

针对短期负荷预测准确度与稳定性提升问题,构建了相空间上基于层标准化改进的 LSTM 神经网络的短期负荷预测模型的预测效果。经过实例分析表明,将新的预测方法与 RNN 模型进行对比, MAPE 均值改进了 0.851%; 将最大 MAPE 值改进了 1.167%; 将体现预测稳定性的 SD-RE 均值改进了 0.464%。

参考文献:

[1] 康重庆, 夏清, 张伯明, 等. 电力系统负荷预测研究综述与发展方向的探讨[J]. 电力系统自动化, 2004, 28(17):1-11.

[2] Xiao L, Shao W, et al. A combined model based on multiple seasonal patterns and modified firefly algorithm for electrical load forecasting [J]. Applied Energy, 2016, 167: 135-153.

[3] 万坤, 柳瑞禹. 区间时间序列向量自回归模型在短期电力负荷预测中的应用[J]. 电网技术, 2012, 36(11):77-81.

[4] 李钜, 李敏, 刘涤尘. 基于改进回归法的电力负荷预测[J]. 电网技术, 2006(1):99-104.

[5] 刘翊枫, 周国鹏, 刘昕, 等. 基于智能相似日识别及偏差校正的短期负荷预测方法[J].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2019, 47(12):138-145.

[6] 王典礼. 指数平滑日负荷预测[J]. 水电能源科学, 1986(1):91-97.

[7] Lahouar A, Ben H S J. Day-ahead load forecast using random forest and expert input selection[J].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2015, 103:1040-1051.

[8] 吴潇雨, 和敬涵, 张沛, 等. 基于灰色投影改进随机森林算法的电力系统短期负荷预测[J]. 电力系统自动化, 2015, 39(12):50-55.

[9] Li Yanying, Che Jinxing, Yang Youlong. Subsampled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ensemble for short term electric load forecasting. Energy. 2018, 164: 160-170.

[10] 肖白, 赵晓宁, 姜卓, 等. 利用模糊信息粒化与支持向量机的空间负荷预测方法[J]. 电网技术, 2021, 45(1): 251-260.

[11] Guo Zhifeng, Zhou Kaile, Zhang Xiaoling, et al. A deep learning model for short-term power load and probability density forecasting[J]. Energy. 2018, 160: 1186-1200.

[12] 郑瑞骁, 张姝, 肖先勇, 等. 考虑温度模糊化的多层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短期负荷预测[J]. 电力自动化设备, 2020, 40(10):181-186.

[13] 王德文, 孙志伟. 电力用户侧大数据分析并行负荷预

- 测[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5, 35(3): 527-537.
- [14] 阳曾, 丁施尹, 叶萌, 等. 基于变分模态分解和深度学习的短期电力负荷预测模型[J/OL]. 电测与仪表, 2021: 1-8 [2021-03-23].
- [15] 魏腾飞, 潘庭龙. 基于改进 PSO 优化 LSTM 网络的短期电力负荷预测[J/OL]. 系统仿真学报, 2021: 1-8 [2021-03-23].
- [16] Heng Shi, Minghao Xu, Qiuyang Ma, et al. A Whole System Assessment of Novel Deep Learning Approach on Short-Term Load Forecasting[J]. Energy Procedia, 2017: 142.
- [17] Ghulam Hafeez, Khurram Saleem Alimgeer, Imran Khan. Electric load forecasting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nd optimized by heuristic algorithm in smart grid[J]. Applied Energy, 2020: 269.
- [18] 陆继翔, 张琪培, 杨志宏, 等. 基于 CNN-LSTM 混合神经网络模型的短期负荷预测方法[J]. 电力系统自动化, 2019, 43(8): 131-137.
- [19] 吕海灿, 王伟峰, 赵兵, 等. 基于 Wide&Deep-LSTM 模型的短期台区负荷预测[J]. 电网技术, 2020, 44(2): 428-436.
- [20] 陈振宇, 刘金波, 李晨, 等. 基于 LSTM 与 XGBoost 组合模型的超短期电力负荷预测[J]. 电网技术, 2020, 44(2): 614-620.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hort-term Power Load Forecasting Based on Long-short Term Memory Neural Network

YI Liqiu¹, GU Yundong²

(1. Xinjiang University of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 Urumqi, Xinjiang 830012, China;

2.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ower load forecasting, this paper proposes a short-term power load forecasting model based on long-short term memory (LSTM) neural network. First of all,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ic load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t selects 28 factors that affect power load changes as candidate features of predictive input, and quantitatively characterizes some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ualitative expression. Secondly,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load, and 23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strong correlation are selected with the aid of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Finall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high input dimensions on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s used to reduce the feature dimensions, which simplifies the input of the neural network model. The model determines the extracted principal components as the predictive input feature set; furthermore, the input and output relational expansion of the time series historical data is carried out to construct the predictive phase space. The parameter settings of the LSTM prediction model are tested experimentally and the optimal training parameters are selected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Use LSTM as model training to realize short-term power load forecasting. The results of the case analysis show that the method is effective.

Key words: short-term load forecasting; predictive phase space; long-short term memory neural network

辣木全粉对馒头品质的影响研究

聂 卉, 李晓静, 杜 笑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以辣木全粉和普通小麦粉为原料制备辣木全粉馒头,考察辣木粉添加量、加水量、和面时间和发酵时间对辣木全粉馒头感官品质的影响,利用 Brookfield 质构仪研究辣木全粉馒头的质构特性,利用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研究辣木馒头微观结构变化。结果表明,当辣木添加量为3%、发酵时间50 min、加水量100 mL、和面时间10 min时,馒头制品色泽度高,口感香甜,感官评分最高。辣木粉的添加能够明显改善馒头质构和微观结构,提高馒头品质。

关键词:辣木;馒头;感官鉴定;TPA;CLSM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22

中图分类号:TS2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118-04

辣木(Moringa)属多年生热带落叶乔木,是一种新兴的功能性植物^[1]。辣木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钙,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抗菌、消炎等生理功效^[2],可以增强人体机能、治疗贫血、抑制病菌等^[3]。段丽丽等^[4]将辣木叶粉加入曲奇饼干中,通过感官评价、质构分析和对曲奇饼干中铁、锌、镁等微量元素的测定,分析辣木叶粉添加量对饼干品质的影响,确定辣木曲奇饼干的最合适配方。表明:辣木叶粉最合适添加量为6.5%,曲奇饼干的胶黏性、咀嚼性和硬度低,色泽、气味、组织、口感等感官评分较高。匡钰等^[5]研究辣木粉对苏打饼干品质的影响,并优化了实验配方:辣木粉添加量为350 g/kg,酵母添加量为18 g/kg,食用油添加量为170 g/kg,盐添加量为6 g/kg。此工艺条件下制备的饼干色泽呈黄褐色,口感酥脆,香味浓郁。潘新杰等^[6]以牛奶和辣木为原料,通过正交实验和感官评价确定辣木乳饮料的生产工艺,对饮料中的微量元素和微生物指标测定,分析辣木粉对乳饮料品质的影响。

以辣木粉和小麦粉为原料制备辣木馒头,探讨辣木馒头工艺优化过程,测定辣木馒头的比容、多酚含量等指标,利用 Brookfield 质构仪、激光共聚焦显

微镜研究辣木馒头品质及微观结构,为辣木馒头的工业化生产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面粉:南顺(山东)食品有限公司;辣木籽:云南帅润科技有限公司;干酵母: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800Y 多功能粉碎机:武义海纳电器有限公司;CT3 1000 质构仪:美国 Brookfield;LSM710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德国 ZEISS;RE-52C 旋转蒸发仪: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公司;T6 紫外可见风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1.3 方法

1.3.1 辣木全粉馒头的制备

辣木籽在60℃下干燥2.5 h,取出后脱皮,用粉碎机粉碎,80目过筛;将辣木粉加入小麦粉内,混匀备用。参照 GB/T21118-2007^[7],用一次发酵的方法完成。将混合粉、活化后的酵母和适量水混合搅拌(预留3%的混合粉用于发酵之后的饅面成型),揉成光滑柔软的面团进行一次发酵,时间为50 min;

收稿日期:2021-05-25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20B550010)

作者简介:聂卉(1978—),女,河南郑州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多糖综合利用与污染处理。

面团反复揉搓,在切成大小相同的面团,揉成光滑的馒头坯;将切好的大小相同的馒头坯用保鲜膜覆盖,进行二次醒发 15 min 后将馒头坯放入蒸锅中蒸 20 min,关火焖 5 min 后取出,室温下静置 1 h。

1.3.2 辣木全粉馒头感官评价指标

辣木全粉馒头蒸制成熟后,进行感官鉴定^[8]。由 10 名感官评定员打分,评分权重如表 1 所示。

表 1 辣木全粉馒头品质权重

项目	分值	得分标准
香味	10 分	有麦香味 7~10 分;香味暗淡 4~6 分;有酸味 0~3 分。
色泽	10 分	光泽好 8~10 分;稍暗 4~6 分;灰暗 0~3 分。
口感	10 分	口味香甜 8~10 分;滋味平淡 4~6 分;有异味 0~3 分。
宽高比	10 分	宽高比小于 1.4 得 8~10 分;在 1.4~1.6 之间得 4~7 分;大于 1.6 得 0~3 分。
弹性	10 分	手指按压回弹性 8~10 分;按压回弹性弱 4~7 分;不回弹或按压困难 0~3 分。
表面结构	20 分	表面光滑细腻 15~20 分;表面有气泡、皱褶 8~14 分;有塌陷、缺口 0~7 分。
内部结构	20 分	内部气孔细腻均匀 15~20 分;气孔均匀,有个别气泡 8~14 分;气孔较多且分布不均 0~7 分。
黏性	10 分	爽口不黏牙 8~10 分;稍黏 4~7 分;很黏 0~3 分。

1.3.3 辣木全粉馒头比容的测定

利用小米置换法测定其比容^[9]。

1.3.4 辣木全粉馒头质构特性的测定

蒸制好的辣木馒头室温下冷却 1 h,取馒头中心部位 25 mm 的方块。采用 CT3 1000 的 TA10 圆柱形探头在 TPA 模式下对馒头样品进行质构测定^[10]。测试参数:测前速度:2.00 mm/s;测试速度:1.00 mm/s;测后速度:1.00 mm/s;目标:5.0 mm;间隔时间:5 s;获取数率:10.00 points/se;循环次数:2 次。

1.3.5 辣木全粉馒头抗氧化性和多酚含量的测定

根据清除 DPPH 自由基能力测定辣木全粉馒头的抗氧化性^[11],多酚含量测定方法参照文献^[12]。

1.3.6 辣木全粉馒头微观结构表征

馒头干燥后磨粉过筛,取 10.0 mg 馒头粉样品于 15.0 μL 8-氨基苊-1,3,6-三磺酸三钠盐(ATPS)溶液中,加入 15.0 μL 1 M 的氰基硼氢化钠溶液,置于 30 $^{\circ}\text{C}$ 下染色 15 h,用 1 mL 溶剂清洗至无色,最后将淀粉颗粒悬浮于 $V(\text{甘油}):V(\text{水})=1:1$ 的 20.0 μL 混合溶液中^[13],观察馒头的微观结构。

2 结果与分析

2.1 辣木全粉馒头工艺条件优化研究

以感官鉴定为指标,以辣木粉添加量、加水量、和面时间和发酵时间为试验因素进行单因素实验,

考察各不同因素对馒头感官品质的影响。

2.1.1 辣木粉添加量对辣木全粉馒头品质的影响

辣木添加量分别为面粉质量的 0‰,2‰,3‰,4‰,发酵时间 50 min,加水量 100 mL,和面时间 10 min。按照表 1 中馒头的品质评价分着作为考察指标进行评分。由表 2 可以看出,辣木粉的添加量增加后,馒头的比容也增加,到达峰值后下降。宽高比先减小到一个峰值后又增加,说明在一定添加范围内,馒头的体积和高度有所增加,辣木添加量的增加使面筋网络和空间结构稳定^[14]。

表 2 不同辣木添加量对辣木全粉馒头感官评价的影响

添加比例/‰	比容/(mL/g)	宽高比	品质评分
2	1.75	1.45	86
3	1.93	1.3	88
4	1.88	1.32	85

2.1.2 加水量对辣木全粉馒头品质的影响

从表 3 可以看出,随着加水量的增大,馒头比容和宽高比也增大,说明加水量增多可以增加馒头的体积和宽度。这是由于小麦粉中含有大量的亲水基团和多糖聚合物,和面过程中亲水基团与水结合成亲水胶体,吸水后膨胀,使馒头的体积增大。将馒头放入蒸锅中汽蒸后,蒸出来的馒头蓬松度高,嚼劲差,因此感官评分低。

表 3 不同加水量对辣木全粉馒头感官评价的影响

加水量/mL	比容/(mL/g)	宽高比	评分
80	1.94	1.47	78
100	1.96	1.49	84
120	1.97	1.52	82

2.1.3 和面时间对辣木全粉馒头品质的影响

表 4 为不同和面时间对辣木全粉馒头品质的影响。从表 4 可以看出,随着和面时间的增长,对产品品质的评分是先升高后降低,产品比容增大,宽高比降低。和面时间 5 min 时,馒头评分最低,因为面粉没有揉和均匀,面团结构不成型,表面褶皱较多;和面时间 10 min 时,感官评分最高,馒头的表面有光泽,形状规则;和面时间 15 min 时,面团发黏,不易成型,馒头的形状不规则。在实验范围内比较 3 种不同的和面时间,可知和面时间 10 min 的馒头品质最优。

表 4 不同和面时间对辣木全粉馒头品质的影响

和面时间/min	比容/(mL/g)	宽高比	评分
5	2.7	1.45	78
10	3.1	1.42	84
15	3.2	1.40	80

2.1.4 发酵时间对辣木全粉馒头品质的影响

根据表 5 所示,发酵时间对馒头品质影响较大,比容显著增大,宽高比显著减少,当面团的发酵时间

太短时,面团的内部气体不足,导致面团体积变小,蒸制出来的馒头太小;随着面团的发酵完成,馒头比容增大,当面团的发酵时间过度,面筋网络结构被撑大发生断裂,面团气孔增大,表皮分离,口感较差。综上所述,在实验范围内面团的发酵时间为 50 min 时产品品质最优。

表 5 不同发酵时间对辣木全粉馒头品质的影响

发酵时间/min	比容/(mL/g)	宽高比	评分
40	3.0	1.53	70
50	3.1	1.50	75
60	3.2	1.48	74

表 6 辣木全粉馒头质构特性

质构	硬度/mm	黏性/mJ	弹性/mm	拉丝长度/mm	内聚性	胶着性/g	咀嚼性/mJ
辣木全粉馒头	4.94	0	4.71	0.61	0.92	221.22	10.20
普通小麦粉馒头	4.93	0.3	4.68	45.15	0.91	195.00	9.00

由表 6 可知,加入辣木粉后,馒头的内部松软,硬度降低,黏性增加,弹性反而减弱,咀嚼性变差。胶着性降低表示馒头的韧性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馒头的口感,内聚性反映了馒头内部结构的紧致性。

2.3 辣木全粉馒头多酚含量及抗氧化性研究

多酚类物质不但具有多样化的生物活性,还可以改善食品的内在质构质量,增加货架期等。普通小麦粉馒头中的多酚含量主要来自制粉过程中小麦麸皮,但含量并不丰富。如表 7 所示,辣木全粉馒头中的与普通小麦粉馒头相比,辣木全粉馒头多酚物质显著增加,抗氧化性显著增加,多酚含量随着辣木的添加增加至 0.213%,抗氧化性则随之增加至 0.065%。这对与赋予馒头更优化的性质和功能是十分有益的。

表 7 辣木全粉馒头的多酚含量和抗氧化性

样品	多酚/%	抗氧化性/%
辣木全粉馒头	0.152	23.6
普通小麦粉馒头	0.213	2.17

2.4 辣木全粉馒头微观结构研究

图 1 为辣木全粉馒头和普通小麦粉馒头 CLSM 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普通小麦粉馒头的内部结构不明显,气孔大小不一且颜色较为暗淡;辣木全粉馒头的内部纹理结构层次清晰,可以看到气孔大小和方向,孔壁较薄且颜色光泽度高。气孔的大小可以反映内部结构,通过对气孔的分析,可以比较馒头的外观形态和组织结构^[15-16]。辣木粉的添加使馒头内部结构发生改变,改变了馒头内部气孔的色泽和大小,影响馒头比容,并能改善馒头的外形和口感。

3 结论

3.1 以感官评分为指标,利用单因素法优化了辣木全粉馒头制备工艺。结果表明,辣木馒头在辣木添

综合感官评价结果,通过单因素实验确定最优比例为发酵时间 50 min、加水量 100 mL、辣木添加量 3%、和面时间 10 min。

2.2 辣木全粉馒头质构特性分析

对辣木全粉馒头进行 TPA 测试,记录两种样品测试的变化曲线,对样品的硬度、咀嚼性、弹性、黏性等性质进行量化评分,根据两种样品的测定数据,分析辣木全粉馒头和普通小麦馒头质构的差别,研究辣木全粉对馒头品质的影响。如表 6 所示。

加量为 3%、发酵时间 50min、加水量 100 mL、和面时间 10 min 时,色泽度高,口感香甜,评分最高。



a 辣木全粉馒头

b 普通小麦粉馒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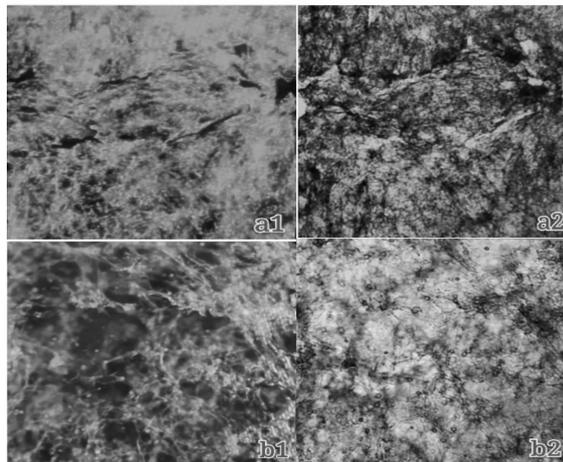


图 1 辣木全粉馒头(a)和普通小麦粉馒头(b)的 CLSM 图

3.2 分析了辣木全粉馒头的比容、多酚含量、抗氧化性能、质构特性等。结果显示,辣木粉的添加提高了馒头的比容、多酚含量和抗氧化性能;辣木粉改善了馒头的组织结构,使其硬度降低,黏性增加但咀嚼性和胶着性变低。

3.3 利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研究了辣木全粉馒头的微观结构,显示辣木粉的添加改变了馒头内部气孔的大小,使其组织更加致密,提升了馒头的品质。

参考文献:

[1] 刘昌芬, 龙继明, 杨焱, 等. 多功能植物辣木栽培技术研

- 究初报[J]. 中国农学通报, 2007, 23(6): 590 - 593.
- [2] 熊瑶. 辣木叶蛋白质提取及其饮品研制[D]. 福建福州: 福建农林大学, 2012.
- [3] 刘凤霞, 王苗苗, 赵有为, 等. 辣木中功能性成分提取及产品开发的研究进展[J]. 食品科学, 2015(19): 306 - 310.
- [4] 段丽丽, 贾洪峰, 赵美丽, 等. 辣木叶粉在曲奇饼干中的应用[J]. 粮食与油脂, 2018, 31(1): 38 - 41.
- [5] 匡钰, 史文斌, 苏琳琳, 等. 辣木苏打饼干的研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6(30): 74 - 76.
- [6] 潘新杰, 陶亮, 刘成洁, 等. 辣木乳饮料的工艺技术研究[J]. 农产品加工, 2015(12): 25 - 27.
- [7] 孙辉. 《小麦粉馒头》国家标准解读[J]. 粮食与食品工业, 2008, 15(2): 1 - 2.
- [8] MITIKU D H, ABERA S, BUSSA N, et al. Physic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ensory evaluation of wheat bread partially substituted with sweet potato (*Ipomoea batatas* L.) flour[J]. *British Food Journal*, 2018, 120(8): 1764 - 1775.
- [9] JOO S Y, PARK J D, CHOI Y S, et al. A Study of the Optimization of White Pan Bread added with Wheat Sprout Powder[J]. *Culinary ence & Hospitality Research*, 2018, 24(3): 1 - 14.
- [10] YUJUAN G U, JIANGTAO L, Yanfei G, et 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Wheat Flour Granularity on Steamed Bread Quality by Missing Item Method[J]. *The Food Industry*, 2019(1): 189 - 193.
- [11] THAIPONG K, BOONPRAKOB U, CROSBY K, et al. Comparison of ABTS, DPPH, FRAP, and ORAC assays for estimating antioxidant activity from guava fruit extracts[J]. *Journal of Food Composition & Analysis*, 2012, 19(6-7): 669 - 675.
- [12] 忻晓庭, 刘大群, 郑美瑜, 等. 热风干燥温度对冰菜干燥动力学、多酚含量及抗氧化活性的影响[J]. 中国食品学报, 2020(11): 148 - 156.
- [13] NORAH, SHEA O, LINDA, et al. The rheology, microstructure and sensory characteristics of a gluten-free bread formulation enhanced with orange pomace[J]. *Food & Function*, 2013, 4: 1856 - 1863.
- [14] 张军, 刘然, 孙云霞. 酶制剂在馒头工业化生产中提高保鲜期及复热性的应用[J]. 食品研究与开发, 2001(1): 53 - 55.
- [15] 皮俊翔, 张根义. 茶多酚对面团中面筋蛋白结构的影响[J]. 食品工业科技, 2020, 41(18): 1 - 7.
- [16] TÜRKER S A, ÖZYÜREK E U, TEK V.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obturation methods on sealer penetration alongside apically separated rotary nickel - titanium instruments: A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y study [J]. *Microscopy Research and Technique*, 2020, 83(6): 15 - 40.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Moringa Oleifera Powder on the Quality of Steamed Bread

NIE Hui, LI Xiaojing, DU Xiao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Moringa steamed bread was prepared with Moringa oleifera whole flour and common wheat flour. The effects of adding amount of Moringa oleifera flour, amount of water, mixing time and fermentation time on the quality of Moringa whole flour steamed bread were investigated. The texture characteristics of Moringa whole flour steamed bread were studied by Brookfield texture analyzer, and the microstructure changes of steamed bread were studied by laser scanning confocal microscop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amount of Moringa oleifera was 3%, the fermentation time was 50 min, the water content was 100 ml, and the dough mixing time was 10 min, the color was high, the taste was sweet, and the sensory score was the highest; the addition of Moringa oleifera powder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exture and microstructure of steamed bread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eamed bread.

Key words: Moringa oleifera; steamed bread; sensory identification; TPA; CLSM

米酒黄瓜奶昔生产工艺研究

冯冲^a, 姚虹^b, 陈安琪^a, 许明媛^a, 冯茜杰^a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a. 化工食品学院; b. 分析测试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通过单因子试验和正交试验, 确定了米酒黄瓜奶昔的最佳配方及工艺条件。单因子和正交试验结果表明, 工艺 A 最佳, 各成分添加质量分数分别为: 米酒发酵液 20%、黄瓜浆液 14%、蔗糖为 6%, 发酵温度为 42 ℃, 发酵时间为 6 h。在此配方工艺下, 产品的持水力为 75%, 感官评分为 92 分。该产品有明显的乳香和淡淡的酒香及淡淡的黄瓜香味, 口感滑润细腻、爽口, 浓稠度适宜, 稳定性好。

关键词:米酒; 黄瓜; 奶昔; 生产工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23

中图分类号:TS2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4-0122-04

米酒是我国的传统食品, 营养丰富、酒香浓郁、口感醇厚, 增食欲、助消化, 深受广大消费者推崇和喜爱^[1-2]。黄瓜是我国种植范围最广的蔬菜之一, 其口感脆嫩、瓜味浓郁, 富含糖类、糖苷类、多种游离氨基酸、胡萝卜素、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素, 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水果蔬菜两用型食品^[3-4]。另外, 黄瓜中的丙醇二酸、黄酮类化合物和黄瓜多糖具有预防冠心病、糖尿病、抗衰老、抗肿瘤等功能^[5-7]。奶昔口味丰富, 选择性广, 具有食疗合一等特点, 是最受欢迎的乳品之一^[8-9]。传统的奶昔是由牛奶加冰激凌, 然后加上冰块混合而制成的甜品, 但冰激凌能量高、低营养, 经常食用对健康不利^[10-12]。将传统奶昔进行改造, 用米酒、水果及蔬菜代替冰激凌, 拟开发营养健康美味的功能性新型奶昔产品, 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糯米、纯净水、白糖、纯牛奶、黄瓜: 均为市售; 酸奶发酵剂: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黄原胶: 河南万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魔芋胶: 河南万邦实业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LDZX50FBS 立式压力灭菌锅: 上海申安医疗器械厂; 超净工作台: 郑州赛博实业有限公司; 数显 LRH-150 生化培养箱: 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 榨汁机: 苏泊尔有限公司; DHG-9030 电热恒温干燥箱: 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 常规实验玻璃仪器、电磁炉等。

1.3 方法

1.3.1 米酒酿造加工流程

洗米→浸米→蒸饭→淋饭(拌曲、加水)→发酵→成品

1.3.2 黄瓜浆液制备流程

黄瓜→清洗→烘烤→打浆→浆液

1.3.3 米酒黄瓜奶昔加工工艺

1.3.3.1 基本流程

原料鲜奶→混匀→加入脱脂乳粉、蔗糖调整乳中总固体物含量→预热→均质→巴氏杀菌→冷却→接种→发酵→冷却→后熟→搅拌→灌装→成品。

1.3.3.2 工艺调整

对米酒黄瓜奶昔加工的基本流程分别进行如下调整:

(1) 工艺 A: 在原料鲜奶中加入无菌米酒发酵

收稿日期: 2021-05-21

基金项目: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功能性马齿苋泡菜菌株的筛选及发酵工艺研究”(201911068040)

作者简介: 冯冲(1970—), 女, 河南潢川人, 硕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发酵工程。

液;在搅拌环节加入黄瓜浆、稳定剂、冰块。

(2)工艺 B:在原料鲜奶中加入无菌米酒发酵液、黄瓜浆、稳定剂;在搅拌环节加入冰块。

(3)工艺 C:在搅拌环节加入黄瓜浆、无菌米酒发酵液、稳定剂、冰块。

(4)工艺 D:在原料鲜奶中加入黄瓜浆、稳定剂;在搅拌环节加入无菌米酒发酵液、冰块。

1.3.3.3 工艺要点

(1)米酒制作

将糯米浸泡 4 h 后沥水,蒸锅蒸 30 min,凉开水冲淋至 30℃ 左右,接入甜酒曲,拌匀、搭窝,恒温培养(30℃,36 h 左右)。

(2)发酵剂制备

取 1 g 菌粉,加入装有 100 mL 的灭菌脱脂乳的三角瓶中混合,在 40℃ 条件下,恒温培养,10 h,待用。

(3)稳定剂的制备

黄原胶和魔芋胶按质量比为 1:1 混合,加入白砂糖与之充分混合,然后加入 85℃ 热水,充分溶解,冷却,使用量的质量分数为 0.02%^[13]。

(4)均质

将预料预热至 52~55℃,在 16~18 MPa 压力下均质处理 2 次,使其微细化,过滤,待用。

1.3.4 持水力测定

取一定质量样品于离心管,离心 15 min(4℃),倾去上清液,称量剩余样品的质量。持水力(WHC)计算式为:

$$WHC = (m/m_0) \times 100\% \text{ [14]}$$

式中: m_0 为样品质量,g; m 为离心后剩余样品质量,g。

1.3.5 感官评定指标

将制备好的奶昔产品随机分组编号,参评人员由 10 名食品专业的专家和 10 名食品专业的学生组成。奶昔产品感官评分标准见表 1^[15]。

2 结果与分析

2.1 最佳工艺及米酒发酵液添加量的选择

分别选取 4 种工艺 A,B,C 和 D,每种工艺米酒发酵液添加质量分数分别为 12%,14%,16%,18%,20%,22%,25%。米酒发酵液杀菌条件为 95℃,5 min。试验结果见图 1。

由图 1 可知,工艺 A 效果最好。当米酒发酵液添加质量分数为 20% 时,效果最佳(91 分),可能是因为米酒发酵液灭酶灭菌后,经过乳酸菌发酵产生新的风味物质,使得奶昔具有淡淡的酒香味和酸甜味。

2.2 最佳黄瓜浆液添加量的确定

根据 2.1 试验结果,选取工艺 A,米酒发酵液添加质量分数为 20%。选取黄瓜浆液添加质量分数

分别为 4%,6%,8%,10%,12%,14%,16%,18%。米酒发酵液杀菌条件为 95℃,5 min;发酵温度为 42℃,发酵时间为 4 h。试验结果见图 2。

表 1 感官评分标准

项目	感官	得分
色泽 (20 分)	色泽呈乳白或微绿色,颜色分布均匀,基本无杂色。	17~20 分
	颜色分布不均,深浅不一,呈乳白偏黄。	13~16 分
	颜色不协调,偏离产品应有色泽,出现明显色差。	<12 分
香味 (20 分)	有明显的乳香和淡淡酒香和淡淡的黄瓜香味,香气协调	17~20 分
	酒香较淡或黄瓜味太浓,略微不协调,	13~16 分
	酒香很淡,香味轻微,味道很不协调	<12 分
滋味 (30 分)	酸甜适口,酒味适中,口感细腻。	26~30 分
	酸甜较适宜,酒味较淡,口感有些粗糙但尚能接受。	20~25 分
	有不舒服的酸味或过甜,或酒味过重或水果味过浓,口感粗糙,难以接受。	0~10 分
组织状态 (30 分)	组织均匀细腻,无沉淀现象。	26~30 分
	略微粗糙,有微量沉淀析出。	20~25 分
	口感粗糙,有大量沉淀析	0~10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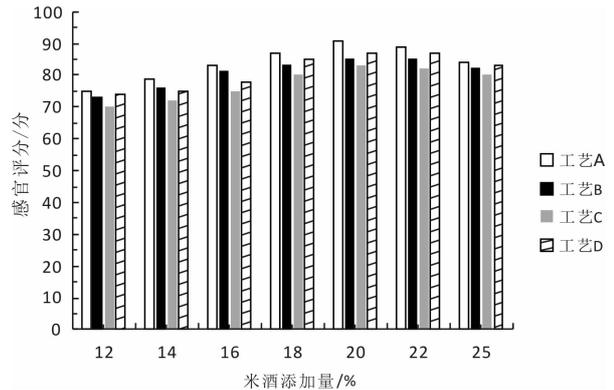


图 1 米酒发酵液的添加量对不同工艺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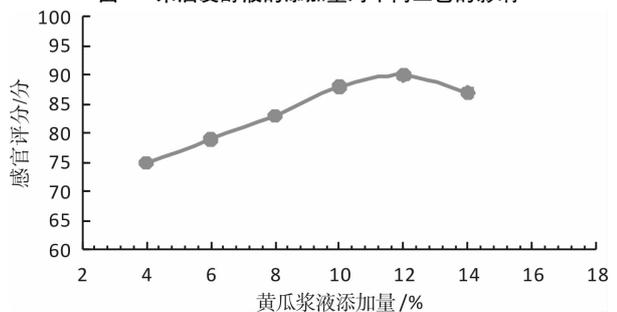


图 2 不同黄瓜添加量对奶昔的影响

由图 2 可知,黄瓜浆液添加质量分数为 12% 时,感官评分达 90 分,效果最佳。黄瓜的清香味和米酒奶昔结合产生淡淡的黄瓜香味、淡淡的酒香和明显的乳香,香气协调,口感细腻。

2.3 最佳蔗糖添加量的确定

选取工艺 A,米酒发酵液添加质量分数为 20%。选取蔗糖添加质量分数分别为 2%,4%,6%,8%,10%,12%,14%,16%。米酒发酵液杀菌

条件为 95 ℃, 5 min; 发酵温度为 42℃, 发酵时间为 4 h。试验结果见图 3。

由图 3 可知, 蔗糖添加质量分数为 8% 时, 感官评分达 89 分, 效果最好。香味协调, 产品酸甜适中, 组织均匀细腻, 无沉淀现象, 适合大众化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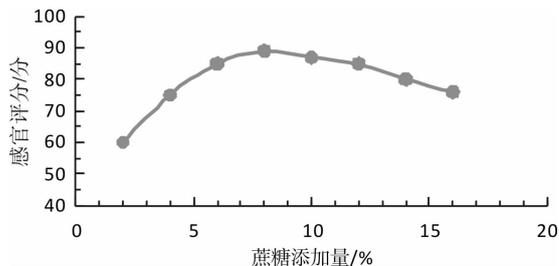


图 3 不同蔗糖添加量对奶昔的影响

2.4 最佳发酵温度的确定

选取工艺 A, 米酒发酵液添加质量分数为 20%, 蔗糖添加质量分数为 8%, 选取发酵温度分别为 38, 39, 40, 41, 42, 43, 44℃; 米酒发酵液杀菌条件 95 ℃, 5 min; 发酵温度为 42℃, 发酵时间为 4 h。试验结果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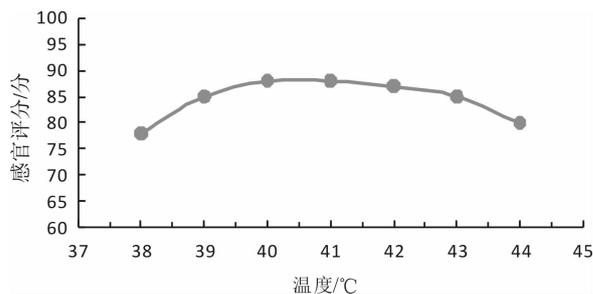


图 4 不同发酵温度对奶昔的影响

由图 4 可知, 发酵温度为 40~41℃ 时, 达 88 分, 效果最佳。色香味都比较协调搭配, 产品呈现淡淡的黄瓜米酒奶香味、细腻、爽口。

2.5 最佳发酵时间的确定

选取工艺 A, 米酒发酵液的添加质量分数为 20%, 蔗糖添加质量分数为 6%, 选取发酵时间分别为 2, 3, 4, 5, 6, 7, 8 h; 米酒发酵液杀菌条件为 95 ℃, 5 min; 发酵温度为 40℃。试验结果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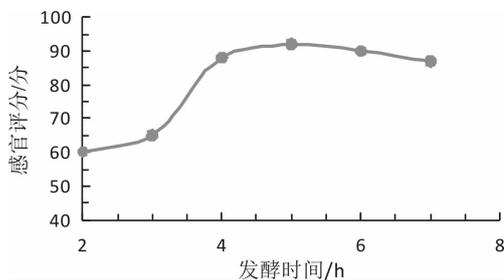


图 5 不同发酵时间对奶昔的影响

由图 5 可知, 发酵时间为 5 h 时, 达 92 分, 效果

最好。淡淡黄瓜米酒奶香味, 酸甜味适中, 口感细腻。

2.6 正交试验设计结果

根据单因子试验结果, 选用米酒发酵液、黄瓜浆液及发酵时间, 设计了一个正交试验。选用表 2 所示的 $L_9(3^4)$ 正交设计表, 试验结果如表 3。

表 2 $L_9(3^4)$ 正交试验设计表

水平	因素		
	A 米酒发酵液/%	B 黄瓜浆液/%	C 发酵时间/h
1	18	10	4
2	20	12	5
3	22	14	6

表 3 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A	B	C	持水力/%	感官评分
1	1	1	1	59	78
2	1	2	2	65	89
3	1	3	3	69	95
4	2	1	2	71	96
5	2	2	3	63	89
6	2	3	1	74	93
7	3	1	3	68	91
8	3	2	1	64	90
9	3	3	2	55	86
K1	64.3	66	65.7		
K2	69.3	64	63.7		
K3	62.3	66	66.7		
R	7	2	4		
K1	87.3	88.3	87		
K2	92.7	89.3	90.3		
K3	89	91.3	91.7		
R	5.4	3	4		

由表 2 进行直观分析, 可以看出持水力的最优组合是 $A_2B_1C_3$, 比较各因素的极差大小为 $R_A > R_C > R_B$, 对奶昔影响的主次顺序为 ACB; 持水力是衡量产品保持水分的能力,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产品的组织状态, 对产品感官品质有较大影响^[16-17]。感官评定的最优组合是 $A_2B_3C_3$, 比较各因素的极差大小为 $R_A > R_C > R_B$, 对感官评定影响的主次顺序为 ACB。

经过分析, 本试验的最优组合是 $A_2B_3C_3$, 即米酒发酵液添加质量分数为 20%, 黄瓜浆液添加质量分数为 14%, 发酵时间为 6 h。由于 $A_2B_3C_3$ 组合不在试验之内, 所以补加验证试验 $A_2B_3C_3$ 组合。按优选工艺组合 $A_2B_3C_3$ 试验 3 次, 试验表明, 持水力为 75%, 感官评分为 92 分。

3 结论

研究了米酒黄瓜奶昔产品配方和生产工艺, 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确定了米酒黄瓜奶昔的最佳配方及生产工艺条件。工艺 A 最佳, 米酒发酵液添加质量分数为 20%, 黄瓜浆液添加质量分数为 14%, 蔗糖添加质量分数为 6%, 发酵温度为 42℃, 发酵时间为 6 h。在此配方工艺下, 产品持水力为 75%,

感官评分为 92 分。最终研发出具有明显的乳香和淡淡酒香及淡淡的黄瓜香味,口感滑润细腻、爽口、浓稠度适宜、稳定性好的米酒黄瓜奶昔产品。

参考文献:

[1]何钢,彭灵犀,贺婷婷,等.糯米酒发酵工艺优化[J].成都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33(4):325-327.

[2]王涵欣,乔发东,刘孟健,等.玉米甜酒的发酵特征与米酒酸奶生产工艺优化[J].食品研究与开发,2014,35(16):69-72.

[3]李培睿,张晓伟,王丽娜.凝固型黄瓜酸奶的研制[J].江苏农业科学,2015,43(11):357-359.

[4]黄国宋,黄伟康,郭静依,等.19份华北型黄瓜新品种主要农艺性状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J].现代农业科技,2021(11):81-84.

[5]LIU K D, YUAN C C, FENG S X, et al. Genome-wide analy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ux/IAA family genes related to fruit ripening in papaya (*Carica papaya* L.) [J]. BMC Genomics, 2017, 18(1): 892-1024.

[6]TAKEBE Y, TAKIZAKI M, TANAKA H,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biogenic amine-production ability of lactic acid bacteria Isolated from Tofu-misozuke [J].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2016, 22(5): 673-678.

[7]闫华文.甜酒曲中真菌多样性的研究及甜酒酿营养成分分析[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5.

[8]阮雁春,冯印.响应面法优化红酒酸奶的制作工艺[J].食品研究与开发,2020,41(23):112-116.

[9]DE MESA - STONESTREET N J, ALAVI S, GWIRTZ J. Extrusion ~ enzyme liquefaction as a method for producing sorghum protein concentrates [J]. Journal of Food Engineering, 2012, 10(8): 365-375.

[10]陈德.日本软冰激凌和奶昔[J].冷饮与速冻食品工业, 1998(2):40-42.

[11]农皓如,唐艳,李玲,等.水牛乳果味奶昔的工艺研究[J].中国乳业,2020(3):20-23.

[12]陈丽娜,吴琼,石矛,等.沙棘籽及果皮渣黄酮提取工艺研究[J].食品科技,2010,10(20):211-214.

[13]牛广财.食品科学创新实验技术[M].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2013:222-223.

[14]吴森,唐善虎,李思宁,等.不同益生菌与嗜热链球菌共培养发酵乳的理化、质构及感官特性研究[J].食品科技,2020,45(12):1-7.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GB 19302-2010[S].

[16]WANG J, GUO Z, ZHANG Q, et al. Effect of probiotic *Lactobacillus casei* Zhang on fermen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et yogur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airy Technology, 2010, 63(1): 105-112.

[17]CASAROTTI S N, MONTEIRO D A, MORETTI M M S, et al. Influe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probiotic cultures during fermentation and storage of fermented milk [J]. 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14, 59(5): 67-75.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Rice Wine Cucumber Milkshake

FENG Chong^a, YAO Hong^b, CHEN Anqi^a, XU Mingyuan^a, FENG Qianjie^a

(a.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b. Center of Analysis Test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optimum formula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of rice wine cucumber milkshake were determined by single factor test and orthogonal test. Single factor and orthogonal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process A was the best. The amount of rice wine fermentation broth was 20%, the amount of cucumber slurry was 14%, the amount of sucrose was 6%, the fermentation temperature was 42 °C, and the fermentation time was 6 h. Under this formula, the water holding capacity is 75%, and the sensory score is 92 points. The product has obvious frankincense, light wine aroma and light cucumber aroma, refreshing smooth and delicate tastes, good consistency and stability.

Key words: rice wine; cucumber; milkshake; production technology

金属催化的双环化反应构建稠合氮杂环骨架方法研究进展

范 威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科研处, 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 氮杂环化合物包括吡嗪、嘧啶、萘啶、异喹啉等结构。该骨架存在于 Lenalidomide, Rosettacin, Oxypalmatine 等活性分子中, 其合成备受化学家的关注。金属催化的双环化反应是构建氮杂环骨架的常用方法, 从单组分、两组分和多组分三个角度对该类反应进行叙述, 将为稠合氮杂环化合物的合成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金属催化; 双环化反应; 氮杂环骨架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4.024

中图分类号: O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1)04-0125-04

吡嗪^[1]、嘧啶^[2]、萘啶^[3]、异喹啉^[4]等化合物均为氮杂环化合物, 该类衍生物的合成受到了化学家的格外青睐^[5]。如图 1 所示, Lenalidomide^[6]、Rosettacin^[7]、Oxypalmatine^[8]等活性分子的关键母核都是氮杂环骨架。利用金属催化的双环化反应(单组分、两组分和多组分)可以构建多样的氮杂环骨架^[9]。对这类反应进行总结, 将为稠合氮杂环化合物的创新合成提供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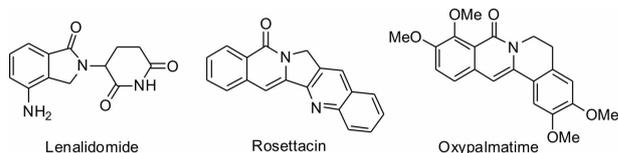


图 1 含有氮杂环骨架的活性分子

1 单组分双环化反应

HUANG F 等^[10]构建了环丙并吡咯骨架。该方法通过溴化铜(CuBr₂)介导下 α -氧代乙烯酮 N, S-乙缩醛的分子内氧化环丙烷化反应, 在氩气条件下合成了 37 例三元并吡咯衍生物。该反应的优点是温度适宜, 缺点是反应时间过长(图 2)。

SHEN W B 等^[11]构建了环戊烯并吡咯骨架。该合成路线用一价铜催化烯二炔, 最终以 66% ~ 87% 的产率合成了 20 例五元并吡咯衍生物。反应

涉及 α -氧代铜卡宾的形成、卡宾/炔烃复分解、[3+2]环加成等过程, 简洁高效(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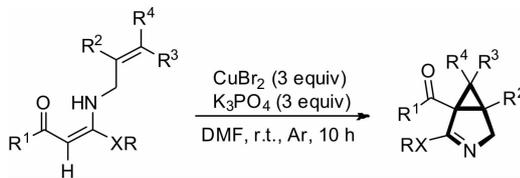


图 2 构建环丙并吡咯骨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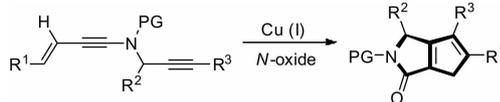


图 3 构建环戊烯并吡咯骨架

ZHAO S 等^[12]构建了环丙并氮杂卓骨架。反应用 10 mol% 的铱催化 1,7-烯炔, 在 45℃ 的氯仿溶液中反应, 合成了 19 例三元并氮杂卓衍生物, 最高产率达到了 98%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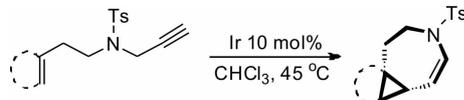


图 4 构建环丙并氮杂卓骨架

SONG L 等^[13]研究了金(I)催化下 N-炔基-2-乙酰胺构建吡嗪酮骨架的串联转化反应。该

收稿日期: 2021-05-29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KJ2020A1003);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院级科研项目(2021zk07)

作者简介: 范威(1988—), 男, 江苏徐州人, 博士,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有机合成。

路径通过连续的亲核环化/烯炔环异构化/1,2-迁移过程,在温和条件下以区域特异性和会聚方式合成了各种吡咯酮并[1,2-b]异喹啉(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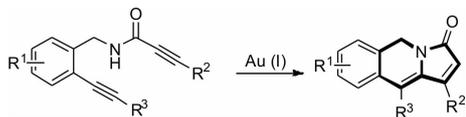


图5 构建吡咯酮骨架

KONISHI K等^[14]发展了铜催化下炔酰胺构建吡唑并吡啶骨架的顺序环化/迁移反应。该合成策略在氯苯溶液中回流反应0.5 h,通过扩环合成了N-N稠合的吡唑啉酮。该反应涉及亲核加成/1,3-迁移/双亲核取代等过程(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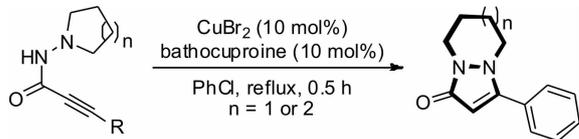


图6 构建吡唑并吡啶骨架

2 两组分双环化反应

MENG H等^[15]报道了由铜/ PPh_3 介导的邻硝基芳炔与甲基酮肟构建吡咯酮并吡啶骨架的串联反应。该策略通过 PPh_3 介导的脱氧环异构化和铜催化的[3+2]吡啶环化,提供了合成各种吡啶稠合的吡咯酮化合物的可行途径。该反应以30%~70%的产率合成了35例产物(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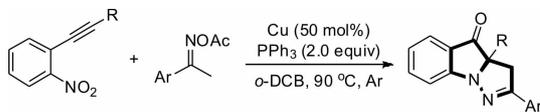


图7 构建吡咯酮并吡啶骨架

REDDY C R等^[16]研究了室温下构建吡咯酮骨架的两组分反应。该合成策略用5 mol%的三价铈催化N-(新戊酰氧基)苯甲酰胺和1,5-烯炔,反应4~15 h,通过C-H活化过程合成了22例吡咯酮衍生物(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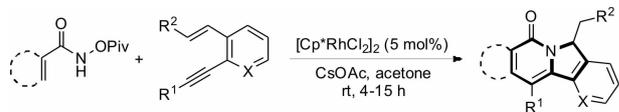


图8 构建吡咯酮骨架

QIAO S等^[17]构建了环戊并吡啶酮骨架。该反应以二烯和烷氧基甲酰肟为原料,铁为催化剂,过硫酸铵为氧化剂,在80℃的DMSO中反应12 h,合成了四环稠合的茚并喹啉衍生物。该合成方法具有高区域选择性和高立体选择性的特点(图9)。

GAO Y等^[18]描述了10 mol%的三氟甲磺酸铜催化下构建环戊烯并吡啶骨架的方法,合成了三环稠合的环戊烯并喹啉衍生物。该反应的优点是反应

成本低,溶液绿色环保,缺点是产率仅为25%(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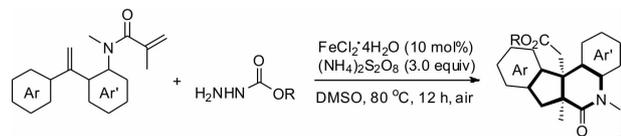


图9 构建环戊并吡啶酮骨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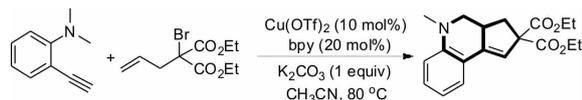


图10 构建环戊烯并吡啶骨架

PRADHAN S等^[19]构建了咪唑并吡啶骨架。该合成方法用20 mol%的三氟甲烷磺酸锌催化活性的氮丙啶与N-炔丙基苯胺,在甲苯中合成了17例咪唑并[1,2-a]喹啉化合物。该反应的优点是产率和ee值高,但选用的溶剂不绿色环保(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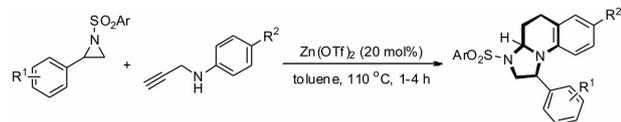


图11 构建咪唑并吡啶骨架

JIL等^[20]在室温下构建了萘啶骨架。该策略涉及N-芳基丙烯酰胺的炔加成串联氨基插入/环化反应,合成了氘代菲啶衍生物。廉价的 $\text{Fe}(\text{NO}_3)_3 \cdot 9\text{H}_2\text{O}$ 可以使 NaBD_4 原位生成氘自由基。该反应对各种官能团的耐受性良好(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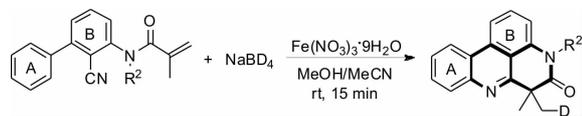


图12 构建萘啶骨架

LUO X等^[21]报道了钨催化的多米诺 Heck/C-H活化/脱羧反应,构建了环己烯、环庚烯并吡啶酮骨架。在该反应中,邻溴代苯甲酸被用作偶联剂,通过 $\text{C}(\text{sp}^2)-\text{Br}$ 的裂解和脱羧实现了芳环的插入,从而合成了各种四环和五环稠合氮杂环。该合成方法的优点是区域选择性高,底物多样(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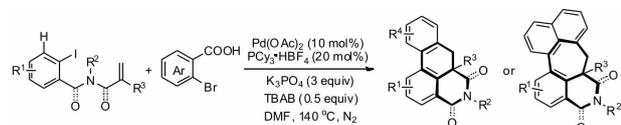


图13 构建环己烯、环庚烯并吡啶酮骨架

3 多组分双环化反应

HUANG K等^[22]构建了吡咯并吡啶骨架。该反应用四(三苯基膦)钨催化邻碘代芳炔和异脞,在110℃的甲苯溶液中合成了吡咯并喹啉。该反应选用的溶液属于致癌物质,不是绿色溶剂。该合成方法的最高产率为75%,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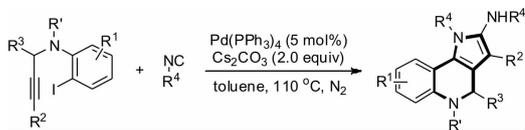


图 14 构建咪唑并吡啶骨架

OUYANG H C 等^[23]构建了咪唑并吡啶骨架。该策略用碘化亚铜催化炔醛、邻苯二胺、N-溴代琥珀酰亚胺或碘，合成了卤代异喹啉稠合的苯并咪唑衍生物，丰富了四环稠合氮杂环(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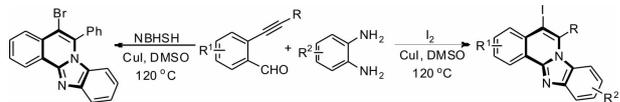


图 15 构建咪唑并吡啶骨架

LIU Z 等^[24]报道了环状二芳基碘鎓、炔烃和叠氮化钠的三组分构建三唑并[1,5-a]吡啶骨架的串联反应。该合成路径在碘化亚铜催化下的 DMSO 溶液中反应，合成了[1,2,3]三唑并[1,5-f]菲啶衍生物(图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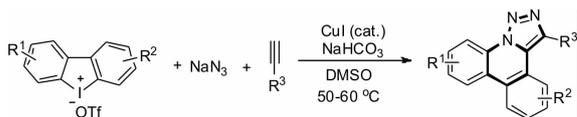


图 16 构建三唑并[1,5-a]吡啶骨架

XU C 等^[25]构建了三唑并[4,5-c]吡啶骨架。该路线从可商购的 2-溴苯甲醛，叠氮化钠和芳基甲基酮出发，历经连续的碱促进的缩合，[3+2]环加成，铜催化的 S_NAr 和脱氮环化过程，合成了 1H-[1,2,3]三唑并[4,5-c]喹啉衍生物。机理研究表明，在该反应中 CuBr₂ 充当多功能催化剂。该反应一步构建一个 C-C 键和四个 C-N 键(图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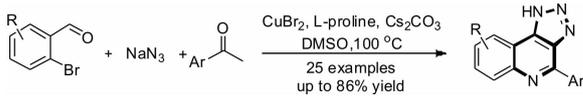


图 17 构建三唑并[4,5-c]吡啶骨架

RAMANATHAN M 等^[26]构建了嘧啶并嘧啶酮骨架。该反应以邻甲氧基羰基苯重氮盐、2-氨基苯胺和腈为原料，以良好的产率合成嘧啶[1,6-a]嘧啶。该路线一步构建了 4 个 C-N 键，涉及胺化/串联环化/酰胺化等过程(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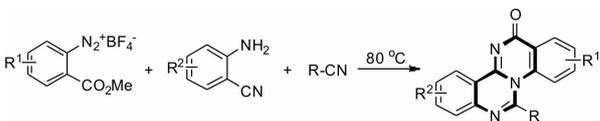


图 18 构建嘧啶并嘧啶酮骨架

4 结语

本文综述了金属催化的双环化反应在构建稠合氮杂环骨架中的研究进展。通过铜、铈、钨等金属催

化的双环化反应构建了环丙并吡咯、吡啶并吡咯、吡啶并吡啶等多样的稠合氮杂环化合物，分别拓展了单组分、两组分和多组分双环化反应，丰富了化合物的种类，也为继续探究金属催化下氮杂环骨架的构建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 [1] STREIT A D, ZOLL A J, HOANG G L, et al. Annulation of hydrazones and alkynes via rhodium(III)-catalyzed dual C-H activation: synthesis of pyrrolopyridazines and azolopyridazines[J]. Organic Letters, 2020, 22(3):1217-1221.
- [2] GAO Q, WU M, ZHANG K, et al. I₂-Catalyzed aerobic α, β -dehydrogenation and deamination of tertiary alkylamines: highly selective synthesis of polysubstituted pyrimidines via hidden acyclic enamines[J]. Organic Letters, 2020, 22(14):5645-5649.
- [3] TSURUOKA R, YOSHIKAWA N, KONISHI T, et al. Asymmetric synthesis of a 5,6,7,8-tetrahydro-1,6-naphthyridine scaffold leading to potent retinoid-related orphan receptor γ t inverse agonist TAK-828F[J]. Th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20, 85(16):10797-10805.
- [4] JO Y I, LEE C Y, CHEON C H. Atroposelective total syntheses of naphthylisoquinoline alkaloids with (P)-configuration[J]. Th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20, 85(19):12770-12776.
- [5] HEDGES J B, RYAN K S. Biosynthetic pathways to non-proteinogenic α -amino acids[J]. Chemical Reviews, 2020, 120(6):3161-3209.
- [6] BAI Y, SHI L, ZHENG L, et al. Electroselective and controlled reduction of cyclic imides to hydroxylactams and lactams[J]. Organic Letters, 2021, 23(6):2298-2302.
- [7] GUO S, SUN L, WANG F, et al. Rh(III)-Catalyzed oxidative annulation of isoquinolones with diazoketoesters featuring an in situ deacylation: synthesis of isoindoloisoquinolone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to rosettacin analogues[J]. Th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18, 83(19):12034-12043.
- [8] ZHOU S, TONG R. A general, concise strategy that enables collective total syntheses of over 50 protoberberine and five aporphine alkaloids within four to eight steps[J]. Chemistry - A European Journal, 2016, 22(21):7084-7089.
- [9] TANG H T, ZENG J H, CHEN J J, et al. Synthesis of pyrazolo[5,1-a]isoquinolines through copper-catalyzed regioselective bicyclization of N-propargylic sulfonylhydrazones[J]. Organic Chemistry Frontiers, 2017, 4(8):1513-1516.
- [10] HUANG F, WU P, YV Z. Copper(II)-mediated intramolecular cyclopropanation of ketene N,X-acetals (X = S, O, N) under mild conditions[J]. Th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20, 85(6):4373-4385.

- [11] SHEN W B, TANG X T, ZHANG T T, et al. Cu(I) – Catalyzed oxidative cyclization of enynamides: regioselective access to cyclopentadiene frameworks and 2 – aminofurans [J]. *Organic Letters*, 2020, 22(17):6799 – 6804.
- [12] ZHAO S, ZANG Z L, LI S, et al. Iridium – catalyzed cycloisomerization of N – tethered 1,7 – enynes; construction of an azabicyclo[5.1.0]octene system[J]. *Th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20, 85(14):9321 – 9330.
- [13] SONG L, TIAN G, MEERVELT L V, et al. Synthesis of pyrrolo[1,2 – b]isoquinolines via gold(I) – catalyzed cyclization/enyne cycloisomerization/1,2 – migration cascade [J]. *Organic Letters*, 2020, 22(16):6537 – 6542.
- [14] KONISHI K, YASUI M, OKUHIRA H, et al. Copper – catalyzed sequential cyclization/migration of alkynyl hydrazides for construction of ring – expanded N – N fused pyrazolones[J]. *Organic Letters*, 2020, 22(17):6852 – 6857.
- [15] MENG H, XU Z, QU Z, et al. Copper(0)/PPh₃ – mediated bisheteroannulations of o – nitroalkynes with methylketoximes accessing pyrazo – fused pseudoindoxyls[J]. *Organic Letters*, 2020, 22(15):6117 – 6121.
- [16] REDDY C R, MALLESH K, BODASU S, et al. Rh(III) – Catalyzed domino[4 + 2] annulation/aza – Michael addition of N – (pivaloyloxy)benzamides with 1,5 – enynes via C – H activation; synthesis of functionalized aromathecins[J]. *Th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20, 85(12):7905 – 7915.
- [17] QIAO S, QIAN P C, CHEN F, et al. Iron – catalyzed radical cascade 6 – endo cyclization of dienes towards fused nitrogen heterocycles initiated by an alkoxycarbonyl radical [J]. *Organic & Biomolecular Chemistry*, 2020, 18(36):7086 – 7089.
- [18] GAO Y, ZHANG P, LI G, et al. Cascade annulation of 2 – alkynylthioanisoles with unsaturated α – bromocarbonyls leading to thio – benzobicyclic skeletons[J]. *Th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18, 83(22):13726 – 13733.
- [19] PRADHAN S, CHAUHAN N, SHAHI C K, et al. Stereos-
- elective synthesis of hexahydroimidazo[1,2 – a]quinolines via Sn₂ – type ring – opening hydroarylation – hydroamination cascade cyclization of activated aziridines with N – propargylanilines[J]. *Organic Letters*, 2020, 22(20):7903 – 7908.
- [20] JI L, GU W, LIU P, et al. Iron – mediated deuterium addition cascade cyano insertion/cyclization of N – arylacrylamides to access deuterium – labelled phenanthridines[J]. *Organic & Biomolecular Chemistry*, 2020, 18(31):6126 – 6133.
- [21] LUO X, ZHOU L, LU H, et al. Palladium – catalyzed domino Heck/C – H activation/decarboxylation: a rapid entry to fused isoquinolinediones and isoquinolinones[J]. *Organic Letters*, 2019, 21(24):9960 – 9964.
- [22] HUANG K, LIU J B, CHEN Z F, et al. Palladium – catalyzed imidoylation – triggered[2 + 2 + 1] cyclization of internal alkyne with isocyanides [J]. *Organic Letters*, 2020, 22(15):5931 – 5935.
- [23] OUYANG H C, TANG R Y, ZHONG P, et al. CuI/I₂ – Promoted electrophilic tandem cyclization of 2 – ethynylbenzaldehydes with ortho – benzenediamines: synthesis of iodoisoquinoline – fused benzimidazoles [J]. *Th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11, 76(1):223 – 228.
- [24] LIU Z, ZHU D, LUO B, et al. Mild Cu(I) – catalyzed cascade reaction of cyclic diaryliodoniums, sodium azide, and alkynes: efficient synthesis of triazolophenanthridines [J]. *Organic Letters*, 2014, 16(21):5600 – 5603.
- [25] XU C, JIANG S F, WU Y D, et al. Copper – catalyzed multicomponent domino reaction of 2 – bromobenzaldehydes, aryl methyl ketones, and sodium azide; access to 1H – [1,2,3] triazolo[4,5 – c]quinoline derivatives [J]. *Th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18, 83(23):14802 – 14810.
- [26] RAMANATHAN M, LIU S T. Preparation of quinazolin-oquinazolinones via a cascade approach [J]. *Th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18, 83(22):14138 – 14145.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Progress of Metal – Catalyzed Bicyclization Reactions to Construct Fused Nitrogen Heterocyclic Skeleton

FAN Wei

(Office of Research Affairs, Chuzhou City Vocation College, Chuzhou, Anhui 239000, China)

Abstract: Nitrogen heterocyclic compounds include pyridazine, pyrimidine, naphthyridine, isoquinoline and other structures. This skeleton exists in active molecules such as Lenalidomide, Rosettacin, Oxypalmatime, and its synthesis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hemists. The metal – catalyzed bicyclization reaction is a common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nitrogen heterocyclic skeleto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is type of reactio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one – component, two – component and multi – component, which will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synthesis of fused nitrogen heterocyclic compounds.

Key words: metal catalysis; bicyclization reaction; nitrogen heterocycle skeleton